

俄国文学的几场论争

——《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观察

耿海英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黑暗七年”时期,俄国文学依然保持着应有的张力与活跃,围绕几份重要刊物《现代人》《莫斯科人》《祖国纪事》《读者文库》,特别是在《现代人》与《莫斯科人》之间,进行美学与文学论争。论争涉及“自然派”内部的争论,“小品体”与“概观体”之争,“主—客观”之争,“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等。这些论争决定了当时俄国文学的多元生态与面貌,也决定了俄国文学未来的趋势。

关键词:“黑暗七年”;俄国文学;杂志论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01-09

涅克拉索夫开始主编《现代人》之后,别林斯基迅速成为杂志的精神领袖,但很快随着别林斯基的去世,《现代人》进入了“德鲁日宁时期”(正是史称的1849—1855“黑暗七年”)。传统研究对这一阶段相对忽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这一时期整个俄国文学毫无建树,没有结出任何“果实”,当然也包括《现代人》的文学批评与创作。这是从“车氏标准”或“车氏真理”出发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正如笔者在文章《俄国文学的多元生态——〈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观察》中呈现的那样,不仅《现代人》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时代,同时《莫斯科人》也迎来自己的新生。在两份杂志周围分别聚集了以德鲁日宁和阿·格里戈里耶夫为首的批评家和文学创作力量,各自秉持自己的美学原则与批评理念,在诸多问题上形成论争。同时,论争涉及《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甚至波及一些文学报纸,遂成“后别林斯基时代”新的文学与批评力量的角逐,带来俄国文学多元的自然生态与驳杂面貌。

这“七年”中,在《现代人》与《莫斯科人》真正成为激烈对手之前(1850年之前),《现代人》的主要论争对手是《祖国纪事》。安年科夫在《1848年俄国文学札记》中写道:“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仅局限于出现在两份彼得堡杂志上的作品,而置其他期刊上的作品于不顾。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只有我们提到的那两份刊物(指《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笔者),其文学作品虽具有不同特质,却各自具有某种明显的思想的统一性和严肃的理想的渴望,无论它们是什么理想。”^[1]也就是说,唯有它们是思想上可以匹敌的力量。这里指的是,1846年4月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主笔《现代人》(1846年4月),随即瓦·迈科夫接手《祖国纪事》批评栏目任首席批评家(1846年4月),两杂志构成短暂的对峙。随着他们前后去世,《祖国纪事》失去力量,《现代人》进入德鲁日宁时代,1850年《莫斯科人》“青年一代编辑”真正崛起,构成《现代人》的另一对手。因此,我们说,若以《现代人》为坐标来观察,从倾向上看,内

收稿日期:2019-03-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俄国《现代人》杂志研究(1836—1866)”(17AWW005)

作者简介:耿海英(1964—),女,江苏邳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与翻译30余年。

部是《现代人》与《祖国纪事》的争论,外部是《现代人》与《莫斯科人》的争论。

一、自然派内部的分裂与争论: 《现代人》VS《祖国纪事》

别林斯基在1847年给鲍特金的信中曾说:“《祖国纪事》与《现代人》是同一倾向。”^[2]一般研究者也许据此总是有一个粗略的且相当稳定的看法:《祖国纪事》与《现代人》是志同道合的。实际上,这既是别林斯基没有充分评价“自然派”内部不断发展的矛盾,也是后来研究者没有区分不同时段两杂志的不同特点,忽略了它们的内在分歧。首先,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冲突(1847),使他摘去了果戈理“文学领袖”的桂冠。其次,别林斯基1846年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之后,很快,他及未来他的《现代人》圈子就对陀氏冷淡下来:别林斯基否定了陀氏“不同寻常的天才”^①;别林斯基去世后不久,安年科夫在1849年第1期《现代人》发表《1848年俄国文学札记》,宣布整体上不接受围绕《祖国纪事》的一批青年作家的文学流派(以陀氏的创作风格为代表,还有布特科夫等),这与别林斯基一脉相承。再者,别林斯基入主《现代人》,迈科夫入主《祖国纪事》,俩人在各自的话语权力空间与对方展开思想争论。最后,别林斯基加入《现代人》之后,在他和涅克拉索夫、巴纳耶夫、德鲁日宁、鲍特金等人之间,意见也并非完全一致;后别林斯基去世,德鲁日宁为首的《现代人》也不再遵循别林斯基的批评纲领。凡此种种都意味着在1947—1948年间,以《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为平台的“自然派”内部的裂口越来越大,最终各自离散,或者正确地说,本就是别林斯基捏合到一起的“自然派”彻底瓦解,文学回归到自然生态。这个短暂阶段“自然派”内部的论争,可以说是我们本文所探讨的《现代人》“德鲁日宁时期”所处的“黑暗七年”阶段更激烈论争的前奏,具有代表性的即两份杂志主编别林斯基与迈科夫之争。

早在1846年初《祖国纪事》出版人兼主编克拉耶夫斯基就与其首席批评家别林斯基因美学、思想以及经济等问题,合作关系开始破裂。4月经屠格涅夫推荐,克拉耶夫斯基吸收立场相对一致的瓦·迈科夫主持《祖国纪事》批评栏目。在主持杂志后的第一篇文章《阿·瓦·科利佐夫^②的诗歌》中,迈科夫就与别林斯基展开争论。阿·乌·波列茨基^③曾撰文《1847年8月的〈祖国纪事〉》指出:迈科夫

的文章准确界定和评价了别林斯基作为批评家的功绩,但“他在自己前任的批评中发现了无根据性,‘无意识的与严格的逻辑要求相矛盾的东西’,并指出了其批评方法的有害后果:绝大部分读者轻信了别林斯基的判断,并作为一种时髦的新东西无意识地吸收它们,也正因此它们对智性的影响只能是表面的。”^{[3]XXXIV}迈科夫在别林斯基“无根据性”的方法中看出了对待读者的“专横、独裁、霸道”,他在文章中指出:“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却不用根据去证明它们,让你自己去发现它们是确定无疑的,这已经意味着对自由见解表达的不尊重和独裁的意图。”^{[3]10}在别林斯基的批评中,迈科夫感到缺乏整体的科学的见解。别林斯基的批评源于黑格尔的美学学说,但对于迈科夫来说,纯粹思辨的体系并不是科学最终的话语^{[3]XXXV}。迈科夫的公开指责引来别林斯基的愤怒。

在当时各界热议的话题“民族性”问题上,迈科夫也与别林斯基针锋相对。迈科夫关于“民族性”的看法虽然前后有变,但后期基本确定的观点是将“民族性”作为一种与文明相敌对的力量表述的。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理想的人类及其相应的“理想的文明”,认为,“越是人,其生活越是包含独特性,即越是偏离理性,那么就越是低水平的人,其生活也就越是非理性……在一个民族的文明中越是较少独特性,这个民族就越是文明”^{[3]389}。在评价作为“社会综合体基础”的民族性时,迈科夫承认它在社会经济福祉、道德和政治方面的价值^{[3]587-589};而当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份子时他发现了民族性的片面性,民族独特性在他眼里就成了弱点,甚至是毛病^{[3]63-69}。他试图证明“全人类的价值”高于“民族价值”。不过,他也暗示了关于此问题的各种可能的观点。其实这是迈科夫对过分强调独特性而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唯我独尊和排他性的严重后果的警觉。

别林斯基关于“民族性”的论说为我们所熟知,他以主持《现代人》批评栏目的第一篇文章《1846年俄国文学观察》回答迈科夫,称其立场是“虚幻的世界主义”。文中不提名地说“一种人陷入虚幻的民族性里,另一种人为了人类的名义,陷入虚幻的世界主义”^{[4]514},指的就是瓦·迈科夫的《阿·瓦·科利佐夫的诗歌》中的观点。他说:“把民族的与人类的分成两个完全陌生的、甚至是敌对的原则,这就是陷在最抽象、最书呆子气的二元论里。”^{[4]515}“民族性乃是人类个性的本质。没有民族性,人类将是僵

死的逻辑的抽象物,没有内容的言辞,没有意义的声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与其站在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一边,还不如转到斯拉夫派一边……然而我还是指望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必转到随便那一边……”^{[4]519}“人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坚强和安全的,而反过来,要使社会变得坚强和安全,它也必须要有内在的直接的有机的联系——民族性。”^{[4]520}“所谓人类同民族性的斗争,这不过是一种修辞格,在现实中这种斗争是没有的。”^{[4]520}在反驳迈科夫的“虚幻的世界主义”时,他自己是一位具体的相对的历史主义者。他说:“世界上的一切只是相对的重要或不重要,伟大或渺小,老或新。有人会对我们说,‘怎么,连真理、善行都是相对的概念吗?’——不,作为概念,作为思想,它们是无条件的、永恒的。但是作为体现,作为事实,它们却是相对的。真和善的概念得到了所有民族、所有世纪的承认。但是,对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世纪是善的,对于另一个民族在另一个世纪往往却是虚伪和恶。”^{[4]511}他重视和推崇的是具体的民族的价值,而非普遍的人类的概念。在文章起始他就直截了当地称此文将是他主持下的《现代人》的纲领,该文是为了让读者知晓《现代人》对俄国文学的看法,以及杂志的精神和倾向。这样,在当时他及其《现代人》圈子与《祖国纪事》关系紧张背景下,与其论争的色彩不言而喻。

在《祖国纪事》与《现代人》之间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别林斯基在上述文章中,对陀氏截至此时发表的三篇作品《穷人》《双重人格》《普罗哈尔钦先生》给予评述,承认在《穷人》中“陀氏才能的力量、深度和独创性”^{[5]40},但认为小说令读者厌倦,没有节制地拖沓冗长;如果这作为试笔之作还可以原谅的话,在《双重人格》中就是“像怪物般可怕的缺点了”^{[5]40},暴露了陀氏不善驾驭过分充沛的天分能量,也就是不善于“确定理性的尺度和他的理念之艺术发展的边界”^{[5]40};“在《双重人格》中还有另一个最根本的缺点:这就是它的幻想基调。幻想在我们的今天只有在疯人院里可以有它的位置,而不是在文学中;是处于医生的管控下,而不是诗人。”^{[5]41}《普罗哈尔钦先生》就更“像是一种真实的、但却古怪的和乱七八糟的事件,而不是诗的创作”^{[5]42}。

别林斯基去世后,由安年科夫撰写年度观察《1848年俄国文学札记》,该文同样显示着《现代人》与《祖国纪事》之间关于陀氏的论争。他开篇就指出:“让我们从《祖国纪事》(1848年)开始。那里

形成了一个青年作家的圈子。已经相当久了,他们创造了一种幻想的多愁善感的叙事类型,当然在文学史上它并不新鲜,但至少现在以新的形式让它得以复兴。”^[1]安年科夫称这种“幻想的多愁善感的叙事类型”的代表人物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断然否定这一创作方法,认为这是在表现主人公“精神错乱的心理故事”,是彻底的“反艺术性”。安年科夫追随别林斯基,以黑格尔的美学思想理解“艺术性”:艺术中的美与自然中的美是尖锐对立的。按照黑格尔的思想,“艺术克服自然”,经由精神,对自然进行加工和重塑。据此,安年科夫在陀氏作品中找到太多的“反艺术”倾向。这与别林斯基对待《双重人格》的幻想风格的态度相一致。作为《现代人》主创成员的涅克拉索夫同样对陀氏的这一风格持负面评价。而且,安年科夫对陀氏的负面态度也受到涅克拉索夫的煽动。别林斯基亦然。因为虽然别林斯基对《双重人格》和《普罗哈尔钦先生》的态度激烈,但在1846年底他还没有彻底放弃陀氏具有“非凡天才”的看法,只是在涅克拉索夫的纠正下才使他熄灭了这种热情。安年科夫不仅将陀氏的风格认定为“多愁善感”的,还将它推广至《祖国纪事》的所有撰稿人(特别是布特科夫),他称这种手法是“伪现实主义”或“局限地理解的现实主义”。他把“现实主义”理解为反映“日常现实”,“敏锐观察我们社会的各种现象、性格的心理发展”^[1]。安年科夫称别林斯基从来没有号召过“伪现实主义”,《祖国纪事》歪曲了“导师”的遗产。这样,在什么是现实主义的内涵上出现了分歧。

1847年第1期《祖国纪事》发表瓦·迈科夫的《论1846年的俄国文学》,该文成为俄国批评史上评述陀氏的经典文章。与别林斯基及安年科夫相反,他高度评价陀氏的独创性。该文系最早将陀氏评述为“主要是心理诗人”,并将果戈理作为“主要是社会诗人”与陀氏相对照。他指出他们作为忠实于现实的作家的相似之处,同时仔细分辨出他们的不同:“果戈理主要是社会诗人,而陀氏主要是心理诗人。对于前者,个体之所以重要是作为某个社会或某个圈子的代表;对于后者,社会本身受到关注是因为其对个体的个性的影响。”^{[6]84}迈科夫强调陀氏对于俄国文学的重要性,认为缘于他整个当代人转向了人类心灵的解剖。

迈科夫承认陀氏的作品确实只在小众那里获得成功,但舆论和大众除了说他冗长就再没有别的,看不到他的独创性。“我们认为,大部分读者不喜欢

陀氏作品的原因,应该在不习惯他独特地表现现实的方法中寻找。而这一方法也许正是陀氏作品的价值所在。说新东西总应该使多数人感到愉快是无稽之谈,因为,首先,‘多数人’也总是各不相同、众口难调;其次,众所周知,在任何多数人那里总是墨守成规。各个时代各个地方有多少例子,他们真正的艺术作品遭受冷遇,结果随着时间他们被承认为一流经典作家而被捧到天上!如果果戈理早年的文学活动因与我们当时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相对立而不被理解和认可,那么陀氏的广泛接受受阻于他的方法与果戈理方法相矛盾也就没有什么费解的了”^{[6]83-84}。实际上,“陀氏的作品恰恰巩固了果戈理带给我们艺术的那些美学因素的统治地位,证明了巨大的天才走的道路不是别的,只能是打破艺术性定律。同时,陀氏的方法是更高意义上的独创,他比任何人更少模仿果戈理”^{[6]84}。“果戈理的文集可以毫无例外地被称为学,而在陀氏那里也可以找到惊人的社会的艺术图景,但它们只构成图景的背景,更多的是用细节显露,而充盈的是大量的心理兴趣。即便是《穷人》……越读,就越会发现更多的令人震惊的深度的心理分析。我们确信,陀氏的任何一部作品,如果读第二遍、第三遍……就会得到太多太多东西。这只能解释为其中到处弥散着非同寻常的心理特点的细节和深度。”^{[6]84-85}“第一遍读非常容易错过所举出的那一特点(意识的细节——笔者),完全可以说,有许多甚至是多余的和不自然的。但花费些时间去评价所有这些意识的细节,之后,您再读《穷人》——就会发现它深渊般无尽的价值——您、我,任何一位读者、评论者第一眼看起来是缺陷的东西,正是这无尽的价值所在。”^{[6]85-86}

瓦·迈科夫也对《双重人格》进行评说。他指出:“按照我们通常的观点,《双重人格》比起《穷人》来就更少成就,更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新荣誉。但在《双重人格》中,陀氏的方法和对心理分析的痴迷表现得更充分更独创。在这部作品中,他是如此穿透人的心灵,如此坚定和狂热地窥视人类情感、思想、行为的内在隐秘的把戏。阅读《双重人格》所产生的印象,只有酷爱搞透物质化学成分的人给人的印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奇怪的是,似乎更正面的、以化学般眼光看待的现实,被这一眼光照亮的世界图景却总是蒙上了某种神秘之光。……在心理特写中,有的正是那神秘的反光,那正是以深刻地分析现实所得的影像所固有的。《双重人格》在你们面前展开的是灵魂的解剖,这一灵魂已经死于构建完善

的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导致的意识的散乱。”^{[6]86}迈科夫的这些评说即便在今天无比丰富的陀氏研究成果中依然不失价值。他与别林斯基截然对立地肯定陀氏的独创性,如若得以坚持,该是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大幸。只遗憾瓦·迈科夫的早逝和陀氏创作的被中断。

二、“体裁”(“小品体”与“概观体”)作为美学原则/批评理念的载体:《现代人》VS《莫斯科人》

在“黑暗七年”阶段之前别林斯基主笔的《现代人》就与《莫斯科人》有了论战。他在《现代人》1847年第11期上发表的著名的《答〈莫斯科人〉》^④,就是回答1847年第2期《莫斯科人》上尤·萨马林^⑤的文章《论〈现代人〉的历史和文学见解》。萨马林的文章主要针对的是同时发表在1847年第1期《现代人》上的三篇文章,即我们前述别林斯基的《1846年的俄国文学观察》,以及卡维林的《古代俄罗斯法律风尚一瞥》和尼基坚科的《当代俄国文学的倾向》。别林斯基认为该文“涉及的不光是《现代人》,同时也是当代整个俄国文学的基本原则的问题,这样争论就不是个人的意义,而转变为一场思想论争,因而……自己有责任驳斥《莫斯科人》……”^{[5]221}萨马林在文章中指出,别林斯基开始主持的《现代人》“有三个重要之处可以驳斥:第一,缺乏统一的倾向以及内部的协调;第二,其思想方式的片面性和狭隘;第三,歪曲论敌的思想方式”^{[5]223}。别林斯基认为,萨马林的真意在第三点,因而他重点回应了与这位宿敌的思想分歧。《答〈莫斯科人〉》是别林斯基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也是40年代色彩鲜明的思想论争文献,围绕它又引来了一系列别林斯基与斯拉夫派间的唇枪舌剑。它是“黑暗七年”间两杂志论争的引子。

如果说这是思想论争,那么在“黑暗七年”间两杂志的对峙则是另一种性质。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别林斯基去世后“德鲁日宁时期”的《现代人》形成了基本固定的看法,认为其失去了鲜明的文学、美学立场。其实,这是相对于别林斯基以批判现实为宗旨拣选符合自己标准的作家作品的激烈风格而言的。“黑暗七年”间,《现代人》确实是合作者、撰稿人成分驳杂,审美观点也并非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一代《现代人》失去了取向,恰恰在这种不统一中表明着自己的美学原则和批评理念。

在“黑暗七年”间,《现代人》的主要批评家有德鲁日宁、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1849—1854年杂

志的小品文作者主要是德鲁日宁,他的专栏《“外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⑤在杂志批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以自由的“小品体”品论当前的文学状况,坚持评述对象的片段性和非系统性,不以任何理由拒绝对任何作品予以评论。涅克拉索夫这一时期除了发表大量诗作,还发表各种短文和书评。他在1850年第1期上发表了《俄国二流诗人:I.丘特切夫》,引领了杂志,由此开辟了一个方向性话题“俄国二流诗人”,以后各期又相继有鲍特金的《俄国二流诗人:II.奥卡廖夫》、库德里亚夫采夫的《俄国二流诗人:III.费特》、阿·列的《俄国二流诗人:IV.维涅维季诺夫》。巴纳耶夫则从1852年底起接替出走《读者文库》的德鲁日宁,开辟了类似德鲁日宁的专栏《“新诗人”关于俄国杂志的随笔》^⑥,成为小品文的固定作者,以“新诗人”之名写各种短评和讽刺小品。

《现代人》经常性的评论作者还有安年科夫、鲍特金、屠格涅夫。安年科夫的《1848年俄国文学札记》对于杂志来说是关键性的文章,其1854年和1855年的《写老百姓生活的长篇与短篇》和《论高雅文学作品中的思想》也具有纲领性。鲍特金的《俄国二流诗人:II.奥加廖夫》是《现代人》标志性文章;到了1855年他与涅克拉索夫一起主笔《杂志随笔》。屠格涅夫的三篇短评(评叶·图尔的《外甥女》、奥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谢·阿克萨科夫的《带枪猎人的笔记》)对于阐明杂志的美学方针都不可或缺。

我们感到陌生却重要的维·巴·加耶夫斯基1850年曾暂时替代德鲁日宁,发表系列《“外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第16—19封);1851年同样有连载文章《1850年俄国文学观察》,文章理性地总结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俄国文学的重大变化;他还有多篇单独文章和评论。这几年,亚·尼·阿法纳西耶夫也为《现代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参与写作《1849年俄国文学观察》《1850年俄国文学观察》^⑦。康·德·乌申斯基1853—1854年经常在《批评》栏目发表文章,直到车氏1854年到来,《批评》栏目开始了新阶段。

纵观1849—1855年间《现代人》这些作者的文章,除了每期在《批评》栏目的一两篇长文外,上述大部分文章是《杂俎》栏目的短文,其次是《图书》栏目的书评。因此,我们认为“小品文”成为其批评的主要体裁,而且批评对象不分伯仲叔季。正是这些来信、随笔、短评的小品文确定了杂志的面貌。总体

上看,上述作者及文章使这一时期《现代人》的批评风格大体体现了德鲁日宁的“小品文理论”和美学原则,同时也体现着作者各自的“诗学个性”。

波戈金的《莫斯科人》传统的评述对象是书籍,但由于“最近图书出版得很少,杂志成了所有文学的堆放处”,所以从1850年起杂志改变了策略,“编辑部委托青年文学工作者评述杂志”^{[7]213},这就是“青年编辑部”的产生——以阿·格里戈里耶夫为首,还有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叶·尼·埃德尔松、鲍·尼·巴尔马佐夫、捷·伊·菲利波夫等为主要批评力量。他们转向“评述杂志”拯救了《莫斯科人》的颓势。其成员在每期《莫斯科人》中都有文章评论某一新出的杂志。要么每位作者持续地观察一、两种刊物,如埃德尔松评论《祖国纪事》持续了四年;要么几位作者共同追踪一份杂志,如格里戈里耶夫有《1850年的〈现代人〉:论自1847年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出版的文学杂志》,阿尔马佐夫有《论〈现代人〉第8、9期杂志》等。他们每个人的评判都是对自己先前评判引起争议的回应;同样他们之间也相互回应,从而建立了一种整体的持续不断的对当前俄国文学观察。他们以一种统一的、内在不矛盾的、逻辑上站得住脚的观点进行写作。这种连贯性与《现代人》“小品体”的随机性批评形成对照。

我们发现,《莫斯科人》原则上回归了“概观体”批评体裁,如格里戈里耶夫的《1851年的俄国文学》和《1852年的俄国雅文学》,埃德尔松的《论我们美学批评当前的状况及其意义》等。这些“概观体”文章对当前杂志的争论作出总结,对文学和批评发展的总体特征予以描述(但不同于别林斯基的遴选“文学领袖”式的文学概观)。当然,正如我们前述,此时在《现代人》的《批评》栏目也刊登此类“严肃”的“文学观察”,但是在其以小品文为主要批评风格的背景中,这种文章更多是其批评体裁之一,似乎更是“诗学个性”的一种体现。而且,在《现代人》那些“小品体”文章中,同样的作家可以被评论得完全面目不同,例如在巴纳耶夫那里,费特就是一位蹩脚的诗人,“可是《莫斯科人》现在还在那里继续刊登他那些低劣的小诗——当然,是因为现在没有刊物宽容这些蹩脚的诗人了”^{[8]812-813};而德鲁日宁则论断费特说:“我毫不动摇地确信,费特属于我们时代杰出的诗人之列,如果问诗人这一最富含义的修饰语最适合于我们时代的哪位诗人,那么非费特莫属。”^{[9]808}这种截然相反的体现“诗学个性”的论断在《现代人》上并行不悖。相反,“青年编辑部”成员

的文章总是相互间一致。《莫斯科人》批评风格的连贯性、内在一致性、严肃“概观体”，与《现代人》的片段性、内在个性化、戏谑“小品体”形成一种对峙。

《现代人》与《莫斯科人》的体裁取向其实是美学原则之争。正如我们在“《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研究”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德鲁日宁和安年科夫宣称厌倦了批评的概念化和哲学味，厌倦了累赘冗长的俄国文学年度观察，德鲁日宁甚至创造了独特的“小品文理论”。他们摒弃别林斯基“概观体”的教条式批评，有偏见的哲学式的理论，严格的美学体系及其包罗万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人》“德鲁日宁时期”的面貌。

可是《莫斯科人》青年批评家表现出对德国经典哲学的热切追随，埃德尔松主攻康德，格里戈里耶夫主攻谢林。他们深信德国哲学思想对于当前俄国文学的有效性，力图在当时哲学缺失的空间里重回文学批评的严肃感厚重感。他们推崇德国思想关于文学的崇高理念，“坚持艺术的崇高价值和意义高于任何个人的思想体系”^{[10]152}，是最高真理的表达，它能带给生活新的形式和思想，并培养人更合乎道德的精神。因而“青年编辑部”抨击那些在其中看不到努力创作“真正的”“真理的”艺术的作品，认为连载于《现代人》（1851年第1—10期）的涅克拉索夫和巴纳耶夫的小说《死亡之湖》以及德鲁日宁、巴纳耶夫的文学批评的小品文皆属此类。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艺术真正的敌人——以“不严肃的”“嘲笑的”“讽刺的”态度对待那些最严肃、最值得尊敬的作家作品。巴纳耶夫和德鲁日宁成了“小品体”轻慢态度对待批评事业的罪魁祸首，许多作家，从涅克拉索夫到拉·米·佐多夫^⑥都是大众低下趣味的姑息者，而那些令人尊敬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或叶·图尔都是俄国文学被破坏了的“风气”——“自然派”的牺牲品。他们认为“自然派”的整个活动偏离了真正艺术的原则。他们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都归于“自然派”的代表（我们前述的“自然派”内部的分歧在他们这里被忽略），认为他们所有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虚假的艺术概念的致命影响。对于《莫斯科人》的指责，《现代人》同样作出回应。除了德鲁日宁建构的“小品文理论”及其“小品体”创作，巴纳耶夫的小品文系列《“新诗人”关于俄国杂志的随笔》，以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对待“青年编辑部”，指他们重复人所共知的真理，按照过时的标准评判当代文学；德国美学理论现在完全不适宜了。另外，针对《莫斯科人》指责他们“姑

息低下趣味”，他则创作《露馅包子》并搬上舞台，戏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意外事件》，讽刺他给《莫斯科人》圈子唱赞歌。这样，“小品体”与“概观体”不同体裁的使用成为一场美学原则的激烈争论：是要“严肃”还是要“戏谑”，是要“崇高”还是要“低下”。

三、另一个争论：“主—客观”问题：

《现代人》VS《莫斯科人》

主—客观问题，看似一个老掉牙的问题，不值得再提。但是这一最终指向作者——创作对象——批评家——普通读者的关系，即便是当代文艺学也绕不开的问题，同样是区分这一时期不同艺术原则与倾向的标志性问题的。

相对于《现代人》“绝对主观”的小品文批评，对于《莫斯科人》“青年编辑部”来说，界定“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的标准就是“客观性”。其内涵是，艺术家应该有力量表达理想的、任何观察者都理解的形象，作者个人的东西应该是隐蔽的。这里，艺术的“客观性”与对“个性”问题的论述联系在一起。埃德尔松在评述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时写道：“我们认识了一种相当饱满而简洁的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这种主人公类型……正是在此，当作者显然试图努力唤起对主人公的同情时，我们不无沉重和不快地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鲜活的人，而是在许多人身上都可发现的当代缺陷的极端化身。因此我们所讲的就不是针对屠格涅夫一人了，更针对‘不再是彻底的艺术’的那种倾向——集某种发展到极致的特点于一个形象。”^{[11]65}埃德尔松认为，人物这种畸形发展的个性实际上是一种信号——“文学不再是彻底的艺术了”，这时作者对待人物的态度不再是客观的了。

个性问题在“青年编辑部”批评家那里不只是在作品人物层面来谈的问题，还指向作者。《莫斯科人》指责以《现代人》为代表的“西方派”个性过于膨胀，滥用个性，这在自然派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滥用导致许多“偶然”事件，也就是缺少（或不足）所描写事件的根据（我们知道，陀氏那里有多少偶然性）。格里戈里耶夫写道：“自然派方法在于描写个别的偶然的现实的细节”，那些病态的作品“同样缺乏普遍性，更多特殊性和偶然性”，“所有这些品质都源于主观性的无节制发展。”^{[12]319-320}“青年编辑部”批评家曾将当时的文学倾向分类：一类是照相式直接反映现实的“自然派”，一类是“虚伪的有教养派”。格里戈里耶夫称陀思妥耶夫斯基

为直接反映式“自然派”的鲜明代表,屠格涅夫属于“虚伪的有教养派”;但无论看起来多么怪异,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深入底层“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与屠格涅夫的后浪漫主义小说中表现高层的“有教养人物”的敏感心理,却具有同类的性质,即这种完全相反的现象恰恰都是作者对待人物不负责任的态度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作者对人物的过分同情,或绝对的抒情态度,破坏了艺术整体的客观性,代之以病态的主观的人物。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是作者个性的滥用,是作者的不负责任,以带有偏见的思想的名义背叛了艺术性。作者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与人物保持距离。在“青年编辑部”那里,作者的个性问题还与创作目的相关,最终与读者个性的正确发展相关。读者的个性是与批评家的作用联系在一起,并且批评家起相当的作用。“他(批评家)应当真正将读者放到与艺术作品的关系中,告诉读者自己对它的观点。他要做的事是——排除一切偶然的、个人的观念,引导他们走向一个他也属于其中的、作品本身也要求的共同的东西……他有责任给他们以真正的观点,这个观点使得艺术之为艺术,使得摆脱一切足以制约读者个性却非作品本身所需的谎言的东西。”^{[13]227-228}

因此,主一客观问题的争论不是思想之争,而是艺术的最高原则之争。《现代人》坚持艺术及批评的“个性化”,《莫斯科人》主张排除任何个人的、有局限的偏好。“青年编辑部”批评家认为艺术“客观性”的最高形式是莎士比亚,他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作家的典范,他能够代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主人公说话而具有同等的说服力;俄国客观艺术的代表是普希金。不过他们也认为,理论上主观艺术家客观艺术家都具有同等价值,但现在更需要客观艺术家。《现代人》则不满这一“客观性”原则,不希望把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作为评判当代作家的标准,试图选择更有弹性的观点体系看待文学,以便恰当地评价当代俄国作家的价值,避免在抽象论断艺术的属性时无休止地打转转。这与《现代人》文学栏目当时主要支柱是屠格涅夫有关,其《罗亭》(1855)之前的后浪漫主义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以“客观性”标准论断,《现代人》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纵观上述争论,一方主要有德鲁日宁、巴纳耶夫、涅克拉索夫、安年科夫、鲍特金等,另一方则有格里戈里耶夫、埃德尔松、阿尔马佐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批评力量上基本形成了势均力敌的争论双方。两者中,前者更有开放性,后者更有原则性。如德鲁

日宁的立场就显得更灵活、更有弹性。他不止一次赞赏地回应“青年编辑部”的文章,甚至阿尔马佐夫(以埃拉斯特·布拉贡拉沃夫的笔名)那些讽刺他本人小品文的文章,他也均宽容对待。他推崇他们对文学的酷爱和忠诚,但同时认为这些品质可以而且应当与轻松的举重若轻的戏谑的态度结合来对待当代作家。他说:“你们尽管去写戏谑诗、讽刺文吧;想借用哪位大诗人的思想就借用吧;只是要尽可能地犀利和快乐,而不要介意什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因为他们的荣誉是如此牢固,不会因为成千上万最欢乐最轻松的讽刺文而黯淡。”^{[14]210-211}实质上,这种态度与《莫斯科人》更不相容。《现代人》另一位游移的批评家是鲍特金。他虽有代表《现代人》的重要文章,但1850年代初期更接近莫斯科圈子,他的多篇论莎士比亚的立场就与《莫斯科人》接近。他们这种批评立场的弹性和游移是否有另一种深意?意味着更多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无论怎样,在我们观察各方争论的同时,同样应注意到内在的复杂性,它们绝非是可以整齐划一的现象。

除却上述论争外,在《读者文库》内部也曾有阿·伊·雷若夫^⑨与德鲁日宁关于果戈理问题的争论^⑩,在《莫斯科人》与《现代人》之间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皮谢姆斯基等莫斯科圈子作家创作价值的争论,以及波及甚广的“普希金倾向”与“果戈理倾向”之争等,尤其是后者,争论时间之长,涉及人之多,对俄国文学未来走向影响之大,都显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将另辟文探讨。

四、结语

如果以“德鲁日宁时期”的《现代人》为坐标观察俄国“黑暗七年”间的文学与批评,发现“后别林斯基时代”文坛告别了因“狂暴的萨维利昂”而生的不无激烈的氛围,进入没有“文学领袖”的自然生态,但也不意味着别林斯基的影响踪迹全无。《莫斯科人》沿袭的“概观体”,虽然有别于别林斯基,但也强调文学的“严肃性”与“教育性”。针对当时文学人在某种程度上被大众口味所胁迫,《莫斯科人》希望“培养”大众,“塑造”读者,提高读者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像《现代人》编辑和作者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批评与创作迎合、姑息大众口味。埃德尔松的重要文章《说几句我们当前美学批评的现状和意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莫斯科人》将自己的文学批评立场与后期普希金相比拟,标明自己希望对抗服务大众的杂志^⑪。《现代人》则斥责《莫斯科

人》不尊重读者：“读者走在了前面，而你们给他们重复那些早已令人疲惫的东西，给他们说着孩童的语言——你们是想让他们严肃地听你们、读你们！”^[15]这里回响着瓦·迈科夫对别林斯基对待读者的“专横、独裁、霸道”态度的指责声。这些创作原则与批评理念之争，似乎依然是当今文学及批评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处在“黑暗七年”之中，但总以历史的“黑暗”否定或掩盖其间各种文学力量内在的张力和活力而称其“无果实”，实为价值一元论的偏激。以《现代人》与《莫斯科人》为主，涉及《祖国纪事》《读者文库》，甚至波及一些文学报纸的文学论争，像30—40年代一样，使得诸如“民族性”“艺术性”“自然派”“现实主义”“主—客观性”、对待读者的态度等美学原则和批评理念，重又成为讨论的对象，最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别林斯基将文学分出层阶、遴选“文学领袖”、粗暴对待读者甚至作者（如果戈理、如陀氏）的“文学霸权”。《现代人》的“德鲁日宁时期”最重要的贡献，甚至不是什么“纯文学”或“唯美主义”（且对其思想与批评的“唯美”论定亦可商榷），而是以“小品体”的戏谑，抵抗一种话语霸权（亦或与巴赫金的“狂欢体”有异曲同工），以没有原则的原则^⑩对抗单一的原则。虽然当时并没有形成“话语权力”之类的理论阐述，但直接使用“霸权”来指责别林斯基或指向这种企图则是另一派力量清醒的意识（亦或福柯之论可与之呼应）。同样，《莫斯科人》“青年一代”批评家的出现，其真正意义在于与《现代人》形成对话（其具体的文学批评论述也应当给予充分重视）。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莫斯科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争论构成了1850年代上半期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引发的各种严肃论争所形成的力量的辐射，也许终会穿透“黑暗七年”这一历史的“黑洞”，以自己的姿态弥补这一历史研究的缝隙。

注释：

①1840年代陀氏的全部作品12部，除了《九封信的故事》发表在《现代人》1847年第1期上；《穷人》（1846）和《波尔宗科夫》（1848）分别发表在巴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出版的《彼得堡文集》和《配图文集》中，其他全部发表在《祖国纪事》上，也就是恰好是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接任《现代人》，迈科夫接任《祖国纪事》时段。陀氏的这种选择也不是偶然的。陀氏1846—1848年在《祖国纪事》上的作品有：1846年《同貌人》（2期），《普罗哈尔钦先生》（10

期）；1847年《女房东》（10期、12期）；1848年《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1期和12期），《脆弱的心》（2期），《诚实的小偷》（4期），《松树晚会和婚礼》（9期），《白夜》（12期）。

②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ьцов（1809—1842），俄国诗人。亦译：柯里佐夫，柯尔卓夫。

③Александр Устинович Порецкий（1819—1879），作家，《祖国纪事》的法语翻译家，《星期日闲暇》杂志创办人和主编。在《时代》（Время）和《时报》（Эпоха）上曾发表文章，捍卫托尔斯泰的民众教育。一度是陀氏《时报》的编辑和《公民》（Гражданин）的合作人，与陀氏两兄弟、斯特拉霍夫，阿·迈科夫关系友好。

④首次发表在《现代人》1847年第6卷第11期，第3部分。第29—75页。没有署名。

⑤《“外省订户”关于俄国刊物的来信》共有37封，发表时间为1848.12—1854.3。前25封发表在《现代人》上，其中第16—19封由维·巴·加耶夫斯基替代德鲁日宁写。26—33封发表在《祖国纪事》上（即1852年他短暂与之合作时），34—37封又发在《现代人》上。

⑥巴纳耶夫的《“新诗人”关于俄国刊物随笔》共41篇，发于1851—1865年间的《现代人》上。

⑦《1849年俄国文学观察》共两篇（1850年第1、2期），第一篇署名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第二篇署名不详。《1850年俄国文学观察》共3篇（1851年第1、2、3期），第一篇署名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第二篇署名维·巴·加耶夫斯基，第三篇署名不详。

⑧Раф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отов（1795—1871），俄国浪漫主义者，剧评家，作家，翻译家，回忆录作者。《现代人》仅在1852年第3期《图书》栏目推介过他的作品《两兄弟。或1812年的莫斯科》（1851）。

⑨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жов（1826—1872），俄国文学家，莫大法律系毕业，被认为是米留金的得力助手。曾受格拉诺夫斯基的影响。为《祖国纪事》和《读者文库》写有系列评论文章。

⑩见：Егоров Б. Ф. Кри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А. И. Рыжова [М]//Труды по русской и славян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 Тарту, 1958. Вып. I. С. 80.

⑪这一点与笔者对普希金创办《现代人》的初衷的判断一致：在此前研究普希金的《现代人》立场和原则时笔者强调，普希金欲以《现代人》的严肃立场和对重大问题的关注对抗当时刊物的大众化和商业化倾向。

⑫正因此论定它没有鲜明的文学美学立场。

参考文献：

[1] Анненков П. В. 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848 года [J].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849 (1). Отд. III. С. 1—23. 电子版：http://az.lib.ru/a/annenkow_p_w/text_0142.shtml.

- [2]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3 томах [М]. – Том 12.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6.
- [3] Майков В. Н. Критические опыты [М]. Спб, 1891.
- [4] 别林斯基. 文学论文选 [М]. 满涛,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5]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13 томах, – Том 10.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6.
- [6] Майков В. Н. Нечто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1846 году [М] // Рус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40 – 50 – 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отв. ред. Кантор В. К.) М., 1982.
- [7] Григорьев А. 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в 1850 году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с 1847 г. И. Панаевым и Н. Некрасовым) [J]. Москвитянин, 1851 (2).
- [8] Панаев И. И. Письмо Нового поэта к издателям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850, № 11, отд. 6.) [М]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омах – Том 5. М., 1912.
- [9] Дружинин А. В. Собр. соч. в 8 томах [М]. – Т. 6. СПб, 1865.
- [10] Зубков К. Ю.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установки молодой редакции журнала *Москвитянин* (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проблемы) [J].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пб, 2011 (3).
- [11] Эдельсон Е. Н.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в 1850 году Учено –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журнал, издаваемый А. Краевским) [М] // Зубков К. Ю., Балакин А. Ю.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против *Москвитянина*.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15.
- [12] Григорьев А. А. Русская изящ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1852 году [М] // Зубков К. Ю., Балакин А. Ю.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против *Москвитянина*.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15.
- [13] Эдельсон Е. Н.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и значении у нас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критики [М] // Зубков К. Ю., Балакин А. Ю.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против *Москвитянина*.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2015.
- [14] Панаев И. И. Заметки Нового Поэта о русской журналистике. Июль 1851 [J].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851 (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everal Controversi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An Observation of Druzhinin Period in *The Contemporary Magazine*

GENG Hai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Seven Years of Darkness”, Russian literature still maintained its due tension and activity. Aesthetic and literary debates had been carried out around several important magazines, especially around *The Contemporary* and *The Muscovite*. The controversies involved the internal debate of the “naturalism”, the dispute between “feuilleton” and “outline”, the debate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the argument between the “Pushkin tendency” and the “Gogol tendency”, etc. These controversies formed the pluralistic ecology and appearance of Russian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and decided the future trend of Russ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Seven Years of Darkness”; Russian literature; controversies over magazines

编者按:《宋朝故事》是小说家张晓林计划写作的10卷本系列笔记体小说的总称,现已出版两部:《宋朝故事·宋真宗的朝野》和《宋朝故事·书法菩提》;《书法菩提》系列已出版两部:《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和《书法菩提·民国河南书法人物志》,第三部《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墨逸事》已在“中国书法第一报”之称的《书法报》连载结束,即将出版。其中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曾获河南省“第二届杜甫文学奖”“全国第八届书学论文奖”等。基于张晓林在文学创作和书法艺术方面呈现出的特色、潜力及影响力,本刊特推出专辑,选发一组国内实力派作家、评论家对他的推介和评论。

宋朝书家那些有意思的事儿

——序《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

何 弘

(河南省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8)

摘 要:张晓林用笔记体小说的方式来写《宋朝故事》,上至帝王将相、中到名人雅士、下及五行八作小人物的大事小情、趣闻逸事、掌故传说、民风民俗等,其叙事潇洒捭阖、张弛有致、妙不可言。但他的《宋朝故事》和六朝志怪、《聊斋志异》之类的笔记体小说不同,其事都有籍可考,绝不虚构戏说。《宋朝故事》带着深层历史乡愁,同时又具有现代生动气息,是盎然纸上的历史文化小说。《书法菩提》亦是用此笔法。

关键词:张晓林;《宋朝故事》《书法菩提》;笔记体小说;文人精神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10-11

2002年10月,河南省文学院迁到现址办公,为期一年的首届高研班同时开班。当前河南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出身该班者众。其中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写得一笔好字、深得中国传统文人情趣者,非冯杰和张晓林二位莫属了。

尽管如此,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与晓林的交往并不多,他在我脑子里最早留下的是小说家的形象。大约2011年前后,晓林和孔羽、孙玉亮三个开封籍的小说家准备联手举办名为“夷门三友”的研讨会,找我协商相关事宜。为此,我系统阅读了他们的相关作品,由此对晓林和他的小说创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过,后来会议因故未能开成,但由此

开始,我与晓林的来往也多了起来。后来,晓林接手了《东京文学》杂志,一门心思想把杂志的品位搞上去,把开封文学搞上去,希望我能帮助做些工作。从此,由参与杂志社主办的“蔡文姬文学奖”“东京文学奖”开始,我和晓林有了较多的合作,对他的为人做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去年,杂志社正式更名为“大观杂志社”,向文学、书法、收藏等多个领域拓展,并期望能够和文学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基于对晓林的信任,河南省文学院决定与大观杂志社联办《大观》杂志的上旬刊《大观·东京文学》,由我担任编委会主任。于是,和晓林成了经常见面的密切合作者。大观杂志社能和河南省文学院合作,具体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何弘(1967—),男,河南新野人,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文艺评论及跨文体写作。

说我和晓林能够合作，首先缘于把河南文学事业搞好这一共同的使命感，同时也缘于共同的文人情怀。

晓林是杞县圉镇人。杞县是开封下面的一个县，“杞人忧天”说的就是这里的事。圉镇是晓林的老家，也是蔡邕、蔡文姬父女的老家。晓林是很以他的这两位老乡为骄傲的，特意把他张罗的文学奖命名为“蔡文姬文学奖”，一为表达敬意，二为激励来者。蔡邕、蔡文姬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传说“飞白书”就是蔡邕的发明，唐代张怀瓘就非常赞赏“飞白书”，其《书断》称“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晓林志于文学，又潜心书法，成为中国作协、中国书协的双料会员，大约是从两位古代乡贤那里得到了启示，甚或晓林文学、书法双双精进是蔡氏父女暗中护佑加持之故，也未可知。

晓林的文学创作是从小说开始的，大约缘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熟悉，他选择笔记体小说为主要创作形式，多年来在全国各专业文学期刊发表笔记体小说400余篇，100余篇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等转载。晓林的写作虽然中短篇兼及，总体还是以小小说为主，但写小小说不意味着不能干“大事”。几年前，晓林决定在创作方面干点“大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宋朝故事”。这也难怪，虽然过去了近千年，开封人心中始终褪不去的就是大宋情结。

《宋朝故事》是晓林计划写作的10卷本系列笔记体小说的总称，他立志要把它写成一部有文化、有内涵、有故事、有趣味的好书。不过，如果想看正统的军国大事，应该读《宋史》；想看包公断案、杨家将之类的故事，应该去看戏看电视剧；如果想看上至帝王将相、中到名人雅士、下及五行八作小人物的大事小情、趣闻逸事、掌故传说、民风民俗等，看晓林的《宋朝故事》就是最好的选择。晓林用笔记体小说的方式来写宋朝故事，说是故事，其实这些人物、事件在历史典籍里都有确切记载，和六朝志怪、《聊斋志异》之类的笔记小说大大不同，其事都有籍可考，绝不虚构戏说；因为是故事，自然还要生动有趣。我以为，这部书写成之后，我们就又有一部宋代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可读了，读来会让人受益而且还好玩有趣。

《书法菩提》是《宋朝故事》中晓林最先完成的一卷。之所以先从书法家入手，当然和晓林本身也是书家有关。晓林号称自己的书法是师法“二王”的。其实，书法家公开场合都这么讲，但私下他们都认为“学王者死”，所以都拿学“二王”骗别人，而自己则否。我觉得晓林说自己学“二王”也是这个道

理，他学的其实是米芾。米芾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故事的人，他周围的那帮书法家朋友或对手，也都各有性情、各有故事，晓林对此当然再熟悉不过，他写宋朝故事从这里入手，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晓林尽管写了多年的小说，作品被转载过、选载过，也得过奖，但在好手如林的河南小说界，还算不上出类拔萃的一线高手。但是，有了《书法菩提》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晓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符号，他由此就在芸芸众人中立了起来，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书法菩提》这部书，好就好在打破了文体的藩篱，为作者的尽情表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有“中国书法第一报”之称的《书法报》特辟专版连载，并结集出版。

《书法菩提》可以作为小小说来读，每个人物的每则故事都独立成章，别有意趣；这些故事连在一起，相对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或数个人物，自然成为很好的中短篇小说；整部书则是对宋代书法家群体的全面描写，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读也未尝不可。之所以称之为小说，当然是因为这部作品具备了小说的各种元素，最重要的是它有故事，而且讲述得非常生动；其次它有人物，像米芾、黄庭坚、苏轼、蔡襄等人物都写得非常鲜活，而且人物的性格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成长的；再次就是它在还原宋代历史场景的同时，揭示了至今不变而又复杂微妙的人性。因此，从小说的意义上讲，《书法菩提》尽管借鉴了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表现形式，而现代小说的特征和属性其实也完全蕴含在其中。

《书法菩提》也可以作为散文或随笔来读。这些年，文化大散文盛极一时，但多数文章无非是用小说化的叙事手段讲一些历史典故和常识，有深度、有个人见解者少。《书法菩提》写的是宋代的书法家，晓林因本身就是书法家，也是书法理论家，曾获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二等奖等奖项，因而对宋代的这些书法大家不仅有理论上的认识和概括，同时有切身的体验和感悟。如此一来，他的文章自然就有了文化的厚度和韵味。散文文化的书写使其多了些表达的自由和畅快，作品因而具有了历史文化散文的优秀品质。

《书法菩提》继承了中国笔记小说的精神气质，让笔记小说在现代背景下重新表现出巨大的活力。《世说新语》以来，中国代代都有优秀的笔记流传下来，其中很多都具有叙事性或散文性特征，而可以作

为小说来读的,志异志怪的多,典型的就是《聊斋志异》。中国新小说发端以来,在汪曾祺等人的推动下,笔记体小说一度相当受关注。比较而言,《书法菩提》的最大特点在于,既吸收了现代小说的表现特征,同时又接续了古典笔记的文人精神、文人情怀。某种意义上讲,《书法菩提》是对《世说新语》精神直接的最好的继承。笔记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非常文人化的文学样式,寓文化性于趣味性之中,是《世说新语》开创的一个优秀传统,这些在《书法菩提》中都有很好的体现。片段化是笔记体的一

个典型特征,《书法菩提》保留了这一传统。而碎片化阅读在移动终端普及的今天,已成为阅读的普遍形态。笔记体作品的片段化特征与读屏时代的阅读特点正相吻合。

《书法菩提》的这些特点,使它在当下品种繁杂、数量众多的文字中跳脱出来,有了不一样的风貌和品格,不一样的精神和气质。它的表现特征,它的内蕴,决定它有理由受到读者的喜爱——首先,我这个读者是喜爱的,我也因此对晓林的整部《宋朝故事》充满期待。

论《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的叙事艺术

墨 白

(河南省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8)

《书法菩提》里的大多篇章,最初发表在《莽原》《作品》《西部》《小说林》等各种文学期刊上,又被《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选载或收入不同的选本,有的篇章同时被《散文选刊》选载或收入散文年选,接着,《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又陆续在《书法报》上连载。一个文本,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或小说、或散文、或有关书法的话题,这是一个有趣且有意味的事件。现在,当晓林君把这些单独的篇章放在一起组成《书法菩提》(北宋卷)出版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又是一部以新笔记叙事形式——由骨骼、血肉、经络、精气构造的浑然天成如人体一样结构精美的长篇小说。

我们首先看这部小说的骨骼框架。《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总共八章 51 篇,第一章和第八章分别是《北宋宣纸上的墨痕》的上篇和下篇。上篇《灯影下的篆书》写的是南唐后主李煜和他的旧臣徐铉在开宝八年(975 年)宋军攻破金陵后被俘至汴京后的凄凉,在后面的几篇里分别写到了林逋、王著、石延年、范仲淹、富弼、尹洙、石苍舒、文彦博、狄青、宋太宗等等这些生活在北宋初年的著名人物;第

八章的几篇里写到的王安石、司马光、沈括、章惇、秦观,则都生活在北宋末年。而中间六章分别以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宋徽宗和蔡京为主体,同时涉及的韩琦、欧阳修、梅圣俞、钱穆父、范纯仁、吕夷简、苏辙、陈师道、陈襄、文同、张方平、范镇、李公麟、韩忠彦等等这些人物,大都生活在北宋王朝的中后期。在物理时间上,小说自然地跨越了从北宋初年到北宋末年的近 167 年或者更为长远的历史,并通过这些几乎是决定了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学艺术走向与人类命运的著名人物所造就的整个北宋王朝的历史,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体骨架。

单独成章,或放在一起又构成长篇的艺术手法在小说叙事学上并不鲜见,像维·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等等。但是《书法菩提》的意义在于散落在各个章节里的人物生活的片段,比如苏轼,在第一章里写他和石延年的关系,第二章里写他和钱穆父、黄庭坚、米芾的交往,到了最后一章里写他和章惇莫名的恩怨,他的身影几乎遍布了整部小说;还有米芾、黄庭坚、蔡襄、王安石、欧阳修、蔡京、宋徽宗等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墨白(1956—),男,河南淮阳人,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长期从事小说及影视文学创作。

等,如果没有全面的阅读,那么你看到的这个人物可能就不是完整的,也很难真正领会到作者的用意。出现在小说里的这些对北宋王朝的兴衰大都起着关键作用的人物,均都来自史书典籍,或者人文笔记,这就给这部小说的叙事构成了难度。而晓林君的高明之处是把这些大多已有定论的在庙堂中个个正襟危坐的人物既归还于人间烟火,又把从史书中得来的琐闻杂录、传说轶事转换成粘满油盐酱醋气息的生活素材置放在他们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转折的关键事件上,并以人性的目光由生动的细节来呈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比如苏轼这个人物,既写他的天性、洒脱与豪迈的一面,也写他在逆境中精神所受到的煎熬与悲观;比如徐铉,既写他的铮铮傲骨与气节,也写因他的耿直给人带来的灾难;比如欧阳修,既写他的文学胸怀又写他在生活细节上的偏执;比如米芾,既写他生活中的洁癖,也写他因艺术而生的人性弱点;比如蔡京,既写他做人的阴冷险恶的一面,也写他内心觉醒善良的一面。小说使这些历史人物复活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使用鲜活的生活细节:比如写徐铉的气节,用的是他那身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北方也不肯脱下的来自江南故国的服饰;写蔡京生活的奢靡,只用包厨里一个专门用来切葱的厨娘;写章惇晚年被贬谪到偏远的雷州仍然无法释解对苏轼才华的敌意,随手扔掉苏轼特意为他开的药方,等等。这些使人物血肉丰满的细节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自然地遍布在文字里,和鲜活的人物一起生长在历史的骨骼上,构成这部小说的血肉。

其次,我把这部小说的叙事手法与语言风格看作是遍布文体的经络。《书法菩提》在继承传统笔记小说的叙事手法的同时,又被作者的现代叙事理念所浸染。《书法菩提》讲述的是距今九百年前的北宋王朝的历史,而整个故事却是由当下的叙事视角来统领:“先前,我很少涉及篆书……”“……以致研究北宋书法的理论家们……”“他(蔡襄)著有《茶录》一文,有兴趣的读者可去网上搜索下载……”“改天专门做篇文章,来详细叙述这些饮法……”

由于这些融合了传统说唱艺术的现代叙事句式的出现,作者时常把读者从历史的故事里拉回当下,并对现实社会构成隐喻关系。比如,写宋真宗到泰山封禅,当朝的那帮高官文人纷纷吟诗献谏;比如沈括这个人物,作为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梦溪笔谈》的作者,却是以苏轼为首的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无论是苏轼、黄庭坚、章

惇、蔡京等等这些人物的命运和他们所经历的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还是李煜、宋徽宗这两个精书画、通音律具有艺术天赋的天子和他们所代表的南唐与北宋两个王朝所有的惊人相似的终结过程,对于我们来说,都具有警世的意义。而这些,都应归功于作者开放的叙事理念,比如第七章《西风凋碧树》中的第六节,以蔡京的口气写就的蔡京在弥留之际充满忏悔意识的人生幻想,完全是现代文学中意识流的叙事手法。

《书法菩提》叙事语言的诙谐与幽默所蕴含的趣味性、从容与自然的语调里所呈现的对世事的淡定与宽恕,在像经络一样四通八达布满整个小说文体的同时,也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风格。而小说叙事风格的形成,正是一个优秀小说家最重要的标志。

在《书法菩提》里,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作为贯通小说的精气,传达出了北宋书法的人文精神之所在。北宋初期的重神论和反“法”思潮,正是北宋书法重视个人主观性情特征的体现,这和《书法菩提》里所表达的人文精神十分吻合。就“苏黄米蔡”四大家来说,无论是苏东坡的禅风,还是黄山谷的无法之法、米芾批判的彻底性,都是个人的主观性情在他们的书法或者理论里得到了具体表现的见证。就蔡襄来说,他所主张的“神”可贵,但“法”也不轻易否定的艺术观点看似有些保守,而正是这种选择的过程里多维的思想方式,才体现了中国人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

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而到了北宋,无论是蔡襄充满温雅的对“晋唐法度”的恪守、苏东坡因“我书造意本无法”而得到的丰腴跌宕、黄庭坚在对传统继承上的“纵横拗崛”,还是米芾将一切价值归于“本心”的意志,其实都是一种张扬个体的姿态,是重风格、重意境的表现,北宋书法在具备了“工夫”与“天然”的两个层次之后,更强调“书卷气”。正是这种“书卷气”,才使那个时代的书法家在摆脱别人之后又逐渐呈现出各自的艺术风格。所有这些都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无论哪门艺术,其目的都是在标新立异的同时,给人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并通过这个方法,把人带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而通往这种境界的路途,又和对人生的感悟有着直接的关联:苏轼因屡经坎坷,他的书法风格才显现出跌宕;黄庭坚以禅悟书,才有草书上的新境界;米芾早年行为疯癫,到了晚年书法才给人以“有冰寒于水之奇”;还有蔡襄书法的“有风云变幻之势”,这些

都因丰富的人生经验并通过艺术形式表达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恰恰是《书法菩提》的叙事观念。在《书法菩提》里,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变得息息相通,并被作者赋予丰满的人文精神通篇灌注在小说的叙事语言里,使这部小说充满了鲜活的生命气息。

我们之所以从西医解剖学的方法来分析《书法菩提》,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这部小说崭新的叙事结构:在北宋历史的构筑下,人物的血肉,叙事语言所呈现的经络,与书法艺术构成的精气,在《书法

菩提》里得以理想的体现。其实,《书法菩提》(北宋卷)是晓林君对自己文学王国构造的一部分,整个《书法菩提》将有接下来的“先秦卷”“南宋卷”“明清卷”和“民国卷”构成。从2002我认识晓林君以来,就知道他在为创作《书法菩提》做着扎实的案头工作。十多年过去,在人生经历了艰难的历练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晓林君这部大气的《书法菩提》。因为这部《书法菩提》,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整部书稿完成之后,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论及新笔记小说时一部无法避开的杰作。

论《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的境界

——以小说《莲荷图》为例

刘 恪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我以《书法菩提》系列小说中的《莲荷图》为例,对张晓林的写作做一个基本分析。我觉得这样能把对他的判断落到实处。

《莲荷图》这篇有比较典型的意义。先说这一篇的结构,我称它为锁链式的循环结构,是以情节方式构成的。这么一个篇幅很短的小说,它有四次伏笔,一是开头的黄庭坚“偿债而来”;二是智珠禅师捡起一片瓦砾,拂去灰尘,装进口袋;三是遇见秦观的儿子;四是向禅师求画。有了这四次伏笔,在情节上来讲形成了一个回环的逻辑锁链。四个伏笔就会有四次照应,这些照应有时会写得很隐晦。这样不停地伏笔不停地照应,形成一个锁链式的循环结构,这是这篇《莲荷图》的结构关系。

为什么我看到了这篇作品有兴奋点呢?因为他从文化、宗教、哲学的境界来营造这篇小说的。以前我读过他的另一篇小说《木钗》,那是一篇很好的小说,写的是一个生命的故事,用生命把一个钟给补起来了,表述了一种生命意识。而《莲荷图》这篇小说,选择的是一个宗教题材,因此,我们从宗教说起

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如果他只是简单写一个宗教故事的话,就没有意思了。他是从宗教里面突出来写哲学的。我们知道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大特点:哲学是从宗教中来的。哲学从宗教中来,宗教比哲学要早。这也是为何在中国特别到理学以后、民国以后,如果说懂哲学的人不懂宗教,大家肯定会对他嗤之以鼻。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悟,它要从宗教中悟出某种东西。只悟到哲学仅仅是一种理念还不够,还要悟到一种境界。所以中国的禅宗和西方哲学特别不一样,既有宗教的东西,又有哲学的东西。我们如果写一个长的小说,有宗教和哲学的东西在里面,拿到西方肯定是第一的,因为西方没有这个东西。我评判一个东西,经常从内到外把它全面进行比较。说好,就一定要找到一个在同类作品里别人所没有的东西。

张晓林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宗教故事,在这个主题上,开篇就提出了文化与佛教,又是一个文化的故事。到了小说的中间,又从佛的缘分转移到人的情分、人的情缘上来了。这个情感写的是男人的情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刘恪(1953—),男,湖南岳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评论家,多年来从事小说、散文和文艺评论创作。

感而不是女人的情感,这就是很好的意味了。再往下,他把题蜻蜓点水地点了一下,你根本不知道他的目的所在,他接下来开始写那个佛塔,看似闲笔,其实佛塔在这篇小说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晓林的小说内部,常常有一种悠闲荡漾的东西,往往不直奔所写的最终目的,这就往高处写了。我在外面跟你玩玩,玩几个结构之后最后还到这儿来,我用的评价词就是“浮空闭影”。这样舒缓的闲笔把语境营造足了,笔锋才开始往深处去。小说的境界和人生的境界有时候是非常一致的。

老禅师和黄庭坚两个人就像我们平时喝酒说家常话一样,老禅师就对黄庭坚说:“我把浮屠都造起来了,这是一个很难的事,下面有个很小的事要你来摆平。”老禅师嘴里的这个很小的事就是写一篇塔的赋文。其实,为承天寺七级浮屠作赋文是一件很难的事,不然,不会专等黄庭坚来做了。这样一来黄庭坚就被将了一军,整篇小说在这种复合照应的循环锁链中间不停地荡来荡去,这么荡了几个回合以后,小说于是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写悟,再发展到建筑,是一个文化象征符号,再下面是一篇赋文,就是文化产品中间的眼睛,最后上升到精神。这个精神从哪来呢?下面就来了。有一个花钱买官的人陈举,他希望黄庭坚给他写一笔字,在赋文中留下名字,不仅可以附庸风雅一下,还可以传诸后世,这是历代官僚的心态。而黄庭坚就故意给陈举悬了一空,跌了一下,好像是忘记了,没有把他写进赋文。这下把陈举给得罪了,结下了梁子。当官的你不给他面子,他就把你记恨在心里了,瞅机会往死里整你。这就从写文事,再到宗教来写佛缘,写文化,写人情,到后来写到政客,这就不一般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笔,把文化、宗教、哲学等抽开一笔提高到写政客。过去政客的心态,和现在政客的心态是一样的,千古不变。下面就写了这个政客是怎样报复黄庭坚的,黄庭坚以后人生中的一切坎坷,大都因为这个政客而起,文人情怀让黄庭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里就凸显了作者的新历史主义的态度。什么叫“新历史主义”?就是我写的是历史故事,但我在隐喻当今世事中的某种东西。以当时的细节来展示今天的人情方式,这就有新历史主义的意味在里面。他在后面又补出一个细节,就是秦观的儿子护送秦观灵柩回乡。这个细节是一个完全可以删掉的细节,但是他就补在这儿。这样又有另外的好处。黄庭坚给了秦观儿子二十两纹银,来表现黄庭坚这个人在政治和平民、文人和政客之间的一种隐晦的态

度。细想一下,在这里他是突出黄庭坚,如果没有这个事例的话,后面《莲荷图》的丰富性就不够了,有了这个事例,他后面的故事就有意思了。文章的最高峰是在黄庭坚要禅师的一幅画的时候,禅师画了一幅画,画完这幅画以后,这个禅师就死了。这在手法上叫“斗转”。西方也好,中国也好,几千年到今天,唯一一个在文学理论中间没变化的就是情节理论中的斗转。美国小说、欧洲小说、我们中国的《三言》《二拍》等,都特别强调斗转。这个斗转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斗转有几种方式:反转,跳跃式,等等。

《莲荷图》采取的是跳跃式斗转,而且一跳就跳到你想不到的地方,然而又是符合情理的。而这里一直跳跃一直斗转,从佛事跳跃到文化,从个体的还愿跳到生命的偿还,由给一个宗教的浮塔写一篇文章,还一个文债,到用生命还一个精神之债,从而上升到一种人生哲学和生命哲学的高度。小说在这个地方,第四次照应了以上的伏笔,揭示了老禅师以个人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完成了一幅《莲荷图》,这个短篇小说的内部关节就比较完善了。这个《莲荷图》与荷花已经没有关系了,画的是那个老禅师,画的是黄庭坚的品格,画的是佛、文、人之缘,从一个普通的宗教故事和文化故事上升到一个人生哲学的故事。这个《莲荷图》,你之前不会想到它有这么复杂的内涵在里面。它是通过几次折转以后产生出来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莲荷图》是一个生命之图、佛教之图、文化之图、哲学之图。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可谈的,比如山和高洁,生命之沉浮,及禅师的生命境界,这个文本里面还有很多可以阐释的东西。

在小小说里面,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我们的阐释也到了一个高度。我们还可以进取一下,把它本质的东西和更高的东西说一下。第一点就是这个小小小说中还有个弱项。因为他写的是文化意识,文化意识如果完全作为一个符号来讲,我们在写文化意识的时候应该站在另一个角度。我们要抓住每一篇小说表现力最根本的地方,或者说它更应该着重的地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谈到,世界上有几个民族和国家的建国基准和人的精神基准,是不一样的。比如不带偏见地说,日本是以法为他的建国基准和精神基准构成的;中亚是以人力和宗教为基准的,用别的方式轻易是不能撼动它的;中国的建国基准和历史发展是以民俗为基准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我们写文化小说,要写出民俗的心理实质和状态,要写以民俗为基本

构成的文化方式。晓林的小小说我看了很多篇，写了官场、文化轶事和风俗，但是他的民俗中间的细节构成还少一点。

还有一点，我觉得晓林小小说中表现的就是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散文也好，诗歌也好，小说也好，无一例外地都突出一种强大的“政治无意识”的态度。“政治无意识”是好的，用詹姆逊的原话说就是“文学是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这里就有两个细小的点，我觉得他把文学的“政治无意识”写得稍微明了一点。比如说，他说禅师佛法高深，当他做好准备画那幅画的时候，他说他喜欢画莲，画莲的时候画出莲花的魂，高洁而脱俗，夏天能闻到幽香。我认为，这段只要三五个字就可以了，通过这么一大段话其实就把莲花的精神和要投注的那种“政治无意识”所表达的人格说得太明显了，只要有读小说习惯的、搞评论的读到这儿一下就明白了。最后还有一个，小说里写到“这幅《莲荷图》才展开到一半，他的泪水已经双眼模糊”，其实这一段完全可以用另外的话来说。不要把你的底牌给明确地亮出来，而应该产生别的余味，这样是不是就能更

好一些。

还有一个短篇我提一下，不做过多分析了，就是《江南落雪无》，是讲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们两个在政治上对立，在文学上交流，在学术上沟通。这个东西看起来好看，也很好懂。但是它的主旨，它的深度我觉得要找起来可能比较麻烦。我举一个例子给这篇作品提供一个参照，美国有个诗人叫华莱士·史蒂文斯，他写了一首全世界有名的诗叫《坛子轶事》，他就写山顶上一个坛子，中国很多诗人在讲的时候都讲不清楚这个坛子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这篇小说骨子里最核心的东西是讲学术可以超越一切，这是一个新的说法。

参考文献：

- [1] 张晓林. 书法菩提·金明池洗砚[M].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5.
- [2] 张晓林. 宋朝故事·宋真宗的朝野[M].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 [3] 张晓林. 书法菩提·民国河南书法人物志[M].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7.

《宋真宗的朝野》序言

艾云

(广东省作协, 广东广州 510635)

我的乡谊张晓林志向高远，赳赳雄心，他立志为汴梁古城开封钩沉出历史歌哭传唱的神韵。《宋真宗的朝野》一书，是他关于“宋朝故事”十卷本中的其中一本。

2016年1月的广州，遭遇到罕见的寒潮，温度竟然下降到零度。1月24日上午白云山和市内的一些地方竟然飘起了雪花。虽然这雪花薄薄一层细霰如絮，却让在自己的地盘几乎未见过下雪的广州人惊讶不止，惊喜不止。他们争相拍摄，传发照片，处在少见的亢奋之中。

我踩着双脚在依旧寒冷的屋子里看张晓林的这

部书，一入情境就放不下，完全被书中的人物与故事吸引住。张晓林的笔下，真宗时期朝野上下，各色人等无不鲜活跃动，性格灿然，栩栩如生。他深谙中国传统笔记小说之精髓，一篇文章往往两三千字，不长，却写得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叙事结构张弛有致，布局完整有条不紊。他将风物人情、历史沿革、潇洒捭阖一路写来，妙不可言，妙趣生辉。唯有文化知识渊博，对中国历史研读颇深，同时又老道传神的写作者，才能写出如此带着深层历史乡愁，同时又具有现代生动气息、盎然纸上的文化历史小说。

每次回到我的家乡开封，我都会在这座城市漫

收稿日期: 2019-05-10

作者简介: 艾云(1957—), 女, 河南开封人, 广东省作协一级作家, 从事散文、文学评论及思想类随笔的创作。

走。我不是偏爱,但是我必须得说,这座城市与中国其他的城市都全然不同,它就像是一个梦境,一个由穿越时空的幻觉和真切构筑的美轮美奂的实景构成的一个梦。比起北京、西安以及洛阳等古城,开封它显得更为旖旎婉丽,在某种慵懒而惬意的淡然中,透出天然的、无以言说的风流自在。那是汴河沿岸的垂柳兀自袅袅婷婷,那是相国寺的千手千眼佛的安详静谧,那是潘杨二湖的涟漪微波荡漾,那又是舟桥明月的清晖疏朗。我漫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时而清晰时而朦胧地感受到这里的民俗风情与千年之前的北宋遗韵有着剪不断的传承。这座城市的人们侠气洒脱,豪爽不羁;同时又有着丰富敏感地对艺术诸多事宜熟谙而又把玩着的独特生态与心态。

因此我读张晓林的这部书稿,没有任何时空的障碍,就好像自然而然地回到北宋年间的开封。书中主要写宋真宗时期的事情,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引车贩卒,他都写得形象生动,人物言谈举止仿佛可以触摸,呼吸吐纳如在目前。宋真宗这个皇帝很有意思,他是宋太祖宋太宗之后的第三个皇帝,他本人虽然没有前两个开辟江山者的强梁霸气;却也勤于政事,治国有方。他在朝二十五年,北宋经济日益发展繁荣,少于战事,民众安居乐业,传诸后世的有《文武七条》的廉政理念和规则,史称“咸平之治”。

我明白张晓林之所以选择真宗朝野来写,并且写得笔致摇曳,时而诙谐时而沉重,正是因为这一时期人们的脸上不再是蹙眉皱眉,愁云满布。

上卷“庙堂之上”,张晓林将笔墨更多的用在赵恒赵真宗的身上,赵真宗的性格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着长处和缺点。他派曹利用与萧太后议和,曹伸出三根手指,真宗先是惊恐然后释然的微妙心理活动,真宗当朝讨论封禅之事时对诸臣态度的悉心观察揣摩,他与老臣邢昺下棋时的心酸与体恤,他听信王钦若谗言时的糊涂昏聩,都让人看到一个有着普通人性格特征与局限的君王的真实一面。

下卷“江湖之远”诸篇,他写的则是更为普通的民众,这里有个性桀骜不驯的画家柳白藤,有开着面食店却又担心无后的刘好手,也有救人的茶肆肆主方二郎,还有悬壶济世的神医王竹楼,当然还有坐怀不乱的任侠叶如裳。

我读着张晓林的这部书稿,仿佛听到千年老树茂密的枝丫之上斑鸠的啁啾声,华美的绛红色木门

在推开之时发出的沉闷回音;我又仿佛看到槐花树隙间流年摇曳的幻想,菊花与黄河水新鲜的香气簇拥而来,墙壁和屋檐的暗影嬗变着虚无的净空。宋代开封有着太多的故事、演义与传奇,它的每个砖石檐角、勾栏瓦肆都带着它隽永的吟唱与词赋,歌尽菊花,花在陌上,陌上千年。

关于开封,它现在几乎成了一个显学。回望而去,人们惊诧不已的是北宋年间它竟是世界第一大都会。它的繁华煊盛,早早领先于西方现代文明。人们简直无法弄清楚开封那时为什么会有如此美不胜收的魅力。关于开封,研究者和史学家都在进行发现和琢磨,现在已经有不少的论者有文字问世。而作为文学家的张晓林,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开封古城的历史作一形象生动的摹状。他研读《全宋笔记》经年,饶有心得。他写开封的往昔,努力贴着人物的命运和性格来写,将情怀汇入笔端,浑然天成便是上乘佳作。

我初识张晓林也是因为文字。2007年春,我在《作品》杂志当编辑时,他给了我《汴门三柳》的小说,是写开封的,写得漂亮传神。我们刊物马上发表。接着他又给了我另外的小说也都终审通过。从此我记住了我有一个写小说的开封老乡张晓林。后来回家,我们见面。晓林身上虽有文人气质,书卷雅度;但也秉持着原则、操守与风骨,这使我与他一下子有了一种亲近感。晓林禀赋逸群,不仅专攻小说,在书法篆刻等其他艺术门类均有较高造诣。他工作非常繁忙,却有如此雄心写出绵绵长卷,这让我心生敬佩。对,我认为晓林写的是绵绵长卷;我没有用浩浩长卷来形容,正是因为他平实而素朴的个性,以及他这种个性对北宋故事的辨析解读。北宋的确没有汉代鼎盛的威仪,没有盛唐磅礴的气象;但宋代它却是一个有着浓郁人文意味的、多姿多彩的朝代。那是青花瓷上薄如蝉翼的讲究,是字画间墨宝生香的氤氲,是一声梆子敲在午夜子时的悠长,是文人骚客秋色连波寒烟碧翠独登高楼的惆怅。

现在,知识的贫瘠化以及弱化阅读,似乎成为无可奈何的一件事。但是总有为民族文化传播承递而有所担当的人,他们在默默做事,这样的人会带动更多的人。文学的力量,就在默默阅读中你所感受到知识的丰富和历史眼光的宽远。张晓林就是一个默默做事的人,一个默默为人们贡献精神琼浆的人。我对他只能用这么直白的语言来评述。

以史学家的态度写小说

张晓林

(《大观》杂志社,河南 开封 475000)

一、以史学家的态度写小说

写笔记小说,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设想,就是写两个大的系列,《宋朝故事》系列和《书法菩提》系列。仅从题目上看,就明白这两个系列都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但又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不同,因为我的设想是:这些小说既要有广阔的民族文化背景,还要有深刻的现代意识,我姑且称之为文化历史小说吧。目前,《书法菩提》系列的“北宋卷”已经完成,除了在文学期刊上发表外,中国最权威的书法类专业报纸《书法报》正在连载;《宋朝故事》系列的第一卷《宋真宗的朝野》明年上半年可杀青。

对于这两个系列的创作,我的构想是这样的:《书法菩提》系列从7500年前的贾湖刻符也即中国文字的起源开始,一直写到民国,以笔记小说的形式,再现中国书法这一民族精粹文化的演变史;《宋朝故事》系列也从文化的视角,不写皇帝,写文化与民间,写永恒的东西。

我很清楚,我的这种写作,是不入主流创作之列的。就河南文坛看,主流创作应该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这一阵营曾经涌现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家。只是眼下的新农村变化太快了,让年轻一茬从事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者有点眼花缭乱了。姑且不论。我的小说创作,也不同于姚雪垠、二月河们的历史小说创作。我要独立于农村小说创作与历史小说创作之外,再开辟出一条小说创作的路子,也就是前面说的新历史文化小说。放到河南文学创作的背景下,这尚属于一个新的领域,我要尝试着去碰一碰。

因为写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表达手法上,自然要用最传统、最民族的表现形式,我选择了笔记小说。笔记小说篇幅短小,表达灵活,又具有小说的一切特性,更重要的是笔记小说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而且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中国人喜欢阅读短小而精粹的诗文。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六朝志怪到明清笔记小说,都很短小,但现在人们记住的,还是这些。眼下那些名噪一时的长篇巨著,老百姓记得住的有几本!文学作品失去了传播功能,真不知道它还有何种意义?

毫无疑问,笔记小说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直至今日,笔记小说的文学意义和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味到,一个小说家,至少要具有两种目光:一种目光投向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另一种目光投向世界最前沿、最先进的优秀文学成果。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管是儒家文化或是道家文化,或是其他,拿来作为我们小说创作的根基,会增加我们作品的厚度。现在提倡民族文化自信力,其实是在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出了问题,对一个小说家来说,这是致命的。外国作家倒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譬如英国作家尤瑟纳尔,从中国神话及民间传说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意大利作家布扎蒂,写过一部《人间地狱漫游》,简直就是《聊斋志异》的翻版;还有著名的博尔赫斯,把道家文化很成功地运用到了他的小说创作中。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掘。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已成必然趋势,这给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小说创作的形式上,外国的小说家开拓了我的视野。这之间,我读到过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譬如曼加内利的《荒诞世界》,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科塔萨尔的《动物寓言集》等等,我感到,这些小说家在形式的探索上,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收稿日期:2019-05-10

作者简介:张晓林(1964—),男,河南杞县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大观》杂志社社长、主编,从事小说创作及书法艺术创作和研究。

小说创作的灵魂应该是民族的，而驱壳却应该是世界的。

笔记小说应该可称为中国小说中的“国说”，因为它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过了漫长的演变。笔记小说萌芽于夏周，魏晋时演变为志怪，一路走来，在北宋被发扬光大，“笔记”这一文体被北宋文人墨客所青睐，欧阳修、米芾、苏轼等等都有不止一部的笔记专著传世。由“笔记”到“笔记小说”，直到清代才成熟起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是笔记小说的高峰。可以说，笔记小说又是一种晚熟的文体，这一文体大有作为。

但是，我绝不会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裹足不前，继承笔记小说这一文体，其根本还在于发展它。如何发展笔记小说，是我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定位问题，笔记小说篇幅短小，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试看中国文学几千年，从《诗经》到唐诗宋词，诗歌超过百字的很少，多为十几数十个字，但中国人喜欢读，时至今日，古典诗歌的读者依然是最多的。现代诗写得长了，一长却没人读了。中国的散文也是如此。中国古典小说倒是有长篇小说，但也是章回的，化长于短，所以它没有失去读者。

由此看来，一部中国文学史，单从形式上看，“短和小”两个字就可以涵盖了。这无疑得继承。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重续笔记小说这一中华民族的文脉。实践证明，系列笔记小说可以说是继往开来，是最符合国人阅读的，紧跟时代步伐的，而且是与中国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文学表现形式。

其次，中国文学的“小”只是一种形式，如何以“小”的形式写出厚重的文学作品来，这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了。在这方面我曾做过一些尝试，也引起过一点小小的影响，但还不够成熟，于此不做赘述。

我写文化历史笔记体小说，是像历史学家那样对待历史的。在我的行文里，你看不到演绎的成分，更没有荒唐的戏说。我是在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的真实。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通读中国正史，还要去阅读大量的野史和笔记来佐证它。我要做的，仅仅是从人性的空间来开掘历史人物，使他们从历史沉寂的故纸堆里重新活泛起来。

文学创作和书法创作道理是相似的。学习书法，并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那你一定得通读中国书法史，读书法美学，试想一下，你连中国书法的演变过程都不清楚，你怎样能写好书法呢？我的理解是：写笔记小说比写书法更难，你得通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等等，然后融会贯通，才能写好这种文化历史笔记体小说。

二、我写蔡襄不得不说的话

（一）想去揭开一个谜

我写《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墨逸事》，是想去揭开一个萦绕在我心头多年的谜。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书法界对“宋四家”有了疑惑，认为“苏黄米蔡”之“蔡”本不是蔡襄，而是蔡京，因为蔡襄的排名不应该是最后一个，他的年龄最大。让蔡襄取代蔡京，是蔡京人品有问题，做了奸臣。中国历来有论艺品先论人品之说，所以，蔡襄捡了个大便宜，得以流芳百世。

持有这种观点，也不能说完全是臆造和空穴来风。蔡襄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几乎是两个时代的人，蔡襄无疑是他们的前辈。蔡襄与苏轼，因为欧阳修的关系，也许见过几面，但历史上或者笔记中没有记载，与黄庭坚、米芾铁定是没有任何的交往。苏轼称蔡襄“书法本朝第一”，也是继承了他老师欧阳修的观点，欧阳修就曾说过蔡襄书法是“本朝第一”，应该主盟天下书坛。而蔡京，却与“苏黄米”是同时代的人，把同时代的几个人归入一个团体，是再合理不过了，譬如“江淮八艳”之类。

但是，我读了《全宋笔记》之后，认为这种逻辑放在“宋四家”身上行不通。一种书风的形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萌芽、发展及成熟，有倡导者、推动者、响应者。北宋尚意书风的萌芽应该从宋绶、欧阳修、蔡襄开始。欧阳修是尚意书风理论的奠基者，蔡襄则是书法实践的先行者。苏轼来到帝京，成了其中的关键人物，他兼具欧阳修、蔡襄二者之长，又影响了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书法尚意之风才愈刮愈大。

至此，我想揭开的谜底也就有了答案。

（二）回到宋朝写蔡襄

写蔡襄，得回到宋朝。

我对宋朝情有独钟。对我来说，最恐惧的事情莫过于打球，好像我从来没有摸过球，尤其是足球、篮球，却给自己取了一个网名叫“在宋朝蹴鞠”。就像齐白石作诗不行，却说自己诗是第一一样。

回到宋朝，看蔡襄在1000年前是如何生活的，对宋朝的生活方式力图了然于胸，这可以说是在追求生活的真实，不能简单地拿今天的生活方式去套在宋人的身上。写哪个朝代的小说，就要把那个朝代生活的真实写出来。

很自然，宋朝的生活无法亲身去体验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间接地去体验，多读宋人的著述。在写蔡襄的这一时间里，我每天都要读《全宋笔记》，《全宋笔记》就是一部宋朝的生活史。宋人的

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这套书里全有。譬如,欧阳修来东京赶考,喜欢住澡堂,宋朝的时候把澡堂叫作浴室,门口都要挂一把大铁壶。就好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封的修车铺前都要挂一个破轮胎一样,算是一个幌子。这些,《全宋笔记》都有,宋人记录的自然是宋人的生活了。

当然,要读得进去,还要读得出来,不能食古不化。所以说,回到宋朝去写蔡襄,蔡襄自然就是宋朝的蔡襄了,宋朝的蔡襄,才是真实的蔡襄。

(三)用宋代笔记的笔法来叙述

诗人秋水在飞驰的火车上读了《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墨逸事》的部分章节,即发来微信,说有宋人笔记的味道。我颇为吃惊,秋水可谓是善读书者。

秋水还说,这样的笔法文化气息浓郁,别开生面,拍成电视剧也一定与北宋尚文的精神一致。这段话使我很受鼓励,增加了几许自信。

当下的小说,我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去看,西化得厉害,毫无节制,任意挥洒和浪费,浪费纸张,浪费别人的时间,等等。其实,中国古典著述中的语言很美,譬如元散曲,倘若一个人认真读读关汉卿、王实甫的作品,肯定会深感羞愧。

我是读了范成大的笔记后,才决定用宋笔记的笔法去写这部小说的。范成大笔记的语言平白、简朴、惜墨如金,白开水一般,却又令人回味无穷。我曾尝试更换他文中的某个字词,立刻感到意味全无,真的是一个字都动不得,这是何等的语言功夫!

宋代笔记的叙述方式,天马行空却又不离主旨,不枝不蔓却又信息量奇大,这种叙述我认为当今已经失传,读当代的作品,已经读不到这种叙述的影子和味道,为什么这种优秀的传统叙事方式被完全抛弃了呢?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用宋笔记的笔法去写这部小说,只是初步的尝试,自然会显得幼稚和不成熟,但我会继续下去。

(四)说明几种关系

写《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墨逸事》,因有一个“帝京”在,自然离不开北宋政坛。蔡襄大半生宦海沉浮。如果只写蔡襄的书法,显然无所附丽,亦无法着笔,何况在那个时代,书法只是小技末节,是仕途的寄生物。同时,它也是在蔡襄仕途的升降中成熟起来的。在蔡襄这里,书法与仕途是融为一体的,把二者割裂开来去写,显然违背时代,违背生活的真实。

当然,还有一种现象不能忽略,北宋时期礼教是仕途的符号。当礼教与书法产生矛盾时,蔡襄选择的是礼教而不是书法,故有蔡襄拒绝为温成皇后书写墓志铭一节。

客观地说,蔡襄初到帝京时,对于书法是颇下过一番功夫的,从而完成了书法“技”的积累,这为他进入书法“道”的层面奠定了基础,最终使他认识到,在人的生存乃至生命面前,书法是苍白的,是无力的。

中年后的蔡襄,思考最多的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书法了。他著《荔枝谱》是他这一思考的结晶,也正是蔡襄的人生境界达到了这一高度,他的书法才有了更宽博的价值,才为尚意书风作了最好的注脚。蔡襄还告诉我们,母亲是永恒的,亲情是永恒的,艺术和仕途都不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这也是书法的道,蔡襄参透了这一点。

最后,我真诚地希望,《书法菩提·蔡襄帝京翰墨逸事》只是一部小说,不要把它当作历史去读,更不要把它等同于学术。它是一本小说,关注的只是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

(责任编辑 刘海燕)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Calligraphers in Song Dynasty

——Preface Calligraphy Bodhi

HE Hong

(Henan Academy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Henan 450008, China)

Abstract: Zhang Xiaolin wrote *Song Dynasty Stories* in the form of novella which included big events, folk customs, anecdote, and legends of people from emperors and prince to celebrities and scholars and to lower-class people. His narration was natural, well-arranged, and fantastic. However, his *Song Dynasty Stories*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note-novels, such as *Six Dynasties and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and all the things in his novels can be checked with historical data. *Song Dynasty Stories* wer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novels with deep historical nostalgia and modern and vivid atmosphere. *Calligraphy Bodhi* were written with the same style.

Key words: Zhang Xiaolin; *Song Dynasty Stories*; *Calligraphy Bodhi*; novella; spirit of scholars

荒诞世界中的一线希望

——评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

李欣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上海 201620)

摘要:作为一部时长近四小时的电影处女作,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绝对是2018年华语电影的一个重要收获。影片通过四个社会边缘人物一天中的经历,呈现出一幅灰暗压抑而荒诞的人生画卷,其间曲折可见当下盛行于年轻人中的青年丧文化的影子,影片将对生命的富有存在主义哲学意味的思考寓于长镜头美学风格之中,以充满隐喻的影像诗意地表达出了对人生的独特理解。

关键词:丧文化;荒诞;长镜头;隐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3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21-04

作为一部时长近四小时的电影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绝对是2018年华语电影的一个重要收获。影片通过四个社会边缘人物一天中的经历,呈现出一幅灰暗压抑的人生画卷,它将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寓于长镜头美学风格之中,其细腻尖锐的表达深深地触动了诸多观众的心灵。

一、《大象席地而坐》与丧文化

丧文化在当下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青年亚文化,从葛优躺、流泪的咸鱼等一系列丧文化的流行符号中不难感受到80、90后青年一代面临的社会境遇,价值观念的多元和虚无,靠自身努力难以改变命运的无助,这些现实的困境最终便体现为流行丧文化中面对现实的无力与无助感。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弥漫的情绪,无不透出一种“丧”的意味,在胡波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痛苦,这一代人的痛苦是肤浅和庸俗融入血液”,“你很难在当代社会找到任何问题的答案。当你试图去了解这世界的各个层面,会发现早已有整套的定论摆在那儿,一切早就有了解释,连质疑这些解释的解释都有了。自身面对周遭,会有一种无力感”。《大象席地而坐》中的每个人都面对着生存的困境,每个人都在困惑于自己该怎么办。中学生韦布想帮被校园小混混欺负的

朋友出头,却无意中导致对方摔下楼梯死亡,踏上了逃亡之路;韦布的同学黄玲来自单亲家庭,她在教导主任那里寻到了难得的温情,却因与主任的视频曝光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愤激之下她拿起球棍击倒了教导主任和他的妻子;于城睡了朋友的老婆,发现真相的朋友选择了自杀,为了自保,于城将责任推给情人和前女友,试图躲避良心的谴责。影片中的事件和人物,的确很容易让人想到很多残酷青春类型的电影,但是对胡波来说,他并不认为这是专属于青年阶段的人生困惑,“不该把习惯了某种方式当作跨过了某个阶段”,在《大象席地而坐》中,“世界是一片荒原”,“活着就是很烦”,“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破烂,每天堆到我跟前,清理了一块,就有新的堆过来”,“这世界太恶心了”,“人活着呀,是不会好的,会一直痛苦,一直痛苦……”这些颓丧的感叹从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物口中一再说出,这似乎代表了胡波对人生的理解,正如《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一句经典对白所言:人生是只有童年才这么苦吗?不,总是如此。

事实上,《大象席地而坐》中成年人的世界同样艰辛。黄玲的母亲是个医药代表,要陪人喝酒甚至付出更屈辱的代价才能换来订购合同。退休的王金

收稿日期:2019-05-16

作者简介:李欣(1979—),女,河南唐河人,文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中国电影、当代中国电影等。

与女儿一家住在狭小的房子里,他只能睡在阳台,而女儿女婿为给下一代买学区房,谋划着把王金赶到敬老院去住,小狗是老人生活中所剩不多的一个寄托,却不幸被大狗咬死。于城虽然看似是个威名在外的混混,却被喜欢的女孩一再拒绝,在父母面前他只能唯唯诺诺,不敢违抗。副教导主任婚姻不睦,盼着能顺利调到另一个学校去,却因与黄玲的绯闻视频曝光,一切都完了。影片中的众生形象大都迷茫孤独,一切行动最终似乎都毫无意义和价值。他们的内心冷漠而绝望。

其实,这种具有颓废色彩的人物形象在每一代人的文学和电影作品中都有出现,例如谢飞《本命年》(1990)中的主人公泉子、贾樟柯《小武》(1998)中的小武等,然而,那些影片中人物的悲剧与主流观念格格不入,影片还是同情并肯定了主人公所追寻的某些价值:人与人之间难得的温情、道义,以及逐渐逝去的传统价值观念等,同时,影片也通过对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呈现,试图追问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与之相比,《大象席地而坐》呈现的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荒凉人间,影片也无意去揭示人物命运背后的社会历史深层背景。在胡波看来,“人本身自带所有阶段的人性”,“比起‘增加’生活的重量,我更认同深入当下的觉知,生活本身就是无底洞,不用再添砖加瓦了”^[1]。影片中所呈现的人生世相,便因而具有了一种抽象而普遍的意味。

二、荒诞人生与自我追寻

亲情、爱情、友情……,这些温情都是人生的重要支撑,然而,《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关系却都被自私和冷漠所充斥。父亲对韦布充满恨意和不满,韦布的大伯与奶奶虽相邻而居,奶奶死了大伯却一无所知。退休的王金被混混缠上,女婿却生怕惹上麻烦急忙关上房门。黄玲的母亲是位单身妈妈,每天忙于生计,深夜方归,婚姻的不幸和生存的艰难使她对女儿缺乏关心,母女之间更多充斥的是戾气怨气而不是温情脉脉。副教导主任和黄玲之间发展了一段暧昧的情意,他告诉黄玲他夫妻不和,要离婚,然而当事情败露,他却气急败坏地把一切都怪罪在黄玲头上,将她赶出门。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充斥着欺骗、暴力和冷漠,其中并无绝对意义上的好人,身为受害者,也许转身就成了施暴者。例如小说中的于帅,他既是校园霸凌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韦布的同学李凯一开始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但他却利用韦布的信任欺骗了他,最终失手击中于城,并选择自杀。

影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而隔绝,主要人物的行为消解了一切意义和目标。韦布为李凯出头,但

却并不为兄弟情义,也不为正义,他听了于帅嘲笑他爸的话就选择动手,也并非因为自尊受辱,这一切在他心目中都不觉得有什么,他动手只是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个流程,他按流程来的。于城与朋友之妻偷情,目睹朋友在眼前跳楼自杀,他并不爱朋友之妻,也并不觉得朋友多爱他的妻子,因而,他并不为此事过多地愧疚自责,事发之后他更多在想如何逃避责任,因此他选择外出躲避一段,并对朋友之母隐瞒了事情的真相。于城为弟追踪韦布,只是因为父母的压力,他弟弟身亡的消息传来,对他似乎也并无撼动,在他眼中,弟弟也只不过是个体他并不喜欢的废物。一切都显得无意义,而到满洲里看大象这个目标却变成他们人生中最关心的事,这使得影片中人物的生活显得荒谬而讽刺。

影片中所呈现的,是类似于加缪笔下的荒诞人生图景,人物的选择和行动看似丧到极致,但其间也体现出了一在荒谬人生中直面现实、追寻自我的挣扎。影片将荒谬的真相撕给观众,将美好希望消解。韦布、黄玲、王金和于城都想要逃离自己所处的困境,但最终影片借王金之口指出,在哪都一样,最好的就是在这里,面对该面对的。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面对自我,影片中这几个人物都为此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影片中两个本应是敌对关系的人物,韦布和于城却最终达成了最为默契的理解,于城主动放韦布离开,因为他们俩才是同类,同样孤独,同样试图反抗这外在的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各种流程,当于城通过韦布看清这一切,他选择了面对现实,对好友的母亲说出自己在场的真相。而李凯,作为一个对照的人物,其实仍然活在他人眼光的幻象中,他的行为的动机,全都是为了不让别人小瞧自己。为了向他人证明自己的勇敢,他的选择因而导致了影片中最荒诞的一幕,在于城已经打算放韦布走时,他却来上演了一出枪击于城救韦布的戏码。这是我们在各种影视剧习以为常地体现兄弟情义的煽情桥段,在这里却成了最荒谬的情境。影片中一共发生了五次死亡,奶奶的死让韦布失去了最后一缕家庭的温情,小狗之死让王金的生活再没了支撑。于城朋友、于帅、李凯三个人都死了,似乎暗示着,他们各自凭着不同的稻草来支撑自己,然而被他们认为是救命稻草的东西,一旦破灭便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长镜头的电影美学

胡波深受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等前辈的影响,并将长镜头的美学追求贯彻在这部作品中,这也导致其时长达到近四小时,远超常规电影,然而,影片丝毫不显沉闷,胡波的精心设计使长镜头成为一

种独特而适宜的美学风格。贝拉·塔尔认为,“在一个长镜头内,场景、演员在场面调度中经常发生空间位置变化,因而,长镜头内必然包含着剪辑的因素”,“拍摄长镜头一定要注意创造节奏”。贝拉·塔尔的作品“关心人本身及其丰富的心理活动”,^[2]形成了一种节奏舒缓,远离戏剧性的独特电影美学。与之类似,《大象席地而坐》的镜头语言克制而简洁,对白较少,音乐也呈现出一种极简的风格。影片运用了大量跟拍长镜头,很多是跟随在人物身后仰拍,这导致影片中出现大量背影的画面,这里面也有制作经费和场地条件限制的原因,也是为了避免平拍时路人看镜头而穿帮。以2小时49分03秒开始的一个长镜头为例。镜头开始,中景镜头中韦布走过泥泞的路面,穿过桥洞来到桥下,近景镜头从背后拍摄他在河边静静伫立,吉他伴奏的单调而忧伤的旋律响起,韦布终于忍不住对着垃圾遍布的干涸河道破口大骂,将心中的压抑、愤怒和恐惧一并宣泄出来,一直到他骂完,摄影机才缓缓转至侧面,特写镜头中韦布在流泪,但摄影机却极为克制,无意以正面特写营造煽情效果,2小时51分12秒,随着音乐节奏的加快,忧伤哀怨的提琴声加入,韦布擦掉眼泪,扭头离开。幽怨的提琴声还在继续,镜头切至茫茫雪地的近景,这一空镜头承接上一镜头,传递出无尽忧伤。再如2小时37分44秒至2小时42分43秒的长镜头中,王金走进敬老院,镜头缓慢地依次扫过6位老人的房间,他们有的坐在椅子上,佝偻着身子垂着头,有的半坐半躺在床上,有的站在窗前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有的拿着饭碗和勺子,在房间里机械地来回踱步,这段镜头中人物多处于静态,镜头贴着墙壁缓缓前行,大多数时候画面中是黑乎乎一片的墙壁,镜头摇回到王金的近景,他若有所思地拿着球杆往外走,昏暗的走廊里看不清他的表情。这一镜头的确有向贝拉·塔尔《鲸鱼马戏团》中医院暴乱一幕致敬之嫌,然而镜头的缓慢移动营造出一种十分压抑的效果,画面中狭小、昏暗的房间、一动不动的老人一再重复出现,让人一眼便可感受到养老院生活的沉闷无望。影片中有大量的长镜头,最长的一个甚至长达近20分钟,但通过精心的场面调度、景物变换和镜头运动,并不令人感到乏味。镜头耐心地一次次跟随韦布、王金、黄玲游走于大街小巷,以最大的克制旁观着人物的遭遇和内心波澜。影片中这一一贯之的默然静观的姿态,传递出对人物最大的尊重和悲悯。

胡波认为:“戏剧性的叙事节奏有着清晰的节拍……,节拍和信息量的设计产生了阅读和观影快

感,但我排斥这种设计和设计带来的引导。我觉得最有魅力的是事件和事件中间那漫长的空隙,回忆与当下的留白,情节发生后深不见底的空洞,这些对我的吸引力远大于只是叙述情节。有时候连续的跳跃更好,有时停滞下来更好,有时干脆略过那些戏剧点。”^[1]影片中的故事本可以以更富戏剧性的方式来呈现,但胡波却有意弱化那些本可煽情的场面,例如影片中于城朋友的母亲来到儿子自杀的楼下,演员最初的表演是撕心裂肺式的,但胡波却要求对方平静,最终呈现在影片中的只是一句语气平淡的台词:太高了。故事接近尾声时,韦布在火车站等候于城发落,于城却出乎意料地要放他去满洲里,混乱中李凯枪击于城后自杀,这一段落胡波用了一个将近20分钟的长镜头来呈现,虽然情节几度翻转,但长镜头舒缓的节奏、演员内敛的表演却弱化了戏剧性高潮,其中可见胡波的美学追求。

四、环境、意象与隐喻

环境是《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一个重要表意元素。影片擅于通过环境元素塑造人物、烘托情绪并表达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

与人物灰暗情绪相一致的是,影片中的环境也大多是灰蒙蒙的。影片取景自河北井陘县,镜头中的井陘是个寒意笼罩下的萧瑟的北方小城,拍摄期间天公不作美,天气晴朗而且雾霾也不见了,为了达到导演心目中理想的灰暗的效果,剧组只能选择在清晨和下午阳光较弱的时候拍摄。影片中人物所生活和出没的环境,如破败的单元楼、凌乱的室内、漏水的厕所、逼仄的房间、狭小的阳台、灰蒙蒙的街道、天空、冷清的小巷、破旧的墙壁、昏暗的隧道、干涸的河道、清冷的风、火车隆隆驶过的轨道、车辆行驶的单调的噪音……既营造出非常真实自然的生活感,又如同人物内心的外化,暗示着人物的生存处境和心理感受。影片中雪地、风雪中迷濛的街道等空镜头反复出现在不同人物的人生故事中,既实现了不同线索间的转场,又串联起不同人物殊途同归的人生命运,更重要的是,这些空镜头是人物情绪的一种延伸和隐喻,如王国维所言,“一切景语皆情语”,无论是韦布在桥下痛骂之后出现的雪地镜头,还是王金看完敬老院黯然离去之后的风雪中道路的镜头,都似乎在寓意着人生之路的艰辛难行和人物内心的绝望荒凉。

《大象席地而坐》表达了胡波对人生富有哲学意味的思考,虽然影片使用大量长镜头,呈现出非常写实化的风格,然而归根结底它又是一个关于生存的寓言。很多镜头中对对话的另一方有意采用虚焦形式处理,构成了影片令人无法忽略的一种美学风

格。这一处理似乎也暗示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影片有意设置了一些富有象征意味的意象,例如影片中,一只走失的大白狗在街头游荡,主人到处寻找,询问正和朋友聊天的王金,也询问过逃离学校的韦布。黄玲走出家门时,也曾在门口遇到过这只大白狗低声咆哮着,她从楼洞内堆积的杂物中抽出一根棒子握在手中,大白狗转身跑掉了,大白狗这一意象一方面串联起几个人物各自独立的生活轨迹,也给后面小狗被大白狗咬死,王金和韦布意外地卷入对方的生活,而黄玲则拿起球棒打倒主任夫雪等情节埋下了伏笔。出现在影片中的这只大白狗充满了暴力、非理性的意味,似乎是命运不祥的象征。类似的还有韦布得罪了于帅,当他来到教室准备坐下时,椅子却突然塌了,把他摔倒在地,这一幕似乎也暗示着命运的陷阱正在等待着他。

另一个富于象征意味的意象便是大象了。影片中的人物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而在这时能够给他们一点希望和慰藉的,竟是远方的一头席地而坐的大象,因为这一点共同的希冀,于城决定放韦布离开,让他去实现自己未了的心愿。虽然王金反驳韦布说大象与你有什么关系,即便王金明白,“你能去任何地方,可以去,到了就发现,没什么不一样”,他仍然不能拒绝韦布的坚持:“去看看!”无论是自杀者如李凯,还是施暴者如于帅,还是其他挣扎着活下来的人们,生命对他们而言似乎并无本质的不同,如同落水狗一般,他们只是试图抓住不同的稻草。“我还能怎么办啊”,如同命运的叩门,存在的残酷追问最终使每个人逃无可逃,不得不面对存在的真相,面对自我,但即便如此,当父子情、父女情、母女情、师生情、友情、爱情一一褪去温情的面纱,如寒冬般冷气逼人之时,命运却奇妙地将四个人的人生勾连起来,这些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的边缘人物,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同类之感,不同的人生之旅因

此有了不期而遇的温情慰藉。尽管这点点温情在如冰天雪地一般荒凉的人生路途中如此微不足道、短暂易逝,但却使影片闪烁着难得的希望的光辉。“去看看”虽如同刹那即逝的火花,却足以燃亮一成不变的平淡生活,而最终在车灯照射的光晕中,人们逐渐加入踢毽子的行列,而在这一刻,大象的嘶鸣声从黑夜里破空而来。这是虚无的象征,还是希望的召唤,影片就在这超现实的一幕中划上句点。和小说中于城想去拥抱大象却被踩死的残酷结局相比,电影要显得更为含蓄而温情。胡迁(胡波写作时的笔名)在《大裂》中写道:“我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此处,并在荒原里寻找可以通向那里的通路,并坚信所有的一切都不止是对当下的失望透顶。”^[3]也许,去满洲里的道路,就是这样一条西西弗斯式的道路?

当然,影片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例如,长镜头所营造的客观真实感与文艺化的对白间的反差,令部分场景有出戏之嫌。人物设定同样也有可以推敲的地方,影片中于城的身份设定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出戏,因为按照生活的逻辑,这么一个觉得什么都无意义的人物,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使唤一帮小混混的大混混,他的某些言语,更像是导演人生哲学的传声筒。

参考文献:

- [1] 胡迁,何晶. 胡迁:文学是很安全的出口[EB/OL]. <https://finance.sina.cn/2018-11-21/detail-ihnyuqhi5765819.d.html>.
- [2] 苏牧,梅峰. 贝拉·塔尔的电影课堂[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3).
- [3] 作为作家的导演胡波:孑然前行,率先抵达[EB/OL]. (2018-11-23)[2019-05-25]. <https://baijiahao.baidu.com>.

(责任编辑 谢春红)

A Glimmer of Hope in the Absurd World

——Comments on Hu Bo's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LI Xin

(Department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As the nearly four-hour maiden film of Hu Bo,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is an important treasure of Chinese films in 2018. The film presents a dark, depressing, and absurd picture of life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four persons in one day, reflecting the influence of depression culture that prevails among young people nowadays. The film embodies the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life in the aesthetic style of long shot. The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life is poetically expressed through metaphorical images.

Key words: depression culture; absurd; long shot; metaphor

基于 DEA 模型的海南省高等教育与 区域经济耦合关系实证研究

曲涛^{1,2}, 王雪梅¹, 陈婷婷¹

(1. 海南大学 教务处, 海南 海口 570228; 2.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 北京 100084)

摘要: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具有正向协同效应与反向制约效应。对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度进行 DEA 模型实证分析, 发现: 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先抑后扬, 逐步呈现相对有效状态; 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协调度总体呈现“相对有效—回撤”的交替状态;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长期处于低度协调状态。建议: 开展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完善高校现代化治理体系, 显著提升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与贡献度; 区域经济在既定产业政策引领下扩大经济发展规模、提高经济发展效益; 面向高校实施区域经济发展专项课题招标, 促进高等教育产业融入区域经济; 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与高校实现合作共赢; 在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专项小组”, 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长效耦合机制。

关键词: 海南省; 高等教育; 区域经济; DEA 模型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4

中图分类号: G40-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9)03-0025-06

在“互联网+”知识经济时代, 教育与经济的有机融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范式。我国已经全面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并向普及化阶段逐步过渡, 高等教育在区域经济活动中的渗透融入程度日益加强, 与区域经济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演进。学术界对此予以广泛认同与积极关注, 从全国范围^[1-2]、城市经济带^[3-4]、省级行政区域^[5-6]等不同区域视角开展研究, 也有学者从财政要素^[7]、人才要素^[8]等投入视角分析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关系。本研究拟在定性分析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基础上进行 DEA 模型定量分析, 探索改善路径。

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分析

如图 1 所示, 总体而言,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包括两个性质相悖的基本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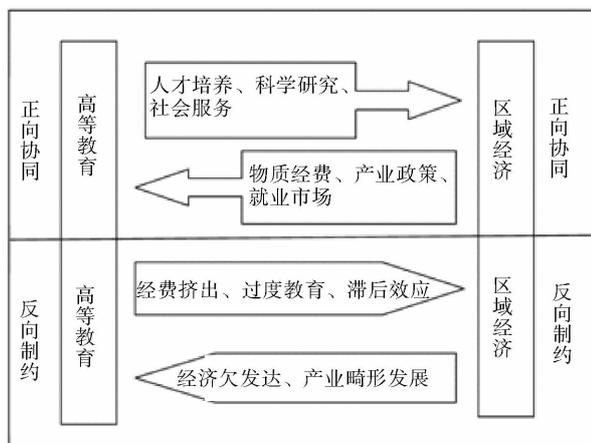


图 1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示意图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具有正向协同效应。一般来说, 高等教育具有以下三大基础功能。一是人才培养功能, 为区域经济社会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 实

收稿日期: 2019-03-26

基金项目: 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资助项目“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结构协调性研究”(Hnjg2018-09); 海南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结构协调性研究”(hdjy1835)

作者简介: 曲涛(1969—), 男, 山东淄博人, 海南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副研究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高等教育学。

现就业人口整体层次提升,奠定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重要人力资源基础;二是科学研究功能,为区域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无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其他类型的科学研究都是区域经济生产力的潜在动力源,通过成果转化有可能实现特定经济领域、产业升级方面的重大突破;三是社会服务功能,属于高等教育持续服务区域经济的显性功能,通常表现为技术指导与培训、联合技术攻关、政策调研咨询以及有关政策性工作(如扶贫、公益志愿者服务等),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形成了区域经济生产力。可以说,高等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引领元素。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无疑为高等院校办学条件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科学研究活动、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与经费支持。区域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客观存在着发展依赖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要高质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深圳大学、苏州大学、宁波大学等地方高校异军突起与其所在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丰盈充沛的地方财政收入密切关联。区域经济产业政策对于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规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区域高等院校应当根据国家与地区产业政策制定实施相应的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就业市场是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实现的重要途径,就业市场对于高职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等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岗位要求的人才需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等院校层次结构与学科结构调整,进而促进高校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毕业生的社会竞争力。同时,高等教育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物资采购、师生消费支出、培训服务、后勤医疗服务等均是区域经济的组成部分。如果将高等教育视为产业的话,高等教育产业则构成了区域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

毋庸讳言,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反向制约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耗资巨大的高等教育投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挤压其他民生事业投入(特别是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将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如果高等教育发展显著超前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就业市场对于高层次人才接纳程度较低,可能形成“过度教育”或“教育陷阱”情形,即高等教育资本(包括公共财政、企业、个人投入)的投入产出效益低下甚至趋近于零,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具有继承性与稳定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周期比较长,人

力资本转化具有滞后期。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瞬息万变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求,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高校科学研究都会存在一定的差距,无法迅速回应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落后的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同样具有迟滞作用。欠发达的区域经济将直接导致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教学科研条件建设长期不能满足教育教学基本需求,难以支持高水平区域高等教育建设。人才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要素,如果缺乏高水平教学科研平台和令人满意的薪酬就无法引进学科专业高层次领军人才(团队),而且,高校现有教学科研队伍的稳定性也将面临挑战。另外,区域经济如果过于依赖某一产业而出现畸形发展,将不利于高校学科专业改革与发展,削弱区域高等教育的适应性与前瞻性。

二、耦合关系实证分析

(一)海南省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概述

建省前,海南高等教育已有初步基础。例如,1986年已建有4所普通高等院校,分别是海南大学、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海南师范学院和通什师范专科学校,同时还有广播电视大学、海口市业余大学等6所成人高等学校。建省以后,海南省高等教育历经解构、重构、新建、升格,总体规模有所扩大。截至2017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增至19所,其中7所本科高校,12所高职专科院校;普通本专科在校生18.5万人;研究生培养主要集中在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与海南医学院,在校生合计近6000人。目前,海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39%,接近全国平均水平(42.7%)。

经济特区创建初期,海南经济发展起步强劲,1990—1994年GDP增幅保持在10%以上,并且远超全国GDP增长率,1992年海南省GDP增长率甚至达到惊人的41.5%。1992—1994年人均GDP连续三年高于全国人均GDP。由于1993—1996年国家实行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海南经济核心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泡沫迅速崩塌,1995年海南省GDP增长率猛跌至3.8%,海南人均GDP拐点由此形成。1995年以来,海南人均GDP长期低于全国人均GDP,并且差距持续扩大。不过,海南省GDP增长率除2006年略低外,均超过全国GDP增长率1个百分点,2010年达到阶段性峰值后持续回落。2017年海南省GDP增长率为7.0%,仍然略高于全国水平(6.8%)。海南省产业结构经历了“I、III、II”阶段(1988—1991年)、“III、I、II”阶段(1992—2009年)和“III、II、I”阶段(2010—2017年)的演进过程。2017年海南三次产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

重依次为 22.0 : 22.3 : 55.7。

(二)DEA 模型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源自 1978 年美国学者 Charnes 等发表的《决策单元效率测量》^[9],基于“相对效率评价”理念,针对特定考察项目的决策单元集(DMUs),由数学模型运算系统赋予指标权重,通过数学模型求解“生产效率最优前沿面”,作为效率参照面进行距离测度以判断特定 DMU 是否有效。典型 DEA 模型包括 CCR 模型(不变规模报酬)和 BCC 模型(可变规模报酬),基于投入角度(Input)或产出角度(Output)进行测量。其中,投入角度是指保证输出值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减少输入以提升效率,产出角度则是在输入值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增加输出以实现最有效。^[10]

借鉴崔玉平、张弘的区域高等教育系统评价指

标体系^[11],结合海南省相关数据的可采性、客观性与可靠性,拟定如表 1 所示的本研究指标体系。考虑到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从 1994 年起按税制改革新口径统计,将研究期间确定为 1995—2016 年。参考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的填报要求,在校折折合数计算时,本专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权重分别为 1、1.5 和 2。涉及产值、经费的指标数据均以 1995 年为基期(1995 年 = 100),将名义变量转化为实际变量。其中,海南地区生产总值(GDP)通过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予以换算,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均使用 CPI 平减,剔除物价变化因素。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见表 2。为了消除原始数据量纲以及数量级对于 DEA 模型分析结果的影响,通过 Min - Max 标准化处理方法将原始数据全部转换为无量纲化数值。

表 1 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测量指标体系

研究领域	评价指标		数据来源
高等教育	X_1	规模: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折合数(人)	海南统计年鉴
	X_2	人力: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人)	海南统计年鉴
	X_3	经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亿元)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X_4	质量:科研项目、论文数(个)	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
区域经济	Y_1	规模: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海南统计年鉴
	Y_2	结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海南统计年鉴
	Y_3	效益: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	海南统计年鉴
	Y_4	质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元)	海南统计年鉴

表 2 原始数据描述性统计

变量	X_1	X_2	X_3	X_4	Y_1	Y_2	Y_3	Y_4
均值	92666.4	8369.7	13.4	1953.5	1161.4	45.3	147.7	9935.8
中值	82101.0	8168.0	9.9	1806.0	898.2	43.7	70.6	8222.5
最大值	192392.0	14651.0	36.8	4200.0	2665.3	54.3	430.3	18974.0
最小值	12108.0	3456.0	0.9	228.0	363.3	41.2	28.5	4770.0
标准差	70413.5	4349.7	12.0	1385.1	748.8	4.1	142.0	4730.1
峰度	0.2	0.1	0.5	0.2	0.7	1.1	0.9	0.6
偏度	1.4	1.4	1.8	1.6	2.1	2.8	2.3	2.0
观察数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传统 DEA 模型理论,CCR 模型提供 DMUs 不变规模报酬假设下的技术效率(TE),BCC 模型则为可变规模报酬假设下的纯技术效率(PTE),二者相除就得到规模效率(SE)。于是,TE 被分解为 PTE 与 SE 两个部分,即:TE = PTE * SE。就指标解释意义而言,PTE 是指管理和技术等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SE 是指规模因素影响的生产效率,而 TE 则反映了整体治理结构与绩效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符合程度。因此,TE 也可称为综合效率或总体效率。^[12]

本研究基于产出角度的 BCC - 0 模型,使用 DEAP 2.1 软件对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耦合关系进行 DEA 模型效率评价,将效率值作为协调度

进行考察。首先,以高等教育数据(X)为投入变量,以区域经济数据(Y)为产出变量,计算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状态协调度:TE($X \rightarrow Y$)、PTE($X \rightarrow Y$)和 SE($X \rightarrow Y$),计算结果如图 2 所示;然后,以区域经济数据(Y)为投入变量,以高等教育数据(X)为产出变量,计算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状态协调度:TE($Y \rightarrow X$)、PTE($Y \rightarrow X$)和 SE($Y \rightarrow X$),计算结果如图 3 所示;最后,借鉴文启湘、梁爽^[13]、刘东皇等^[14]的计算方法,按照公式 TE($X - Y$) = min(TE($X \rightarrow Y$), TE($Y \rightarrow X$))/max(TE($X \rightarrow Y$), TE($Y \rightarrow X$))、PTE($X - Y$) = min(PTE($X \rightarrow Y$), PTE($Y \rightarrow X$))/max(PTE($X \rightarrow Y$), PTE($Y \rightarrow X$))、SE($X - Y$) = min(SE($X \rightarrow Y$), SE($Y \rightarrow X$))/max(SE($X \rightarrow Y$), SE

($Y \rightarrow X$), 分别计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彼此耦

合度, 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相关数据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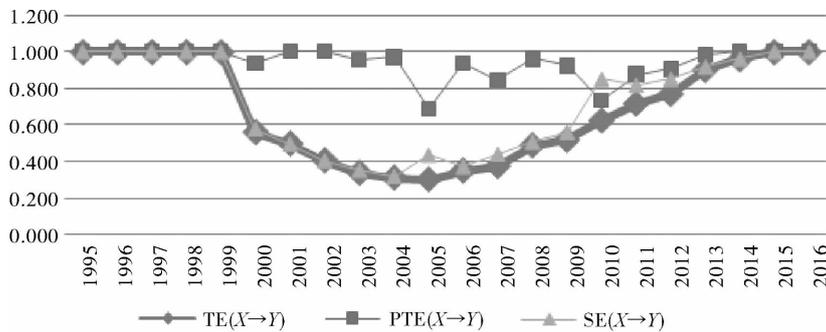


图 2 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状态协调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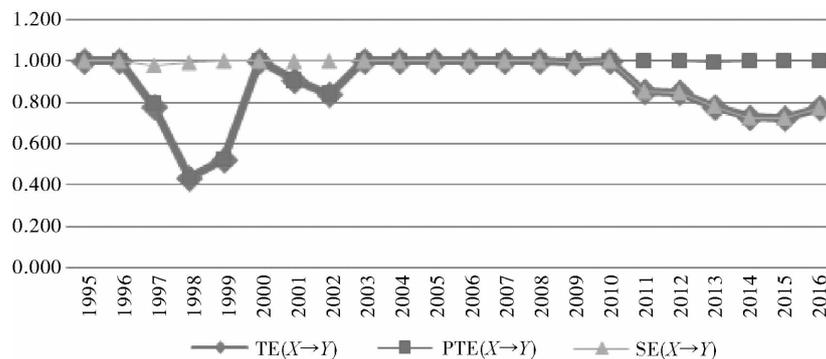


图 3 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状态协调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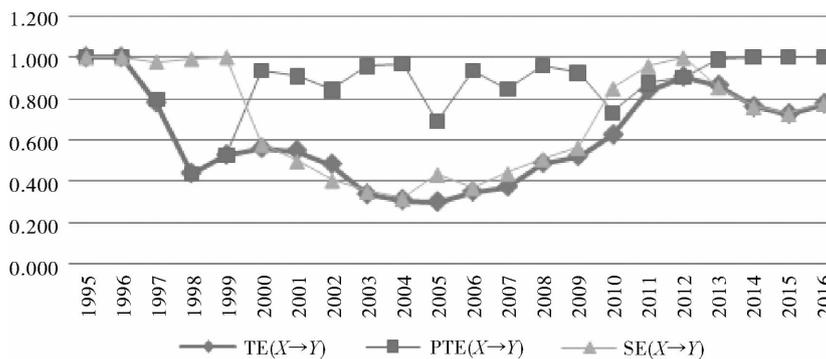


图 4 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彼此耦合度

1. 海南省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先抑后扬, 近年来逐步呈现相对有效的状态。随着 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 高等教育规模显著扩大, 高校基础设施、师资队伍、办学条件等均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并且, 扩招政策出台比较紧急, 高校主要增设对于教学条件要求不高、师资相对充裕的文科类学科专业, 导致人才培养口径重复严重, 与区域经济发展契合度不高, 因此, 2000 年开始高等教育对于区域经济的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均急速下降, 分别在 2004 年、2005 年出现最低值 0.317、0.298。2006 年以后, 海南省高等教育投入显著增加、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有 4 所高职院校先后升格为本科院校, 分别更名为琼州学院(2015 年更名为热带海洋学院)、海口经济学院(民办)、琼台师范学院和海口科技学院(民办)。特

别是, 2007 年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原海南大学合并组建新海南大学, 成为海南省唯一的“211 工程”建设高校。海南省高等教育办学效率逐年持续回升, 2015 年、2016 年处于相对有效的状态, 基本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

2. 海南省区域经济对于高等教育的协调度总体呈现“相对有效一回撤”的交替状态。其中, 2003—2010 年的综合效率、2010 年前的规模效率、2003 年以后的纯技术效率均处于或接近相对有效状态。效率回撤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期: 一是 1997—1998 年, 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出现骤降, 1998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在东南亚经济圈的海南省经济建设造成较大冲击, 进而波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 二是 2010 年以后, 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出现持续走低趋势, 区域经济投入并没有实现高等教育高效率产

出。众所周知,2010年1月国务院决定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海南省面临自1988年经济特区建设以来的第二次历史性发展机遇。然而,之后数年的建设成效与“世界一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的预期目标还相距甚远,省内高校与省外知名高校联合设立的国际旅游岛研究机构也没有形成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的研究报告。2017年海南省GDP全国排名倒数第4(仅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亟待提升。

3. 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长期处于低度协调状态,近年来略有改善。其中,纯技术效率基本维持在0.8水平左右波动,2014—2016年处于相对有效状态;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总体呈现W型趋势,分别有2个年度、3个年度相对有效,最低值分别出现在2005年(0.317)与2004年(0.298),2012年回升至高点后再次回撤,年平均值仅为0.613和0.698。如前所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是发挥彼此促进作用的重要前提,海南省政府应予以高度关注。2015年海南省明确重点建设12个重点产业,提出了《海南省十二大重点产业人才培养五年行动计划》,部分高校牵头成立了若干省重点产业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区域对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有所加强,2016年的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略有反弹至0.775水平。

三、若干政策建议

1. 就高等教育而言,应当根据“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三大领域”“五大平台”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等12个重点产业^[15],进行硕博学位点、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高校布局结构,通过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和高校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显著提升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度与贡献度,同时避免出现过度教育的情形。建议:为弥补海南省农科类高校建制空白,海南农垦独立建设或合作建设“海南热带高效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本为本”战略,适度扩大本科院校规模,全面加强本科院校建设,适度控制学术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显著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在现有高校分设校区的基础上,考虑在海口、三亚以外的地区,地方GDP超过200亿或者与自贸区(港)建设直接相关的市县(包括儋州、澄迈、琼海、文昌、万宁以及陵水)新建高等院校;出台税收、人事管理、人才津补贴等鼓励政策,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教学、科研资源,在海南省建立分校或校区(例如,中央民族大学海南校区已落户陵水)、研发

分支机构,与省内高校协同育人、科学研究、资源共享等全方位合作。

2. 就区域经济而言,当务之急就是在既定产业政策的引领下,显著扩大经济发展规模、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实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有力支持,特别是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建议:结合12个重点产业协调发展要求,逐步摆脱海南房地产业“一业独大、畸形发展”的困境,持续调整优化经济产业结构,进一步巩固并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例,改造升级农牧渔业的生产结构,扩大资本密集型、生态友好型高科技制造业企业规模,有效改变海南第二产业产值比例长期偏低的情况,显著提升新型工业对于海南GDP的贡献度;实施区域经济发展专项课题招标,为高等院校深度参与区域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平台;产业发展过程主动融合高等教育的积极成果,推动高等教育产业形态日趋成熟,成为海南省区域经济的重要内容;加强高校人才就业市场网络化建设,及时将各行业就业岗位需求以及变化趋势反馈于高校,搭建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重要联结桥梁,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高等教育提供比较充沛的高端就业市场;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与高校开展人才培养、技术攻关,实现合作共赢。

3. 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历史机遇背景下,切实提高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实现经济社会进步繁荣,已是当下最为紧迫的事情。优化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实施规模扩张与内涵建设并重策略,加强内部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办学效益与管理效益,实现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高质量特色发展,成为提高彼此耦合度的关键路径。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强有力的机构与机制保障,因此建议:在海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专项小组”,从省一级高度予以统筹、规划、协调,有助于实质性推进海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多维互动、彼此促进、全面发展,以期建立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长效耦合机制。

参考文献:

- [1] 姜华,王晶,吴晓林. 区域经济与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2016(12):7-12.
- [2] 王永杰,黄政,王振辉. 我国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11-115.
- [3] 何丹,程伟,龚鹏. 中部地区长江沿线城市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17(9):

- [4] 王黎恺. 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以中国长三角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J]. 江苏高教, 2014(6): 58 - 59.
- [5] 李静, 谢树青. 基于网络 DEA 模型的新疆高等教育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分析[J]. 新疆社会科学, 2015(3): 132 - 138.
- [6] 韦文华. 国发二号文件背景下贵州高等教育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3(5): 199 - 202.
- [7] 陶元磊, 李强. 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因果性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 2015(1): 74 - 81.
- [8] 刘林, 郭莉, 李建波, 等. 高等教育和人才集聚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驱驱动研究: 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13(11): 15 - 20.
- [9] 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 Measuring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 1978(2): 429 - 444.
- [10] 李光金, 阎洪. 测算具有松弛技术效率的 DEA 方法[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2(2): 67 - 73.
- [11] 崔玉平, 张弘. 我国省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水平的量化评价[J]. *现代大学教育*, 2015(5): 84 - 91.
- [12] 曲涛. “211 工程” 高校本科教育绩效实证分析[J]. *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5(4): 45 - 56.
- [13] 文启湘, 梁爽. 基于 DEA 模型的流通业与消费增长协调发展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0(1): 5 - 11.
- [14] 刘东皇, 谢忠秋, 李向东. 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研究[J]. *统计与决策*, 2015(22): 140 - 142.
- [15] 彭青林. 刘赐贵在全省引进外资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 [EB/OL]. (2018 - 12 - 01) [2019 - 01 - 30]. <http://www.hainan.gov.cn/hainan/ttxw/201812/d892098e2b954219bab0b4a994ce563a.shtml>. 2018 - 12 - 01/2019 - 01 - 3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in Hainan Province Based on DEA Model

QU Tao^{1,2}, WANG Xuemei¹, CHEN Tingting¹

(1. Academic Office,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28, China;

2.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has positively synergistic effect and negatively restrictive effe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ainan province based on DEA model shows that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that higher education exerts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es after initially falling up and gradually presents a relatively effective state;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that regional economy exerts on higher education generally presents a “relatively effective - withdrawal” alternating state;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has been in a low degree of coordination for a long ti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to carry out the supply - sid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improve the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matching and contrib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expand the sca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established industrial policies; to bid for special topic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y into regional economy;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talent training and tackl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with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rough tax policies to achieve cooperation and win - win.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long - term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pecial Group* should be set up as a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leading group of Hai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Hainan province;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 economy; DEA model

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

——以河南省为例

余 兵

(信阳农林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选取郑州绿博园、郑州中牟农业科技园等20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业科普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评价方法,评价分析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资源等级及各评价因子得分,并提出对应的开发策略。

关键词: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开发;河南省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5

中图分类号:F59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31-04

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是指:以农业资源为媒介,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以及较强的知识性和教育性,能够对农业休闲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开发为农业旅游和科普教育活动并产生多种效益的农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丰富,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研究也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鲍春裕分析了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发展现状,总结了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发展的基本类型。^[1]张智慧以河南省12个农业科普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示范点的发展潜力做了分析评价。^[2]杨正通过对河南省主要的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进行梳理,对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的客源市场进行调查,证实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丰富、客源市场庞大。^[3]综观现有文献,大部分文献是对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类型、发展潜力、客源市场等进行研究,在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方面,还未见有专门的研究。本研究选取20个具有代表性的农业科普旅游示范点,运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评价方法,评价分析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资源等级及各评价因子得分,并提出对应的开发策略,以为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与数据

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下辖17个地级市、1个省直管市。河南是传统农业大省,有1863个乡镇,4.98万个村庄。全省37811个旅游资源单体中,73%在农村,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农业科普旅游发展前景广阔。目前,全省共有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12个、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46个,旅游扶贫重点村1065个,发展农业科普旅游意义重大。^[4]

本文选取郑州绿博园、郑州中牟农业科技园、郑州新郑大枣基地、信阳毛尖基地、信阳市太阳坡寨田园综合体、安阳汤阴恒大农业种植基地、南阳南召玉兰生态观光园、许昌鄢陵花卉生产基地、驻马店嵯峨山郁金香、洛阳薰衣草庄园、新乡宝泉万株郁金香园区、信阳市郝堂村、南阳镇平中原荷花博览园、洛阳栾川重渡沟、平顶山东坡文化生态园、商丘市玫瑰庄园、周口老子生态园、三门峡信达生态园、漯河神农庄园、鹤壁紫金山生态园等20家具有代表性的农业科普旅游示范点作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应用的是由国家旅游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共同编制,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收稿日期:2019-02-09

基金项目: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172400410436);信阳农林学院科技创新团队2017年度项目“豫南大别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余兵(1979—),男,河南新县人,硕士,信阳农林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乡村旅游。

总局 2003 年发布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评价方法,该评价体系包括资源要素价值(85 分)、资源影响力(15 分)、附加值 3 个评价项目,观赏游憩使用价值(30 分)、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25 分)、珍稀奇特程度(15 分)、规模、丰度与频率(10 分)、完整性(5 分)、知名度与影响力(10 分)、适游期或使用范围(5 分)、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8 个评价因子。每一评价因子分 4 个层次,相应分值为四档。资源要素价值和资源影响力总分为 100 分,只有附加值中的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有负分值,其余均为正值。

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评价方法,本研究邀请了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黄淮学院、平顶山学院、周口师范学院、信阳农林学院等 10 所高校的 20 位旅游专业副高以上职称教师为评价专家,对研究对象 20 个园区各评价因子进行评分,再计算各园区的总体得分,最后依据旅游资源单体图例标准(表 1),评价出 20 个园区的资源等级,评价结果如表 2 所示。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400 份,回收 392 份,回收率为 98%。

表 1 旅游资源单体图例

资源等级	评价分值	图例表示	形象描述
五级	≥90	■	特品级旅游资源,国内占很高地位,国外知名
四级	75-89	●	优良级旅游资源,国内地位重要,国外了解
三级	60-74	◆	优良级旅游资源,国内占有重要地位
二级	45-59	□	普通级旅游资源,在省区内占有重要地位
一级	30-44	○	普通级旅游资源,地区内有一定地位

(资料来源:国家旅游局《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

旅游资源评价的目的是开发利用,为分析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优劣势,为资源开发提供参考,在评价结果的基础上,对 20 个园区各评价因子的平均得分进行计算,结果如表 3。

三、结果与分析

(一)四级、五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欠缺

从表 2 可以看出,选取的河南省各地有代表性的 20 个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单体中,评价结果为五级的旅游资源单体没有,评价结果为四级的旅游资源单体 4 个,占 20%;评价结果为三级的旅游资源单体 6 个,占 30%;评价结果为二级的旅游资源单体 3 个,占 15%;评价结果为一级的旅游资源单体 7 个,占 35%。通过各资源等级所占比重,可以看出河南省的五级旅游资源,即特品级旅游资源没有,四级旅

游资源也只占 20%,我省高等级的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十分稀缺,大部分为资源等级较低的三级、二级、一级旅游资源。

表 2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评价结果

项目名称	得分	资源等级	图例表示
郑州绿博园	87	四级	●
郑州中牟农业科技园	82	四级	●
郑州新郑大枣基地	78	四级	●
信阳毛尖基地	81	四级	●
信阳市太阳坡寨田园综合体	72	三级	◆
安阳汤阴恒大农业种植基地	71	三级	◆
洛阳栾川重渡沟	71	三级	◆
许昌鄢陵花卉生产基地	70	三级	◆
信阳市郝堂村	69	三级	◆
洛阳薰衣草庄园	68	三级	◆
新乡宝泉万株郁金香园区	53	二级	□
南阳南召玉兰生态观光园	50	二级	□
驻马店嵯峨山郁金香	49	二级	□
南阳镇平中原荷花博览园	43	一级	○
平顶山东坡文化生态园	40	一级	○
商丘市玫瑰庄园	37	一级	○
周口老子生态园	36	一级	○
三门峡信达生态园	36	一级	○
漯河神农庄园	34	一级	○
鹤壁紫金山生态园	35	一级	○

表 3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各评价因子得分

评价因子	平均得分
观赏游憩使用价值	14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12
珍稀奇特程度	8
规模、丰度与频率	5
完整性	2
知名度与影响力	4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	2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3

(二)观赏游憩使用价值

从表 3 可以看出,“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平均得分为 14 分,即“全部或其中一项具有很高观赏价值、游憩价值、使用价值”,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得分较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观赏游憩使用价值有限。

(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平均得分为 12 分,即“同时或其中一项具有省级意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得分较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没有很好地挖掘出来。

(四)珍稀奇特程度

“珍稀奇特程度”平均得分为 8 分,即“有少量珍稀物种,或景观突出,或此类现象在其他地区

少”,珍稀奇特程度得分较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比较大众化,珍稀奇特程度不突出,特色不够明显,没有非常有特色的旅游产品。

(五) 规模、丰度与频率

“规模、丰度与频率”平均得分为5分,即“独立型旅游资源单体规模、体量较小;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结构、疏密度较差、频率较低”。本项得分为5分,得分较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单体规模较小、体量不够大,不便于开发成集群性旅游产品;丰度较差、出现频率较低,对游客吸引力较弱。

(六) 完整性

“完整性”平均得分为2分,即“形态与结构有明显变化”,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形态与结构保持不够完整,需要维护原始面貌。

(七) 知名度与影响力

“知名度与影响力”平均得分为4分,即“在本省范围内知名,或构成省内的名牌”,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只在本省范围内知名,但在全国范围内,知名度与影响力较弱,还没有全国知名的农业科普旅游品牌,与河南省的农业大省地位不相匹配。

(八)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

“适游期或使用范围”平均得分为2分,即“适宜游览的日期每年超过150天,或适宜于60%左右的游客使用和参与”,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适游期时间不够长。

(九)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减掉了3分,原因是“已受到轻度污染,或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说明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已受到轻度污染,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的保护,防止污染进一步恶化。

四、开发策略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与分析,对应国家旅游局《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提出如下开发策略:

(一) 加大优良级、特品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培育力度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丰富、种类繁多,但大部分为三级以下等级的资源,四级、五级的优良级、特品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较为缺乏。目前,河南省还没有在国内叫得响的特品级农业科普旅游品牌,这与河南省的农业大省地位不相匹配,加大优良级、特品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培育力度,是提升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品牌影响力的关键所在。我国江浙地区农业科普旅游资源优良级、特品级较多,这与江浙地区经济发达,旅游产业发展思

路开阔等因素有关。就河南省而言,首先,聘请高层次的规划机构,高起点、高规格地做好农业园区的规划,并和乡村振兴、产业精准扶贫、特色小镇、“互联网+”农业、农业信息化、农村电商紧密结合;其次,做好招商引资工作,通过多渠道、多途径融资,保证项目落地实施;再次,在运营保障方面,可以与国内知名大型旅游集团合作,深度开发农业科普旅游产品,形成农业科普旅游全产业链条。

(二) 开发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观赏游憩价值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有些仅仅作为农作物种植,产生的是农作物的效益,农作物的观赏游憩价值没有充分开发,旅游价值功能没有发挥。例如,许昌鄢陵被誉为“中国花木第一县”,花卉苗木种植规模大,面积已达40万亩。目前,许昌鄢陵花卉生产基地主要的经济效益来自花卉的种植、生产、销售,花卉的观赏游憩价值没有充分开发,观赏游憩价值欠缺,花卉生产基地还没有深度开发为“景区景点”,花卉产业没有和旅游业紧密的结合。应充分开发花卉产业的观赏游憩价值,以市场为导向,开发出符合市场规律、受游客欢迎的花卉旅游产品,才能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三) 挖掘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没有充分的挖掘。例如,信阳毛尖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早在唐朝时期就被列为贡品,信阳毛尖不仅国内知名,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知名度,远销欧美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阳毛尖作为农产品,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但作为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其旅游价值功能没有很好的挖掘,没有和旅游产业很好融合,茶旅融合力度不够,应充分挖掘其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方面,在旅游项目开发时,应该把茶文化元素融入旅游项目,把茶文化中的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茶书、茶具、茶画、茶学、茶故事、茶艺等体现在旅游活动中的各个环节;科学价值方面,在旅游项目开发时,应发展茶养生、康养旅游,开发旅游购物品时,应把信阳毛尖的生津解渴、清心明目、提神醒脑以及防癌、防治坏血病等多种功能融入旅游保健品中;艺术价值方面,开发茶文化旅游演艺项目,要借助于人物、道具、舞台、灯光、音响、字画、花草等,把信阳毛尖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展示出来。

(四) 突出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珍稀奇特程度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珍稀奇特程度不明显,珍稀物种较少,景观不突出,没有非常独特的,具

有垄断性的农业科普旅游资源。洛阳薰衣草庄园、驻马店嵯峨山郁金香对本省游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近几年全国各地纷纷搞花海经济,导致现在的花海已经成为一般的大众性产品,越来越没有特色,难以对游客产生吸引力。珍稀奇特程度是旅游之基,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对原始的地方文化特征进行深度挖掘,充分整合。只有根植于本地自然、文化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珍稀奇特程度突出的旅游产品,才能在旅游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要避免照搬、再造、复制、模仿等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行为,跳出雷同开发的套路。因此,在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开发产品的珍稀奇特程度、突出资源的特色。

(五) 扩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规模、丰度

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单体规模较小,丰度较低,不利于形成规模化的观赏价值高的旅游产品。笔者认为,不管是什么农作物的花和果,只要形成一定的规模、丰度,都可以开发成为旅游景点。比如油菜花,本身是油料农作物,但如果形成一定规模,就可以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像江西婺源油菜花,种植面积较大,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自然地游客产生了吸引力。湖北麻城龟峰山的映山红,千百年来漫山遍野开放,近几年当地政府将其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的农业科普旅游品牌正在叫响。目前,河南省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单体规模较大的是洛阳牡丹、开封菊花,洛阳连续举办了36届“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封连续举办了35届“开封菊花文化节”,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除此之外,河南缺少叫得响的农业科普旅游品牌。应扩大驻马店嵯峨山郁金香、南阳南召白玉兰、新乡宝泉郁金香、商丘市玫瑰的种植规模、丰度,这样才能形成单体规模体量巨大、结构完整、疏密度优良的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品牌。

(责任编辑 刘成贺)

(六) 加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措施

旅游资源开发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保护利用,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很多地方存在破坏性开发行为,体现在农业科普旅游资源开发上,就是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措施不到位。例如,信阳毛尖,每年春季,都有大批的旅游团大巴到茶园基地购买茶叶,体验茶香风情游,但是旅游大巴排放的废气对茶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同时,由于信阳毛尖茶园病虫害防治需要喷洒农药,造成对基地环境的污染,和旅游目的地对环境的高标准要求相冲突。既要做好茶园的病虫害防治,又要保护好旅游环境,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还有新郑大枣,新郑大枣是河南省知名特产,新郑市一直把大枣产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重点品牌,成功举办了多届“枣乡风情游”,开发了“古枣园”“红枣大观园”“玉皇观枣台”等著名景点,但枣树易生虫,需要喷洒农药,尽管新郑喷洒农药符合国家标准,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污染问题。应该加大农业科普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措施,让游客吃得放心、游得开心,形成健康的农业科普旅游品牌。

参考文献:

- [1] 鲍春裕. 河南省农业旅游发展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 2018(6): 53-55.
- [2] 张智慧. 河南农业观光旅游资源定量评价与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4): 67-69.
- [3] 杨正. 河南省农业旅游发展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17: 46-48.
- [4] 李学鑫. 河南省旅游资源开发条件定量评价研究[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16(3): 71-74.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Resources

——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U bing

(College of Tourism Management, Xiny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of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Twenty representative tourism demonstration sites of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e, such as Zhengzhou Green Expo Park and Zhengzhou Zhongmou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us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 evaluation method of *Classifi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s* (GB/T18972-2003), the resource grade and evaluation factor scores of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ourism resources in Henan province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tourism resources; evaluation; development; Henan Province

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问题与对策

杨 慕

(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发展计划部,北京 100054)

摘要:现阶段,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发展进入中高速发展状态,经济结构也进行了调整,这就要求国有企业相应地做出改革和应对。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企业预算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内容,对企业整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在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全面发展,在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要求尽快对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作出整改和创新。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国有企业;预算管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6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35-0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首次提到“经济新常态”,指出今后中国经济要变高速增长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要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为国有企业发展带来了新一轮的机遇和空间,夯实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可以有效节省企业成本,合理分配资源结构,将企业财务风险压缩到最小化。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要结合现代化管理特色,找出现有预算管理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积极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法 and 对策,制定精确化的预算管理目标,提高企业预算管理运行效率,实现既定的总体规划和目标。

一、经济新常态下实行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作用和意义

国有企业预算是一个覆盖范围广泛的全面体系,涉及企业的每一项收入和支出情况。它是一个动态管理过程,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企业全员参与。预算在国有企业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使企业明确经营目标;为企业各部门传达任务,协调平衡;作为企业控制成本的主要依据;企业制定评价考核的主要标准。企业预算由多种预算内容组成,预算管理是其中之一。国有企业通过对即将经营的业务和财务作出事先的预测,在企业活动开展中,根据预算对

企业的各项活动进行精细化管理以及动态监控和跟踪,确保实际和预算保持一致。如果发现实际和预算出现差别,要及时对该部分作出比对和分析,并对结果作出指导和改善,将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可以对企业经营成本和财务风险进行一定的规避,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确保国有企业完成战略性目标,实现国有企业的价值,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推动国有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凸显的问题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要求企业不再单纯地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而是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衡量企业经营效益的不再单单是数字,更讲究稳定可持续性。国有企业预算管理作为企业运行的一大保障体系,在经济新常态结构影响下,各种问题凸显。

(一)预算编制阶段的问题

预算编制是整个预算管理体系的初级阶段,对企业将要开展的业务收支情况作出预算规划,制定各项预算内容的预算框架,本着节约成本、建设企业的双向原则,为企业服务。

1. 预算人员思想松懈,组织制度不健全

在国有企业的预算管理编制阶段,预算人员是

收稿日期:2019-03-07

作者简介:杨慕(1990—),女,河南郑州人,硕士,中国长城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工程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营销体系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编制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其对工作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整个预算管理工作的质量。目前,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编制工作效果不佳,企业整体对预算管理工作的认识不到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管理工作意义不大;没有认清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面临的大局形势,对企业预算编制工作定位不准确,认为企业预算管理工作同企业实际经济效益关系不大;部分国有企业对预算编制工作没有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编制人员也是由财务人员兼职,预算管理编制相关制度不健全,领导人员不到位,分工不明确,工作效率不高。

2. 预算编制偏离实际,存在全口径化

在预算编制工作开展过程中,一是预算编制偏离实际。国有企业预算汇编过程呈现正金字塔的结构,汇编工作程序是由处于最底层的子公司进行初编,再逐级向上级进行汇报,最后总公司整理汇总形成决议,此种编制过程显然脱离了实际依据,部分子公司为了在考核时争名次,会虚报预算成本、少算收入,以此来保证完成年底考核目标。二是预算编制的口径不统一。因预算编制政策制定存在一定的盲区,部分预算编制人员在成本计算中缺乏责任心,会自动把某些成本忽略不计,造成实际支出和预算出现偏差,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 预算编制工作目的性不明确

国有企业通过预算要达到企业既定目标,起到为企业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的作用。企业制定的战略规划目标是企业预算编制工作开展的指导方向,但在部分国有企业中,预算编制人员没有指导性的思想指引,缺乏完善的目标体系,企业预算编制目标的制定没有根据整体战略目标进行逐一分解、详细制定,预算编制工作开展随意性极大,考虑范围仅仅停留在企业财务经营内,没有大局意识,导致国有企业年初制定的预算目标和实际经营结果差距很大,使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二) 预算执行监管阶段的问题

如果将整个预算管理工作比作建造一座房子,预算编制是房子的整体框架,执行监管是房子的建造主体结构,占据着主要地位。国有企业在作出预算后,将管理目标按照企业各部门职能进行对应分解,各个职能部门只有配备专人进行监管,执行成员认真执行到位,才能确保年底完成既定目标。

1. 监督反馈不完善

制度是保证一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科学合理地制定管理制度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中,预算编制人员在制订

出预算目标后,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监督管理工作相对不到位,即使预算编制工作做得很好,但监管不力,也会对目标的实现起到阻碍作用。相关的预算目标分发给各执行部门后,大部分部门没有将执行监督工作列入具体执行环节,即使少数部门有人负责执行监管,监管人员思想也不到位,或是仅仅在自己部门内部进行监督,没有将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统一起来,使预算管理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2. 预算执行力度不到位

国有企业兼具行政性质和企业性质,预算执行工作的开展受到相关行政权力的管控,预算执行工作开展的具体执行人不能自由发挥自身执行能力,行政部门通过拥有的行政权力对预算执行进行把控,预算执行管理意识薄弱,忽视了预算管理工作对企业长久发展的促进作用。国有企业预算管理执行中责任关系不明确,因此在预算管理执行中,国有企业执行预算效率低下,难以按照预定计划来规划企业的下一步目标,大大制约着国有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施。

3. 管理方法缺乏综合性

在预算管理的执行阶段,国有企业各部门“闭门造车”,不与其他部门沟通,造成预算管理目标执行的单一性,国有企业不能综合各部门执行预算的情况对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施及时作出调整和修改,企业各部门往往前半年收紧支出,年底又“完成任务”似地突击花钱,以此来完成起初制订的预算管理目标。这种“完成任务”似的执行管理方法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前期的收紧可能造成部分资源配置不到位,后期的放任又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能将有限的成本用来做最有效的事情。

(三) 预算绩效考核阶段的问题

绩效考核是衡量一项工作成败的重要参考标准,国有企业在前期制定出预算目标后,检验其执行效果的环节在预算绩效考核阶段。现阶段,国有企业预算绩效考核相关的制度不完善,部分企业存在走形式的现象。

1. 测评考核制度不完善

预算考评是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保证环节,直接决定着预算执行人员的工作力度。现阶段,由于受长期国有企业特有管理模式的影响,制度制定的表象化大于实际化,虽然制定了相关的考核制度,但对工资绩效的实际影响不大,震慑力也就不足。仅仅在预算销售环节,销售员的工资和销售业绩密切相关,考核制度主要针对的是销售部门,对于生产预算、成本预算等相关员工的考核标准和工资没有直

接关系,失去了测评考核制度应有的实际意义。

2. 考核形式单一,存在形式化现象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考核制度不健全,考核目标主要是预算编制阶段制定的目标任务,考核形式过于单一。以国有企业的财务预算考核制度为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是为了将各部门的经济活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预算目标来衡量各部门的工作绩效。用财务预算标准考核员工的工作表现时,并不能准确地显示出各个员工详细的工作绩效,使得奋战在最前线的员工和工作效率平平的员工差别不大。所以,如果使用财务预算这种考核方式,对员工的总体评价不公平,会降低部分员工的工作热情。因此,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不利于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对总体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要求国有企业强结构稳增长,不再着眼于经济的总量增长,而是以发展促增长、以增长促发展。企业预算管理作为企业效率的保障机制,要积极应对经济新常态对国有企业的新考验。

(一)完善预算管理编制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编制工作是一项全面性的前期工作,其工作量较大,对国有企业全年工作效益起着指导性作用。只有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保证此阶段工作的科学合理,才能确保后期的预算管理执行阶段和预算管理考核阶段顺利进行。

1. 优化预算编制制度

国有企业预算编制工作的制度优化,对于提升预算编制工作的质量、增强预算编制工作的针对性、确保预算执行效果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在预算编制制度优化中,企业应针对预算编制工作人员对编制工作重视度不高、认识不到位等问题,着重对预算编制制度进行优化。选择得力的领导对预算编制工作进行总体统领,通过民主投票方式,选取工作责任心强、专业知识丰富、能力较高的预算编制工作人员,详细制定规划,积极和企业各部门进行信息沟通,确保科学合理地完成预算编制工作。

2. 预算编制坚持以实际为中心

国有企业在开展预算编制工作之前,要对全体员工进行强调,提高全员对预算工作的重视度,适当给预算编制人员一定的思想压力,促进工作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对待预算编制工作。在编制工作开展后,国有企业各个部门要加强联动,各子公司工作人员要及时沟通,预算的最终结果要通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多次沟通,确保每一项信息的真实合理,坚

持以实际为中心,严格科学合理地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坚持收入全额进预算范围的原则,同时确保总公司到子公司所有编制工作人员口径一致。

3. 预算编制工作要有战略目标

预算编制工作是为国有企业实现总体战略性目标服务的,所以预算编制工作要按照合理的预算指标体系进行。在制定预算目标时,要求工作人员本着高度的主人翁精神,为大局着想,以国有企业总体战略目标为中心,放眼企业未来的长久性发展。国有企业的预算编制工作是整个预算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企业全年的各项业务开展起到向导作用。因此,需要将企业整体运作过程和初期预算编制目标相结合,从原材料购进到产品销售,从成本支出到盈利收入进行全覆盖。只有将每一项预算内容严格进行预算,注重细节、认真规划、上下一心、形成合力,才能确保国有企业实现战略性目标任务。

(二)加强预算管理执行监管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预算编制目标后,能否打好预算管理这一保卫战,关键在执行阶段。预算管理涉及的企业部门多、业务种类多、相关工作人员多,需要有一套给力的执行监管体系来保证执行到位。

1. 建立健全预算管理执行监管制度

国有企业在制定出各项业务的预算目标后,只有保证在实际运行中监管到位、执行到位,才能达到甚至超出预期目标。但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有所不同,其制度制定和私企有着明显的差异,管理分级现象较严重,执行工作的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国有企业应成立专门的预算执行领导小组,针对员工工作执行情况制定奖惩制度,并力保说到做到,发挥执行监督强大的作用,推动预算管理目标的落实。

2. 转变观念全力开展预算管理执行工作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除了监管不力的因素外,执行人员的思想观念也影响着预算目标的完成。国有企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受我国经济体制的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不太高,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这种观念严重影响到企业预算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度,大大影响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企业预算管理执行人员要有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结合互联网优势,努力学习新的高科技知识,保证预算管理执行到位。例如:在预算管理执行过程中建立预算管理执行分析报告制度,定期对执行数据进行跟踪和分析,避免实际和预算出现太大偏差,及时作出合理的调整。

3. 执行管理要齐心协力通力合作

企业预算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行为过程,它要求企业在实施预算管理目标过程中,根据执行情况随时调整相关方案。国有企业预算管理执行工作是一个全员参与的强大体系,上到领导干部,下到基层员工,涵盖国有企业的方方面面。为了有效弥补预算管理执行工作制度方面和员工观念方面的不足,要积极调整执行工作方案,创新工作方法,将各个部门、各个执行工作人员牢牢联系在一起,定期进行思想鼓励,确保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三) 制订科学合理的现代化预算管理考核方案

为了激发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结合经济新常态的新形势,国有企业要利用当前先进的网络技术,根据企业总体发展规划,制订合理的预算管理考核体系,确保企业正常运行。

1. 预算管理绩效制度应结合经济新常态特点

经济新常态下,要求国有企业发展求稳,企业效益稳中有增,这就要求结合这一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企业预算管理考核制度。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相关考核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偏激,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预算管理考核制度也要相应地进行优化,以激励员工代替批评员工,以物质奖励代替口头表扬,这种奖励制度对员工实际意义更大,更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2. 预算管理考核应坚持“以人为本”

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由于对预算管理总体工作缺乏科学系统的认识,从预算管理编制到预算管理绩效考评一系列工作都没有建立长效的监督管理

工作机制,导致整个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实际效果不佳。在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考核阶段,要做到全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不仅要制订长效的考核办法,更要注重考核形式的人性化,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鼓励员工积极工作,保证员工劳动报酬,适当进行阶梯化奖励机制,在考核时执行效果要按照预算考核制度严格把关、奖惩分明,充分调动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大大促进员工保证甚至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对于工作量相对落后的员工,及时进行沟通和心理访谈,让员工感受到来自企业的人文关怀,为经济新常态下国有企业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语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工作不仅是一项全面系统的工作,更是一项精益求精的业务。在经济新常态下,其关键性有增无减,国有企业一定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在制度上优化改进,在执行中加强力度,上下一心,奋力前行,力保国有企业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继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 [1] 吴林斌.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实施难点及效果探究[J]. 财会学习, 2019(2): 34 - 35.
- [2] 徐丽芳. 企业财务预算管理和实施预算管理问题的分析[J]. 纳税, 2019(9): 43 - 49.
- [3] 苏思雨. 探讨国有企业预算管理与绩效考核相关问题[J]. 金融经济, 2019(2): 189 - 191.
- [4] 秦惠芬. 国有企业预算管理的困境及对策探讨[J]. 中国市场, 2019(6): 84 - 8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Issues and Strategies of National Enterprises' Budget Management under New Normal Economy

YANG Mu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China Great Wall Industry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54,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onsidering that the mode of Chinese economics development has changed from high - speed developing to medium - high - speed developing and that economic structure has been adjusted,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SOE) should make corresponding reform and response. As great contributors to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SOE should maintain a sound growth momentum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our economy. Enterprises' budget management, as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conten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ut under new normal economy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budget management of SOE have restrained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SOE. Given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improvements and innovations of SOE budget management should be made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new normal economy;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budget management

从文化自信角度再认识清末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

郭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法律脱胎于文化,文化有表现形式及取旨的不同,却无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从文化角度而言,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并非全因落后使然。清末战争的失败不但冲击了国人文化理念,也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发展轨迹。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争出发,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进行新的视角分析。

关键词:清末修律;战争;法律体系;解体;文化自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7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39-0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国传统法律体系及其优秀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法治文化更是一个包含规范体系、观念体系以及法律机制在内的综合范畴,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最初的、直接的特性以及法治文明的本来面貌,更折射出一国法治文化的产生历程。因此,对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及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解体进行再认识与解构也是践行文化自信的重要表征。

一、由两场战争看清末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

历史的一大魅力在于:无论古今中外,总会演绎出相同或相似的情景。相同或者相似的历史,虽然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却因为具有相似性从而可以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总结规律与经验教训。^①

(一)先秦时代的“部落战争”及其实质

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的历史典故已为我们所熟知,而在部落纷争的过程中,苗民部落似乎与“九黎部落”有着较为良好的关系。《伪孔传》云:“三苗之君效蚩尤之恶”。华夏部落自黄帝时开始至夏禹时期与苗民部落之间就相互征战,并且互有胜负,直至最后华夏部落对“三苗”取得了决定性的

胜利。先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后又“尧战于丹水之浦,以负南蛮”,“窜三苗于三危”^[1],到了舜时期,“却苗民,更易其俗”^[2],已经试图改变苗民部落的风俗习惯,到了夏禹时期,华夏部落对苗民部落进行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战争,此战过后,苗民部落再也无力与华夏部落作战。

值得一提的是,在华夏部落征伐苗民部落的过程中,华夏部落的首领一直在强调一个战争的理由:“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椽、黥”^[3],每次进行战争总是以替天行道,消灭异类的口吻,将己方置于“符合天道”的制高点上,指斥苗民部落“弗用灵”,其“法”酷虐。退出历史舞台中央的苗民部落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成为异端、蛮夷,其创制的“刑法”也被指斥为酷虐之法,其战败也是由于滥施酷法,招致天怒,而对其降下惩罚。指斥苗民“弗用灵”为非,则己方自然是以“用灵”为正。根据《说文解字》:“灵,巫也。各本巫上有灵字。”“用灵”的华夏部落在法律形态上尚属于“神判”阶段,从法律的发展及价值的实现方式的角度来看,苗民部落的“刑”虽然残酷,但是却比华夏部落较为先进。而根据传世文献和近现代法律史的研究可知,华夏部落在战胜苗民部落不久以后也建立了类似的“刑罚”体系,如华夏

收稿日期:2019-03-27

作者简介:郭威(1991—),男,河南开封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治官之法、法律史研究。

部落的刑罚体系中,逐渐也有了“五刑”“俱五刑”等称谓,残酷程度丝毫不逊于苗民的“五虐之刑”。

由此可知,苗民部落的法律及其刑罚并非真的“酷虐”“不合天道”,而是因为自身的战败,丧失了品评自己法律制度乃至本族文化的话语权,而华夏部落之所以能够在先指斥苗民部落法律制度“弗用灵”“有违天道”,并以“替天行道”的姿态征伐苗民部落,后来又制定与其相似或根本就相同的刑罚制度,而没有感觉有何不妥,就在于部落武力强盛,通过战争的胜利,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并书写了历史。

(二)清末数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与清末立宪修律的影响

19世纪中期,正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寻求扩张的英国与古老的中华文明相遇,并因“鸦片贸易”受到中国的遏制而与中国开战。中国由于准备不足,武器落后及对此次战争的重视程度不够等多种原因,最终与英国签订了拉开中国近代耻辱序幕的《南京条约》。其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又数度发生战争,虽然在一些战争之中有小胜,但还是多以中国的战败而结束。列强在中国攫取的利益越来越多,而对中国的轻视却愈来愈严重。至中日甲午海战,偌大中国竟然败给了一向为中国所轻视的“蕞尔小国”——日本,似乎更让列强看到了中国的虚弱不堪,对中国最起码的尊重也不再保有,并无视清政府的存在,在中国划分起了势力范围。列强一改昔日羡慕、向往中国文化的心态,对中国的制度,乃至整个文化都开始持有鄙夷的态度。

而中国内部,随着战事的一再败北,士大夫阶层中的忧国之士,也开始积极寻求救国良方。这些士大夫们开始还对国家、对本民族之文化保有相当的自信,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这一心态的形象表露。

然而,随着中国对外战争的一次次失败,特别是败于向来不为中国所重视的“弹丸小国”——日本,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乃至清王朝的皇帝再也无法安于现状,希望借助一场由“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巨大改革来挽救中国的危局。一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的“维新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虽然该运动并未对当时的体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它却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中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开始意识到“改革可以作为缓解政治危机”的旗帜和武器。且“变法”的理念已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一旦再有危局出现,人们可能还会想到“维新变法”,并企图再次以一场“变法运动”来解救再次出现的“危局”。

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事变”的发生又给了“变法”一次出场并最终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运行轨道的机会。

因“庚子事变”而被迫“西巡”的慈禧太后,尚在逃亡途中,就匆忙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4]由此拉开了中国法律史上,乃至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的序幕——清末立宪修律。这次运动虽然未能成功立宪,却移植了众多的西方法律形式及法律理念,并逐渐在中国得以适用,并在法律形式与立法取旨上逐渐瓦解了一直适用的中国传统法律体系。

二、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解体的文化原因分析:战争的失败影响波及文化、法律制度层面的表现

战争,往往是历史及社会进程发生重大变化及转折的催化剂。有时它会穿越因果关系的界限,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或颠覆历史演进的进程;有时它是社会变化的一剂猛药,暴露出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从而比其他事件更能引起社会思潮的变动,进而引发社会的改革或者革命。但更多的时候,战争是展现力量,掠夺资源,向外推行本国、本民族文化理念、政治模式的有力方式。

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又一场场失败不断冲击着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及文化认知模式,使得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固有认知逐渐从骄傲的认同走向怀疑,再到无情地抛弃甚至是鄙夷^②,并且开始愈发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效仿西方,将自身纳入西方的认同体系才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出路。而列强则通过一场场对中国战争的胜利不仅看到了一向为西方所钦慕的古老帝国原来是如此的虚弱不堪,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由原来的推崇逐渐转向轻视与鄙夷。列强后来不仅派驻大量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创办教育,鼓励中国人到其本土学习,还向中国兜售其政治与法律制度。

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的解体及西方的法制理念能够取代中国传统的法制理念,并不是因为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比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先进,归根结底可以认为是战争失败的影响波及文化层面,具体而言,就是法律文化、法律体系、法制理念。法律脱胎于文化,本民族的所创造出的法律,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从内而言,是当时的中国人将战争失败的结果归因到了法律制度上;从外而言,则是西方通过战争的形式,将中国强行纳入其文化体系、法律体系。

如果当年的战争,中国从一开始能够取得胜利,

使列强不敢小视中国,则中国传统的法律体系应当会保存下来,并在日后的文明碰撞中吸收其他能够完善自我的因素,保留本体,不断发展。传统法律体系在历史上的发展演进过程就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如果当时的中国不曾战败,中国可能也就不会以西方的标准来给自己定义所谓的“近代与现代”,更不会以“法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来评价自己的法律,因为离开了西方的语境和话语体系,这些概念对中国而言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

但是,历史不能推倒重来,现实的情况是:中国传统的法律成了战争失败的一个责任承担者和牺牲者。然而,每一次战争的胜负,必定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一次战争的失败,又必定有多重因素需要对其负责。一个国家的制度形式,文化传统等都不过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又不过是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如果真的需要法律为战争的失败来负责,那么法律究竟该为战争的失败负责几何?

笔者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西方的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相反,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制理念和法律制度在有些方面需要向西方去学习,从而更好地自我完善),而是要说明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法制文化乃至中华法系并非是由于落后才遭受了解体、被替代和消失的命运,虽然它在某些方面确实也存在有许多不足之处。

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法律脱胎于文化。文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落会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经历特有的历史事件而产生和创造出本地区、本群落特有的文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虽然有差异,但不应有优劣高低之分,文化应当有交流,但不应有文化霸权,更不应以自己的文化去试图压迫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传统的法律与西方国家的法律一样,都是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们会有表现形式的不同,也会有价值追求的差异,但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和价值追求的差异,不应当成为品评优劣的因素,更不应当是后者用来取代前者的借口。其实,抛开表现形式不同、价值追求差异,就法律传统、具体立法技术而言,中国传统的法律同西方相比,不仅不会逊色,甚至更有光辉。

三、由立宪修律而思及的中西法律比较

(一)回顾:中西相比,中国传统法律未尝逊色于西方

中西法律的比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自知能力不逮,也无意于将两者进行全面比较,只想

仅就中西法律的传统、具体的立法技术两方面做一下简单比较,以对上文作出回应。

1. 中西法律的起源时间、发展历程、法律体系的构成比较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起源形式与时间有多种说法。有“法源于天说”,“刑(法)起于兵说”,“法源于‘定纷止争’说”,“法源于苗民说”,“皋陶作律”等多种说法。^③仅采取其中“刑(法)源于兵说”而言,《汉书·刑法志》称:“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且“大刑用甲兵”的说法,在《国语·鲁语上》篇中也有提到。这说明,我国的法律(尽管还处于雏形时期)在很久以前就产生了。而根据《尚书·吕刑》中“法源于苗民”的说法,中国法的起源也已经相当早,并且形成于中国产生国家以前。即使按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法律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中国法律的起源起码也可以追溯到夏朝。在后世的典籍与历史文献中多次提到了“夏”的存在,并且考古工作者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其他相关的考古成果也可以形成佐证。大量的文献加上考古成果的佐证,是可以相信夏朝的存在。且《尚书》《竹书纪年》《汉书·刑法志》中都有关于夏朝法律制度的记载,《魏书·刑法志》更是直接说:“夏刑大辟二百,劓辟二百……殷因于夏,盖有损益。”^[5]不仅说明了夏朝的刑种,还描述了中国传统的法律继承方式。

“爱琴海文明”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开端。古代爱琴海文明由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组成,其中克里特文明发生较早。克里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的克利特岛上。其早期王宫时期也不过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前1700年时期。虽然克里特文明也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有关商业往来的内容,也不过是一些简单的符号。^[6]远较中国文明的开始要晚了许多,更遑论法律文明。

就法律的传承而言,我国的法律“自夏、殷、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朝、东汉……唐、宋至明都是汉族一系传承,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野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五代的后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但都是努力的汉化;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绵延四千年才不至中断,在五大法系中……能独立成一个系统,并且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法律唯一的典型。”^[7]并且,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中,再未能有其他法律体系的存在,中国的法律被周边国家直接适用或移植适用。

而翻看任何一部西方法律文明史,就发现近代以前西方的法律变化犹如其政治状况,简直是乱糟糟的一团,随着各个部族之间征战,法律制度之间经常是“断裂式”的演变,相互之间未能不间断地形成传承的体系。例如,古希腊法、罗马法、日耳曼法之间没有明显相互的继承关系,由本民族的习惯演变而来。后来,在世俗法适用的同时,还有教会法的存在。至于说近代以来罗马法的复兴,也是因为偶然地被发现,并因为社会的需要而被予以关注和研究,其间已间断了数百年。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同属一个文化体系的西欧国家间,竟然形成了差异巨大的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

2. 中西法律立法技术的比较——以《大清律例》和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刑法典为例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大清之律非大清所创造也,中华数千年之国粹,经历代圣君贤相参合理法,以辑为成书。”^[8]《大清律例》承于《大明律》而远法《唐律疏义》,其立法旨趣与技术同“中国传统的法治基本精神”及方式乃是一脉相承。《大清律例》的总体框架是由“名例律”和“六律”构成。“名例律”列于篇首,是关于刑名、刑等、刑之加减、恤刑、赦免、共犯、自首、类推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其作用大致相当于现代法律之“总则”。“六律”与中央六部相对应,即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基本上是按六部的管理事务范围来划分的,其中又以“刑律”所占比重最大,涉及方面也最广。从具体法律规范看,《大清律例》由律、小注、例三者组成。律是关于某一犯罪及处罚的一般规定。小注一般以小字夹编在律或例条相应的行文之间,主要起疏通或注释的作用。例的地位和作用比较有争议,大致说来属于特别法规之类。另外,在卷首还配有八图(丧服、纳赎)以及所附“比引条例”。以当代刑法立法的视角来看,《大清律例》的体例、内容也不能算落后,并且吏、户、礼、兵、刑、工的结构是符合当时的政治架构的。至少在鸦片战争以前,在西方人眼中,《大清律例》不但不算落后,反而能当成学习的对象,伏尔泰曾说:“关于中国,只要听到这种法律,我不得不主张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在主持修订刑法典时,除了吸收了17—18世纪法学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贝卡利亚等人的思想外,还特别参考了《大清律例》。其立法参考附件为《十二表法》《查士丁尼法典》和《大清律例》,其中仅有《大清律例》是仍在适用中的活法典。1810年,《法兰西刑法典》正式完成公布实施,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部刑法

典。法典由总则和四卷组成,共484条,其总则规定了犯罪的分类和处刑的原则等,与中国传统刑律的“名律例”部分相当。我们还可从其“刑罚”部分看出《大清律例》的影子,如死刑规定为斩首,恢复了在大革命后已被废除的无期徒刑、终身苦役、终身流刑等,还保留了示众、刺字、烙印、枷颈和戴镣链等刑罚,这些都与清代的刑罚制度有着相似之处。一些刑罚内容和手段也是日后才陆续修改的。^[9]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的对外战争不仅仅启发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更将其法律思想、立法经验传播到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正是在1810年的《法兰西刑法典》制定后,欧洲国家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才陆续开始制定刑法典,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二)展望:中国未来法制建设应当走“中国特色”之路

在此,笔者仍想要再次表明对中国传统法律及法律文化的观点:中国的传统法律是中国数千年来法制建设的成果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在体例结构上算不上十分完善,内容的涵盖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法律价值取向也需要同世界上其他法系交流,借鉴……但就其本身而言,绝不至于沦落到因为落后而需要被其他法律替代的地步。它的解体,主要是成了战争失败的牺牲品。

这种“取代型的断裂式法律演变”不仅一改中国法制建设的传统,更以短暂、直接、粗暴的方式试图破除中国人的规范习惯和伦理习惯,使得中国的立法失掉了原有遵循的脉络,不得不一味去学习西方,同时也造成法律的制定与法律的运行出现“两层皮”的现象。一边是国家轰轰烈烈的西方式立法,一边是民众层面特别是乡村、社区的民众仍然在坚持着原有的规范习惯、法律习惯。国家依照制定法所作出的裁判还经常不为民众所认可。更严重的是,随着西方法治理念及文化的推行,中国原有的价值取向及伦理观念开始逐渐解体。移植过来的东西没有很好地确立,原有的一套观念又逐渐解体,中国人,渐渐成了一个问题群体,中国社会,也渐渐成了一个问题社会。台湾的张伟仁先生在很久以前研究《大清律例》时就提出过这一问题:“我国将来的社会可能真愈来愈像西方社会……糟糕的是现代西方人对他们以前走过的路已经很不满意,对于将来的去向更是十分迷惘。因为近年来西方社会里个人与社会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种种不合理的问题:个人的孤独无依、社会的暴乱冷酷、生存环境的污损毁灭……已经暴露出来,他们对于这些问题,有的还希

望于习惯的途径,在更进一步的科技发展中求解决;但也有些人认为不可再一味信赖科技,主张改由哲学和伦理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调整各项关系,使个人和社会和自然环境亲密配合,和谐共存。他们既在彷徨,我们也应该(实则是早应该)停一停盲目的脚步,仔细地看一看自己过去的路和西方过去的路,看出了其曲直、偏差,然后定下一个新的方向,选一条新的、自己的、更好的路。”^[10]不幸的是,张伟仁先生担忧的问题也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逐渐出现。现在反过头来思考一下当年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中礼教派的一些担忧与主张,又何尝没有道理?

中国的法制建设道路已然不可能再重走一遍,所倡导的理念与形式也逐渐为我们的社会所接受和认可,但移植过来的法律及其生长仍然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再看我们的传统法律体系,它仍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当今民众的规范习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一些内容、一些旨趣,追求的法制精神及价值取向对当今的法治建设、国家、社会的治理与发展,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四、结语

法律及其所属的文化,可能会因为战争的失败而丧失掉自我的话语权,成为战争失败的牺牲品,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及被取代,并非完全是落后使然,相反中国传统的法律及其基本精神不仅是由中华文化的土壤所孕育,在现在看来仍然能够补救当今法制建设的不足,并值得花费大功夫去反思。其间分析相应观点可能会有偏颇之处,但笔者热忱希望通过这一写作实践能够进一步唤起人们对传统法制及法律文化的重视,以裨益于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

注释:

- ①先秦时代的“部落战争”与“清末的对外战争”在性质上有着本质区别,且时间上相去甚远,将两者放在一起,实为看中两者影响的相似性:因为战争失败,丧失了本民族或部落的文化话语权。如有不妥,敬请指正。
- ②如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就多次盛赞中国的法律制度、科举制度的先进,应当为欧洲所借鉴和学习。
- ③关于中国法的起源的论述,在许多中国法制史教材中都有相关论述。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2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1-2。

参考文献:

- [1]尚书·舜典[M].周秉钧,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1:8.
- [2]吕氏春秋·邵类[M].(汉)高诱,注;(清)毕沅,校;徐小蛮,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87.
- [3]尚书·吕刑[M].周秉钧,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1:238.
- [4]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影印版.北京:中华书局:1960:4601.
- [5]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历代刑法志注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139.
- [6]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2-213.
- [7]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导言1.
- [8]吉同钧.刑法为治国之一端若偏重刑法反致国乱议[M]//孙国栋.律师文摘:第五辑[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88.
- [9]王宏治.清末修刑律的再认识[J].比较法研究,2005(4):4.
- [10]张伟仁.研究计划报述(代序)[M]//清代法制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17-1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 -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lf - confidence

GUO Wei

(School of Law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Law is born out of culture. Cultures may be different in expressions and purposes but are equal in their val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he disinteg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is not caused only by backwardness. The failure of the w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ocked the cultural concept of Chinese and changed the developmental track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system. Starting from famous wars in Chinese hist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system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Law modific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wars; legal system; disintegration; self - confidence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评价、分析及建议

任丙超

(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河南郑州 450046)

摘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背景下,各省级行政区纷纷出台知识产权强省(区、市)政策。按照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5个重点方向,根据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情况,选取7个代表性省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强省政策进行评价与结果分析。发现由于我国不同地域间产业基础差别较大,各省级行政区政策完善程度有较大差异。对此,要进一步突出分类支持、特色发展的知识产权强省(区、市)支持政策,建设覆盖东中西省份的知识产权事业协同发展机制,探索推进各级知识产权局垂直管理的行政体系。

关键词:知识产权强省;知识产权保护;保障性政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8

中图分类号:C93;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44-06

2015年12月18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71号)(下称:国务院“71号文”),对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作出新部署。国务院“71号文”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的知识产权建设事业迎来了新的大好机遇。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71号文”,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激发大众的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各省级行政区纷纷进行知识产权强省、强区或强市(以下统一称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从而助力我国实现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迈进。

一、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背景及意义

(一)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背景

2018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知识产权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也

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最大的激励。国务院就知识产权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

2019年4月26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主旨演讲,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专门强调要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这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知识产权合作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需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1]

(二)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意义

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距离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点,需要全国各地积极努力,共同实施,从而实现知识产权强国目标。^[2]消除知识产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局面。通过政策保障释放

收稿日期:2019-03-29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研究”(172400410268);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资助计划“不同主体间协同创新机制研究”(17A630005);2018年度河南省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计划课题“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中的政策保障研究”(20180106014)

作者简介:任丙超(1984—),男,河南濮阳人,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政策、版权管理。

创新创造活力,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作用,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激发和保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推动经济与社会的长足发展。

二、我国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评价

(一)评价模型的建立

政策一般是指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和具体措施。政策本身具有制定的针对性,内容的全面性,上下政策的体系性,实施结果的有效性等特征。

根据对国家知识产权强省相关政策内容的梳理,确定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等5个重点方向进行政策评价,设立了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5个政策评价一级指标,总体评价按照百分制的原则,分别赋予5个一级指标20分标准分;在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立了4个二级指标,分别是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政策内容的全面性,上下政策的体系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分别赋予每个二级指标5分标准分;三级指标主要是具体评价,根据里克特五级量表相关理论,分为非常好、好、一般、差、很差等5个层级打分,最高等次赋予5分标准分,以下4个层级依次递减1分。最终,根据三级指标评分标准,在基础政策资料库中进行分析评价,再经过加权计算,得出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的供给指数。

(二)样本的选择

省级层面,确定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水平不同,选取了7个有代表性的省区开展研究检索;在地市级层面,主要针对7个省区的省会进行资料收集和研究。详见表1。

表1 7个省区和省会城市名单

序号	省区	省会
1	黑龙江	哈尔滨
2	江苏	南京
3	河南	郑州
4	广东	广州
5	四川	成都
6	甘肃	兰州
7	广西	南宁

(三)评价方法

各省级行政区知识产权政策供给指数首先按照

百分制评价,5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每项标准分20分;在每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均为: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政策内容的全面性、上下政策的体系性、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每项标准分5分。各二级指标中第一、三项大体相同,第二、四项在基本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内容有所区别。以下分别对4个二级指标作出说明。指标体系详见表2。

1.“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指标

此为统一性指标,各二级指标下对应的三级指标名称一样,评价方法也一样。5个打分项分别是:有专门强省政策;有针对“创造”的专项政策;有对地市的“创造”工作的具体要求;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有特色政策。某省级行政区满足一项得1分。

“有专门强省政策”是指该省级行政区是否制定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强省政策;“有针对‘创造’的专项政策”是指该省级行政区是否制定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创造专项政策或在大政策中专门提出系列知识产权创造相关政策;“有对地市‘创造’工作的具体要求”是指该省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政策中是否对地市级行政区知识产权创造工作的发展目标等提出具体数值要求或状态描述;“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是指该省级行政区有没有提出具体的与知识产权创造相关的强省建设目标值;“有特色政策”是指该省级行政区有没有提出结合本地实际的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内容。

2.“政策内容的全面性”指标

此为差异性指标,各二级指标下对应的三级指标的具体内容均有所区别。评价一个省级行政区知识产权政策是否全面的目的是,是看其强省建设目标是否和国家政策一致,理念高度吻合,思路精确统一。5个一级指标分别引领五项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内容,在差异性的前提下,在对应的三级指标中,分别确定10个关键词。某一省级行政区的政策中有2个关键词计1分,多1个关键词加1分,计满5分为止。关键词的选择以通用、通识且具有一定的知识产权专业辨识度为原则。

根据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相关政策内容,分别在5个一级指标对应的内容中选择确定关键词。知识产权创造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激励、专利质量、注册机制、职务发明、海外布局、附加值、国际影响、科技评价、收益分配、当然许可;知识产权运用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附加值、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国际(海外)品

牌、技术转化、海外股权投资、质押融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知识产权法院、标准研制、专利布局、行政执法、海外专利、保护联盟、预警、风险控制、专利维权、维权援助;知识产权管理政策内容对应的关键词是: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确权审查、知识产权社会组织、一业多会、知识产权评议、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创新驱动发展评价、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知识产权奖励;知识产权服务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知识产权服务、服务平台、服务业集聚、知识产权代理、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商用、知识产权咨询、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市场。

3. “上下政策的体系性”指标

此为统一性指标,各二级指标下对应的三级指标名称一样,评价方法也一样。在全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国家、省、市政策体系性强不强,是知识产权供给水准高低的重要体现。其三级指标有:省级响应国家政策;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地市对省级有响应;省级对地市有具体数值要求;地市有具体措施。某省级行政区满足一项得1分。

“省级响应国家政策”是指省级行政区在国家提出知识产权强省战略后,是否及时、准确地制定了本地区相关政策;“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是指省级行政区是否对下一级行政区的知识产权事业提出

具体发展要求;“地市对省级有响应”是指地市级行政区在上一级政府提出知识产权强省战略后,是否及时、准确地制定了本地区相关政策;“省级对地市有具体数值要求”是指省级政府或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是否对地市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有具体数值要求或详细的状态描述;“地市有具体措施”是指地市针对国家或省对自身知识产权工作的要求,有没有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来落实相关工作。

4.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指标

囿于研究时间和研究力量有限,在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5个一级指标对应的“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板块下的三级指标中,分别选择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测量和对比,其结果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这些指标中均会对7个省区的相关目标值进行排名,前2名得5分,3至6名分别得4、3、2、1分,第7名0分。在创造指标中,确定了2016年月均发明专利申请量与2015年进行对比;在运用指标中,确定了2015年省区登记技术合同交易总额与2014年进行对比;在保护指标中,对2015年省区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总数量进行排名;在管理指标中,对2016年省区专利代理人总数进行排名;在服务指标中,对2016年相较2015年省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增长率进行排名。

表2 评价模型二级指标测度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度方法
创造 (20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有专门强省政策;2.有针对“创造”的专项政策;3.有对地市的“创造”工作的具体要求;4.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5.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性(5分)	确定10个关键词,有2个计1分,多1个加1分,计满5分为止。关键词:激励、专利质量、注册机制、职务发明、海外布局、附加值、国际影响、科技评价、收益分配、当然许可。
	上下政策的体系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省级响应国家政策;2.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3.地市对省级有响应;4.省级对地市有具体数值要求;5.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5分)	2016年月均发明专利申请量与2015年进行对比,对7个省区的增长率进行排名。前2名得5分,3至6名分别得4、3、2、1分,第7名0分。
运用 (20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有专门强省政策;2.有针对运用的专项政策;3.有对地市运用工作的具体要求;4.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5.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性(5分)	确定10个关键词,有2个计1分,多1个加1分,计满5分为止。关键词:知识产权交易平台、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附加值、知识产权国际影响力、知识产权信息开放、国际(海外)品牌、技术转化、海外股权投资、质押融资。
	上下政策的体系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省级响应国家政策;2.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3.地市对省级有响应;4.省级对地市有具体数值要求;5.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5分)	2015年省区登记技术合同交易总额与2014年进行对比,对7个省区的增长率进行排名。前2名得5分,3至6名分别得4、3、2、1分,第7名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度方法
保护 (20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有专门强省政策;2.有针对保护的专项政策;3.有对地市的保护工作的具体要求;4.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5.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性(5分)	确定10个关键词,有2个计1分,多1个加1分,计满5分为止。关键词:知识产权法院、标准研制、专利布局、行政执法、海外专利、保护联盟、预警、风险控制、专利维权、维权援助。
	上下政策的体系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省级响应国家政策;2.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3.地市对省级有响应;4.省级对地市有具体数值要求;5.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5分)	2015年省区受理知识产权案件总数量进行对比,对7个省区的案件总数进行排名。前2名得5分,3至6名分别得4、3、2、1分,第7名0分。
管理 (20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有专门强省政策;2.有针对管理的专项政策;3.有对地市管理工作的具体要求;4.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5.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性(5分)	确定10个关键词,有2个计1分,多1个加1分,计满5分为止。关键词: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知识产权综合改革、确权审查、知识产权社会组织、一业多会、知识产权评议、知识产权目标评估、创新驱动发展评价、领导干部综合考核、知识产权奖励。
	上下政策的体系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省级响应国家政策;2.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3.地市对省级有响应;4.省级对地市有具体数值要求;5.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5分)	2016年省区专利代理人总数量进行对比,对7个省区的总数量进行排名。前2名得5分,3至6名分别得4、3、2、1分,第7名0分。
服务 (20分)	政策制定的针对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有专门强省政策;2.有针对‘创造’的专项政策;3.有对地市的‘创造’工作的具体要求;4.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值;5.有特色政策。
	政策内容的全面性(5分)	确定10个关键词,有2个计1分,多1个加1分,计满5分为止。关键词:知识产权服务、服务平台、服务业集聚、知识产权代理、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商用、知识产权咨询、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市场。
	上下政策的体系性(5分)	满足一项得1分。1.省级响应国家政策;2.省级政策对地市有要求;3.地市对省级有响应;4.省级对地市有具体数值要求;5.地市有具体措施。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5分)	2016年省区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数量与2015年进行对比,对7个省区的增长率进行排名。前2名得5分,3至6名分别得4、3、2、1分,第7名0分。

(四)评价结果

在确定了评价模型和计分方法后,结合网络调研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打分。

1.指数分换算公式

在模型中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5个方面分别按照20分满分打分,得出原始分;接下来,根据这五项工作在知识产权事业中重要性的差别,在百分制的前提下,分别赋予25、30、20、10、15的权重得分;最后,根据公式分别计算出单项指数得分并求

和,计算出各省知识产权强省政策保障指数。

计算公式:原始分的计算和指数分的计算均在百分制的设定下展开,所以某省知识产权在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5个方面的某一项上的指数分,等于该项权重除以20,再乘以该项原始分。假设某省知识产权强省政策在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5个方面的原始得分分别为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假设某省在以上五项中对应的指数得分分别为 Y_1 、 Y_2 、 Y_3 、 Y_4 、 Y_5 。具体换算公式见表3。

表3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指数分换算公式表

计分种类	指标	创造	运用	保护	管理	服务
原始分	各项满分	20	20	20	20	20
	假设	X_1	X_2	X_3	X_4	X_5
指数分	各项权重	25	30	20	10	15
	假设	Y_1	Y_2	Y_3	Y_4	Y_5
	得分 计算公式	$Y_1 = \frac{5}{4}X_1$	$Y_2 = \frac{3}{2}X_2$	$Y_3 = X_3$	$Y_4 = \frac{1}{2}X_4$	$Y_5 = \frac{3}{4}X_5$

2.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评价结果经过网络调研、文献分析、模型建造和计分评

价,最终得出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指数,其中江苏以74.5分排名第一,广东、四川、河南、

黑龙江、甘肃分列二到六位,广西名列最后一位。见表4。

表4 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指数表

序号	行政区	指数	分值类别	创造	运用	保护	管理	服务
1	江苏	74.5	原始分(x)	14.00	15.00	15.00	15.00	16.00
			指数分(y)	17.50	22.50	15.00	7.50	12.00
2	广东	65.5	原始分(x)	13.00	12.00	14.00	15.00	13.00
			指数分(y)	16.25	18.00	14.00	7.50	9.75
3	四川	64.5	原始分(x)	14.00	14.00	10.00	11.00	14.00
			指数分(y)	17.50	21.00	10.00	5.50	10.50
4	河南	64.3	原始分(x)	13.00	12.00	14.00	11.00	14.00
			指数分(y)	16.25	18.00	14.00	5.50	10.50
5	黑龙江	62.7	原始分(x)	10.00	15.00	12.00	9.00	15.00
			指数分(y)	12.50	22.50	12.00	4.50	11.20
6	甘肃	61.3	原始分(x)	11.00	12.00	10.00	13.00	16.00
			指数分(y)	13.75	18.00	10.00	7.50	12.00
7	广西	50.3	指数分(x)	11.00	10.00	11.00	6.00	10.00
			指数分(y)	13.75	15.00	11.00	3.00	7.50

注:指数得分中,各小项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各省指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三、我国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评价结果分析

(一)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政策保障建设趋势

综合对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政策保障的评价,可以发现其建设趋势呈现以下特征:第一、政策保障覆盖面越来越全。七省区都出台了与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相呼应的地方性政策,且内容涉及范围越来越全面,目标越来越清晰,相关措施越来越具体。第二、涉及“保护”的政策力度明显增强。七省区都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提出相对系统的保障措施,重视对现有保护状态的改善,可以看出,都在努力打破现有制度束缚,创新保护方法。第三、涉及“运用”的政策呈现较强的创新性。七省区在利益分配、质押融资、技术转让等方面有较多的创新性政策,且对国家政策的跟进比较快。

(二)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政策保障建设的优缺点

在总排名中,江苏位列第一,其在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政策内容的全面性,上下政策的体系性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等方面均处在领先地位。相比较而言,广东在知识产权运用政策创新方面与江苏有一定的差距,在对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重视程度上还有待加强。四川的短板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政策方面,这两项指标共同反映出四川知识产权事业开放度不够高的现状。河南的各项得分都相对均衡,没有特别的长处和短板,但相较以前,在紧跟国家政策要求方面已经有一定的提升,这与河南由农业大省向制造业、服务业大省转型的经济社会大环境有较强关系。黑龙江的政策中,长处与短板都比

较明显,在知识产权创造政策保障方面,政策制定有些滞后且全面性不够,在知识产权运用政策方面则相对全面的,这与该省知识产权事业基础一般,但逐步开始加强该项工作有较大关系。甘肃和广西排名后两位,两个省区都属于西部地区,工业基础较差,知识产权事业不够发达,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政策建设,来有力推进知识产权事业快速发展。

四、我国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政策保障的改进建议

(一)进一步突出分类支持、特色发展的知识产权强省支持政策

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产业基础、自然禀赋差别较大,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均衡发展。只要相关省级政府重视本地的知识产权事业且本地区有现实需求,就应该给予相适应的政策和指导^[3],保护知识产权成果,支持其知识产权事业特色化发展,形成强、特均衡发展的局面。

(二)建设覆盖东中西省份的知识产权事业协同发展机制

建议组织加强知识产权事业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业务交流,建立并做实行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交流机制,加强东中西业务交流平台建设;进一步发挥审协中心的人才优势,在地方加强知识产权社会服务^[4],带动落后地区知识产权事业实现快速发展。

(三)探索推进各级知识产权局垂直管理的行政体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断彰显,我国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体系也在不断加强。相较西方发达经济体,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还处在起步阶段,建设上下一

体的垂直性专业化行政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事业跨越式发展,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途径。要进一步在行政体制上为各级知识产权部门松绑,促进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更加专业化,国家、省、市、县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系更加紧密化。^[5]

五、结语

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抓手和支撑。上述七省区知识产权强省的相关保障政策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全国各地区间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水平,无论从体量还是从结构、制度上都存在较大差距,远远无法满足“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经贸往来的需要。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下,需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来制定相应的保障政策^[6],激发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加快我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

产权强国迈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 [1] 王宏.“一带一路”视域下河南省知识产权强省人才培养路径[J].改革与开放,2017(23):21-22.
- [2] 胡翠平,高金娣.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创新科技,2018(8):37-41.
- [3] 闵敏.上海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投资环境[J].科学发展,2019(1):18-25.
- [4] 顾燕新.苏州建设知识产权强市的政策路径探析[J].科教文汇,2019(2):187-190.
- [5] 王宸铭.浅谈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策略[J].现代经济信息,2019(5):345-346.
- [6] 周蔚然.知识产权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J].法制博览,2019(3):187-18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valuation,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on Policy Guarantee of Provin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N Bingchao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94, China; 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constructing China as a country that protec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all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have issued a series of guarantee security policies, which aim at establishing str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hese polices, five key directions——creation, application,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service——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ere determined. Seven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were selected for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sults analysis. Since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industrial bases, the effect of policy improvement is also quite different.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highlight the support polici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vinces with classified support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cove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and to explore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for promoting the vertical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reaus at all levels.

Key words: provin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protective policy

论司法大数据在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中的运用

王工厂

(郑州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长期单一的规范研究范式下,教育法学的学科交叉属性没有展现出来,在法学、教育学的双向误读中,教育法学的独立性被消弭。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法治实践中教育法学固有的、为规范研究所隐匿的独立特质,在基于数据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中逐渐显现出来。从法治实践中追寻自身的独立存在是新时代教育法学的历史使命和机遇;尽管现有数据库存在数据不够全面、相关性预测有限的限制,但大数据思维下的逻辑进路,巨量、权威、客观、迅捷的数据,更具操作性和可接受性的分析方法,还是让正在建设与完善的司法大数据为尚未真正起步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

关键词: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研究范式;司法大数据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09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50-06

一、教育法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考察30多年我国教育法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自发端就带有浓厚的实在法附庸烙印,基础理论及学科知识体系带有概念借用甚至生搬硬套式的“拼装”味道。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法制逐步完善,教育法治继续深入,在以劳凯声、湛中乐、秦惠民等为代表的学者努力下,教育法学研究渐次繁荣。进入新时代,高校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教育法学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1]学界开始反思和追问学科视阈下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有学者对1985—2015这30年的教育法学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千篇一律的是基于定性分析的规范研究;^{[2]79-90}基于逻辑演绎和价值推演的规范研究固有立场既定、结论预设的特质,难免会形成过分注重实然“文本法律”规范,忽视“活法”的思维定式。长期单一的研究范式使得作为交叉学科的教育法学,研究内容的交叉性却被虚化;由于规范研究的学术进路和概念体系的差别,法学视阈内的教育法学研

究主要体现其法学的一般属性,基本局限在教育特别行政法的范畴,但教育法不仅涉及教育的法律问题,而且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行为密切相关,教育的特殊性被忽略;^[3]教育学视阈内的教育法学则更多呈现了教育学话语特质,其对法学属性的规范推演则带有很强的套用其他部门法理论的色彩,缺乏自有灵魂。不同视阈内的教育法学理论建构各言其是,较少相互参考,教育法固有的独立性被隐匿,研究结论认同感较差。

进一步来看,研究范式多样化的缺乏甚或形成教育法学理论建构中法学、教育学的双向误读。任何理论背后其实都有它的经验基础,但抽象的理论会隐藏和消除经验的痕迹;尤其是实践性强的学科其诸多理论来源于实践,它隐藏或暗示了经验的前提。忽略甚或对这种前提的无知会误解、误用理论。一方面,用其他部门法的理论或者西方教育法理论推演教育法学,其经验前提在本土教育法治实践和学术氛围中并非显而易见,表面相同的概念和理论指称其经验性前提可能大相径庭;缺乏足够的经验

收稿日期:2019-03-20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校生诉讼司法大数据的高校治理司法审查实证研究”(2018BFX017)

作者简介:王工厂(1973—),男,河南太康人,博士,郑州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法学,教育法律实务。

内涵,曲解理论可能发生“指称错位”问题,也就是仅从概念字面意义上看,凭自己的片面理解、个体经验甚至去臆测,概念的本来含义被误读。例如,以民事契约理论解构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对教育行为和民事行为的误读,教育除传授技能,还肩负人格养成、情操塑造等不能商品化的义务,合意行为不能涵盖;品格、情操不能复原和估值,违约责任不能适用。另一方面,以其他部门法理论来分析教育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时,有可能对现有的教育经验进行割裂。理论自然具有建构性,可能会对现有经验加以重构,以自身的逻辑来建构性地铺陈经验,进而隐藏经验的逻辑,缺乏理论背后经验基础的足够认知,既有经验就可能会被碎片化地随意建构,就不能有助于全面认识法律现象。同样,在其他部门法理论视角下,其自身的一些理论内容均可以从既有教育法治经验中找到符合或不符合之处,该部门法理论也因此得以证成或证伪。“这种情况下,理论的认识功能,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无法实现,既有经验也就无法得到提升,无法发挥出认识教育法律实践现象的有效中介作用。”^[4]例如教育法问题可纯以行政法视阈内证成或证伪,但教育却绝非行政行为,教育过程尽管存在教学团队、科研团队和合作机制,可能包含行政行为,教育实践中的教师与从事教育的学者并非任何意义上的行政主体。总之,无论教育法学的其他部门法解读或者是借用、移植其他部门法概念肢解教育法,其根本问题都是单一研究范式下对本土教育法治实践的忽视,由此造成的误读或曲解,可能会消弭教育法自身。“研究方法的匮乏乃至缺失是教育法学的致命伤,没有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多样化,教育法学根本不会被学术界认为是‘学’,教育法学就没有学术地位。”^[5]

长期单一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教育法学封闭、静态的研究氛围;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静态和动态时认为,静止状态是生产与消费、分配与交换这些方面所依赖的各种一般条件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换句话说,在静态问题中某种特定类型的变化后果也被考虑,但一般的社会经济条件被假定是不变的。^{[6]89-94}如果说法学整体的研究已有早期单一的政法法学发展到了诠释法学、社会法学以及新型的实证法学并存的阶段,而教育法学整体上仍处于诠释法学的阶段,尽管有学者在十余年前就提出教育法学研究已经出现了诠释法学(中国的诠释法学功能本质上均是以文本为中心来解释法律问题)向法社会学转变的趋势,但就研究文献梳理来看,这种转变显然没有完

成。法学研究整体发展趋势和教育法治实践的变迁,并未引起大部分教育法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回应,教育法学研究落后于其他部门法的发展。^[7]劳凯声认为,“有些研究,仅从学科体系所提供的一套概念范畴、公式原理、理论观点出发,在自己设定的领地里自说自话,使问题演变成研究者头脑中的思辨之物,最终隐匿了问题”^[8]。教育法学对教育法发展、进步的影响和引导是通过立法和司法实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教育法学应从现实出发,直面现实问题,理解和解释‘实然’,通过科学的理性运动创造‘应然’,从而超越‘实然’,这就是教育法学的功能”^[9]。如果教育法学的成长没有根植于本土教育法治资源,则教育法学规范诠释研究的工作越成熟、技巧越精湛,其和中国教育法治实践的距离就越遥远,研究结论就越荒谬,与社会期待的距离落差也就越大。教育法学除了“在法规范解释学的范畴内追寻外,应当从司法实践中获取相应信息,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观察教育诉讼呈现的实然状态的特殊性”^[10]。

二、实证研究是法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 实证研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

实证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实证研究包括所有基于经验对所得的一手资料进行的研究;狭义实证研究是与规范研究相对应的研究范式,利用数理统计和计量技术,分析和确定相关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具有研究程序特定、明确,方法固定的特点。实证研究范式的出现和规范研究在科学研究中遭遇的瓶颈密切相关,具有历史必然性;在18世纪以前,科学研究在物理学、天文学、化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人们更关注重复性运动规律的研究客体,进而举一反三,以演绎推理为主要逻辑进路的规范研究优势明显;随着经济学、管理学等复杂的研究领域兴起,规范研究对不符合单一运动规律的研究客体,采用确定、决定和普通的概念来描述时,也隐匿了研究客体的本质特征,获得的成果不能让人满意,规范研究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9—20世纪以来,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的成果,特别是概率统计的发展,为复杂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技术工具,也奠定了实证研究的坚实基础。“经济学的更高阶段,对我们分析经济的增长与进步问题时,适宜的做法是少做演绎多做归纳。这正如产生推理结论的过程影响结论的性质和价值,如果结论完全是经验性的,那么它总在某种程度上有存在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如果结论来自演绎推理,那么,在结论

赖以成立的假说被证实以及推理条件被肯定之前,结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存在。”^{[11]-15}所以,“合理的方法即是抽象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演绎的,也是归纳的;既是数学的,也是统计的;既是假说的,也是历史的”^{[11]89-94}。事实上,实证研究的兴起是人们对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研究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

(二)作为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在法学研究中正在兴起

较之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可以说“是新生事物”。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2000年之前,在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上发表的以“实证”为标题的文章,数量仅为18篇;自2000年白建军教授在《中国法学》发表《论法律的实证分析》一文以来,截止2018年10月,以“实证”为标题的文章已计1610篇,尤其是2012年至今更是呈高位震荡态势,总量就达1098篇,平均每年发文量都在156篇左右。尽管各部门法实证研究成果分布并不平衡,但总体均呈大幅上升趋势。^[12]学者认为,法实证研究是中国法学研究范式转型升级、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内在要求,是一场“新的范式革命”^[13]。尽管存在些许争议,例如,个案或同质几个案例的研究是否属于法实证研究,认识就有所不同,但学界基本上都认同法实证研究应当包含经验(明确、确定的过程或程序)、数据、量化统计以及以归纳为主的逻辑进路等基本要素。^{[14]30-40}

首先,经验应当是实证研究的基本内涵。广义而言,实证研究也就是经验分析,作为“是什么”或“怎么样”的知识体系,强调“发现”而非“认为”;法实证研究关注现实中法律规范运作的实际过程,迥异于诠释法学关注实然法律规则而忽略法律运行实然状态的做派。这也决定了实证研究的“经验”分析过程是清晰可见的、可重复的,对某个事实的描述和解释才是可信的;研究结论不是价值评判,应当可验证,毕竟假设不能仅偶然地被支持,而是对研究对象总体真实状态的反映;同时研究结论也是客观的,是基于数据推导而非主观判断得出的;实证研究是经验的同时也是对研究过程的展现。

其次,实证研究应当以数据为中心。实证研究就是收集、分析数据并以此为中心展开阐述,在规范研究中,数据不是理论推演的关键,要么没要数据,要么将数据作为理论建构的论据。法律实证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数据而为的法学研究,当然不同于诠释法学以法条或教义为关注点、阐释点的研究,也显著不同于以个案关注为主的经验研究,包括社

科法学研究。

再者,实证研究是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逻辑推演。实证研究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经验研究,实证分析中的定量分析既有研究客体范围、规模、内部结构的量化描述,又有客体与外部关系的量化分析,同时也包含对研究客体发展趋势的推断描述。也就是说,实证研究应当具备样本分析结果与真实情况相当接近的精确性、相信概率真实的可信度和可以延伸应用的共性。个案研究方法在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方面经常受到批评,虽然直观感觉、案件细节仍然重要,但一定程度上的定量数据收集、分析和判断已成为国计民生决策的重要依据。^{[15]25-30}定量与定性的区别又是相对的,具体而言,定量研究在数据分析基础上进行归纳的同时,它仍然需要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原因,而这实际上需要个案的细节描述、比较分析来描述,没有定性研究,基于经验的定量研究难以提升;“演绎与归纳的相互补充,即使当我们主要依赖归纳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结论应通过演绎推理来确认和解释。”^{[15]130-133}

(三)教育法学实证研究尚未真正展开

文献梳理后,可以发现,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教育法学实证研究显然已经落后。

1. 研究现状表明,法实证研究尚未完全进入教育法学的研究视野

首先,作为研究范式,实证研究尚未进入教育法学研究者的视野。教育法学语境中,鲜有对法实证研究范式探讨的成果。截止2018年10月22日,笔者以部门法为搜索词并“实证研究”关键词对中国知网的文献进行精确搜索,得到文献分别为“民法”20篇,“刑法”为54篇,“宪法”23篇,“诉讼法”为52篇。可见,法实证研究在各部门法尽管存在较大差异,但均呈现发展上升的态势,文献数量逐年增加;前述搜索方式得到教育法文献仅1篇。可以说,教育法学研究中对实证研究范式的探讨尚未全面展开。^[16]其次,对法实证研究范式的内涵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存在将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等同起来的认识,认为“教育法案学的研究可以繁荣教育法学的研究领域,从而提高教育法指导现实教育问题的能力”;^{[2]121}指标式个案(以最高法院公报案例为代表)或是其他渠道得来的典型案例研究,主要是为了探讨案例中蕴含的法律规则,或者是作为问题提出验证某种理论预设,或是为了展示修改立法的必要等。尽管案例研究具有凸显争议增加问题意识的价值,但显然不同于以大范围数据收集、量化统计、经验发现为要素的实证研究,就其逻辑进路而言,仍

是将案例几经剪裁、切割纳入既有理论框架,案例的内部结构和实践的联系被肢解。教育法学视阈内的案例研究,无论是个案研究或是部分典型案例研究,基本上是在诠释法学范畴内的规范研究。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自称为实证研究,但在整个研究方法中并没有体现数据分析,只能是有一定实证色彩的研究。^[17]

2. 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现状原因分析

教育法实证研究尚未展开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教育法治实践数据稀少,存在开展实证研究的客观困难。教育法律刚性不足,柔性有余,立法质量有待提高,同时传统特别是权力关系理论对高校治理及司法机关的影响依旧存在,进入司法审查的高校治理纠纷受到限制,司法实践现状与教育法治发展需求深度割裂;数据采集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教育法研究者对基于主观逻辑及价值推演的规范研究偏好。二是,教育法学研究氛围相对封闭,缺乏法学、教育学的深度“科际对话”,没有实现与其他部门法在实证研究上的同向同行。我国的教育事业覆盖了十多亿人,一大批公民需要接受不止十年的教育,教育过程中产生涉及侵犯合法权益的纠纷数以万计,而现行的权益保护机制与教育法治实践现状相比较已经错位,解决问题通道的建设远远跟不上教育事业的进度。

总体而言,对教育法治实然状态关注与回应的缺乏,不能满足教育法学发展和我国教育大国的教育法治实践内在需求,教育法实证研究落后于其他部门法,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教育法学整体研究的发展,使之与社会期待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三、司法大数据的建设和完善,为教育法学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路径

(一) 大数据与司法大数据

一般认为大数据具有 Volume(海量数据)、Velocity(处理速度快)、Variety(数据多样态)、Value(价值)四个特点。我国最高法院主导的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工程,把作为法治要素官方记录重要载体的裁判文书,以官方机构平台发布电子文本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平台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各省市区裁判文书网,截止 2018 年 10 月 23 日,文书总量近 5500 万篇,访问人次近 200 亿。作为世界最大裁判文书数据库其巨量、多样态的案例数据蕴含巨大价值,长期从事事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认为,由此我国(至少在理论上)建设了全国性的司法全样本,这是一座法实证研究的免费金矿。^[18]³⁰⁻³²左卫民教授

认为,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工程是中国司法乃至整个法律大数据的最新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关注和运用大数据的法律与法学研究方式会是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法律与法学界的普遍趋势”^[19]。但也有学者认为,司法大数据的数据分析本质,仍为通过传统方法收集和分析的数据,与大数据思维与分析方法相距甚远。^[20]笔者认为,关键是研究者思维的转变,以传统思维看到的是数据案例传统的内容和形式,以创新大数据思维看到的则是裁判文书上网工程的大数据基本特质,或许其有诸多不完善,但不能据此否定其大数据的性质。就法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方式而言,首要的就是法院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每一份文书都是鲜活的微缩的法治,是法治的细胞;蕴含着立法要素、司法要素;体现了实体规则和程序性规范;是字面法律转化“活法”的生动诠释,几乎囊括了与法有关的所有信息。^[21]生效裁判文书是观察应然法实然表现的最佳途径,是法实证研究的最佳数据;基于司法大数据实证研究是对法实证研究的拓展与延伸,是互联网时代法实证研究的新形式。

(二) 司法大数据作为教育法学实证研究现实路径的可能性

1. 数据来源与结论更加权威、客观、高效、简便

基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教育司法案件数据稀少,随着司法大数据越来越完善,已经不再是教育法实证研究展开的主要问题;较之其他渠道,例如新闻报道案例、教学案例以及部分典型指标案例,司法大数据提供的官方记录更为权威客观,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高度普及使得数据获取高效便捷。尽管较之其他部门法案例数据,教育法数据要稀缺很多,但并不妨碍以全样本或大样本思维进行实证分析;全(大)样本案例数据,很少有完全符合预先设定的数据种类。研究者只有在收集和处理案例数据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小数据的抽样调查需要问题预设,难免存在少量假设基础之上的立场既定;结论缺乏延展性,即调查得出的数据不可以重新分析以实现计划之外的目的。当然司法大数据中的“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大而全,笔者的数据收集过程发现,就裁判文书上网工程发布的数据文书而言,尤其是教育行政管理诉讼文书数量还是偏少,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大数据尚有距离,最多是大样本数据,同时也需要说明,当数据大到一定程度时,结论的可靠性并不随着数据的增加而增加,存在类似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形,我们在一个案例数据上获取的有价值信息越来越少。因此,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教育法实证研究,不用随机抽样的分析进路,而采用大数据的分析进路,

也就是全样本思维。这样,基于司法大数据实证结论的可验证性和可重复性,较之以抽样调查为进路的小数据时大幅提高。

2. 大数据思维下,教育法学实证研究进路更具有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

法实证研究的要素之一就是基于数理统计的案例数据量化分析,在数据少的时代,传统的样本分析很难容忍误差数据的存在。如何防止和避免在采集样本和分析时出现错误,统计学使用了一套策略来减少出错的概率和可能的系统性偏差。然而,即使只有少量的数据,这些错误规避策略仍然存在昂贵的成本。许多法学研究者,在认识法实证研究这个新生概念的最初阶段,往往就因为接触到复杂的统计学论述(或其他非量化的复杂研究方法),失去了对于法实证研究的兴趣。这种“成也统计、败也统计”的法实证研究发展,不仅在我国,在其他法实证研究有更长历史、更多研究者投入的国家,也深受其累;关于此种对研究方法的陌生和抗拒,学者 Methodological Anxiety Syndrome 称之为“研究方法焦虑症候群”^[22]。大数据思维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精确性的优缺点,追求精确性是信息匮乏时代的产物。数据匮乏时,任何数据点的测量都是结果的关键,每个数据的精确性都需要得到保证,才可能预防偏差。大数据时代要接受纷繁数据不精确的存在并从中受益,而不是以高昂的代价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大数据的容错思维下,门槛较低的描述性统计方法,有助于更多研究者接触法实证、了解法实证,进而从事法实证研究。

3. 可以避免规范研究学术进路差异形成的“误读”

教育法学独立性的消弭,很大程度上和其教育学、法学的交叉属性被隐匿相关联。学术进路和概念体系的差异,使得教育法学的双向误读在规范研究范式下似乎是个难以破解的困局,教育学界多年呼吁的“教育法学应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并未引起法学界相应的关注与回应。作为一个教育大国,教育法学的发展应当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司法大数据的裁判文书数据作为法治记录的官方发布,其受众范围由当事人扩及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既有定分止争又有价值引领,基于此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回避规范研究的“误读”。关注和回应实然教育法治实践的本土资源,发现实践中的教育法是新时代赋予教育法学的使命,更是教育法发展的历史机遇;而司法大数据为追寻实践中的教育法提供了绝佳的技术路径,使其以客观、独立的实然状态呈现自身的存在。

四、司法大数据的局限

司法大数据是一种资源,也是法实证研究的一种工具。它告知信息,但不解释信息;指理解教育法治实践的同时,也可能会引起误解,这取决于其是否被正确认识和使用。

(一) 由于技术因素和主观因素,司法大数据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方面,文书数据的公开量、及时性仍有待提升,同时文书公开监督应进一步深化,保证上传文书数据的质量,同时法院内部系统之间有待进一步协调,确保统一的发布平台运行顺畅和良好的技术关联,文书公开的地区差异有待进一步消除。^[23] 另一方面,归类问题也增加了数据收集难度,例如教育行政诉讼的案由没有列入数据库,笔者对相关数据文书的收集基本是靠多次变换关键词反复搜索来完成,难免存在人为遗漏的情形。司法大数据的“大样本”数据到“全样本”数据尚有距离。

(二) 司法大数据的全样本或者大样本缺乏对个案异质性的关注,对部分样本不够大的微观问题分析可能会出现偏差

正如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所有的数据案例都是有差异的,每个数据内部都隐藏着某些未被发掘的价值,其真正的价值就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山,乍一看只能看到冰山的一角,但大部分都隐藏在表面之下。大数据的全样本和容错思维决定了其难以关注个案异质,难以对异质案例进行科学化归纳,结论的普适性甚或有失偏颇;实证研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归纳理论上的全样本数据而产生的一般性结论,带有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性,数理统计回归分析专门手段的缺乏,难以对多个案例数据进行定量尺度的本质考察,形成的结论抑或是狭隘的和特殊的,可能无法提升至一个普遍适用的水准,形成结论信度上的不足。同时,数据案例的异质性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观察同样异质的数据案例集合,实证研究在对司法大数据的案例数据定量分析的同时,会因迁就巨量、繁杂的数据而过于烦琐,更为细节的描述、机制的增加和过程的讨论,这实际上又需要个案研究、比较分析加以支持。这会使深度依赖数据案例的实证发现结论,尽管在细节方面很丰富,但在结论的把握上往往缺乏简洁的整体视角。

(三) 基于大数据相关关系的预测具有一定的或然性。

司法大数据相关关系的预测,是教育法学实证

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数据案例是对法律实然状态的记录、分析和重组,司法大数据提供的是一种发现,不能准确地表现诉讼为何会发生,它只是将正在发生的这件诉讼呈现出来。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提醒的帮助已经足够大了,但作为应然法律投影的文书数据并不完善,据此做出的预测本身仍具有相当程度的或然性。因果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相关关系,应结合局部小样本精确量化或深度描述确定相关关系向因果关系转化。

五、余论

尽管教育法学的规范研究提出了诸多具有洞察力、生命力的问题,但较之于法学研究整体,长期单一的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制约了教育法学的发展,拉大了与社会期待间的距离。数据化时代,被隐匿的体现教育法固有特质的法律现象会在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中逐渐显现,同时,基于司法大数据的教育法学实证研究,也使得教育法学和其他部门法学同处在发展的“弯道”。随着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多样化、规范化,教育法学必将拥有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龙洋,孙霄兵.对我国教育法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思考[J].教育学报,2011(6).
- [2] 祁占勇,陈鹏.中国教育法学研究热点的共词可视化分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3).
- [3] 朱芒.高校校规的法律属性研究[J].中国法学,2018(4).
- [4] 陈柏峰.法律实证研究中的“经验”[J].法学,2013(4).
- [5] 褚宏启.教育法学的转折与重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 [6]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

- [M].党国英,刘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 [7] 谭晓玉.当前中国教育法学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教育研究,2004(3).
- [8] 劳凯声.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J].教育研究,2014(8).
- [9] 秦惠民.中国教育法学的产生发展背景与研究状态[J].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8(6).
- [10] 湛中乐,苏宁.教育法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初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 [11]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Z]. Thomson West. 10th ed. 2014.
- [12] <http://kns.cnki.net/kns/Visualization/VisualCenter.aspx>. 2018-10-19.
- [13] 李林.共建中国的实证法学[C]//田禾,吕艳滨.实证法学研究(第一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14] 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J].中国法学,2000(4).
- [15] 唐应茂.法律实证研究的受众问题[J].法学,2013(4).
- [16] 李扬.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立法实证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 [17] 王工厂.教师劳动权诉讼救济实证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 [18] 白建军.大数据助力法律监督[J].探索与争鸣,2015(2).
- [19] 左卫民.一场新的范式革命:解读中国法律实证研究[J].清华法学,2017(3).
- [20] 何挺.刑事司法实证研究:以数据及其运用为中心的探讨[J].中国法学,2016(4).
- [21] 白建军.案例是法治的细胞[J].法治论丛,2002(5).
- [22] 苏凯平.再访法实证研究概念与价值:以简单量化方法研究台湾地区减刑政策为例[J].台大法学论丛,2016(3).
- [23] 马超,于晓虹,何海波.大数据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报告[J].中国法律评论,2016(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Big Data in Empir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WANG Gongch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Zhengzhou Normal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Under a long-term, single, normative research mode, the interdisciplinary attribute of pedagogy has not been displayed,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pedagogy has been eliminated in the bidirectional misreading of law and pedagogy. With the arrival of Data Age, the inherent, independent nature hidden for normative research gradually emerged in empir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It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in the new era to pursue its own independent existence from the practice of rule of law. Although the database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nd the correlation prediction is limited, big data's logical path, enormous, authoritative, objective, prompt data, and more operable and acceptable analytical method still make judicial big data, which is being constructed and perfected, provide a perfect practical path for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which has not really started yet.

Key words: educational jurisprudence; empirical study; research mode; judicial big data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 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语境、现状与路径探析

李纲¹, 林璐²

(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2.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全新语境。在分析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新语境的基础上,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渠道、话语对象、话语反馈五个方面考察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为建立中国本位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传播环境;话语传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56-05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指出,话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言语,而是超越了语言、言语,是“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1]。话语和语言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言说工具,而且意味着对话语者的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2]话语生成的基础是对具体的概念形态的识别。作为一个个具体的知识单元,概念之间的逻辑勾连铺设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网络,话语正是在此基础上沉淀和形成,最终成为一个群体性的社会意识。^[3]

伴随着话语权较量在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建立本位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消除舆论偏见、提升国际形象的紧迫话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面临着新语境,也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全新样态。

一、“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新语境

(一) 政治语境

国际话语不平衡状态长期以来未得到改善,

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4]“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政治语境。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国际格局变动呈现“阵营化”趋势,全球治理规则改革趋于活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地位凸显。^[5]从前由欧美大国主导的单边国际关系,已经发展成为多极国际关系。中俄印三国合作、“金砖四国”以及“展望五国”等新兴大国的合作逐渐增强,中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力量,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二) 经济语境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并成为第一大制造中心,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25%的全球经济增长都来自中国^[6],国际经济格局和贸易格局由此出现深刻调整。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收稿日期:2019-04-21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软科学项目“客户协同创新(CCI)的形成机制及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172400410353);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课题“‘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模式构建、战略设计与实践路径研究”(18ZXZD03)

作者简介:李纲(1977—),男,河南南阳人,管理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创业管理。

(三) 社会语境

“一带一路”在社会历史上有着深厚基础,古代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特定的物质交往使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不断交叉融合,而文明的交叉融合又反过来促进了物质交往。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一带一路”更是从中国倡议逐步转变为全球共识。全球共识的社会语境,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 技术语境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技术语境。从数据传输技术层面看,5G 等数据传输技术使中国话语可以更快更及时地走向世界。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紧紧抓住 5G 时代历史性机遇,加速融合发展,构建“5G + 4K + AI”全新战略格局,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的主流媒体一道,传播共建“一带一路”好声音,推动不同文化的交流交融。^[7]从内容生产技术层面看,VR、AR 等沉浸式传播技术和 H5 等互动传播技术的发展,更利于受众了解中国话语、认同中国话语、实践中国话语。

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体系,其理念不是近代殖民体系与战后霸权体系,而是集中体现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开创 21 世纪国际与地区合作新模式。本部分从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对象、反馈五个方面入手,力求全面廓清“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现状。

(一) 中国话语国际传播主体

中国话语的国际主要传播主体是中国自身。当前,中国正同时演绎着三种角色。首先,中国之中国。中国拥有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中国愿意借鉴他国经验发展自身,但同时也不会放弃自身的独特性,中国发展坚持独特的轨迹和逻辑,并深刻影响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其次,亚洲之中国。作为人类主要文明的发源地、世界经济最充满活力的地区,中国与其他亚洲文明长期交流互鉴,不断开创亚洲发展新局面。最后,世界之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合作、共赢、繁荣,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广泛传播,中国话语的

传播主体还包括了更多的国际机构和国际人士。国际机构方面,联合国新闻部(现全球传播部)于 2010 年宣布启动联合国语言日,将中文日定在农历二十四节气之“谷雨”。每年的中文日,联合国都会在总部和各国国家办事处举行各种庆祝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表演和体验活动传播中国话语。国际人士方面,在我国“丝路书香”工程框架下,“外国人写中国计划”已成功实施了两期。该计划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及全球其他重点区域,广泛联系和积极培养海外知名汉学家、作家、媒体人、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鼓励并支持他们创新中国话语传播体系,向海外受众客观介绍中国。

尽管如此,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在传播主体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对中国现实发展情况没有深入了解的外国人在进行话语传播时,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这直接说明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尚有不足,未能将真正的“中国好声音”传向世界。

(二) 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内容

中国在进行自身话语国际传播时,提出了一系列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话语概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响强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被纳入联合国决议,中国话语成为国际共识。^[8]除了话语概念外,我国还积极传播中国话语理念。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首次向世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倡议,呼吁国际社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9]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已经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为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我国还积极对治国理政新理念等中国话语进行外译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话语理念,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1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11]。系统完备的话语体系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需要,也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需要。但目前,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话语体系——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内容较零散,表达也较单一,不利于中国话语走向国际受众。

(三) 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渠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逐步发展,中国

话语的国际传播主要通过图书、期刊、报纸、电视、电影、广播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介渠道。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是专门承担国际传播任务的国家级广电媒体,目前拥有61种传播语言、46家海外分台、30多个海外站点、2000多人的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队伍。除此之外,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还常依托线下活动渠道。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就是中国话语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在国家相关项目支持下,中国出版机构近两年开始参加开罗、突尼斯、安曼、乌兰巴托、加尔各答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国际性书展,对翻译成当地语言或国际主流语言的中国图书进行展示推广,如邀请中国作者参加推广活动并接受媒体采访、分发小礼品等,激发这些对中国话语不甚了解的当地读者的兴趣,在取得突出社会效益的同时为承载着中国话语的出版物在这些国家的持续推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可否认,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渠道存在话语平台单一的问题,目前主要依赖大众媒介,尤其是官方大众媒介,而国内的官方媒介在国外的受众较少,传播效果亟待提升。虽然有线下活动等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渠道的拓展,传播平台也多局限于官方媒体。话语平台单一带来话语表达的单一,未能从多角度对中国话语进行立体传播。

(四) 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对象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联系和丰富的共同语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之所以持续时间长、富有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沿线国家和地区思想文化纽带的连接、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多元文明的传承。“一带一路”倡议使人文交流互动更加密切,为中国话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高效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拓展了更广的受众群体。

目前,65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从空间分布上看,关注度较高的国家集中于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而西亚、北非、中亚及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仍然较低。由此可见,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受众尚有一定的拓展空间。

(五) 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反馈

话语传播的反馈是指话语所表达的立场、主张和观点等获得的某种结果。^[12]

一方面,中国话语国际传播逐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反馈。如2015年10月27日,新华社在其官方twitter上发布《十三五之歌》,被称为中国官

方的Rap“神曲”,该动画上线后,海外访问量十分可观。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十三五之歌》欢快而生动地歌颂了‘十三五’规划,甚至包含一些幽默的内容。这种方式似乎更能深入年轻和时尚群体。”^[13]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受众自身的理解能力,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经常被抵抗式解读。例如从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重要战略思想开始,国外就一直将其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为“隐藏我们的才能,以待东山再起的时机”。从美国2000年到2009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韬光养晦”均被翻译成上述表达,严重影响了其他国家对中国重要战略思想和中国话语的理解。一些国外媒体将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称为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猜想与恐慌。^[14]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等客观因素,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能力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路径探析

如前文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全新的传播语境,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话语传播系统性和力度不足、话语传播平台和传播对象单一以及话语反馈中的抵抗式解读等问题。对此,我们应在话语传播的各环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中国话语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

(一) 立足新语境,寻求共识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在发展规模、经济水平、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文化语言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大家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推动本国发展的愿望同样迫切。同时,源自“古丝绸之路”的共同历史经验,相似文化经历和情感体验,为话语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共识基础。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共识,从不同国家的价值体系中寻找与中国声音、中国故事和中国智慧相契合的价值理念,使历史渊源和文化共识成为话语传播的内在动力。

首先,要传播我国的基本国情,表明我国希望与周边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其次,要向其他国家准确传递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目的和意义,强调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既不是“文化渗透”,也不是“文化殖民”,更不是“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建立在平等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上,进行的跨区域、跨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与各国

的合作交往过程中,将中国的好声音传播出去,将中国的好故事讲给各国听,也将中国在长期发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智慧传播出去。最后,要向受众国家阐释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和交流是顺应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需求,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 统筹国内外,加强主体力量

当前,我国话语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外部挑战和内部制约。从外部来看,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西方主流媒体获得,而我国媒体在传播信服力上与西方也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从内部看,受媒介发展水平和专业翻译团队建设等因素的限制,中国话语的向外推介力也仍需提高。

因此,在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传播主体力量的构建和丰富。首先,要提高我国媒体的专业采编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外语沟通能力,形成一支适应国际传播发展趋势、掌握世界一流传媒技术的媒体队伍,确保在国际公共事务发生的第一线,中国声音能够得到及时准确的传播。其次,要充分发挥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国际机构、国际人士以及海外华人华侨对于传播中国话语的重要作用。注重一线话语人才的培养和输出,定期对文化中心的人员进行培训和管理,及时了解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情况,针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不同问题,适时调整传播方案;积极组织选派优秀人才参与国际机构的交流活动,在不同场合积极宣传和传播中国话语;动员和正确引导海外人士主动自觉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分享中国智慧。

(三) 凝炼好内容,丰富话语内涵

长久以来,在西方舆论的笼罩和包围下,“中国威胁论”长期存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和进步并没有得到充分客观的评价。话语内容是话语传播的核心。顺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应当注重传播内容的丰富和深化。

一方面,要凝练话语表达,利用好“关键词”。2014年起,中国外文出版事业发行局、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等机构,开始将“中国关键词”“中国核心词”等关键词翻译成多国语言,面向全球发布。这些术语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凝炼精准的载体,上承源远流厚的中华文化,下应中国“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让世界快速、准确、具体地了解并接受中国,是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很好的话语载体和内容。

另一方面,要注重培养中国话语的品牌产品,在

国际传播中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符号。前有“熊猫”“功夫”“灯笼”“旗袍”等中国元素在国际的流行,后有《“十三五”之歌》在 Twitter 上的广泛传播、《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在欧洲的备受好评。打造话语品牌节目和代表产品,能够提升中国话语的感染力,对加强中国话语传播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 打造多平台,拓宽影响范围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媒介。依托网络平台,信息的传播成本越来越低,时效性越来越强。但通过表 1 可见,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我国媒体的影响力还远远不及西方主流媒体,在议题设置频率、传播方式选择、内容感召力等方面都还有很多不足。

表 1 国际主流社交平台关注用户数量 (单位:万)

	路透社	法新社	CNN	BBC	人民日报	新华社	CCTV
Twitter	2043	159	4189	2504	597	1224	72
Facebook	413	62	3127	4903	49	6056	4815
Instagram	224	- ^①	748	115	81	49	56

因此,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就必须要加强中国话语对外传播的平台建设。传统媒体应当注重掌握和应用新兴媒介技术,增强中国话语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同时,加快新媒体平台建设,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日常化、形象化、具体化和生活化的传播特点,扩大中国话语的传播范围。另外,现有的互访活动、国际会议、民意机构、政党交往、商贸合作等平台资源,也应该进行系统的整合和重组,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和实施,尽快形成一个多语种、全方位、多层次、传播效率高、影响范围广的话语平台。

(五) 提高针对性,增强传播效果

目前,中国话语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反馈机制。首先,要提高对目标国家的认知水平。准确认识我国在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心中的认知基础,明晰共同的利益诉求,为话语传播寻找出发点。准确分析目标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程度和习俗、宗教、文化等因素,为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提供现实依据,使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够有的放矢、因地制宜,更有针对性。

其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反馈管理和应对,及时对传播方案和内容进行解释、调整和再架构,消解来自西方话语的负面影响。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误读,加剧了部分国家对中国的防备和恐惧,削弱了中国话语传播的信任基础。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应当建立完善的应对预案,通过多媒体平台及时高效地进行澄清和回应,形成一套成熟完备

的增信释疑机制,对中国话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状况进行及时纠偏和正确引导,确保传播的实效性。

四、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更多元、话语内容更丰富、渠道平台更宽阔、目标受众更广泛、接收到的反馈也更即时和复杂。这些新变化对中国话语进行国际传播的规划、实施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媒体,都应充分认识到加强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立足中国话语的传播现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寻求共识意义,加强主体力量,丰富话语内涵,拓宽影响范围,增强传播效果,不断提高我国话语国际传播的传播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注释:

①由于未找到法新社(Agence France - Presse),独立准确的Instagram认证账号,仅有@afpsport @afpphoto 和@afpentertainment三个相关认证账号,因此这里未列出其关注用户数量。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36.
- [2] 张新平,庄宏韬. 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战及提升策略[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10.
- [3] 刘涛. 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修辞

学观念与路径[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2):6-19,126.

- [4] 程曼丽.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建设思考[J]. 国际传播,2018(2):1-7.
- [5] 郭业洲. 当代世界研究报告 2016—2017[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7.
- [6] 王冷一. 来自 OECD 的报告: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N]. 第一财经日报,2019-04-22(A12).
- [7] 人民网. “一带一路”5G+4K 传播创新国际论坛在京举行[EB/OL]. <http://media.people.com.cn/GB/n1/2019/0423/c14677-31044363.html>.
- [8] 新华网. 中方提“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被纳入联合国决议:外交部中国声音成国际社会共识[EB/OL]. http://m.xinhuanet.com/video/2017-09/14/c_129703933.html.
- [9] 周宗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实践与时代价值[N]. 学习时报,2019-03-29(2).
- [10] 梁林歆著. 中国“走出去”背景下外译的传播学路径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30-44.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2.
- [12] 梁凯音. 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3):110-113.
- [13] 新华网. 面向世界传播中国话语[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30/c_129262343.html.
- [14] 何明星,李红杰.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打造对外传播新格局[J]. 出版广角,2015(11):10-1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Context, Current Situation, and Path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LI Gang¹, LIN Lu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new context for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discours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from five aspects: discourse subject, discourse content, discourse channel, discourse object, and discourse feedback.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som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will b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nese-based discourse system and for the telling of Chinese stories.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 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与借鉴

——以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为例

刘 杨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以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为例,总结其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指出其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的具有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导向明确、打造学术社群、推出增值服务等特点。指出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存在建设基础薄弱、内部动力缺失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借鉴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的相关经验,提出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发展对策,具体包括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打造自主服务平台;提升作者服务意识,建设优质服务体系;打造工具性服务,努力增强作者黏性;放眼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学术期刊出版产业。

关键词: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1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61-04

在学术出版领域,学术期刊以其特有的精、新、快的优势成为反映一个国家科学研究质量和学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办好学术期刊的重要基础便是作者资源。因此,怎样更好地服务作者,充分调动其学术积极性并不断增加其与期刊的黏性,是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虽然我国学术期刊界已经在作者服务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但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本文以 Springer Nature(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和 Elsevier(爱思唯尔)出版集团为例,分析总结其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并在对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存在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借鉴国际优秀经验,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一、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

Springer Nature 出版集团旗下拥有包含《自然》、自然子刊和《科学美国人》等国际顶级学术期

刊在内的 3000 多种期刊^[1],涵盖科学、技术与医学(STM)和人文与社会科学(SSH)多个领域,60%以上的期刊被 SCI 和 SSCI 收录^[2]。Elsevier 出版集团拥有包括《柳叶刀》和《细胞》等在内的 2500 余种期刊,涵盖多个学科领域,发表的科研文章数占全球总发表量的 16%^[3]。不论从拥有期刊总量上来看,还是从期刊整体质量来考察,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有成熟完备的作者服务体系,为培育优秀作者、吸引优秀论文,进而实现知名度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服务内容丰富,满足作者需求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所提供的作者服务项目种类丰富,涵盖了从论文准备阶段到论文发表后的所有环节,并在每个环节提供指导性服务的同时,提供选择性服务,协助作者完成学术成果的发表。Elsevier 的 Mendeley 平台服务贯穿论文

收稿日期:2019-05-11

基金项目:2016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媒介融合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国际传播策略研究”(2016CZH012)

作者简介:刘杨(1982—),女,河南开封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学术出版。

发表全流程,能使作者在一个高度整合化的平台上完成论文出版与管理的相关工作,对作者特别是国际作者的亲和力较强。在论文写作准备阶段,Mendeley 能帮助作者进行文献查阅和管理,并能通过其学术社交平台帮助作者寻找潜在的合作者与合作机构;在论文写作阶段,Mendeley 能提供文献引用、批注等服务;在论文出版后,Mendeley 能提供作者已发表论文管理与展示服务和论文影响力测评服务,全面满足作者论文发表与影响力提升的需求。

(二) 服务导向明确,增强作者黏性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有优秀的服务意识和明确的服务导向,一切作者服务都以作者的根本诉求——论文发表与影响力提升为目标。如两大出版集团所提供的作者服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地针对作者拟投的期刊进行“要么发表,要么出局”(publish or perish)的针对性判断,而是多渠道为作者稿件寻找合适发表的期刊或合作单位。两大出版集团都为作者投稿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 Springer Nature 的 Journal Suggester 服务和 Elsevier 的 Journal Finder 服务,针对作者论文没有目标期刊的情况,只要求作者上传稿件题目和电子文本并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系统就会自动搜索旗下期刊,并列岀适合此论文发表的期刊名单,帮助作者找到最适合的期刊;二是 Springer Nature 的 Transfer 服务和 Elsevier 的 Article Transfer 服务,针对作者已被目标期刊拒稿的情况,进一步分析作者投稿失败的原因,给出修改指导建议,并帮助作者寻找合适的期刊。明确的服务导向能促使作者服务内容的全面开发,进而增强作者对出版商服务平台的黏性,实现作者与出版商的共同发展。

(三) 打造学术社群,挖掘潜在作者

对学术社群的打造与培养是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作者服务的一大特色。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期刊,学术期刊的读者群体和作者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学术社群就是在作者与读者的角色不断转换中形成的。Springer Nature 通过 The Source 与 Springer Nature Storytellers 让读者了解学术研究与学术论文出版的细节和背后的故事,在扩大作者知名度的同时,激发读者的研究兴趣。另外,Springer Nature 还鼓励作者通过 SharedIt 和 Fig-Share 进行论文内容和数据分享,扩大论文的传播范围,为读者提供更多论文信息,进而提升论文的引用频次并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在学术信息的不断增加和广泛交流中,学术社群得以建立和巩固,潜在作者的学术能力得以激发和培养,其所生产的知识

能够进一步为学术社群注入活力,由此形成作者个人和学术社群的良性循环与共同发展。

(四) 推出增值服务,推进产业发展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的作者服务项目中大部分属于免费的工具性服务,也包含一些增值服务。Springer Nature 的 Editing Service 就提供英语语言编辑和科技论文编辑的增值服务。另外,Springer Nature 还联合 American Journal Experts (AJE)公司,对作者尤其是国际作者提供学术翻译、稿件格式调整、图表调整、视频摘要等增值服务。Elsevier 的 Editing Services 也包含语言服务、图表服务、数据可视化服务等,除此之外,还提供 Print Services,即针对作者的按需印刷增值服务。聚焦于发表及发表后阶段的多种增值服务有利于协助作者,特别是国际作者突破语言表述、图表制作等学术思想表达的外在障碍,使其最新的学术思想与研究发现得以快速进入学术界。出版商也能从相关增值服务中获得一定利润,进而更加重视作者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学术期刊出版产业进一步发展。

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将作者视为学术成果的源泉、学术出版的根基,为作者提供了丰富细致的多项服务,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发展历史悠久,市场竞争激烈,激发其服务意识的觉醒。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与强强合并的背景,其在学术出版产业发展的起跑线上先人一步的优势和国际学术出版界愈发激烈的竞争环境,激发了其极具前瞻性的发展意识,而完备的服务体系正是这种前瞻意识的充分体现。第二,国际市场庞大,作者需求旺盛,催生其服务体系的成熟。以欧美几大学术出版巨头为首的学术出版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意识到海外市场的广阔,并纷纷开始向各国学术界推广自身的学术产品与学术服务。随着其学术出版中心地位的确立,如何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如何鼓励并帮助国际作者加入自身内容生产者队伍,成为欧美学术出版巨头亟待考虑的问题。建立并完善针对全球作者的服务体系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除了在线作者服务体系,Springer Nature 和 Elsevier 出版集团还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网站和办事处,更好地服务作者与自身产业发展。

二、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存在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作者服务呈现出服务意识淡薄、服务内容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与欧美学术出版机构差距较大。作者服务主

要集中于论文投稿阶段,其他阶段一般不提供服务。即使一些期刊建立了数字化投稿/审稿系统,其功能主要为论文审稿程序的通知,一般不具备其他功能。为什么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与欧美国家差距如此之大?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集约化发展程度低,作者服务体系基础薄弱

学术期刊出版的集约化发展道路是市场经济及与之伴随的激烈行业竞争的必然结果,国际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必然趋势,因为只有求得规模,才能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才能更好地打造自身作者服务体系,进而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而长期以来,“全、小、散、弱”正是中国学术期刊的顽疾,严重阻碍了其集约化发展。期刊分散于众多出版机构,单个机构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产出势必不成正比,所以,集约化发展程度低是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学术论文出版长期“卖方市场”,作者服务体系内部动力缺失

长期以来,不论是科研工作者的职称评定,还是高层次研究人才的考核要求,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特别是发表高水平期刊论文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仅就高校教师群体来说,截至2018年底,我国高校专任教师数量有167.28万人^[4]。另外,众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对硕博研究生的毕业要求中,也明确规定了论文,特别是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中国目前学术期刊共有6449种^[5-6],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库收录期刊887种,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期刊568种。学术期刊,特别是核心期刊的发文容量远不能满足作者群体的发文需求,学术论文出版长期存在“卖方市场”。学术期刊的出版流程以编辑、出版为核心,给作者附加了很多投稿条件,如版式要求苛刻、网络投稿流程不友好、缴纳各种费用的手续烦琐等等,导致作者的投稿体验差^{[7]533},作者需求与其学术内容生产主体性长期被忽视。如此一来,内部驱动力量的不足也导致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服务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

三、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作者服务体系发展对策

(一) 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打造自主服务平台

作者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备一定建立在集约化发展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对内实现期刊的作者服务资

源优势互补与共享,对外提高期刊的市场驾驭能力与竞争力。目前,中国知网等学术内容集成商纷纷推出基于其平台的作者服务内容,如期刊查找、数字投稿/审稿系统、国外数据库内容链接等,虽然为期刊提供了作者服务平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无疑使集约化程度较低的中国学术期刊更加依附于知网等学术内容集成商,进一步削弱其集约化发展动力。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要在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尽快打造自主服务平台,在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上,全流程、多层次开发作者服务内容,促进期刊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科技期刊探索出了期刊集群发展的道路。如中华医学会将旗下185种期刊进行整合,创建了中华医学期刊网,提供会议培训、会议直播、医学视频、投稿指南、出版伦理、写作规范等多种服务,建立起高质量的自主服务平台。

(二) 提升作者服务意识,建设优质服务体系

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应充分认识到作者资源是办好刊物的基础,树立并强化以作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以作者需求为核心,创新调整传统的编辑出版流程,从准备——写作——投稿——出版——出版后的全过程,探索优质、高效、完备的服务内容,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培育忠诚、优秀的作者群,为我国学术期刊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作者基础^{[7]533}。

具体来说,可借鉴Springer Nature和Elsevier出版集团的相关经验,在作者写作准备阶段,利用学术博客与播客等社交媒体,传播学术研究前沿话题,引发潜在作者兴趣;在论文写作阶段,为作者提供如文献管理、文稿校对与编辑等服务;在投稿与出版阶段,提供期刊查找、文刊匹配、开放获取、审稿流程通知等服务;在论文发表后,提供内容与数据分享、影响力测评与提升、按需印刷等服务。一方面增强作者对本土学术出版机构的信任,另一方面利用增值服务促进学术期刊出版产业进一步发展,不仅有助于持续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美誉度与影响力,更有利于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 打造工具性服务,努力增强作者黏性

综观Springer Nature和Elsevier出版集团的作者服务内容,不难发现工具性服务占了半壁江山,即出版机构利用自身开发的各种工具为作者提供服务,如Springer Nature的eProofing、MySpringer/MyPalgrave、Journal Suggester、Transfer Service等,Elsevier的Mendeley、Researcher Academy、Journal Finder等。这些工具性服务或针对作者论文出版的某一环节的具体需求,或贯穿论文出版整个流程,且操作较为简单,易于读者掌握,有较强的实用性,能极大提高作

者对期刊及出版机构的黏性,成为出版机构学术内容的忠实生产者、消费者和推广者。相较而言,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工具性服务较为匮乏,应积极借鉴优秀经验,在集约化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打造工具性服务,改进作者体验,增强作者黏性,吸引优秀论文,提升期刊影响。

(四)放眼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学术期刊出版产业

学术期刊出版国际市场潜力巨大, Springer Nature、Elsevier 等学术出版巨头早已凭借其优质出版平台和成熟的作者服务体系得到了众多国际作者的认可,广大中国学者及科研机构对 SCI、SSCI、A&HCI 等评价体系的关注与推崇就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我国大量优质学术成果外流,发表于国际期刊并进入国际数据库,而众多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了获取最新学术成果,不得不支付高额的费用进行购买,这对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极为不利。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应加强作者服务体系建设,一方面增强国内作者对本土期刊的信任和信心,另一方面吸引国际作者对中国期刊的关注,在保护我国科学文化安全的基础上,做大做强学术期刊出版业。

四、结束语

相较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作者服务体系建设,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不论在服务意识还是在服务内容上都与之相差甚远,这与我国悠久的学术历史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不符。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的今天,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应在集约化发展的道路上努力打造自主服务平台,不断增强学术期刊出版从业者的服务意识与服务

务能力,开发数字化服务工具,放眼国际市场,构建优质作者服务体系,提升我国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实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学术期刊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Springer Nature 中文主页 [EB/OL]. (2019 - 04 - 10) [2019 - 05 - 10]. <https://www.springernature.com/cn/products/journals>.
- [2] 施普林格·自然在中国 [EB/OL]. (2019 - 04 - 10) [2019 - 05 - 10] <http://www.zhongkeqikan.com/h-nd-145.html>.
- [3] Elsevier 公司简介 [EB/OL]. (2019 - 04 - 10) [2019 - 05 - 10] <https://www.elsevier.com/zh-cn/about/Elsevierintro>.
- [4]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年度发布 [EB/OL]. (2019 - 04 - 10) [2019 - 05 - 10]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19/50340/sfcl/201902/t20190226_371173.html.
- [5]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一批认定学术期刊名单公示 [EB/OL]. (2014 - 11 - 18) [2019 - 05 - 10] <http://www.gapp.gov.cn/news/1663/231784.shtml>.
- [6]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第二批认定学术期刊认定情况的公示 [EB/OL]. (2017 - 02 - 06) [2019 - 05 - 10] <http://www.gapp.gov.cn/sappprf/contents/6587/314124.shtml>.
- [7] 齐国翠,李哲,石应江. 快速审稿赢得作者:《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作者服务体系建设的[J]. 编辑学报,2018(5): 532 - 53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Implication of Author Servic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Top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rs to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Development

——Taking Springer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and Elsevier Publishing Group as examples

LIU Y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aking Springer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and Elsevier Publishing Group as exampl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r author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Then, based on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author service syste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o develop the author service system of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Key words: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ing group; author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新媒体视域下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

吕 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学生处,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仅关系着国家和整个民族的命脉,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大学校园文化影响学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而文化的传播与媒介的承载密不可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文化的传承不再仅仅依靠传统媒介,新旧媒体的融合是当前文化传播的主流趋势。当前,有着极强探索欲、追求新潮的学生群体成为新媒体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高校校园文化的社交媒体传播进行研究。

关键词:微信;微信公众平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1.01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1-0065-04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的每一次发展、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进,无不伴随着文化的革新和突破。^[1]校园文化是一种隐性的文化传播模式,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可以从思想上启发及指导学生对学校积淀的历史传统、物质文化、精神信仰的传承。大学是聚集社会精英的摇篮,^[2]一定意识上,可以说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延续发展的灵魂。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校园文化涉及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制度文化可以体现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一种体现,高校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可以激发大学生对校园的喜爱之情。^[3]因此,高校要加强精神文化的建设,以强化学生对高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一、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一)丰富校园文化内涵

当今是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大学生乐于接受新鲜事物,更倾向使用网络来接受、获取知识和信息,例如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学生可以对喜欢的文章或内容进行转载,收藏自己感兴趣的公众号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涵。然而目前有些高校主要还是利用校园广播或海报等方式进行文化传

播,这些方式单调乏味缺乏吸引力,而且内容单一,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拓展招生宣传

微信有着传播速度快、及时性、高效性等特点,高校通过微信可以进行招生宣传。高校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布招生信息,许多人通过网络可以看到高校发布的招生信息,并通过微信了解招生院校的具体情况和招生条件。通过微信平台,高校达到招生宣传的目的,让更多的人了解高校的情况。

(三)搭建教育平台

高校通过搭建微信这一教育平台,感化学生的思想,促进学生的成长。高校可以通过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发布有关学生教育的内容,如名人名言、新闻、趣事等,让学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也有一定的了解。同时高校还可以根据大学生的需求,对微信公众号进行开发,增强微信公众号的实用性,让大学生对有关微信公众号产生依赖,促使其长期进行关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微信平台的发展,对学生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

二、微信在校园文化中的传播特点

(一)信息传送的准确化、快速化

以往的传统媒介信息传送滞后,存在送达区域

收稿日期:2019-03-15

作者简介:吕雯(1987—),女,河南郑州人,心理学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学生处教师,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受限等问题,微信公众平台则利用群发方式,微信信息一经发送,用户就会收到信息提醒,并用红色数字圆圈进行标识,信息未经及时阅读,红色的标识便不会消失,在某种意义上,很多平台的关注者便会强制阅读相关内容,因此微信的送达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媒介。高校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信息的传递速度和辐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下,与传统媒体相比较,新媒体的出现无疑能贴合现实需求,特别是贴合广大学生的需求。

(二)传播技术的交互化、融合化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为了满足大众的不同需求,适应当前形势下社会的发展,微信运营商审时度势,在配套技术上下功夫,大力拓展平台服务信息,更新软件,做到及时快速有效的多元融合。微信平台发布的信息大多采用声、图、影结合的方式,以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公众平台发布的信息,其内容容量不受限制,发布的形式除了文字配合图片,有时候会配合视频,在文字的底端配有一个超链接,点击可以进入其他友情链接,方便省时。

三、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成效

(一)物质文化内涵的多样性丰富化

从直观层面上来理解,校园物质文化是一个学校随着时间迁移及历史变迁,在沉淀和积累中传承下来的人文环境、文学氛围、公共设施等。学生在校园物质文化的熏陶下无形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依从感和归属感,传统媒体传播形式单一,无声的文字和简单的图画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时下的应用趋势了。新兴媒体微信极大程度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在传送信息的同时,以声音、文字、动态图等复合叠加的形式配合制作而成,比如在介绍校园物质文化时,加入校园 flash 动画或者剪辑一段关于校园的视频进行宣传讲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传播的形式和内容,打破了传统媒体内容单一和文字简单的局限。因此,微信成为时下比较热门的应用软件。

(二)制度文化的生动性有趣化

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相对单一、刻板、无趣且生硬,仅仅依靠图片和文字来传达冗长繁杂的规章制度,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微信省时省力且成本低廉,在微信平台上借助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动态图画,配合幽默风趣的文字,可以将复杂冗长的规章制度表达得更加清楚生动且易于接受。例如每年新生的入学须知、学生管理条例、学校的规章制度等,如果只是发一些单纯文字的小手册,学生不一定认真通读,但是借助微信及其公众平台,可以制作成小视频或者卡通照片图片,

很多复杂的内容很快就能一目了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传播的频率和范围,使得其传播力度更强。

(三)精神文化的交融性多元化

作为校园文化精髓部分的校园精神文化,代表着一个学校的精神内涵及核心价值,体现着校园的精神风采和人文面貌。师生在长期教学、学习和生活中所凝聚的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学风校纪等,体现了群体特色的认同感和内化了的价值模式的一致性。

新媒体的迅速壮大,使得传统媒体逐渐消融。传统媒体信息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而微信及微信公众平台的出现扩充了信息的传输路径及传送领域,信息的接受和传播可以是双向的,这样校园文化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互融合性。借助微信公众平台,每位学生、教师可以平等地交流思想,发表看法,加强彼此的了解,同时传播一些具有学校特色的信息。网络的自由化、开放性使得精神文化的流动性更强,便于学生更加轻松地领会校园文化的灵魂与精髓。

四、新媒体环境下微信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影响

(一)新媒体环境下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机遇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媒体如海报、校园广播等在校园文化的传播中就显得单一。现今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与传统的媒体相比颇具优势,如传播速度快、传播影响大、传播覆盖力强等。根据一项调查结果,图画和文字结合的形式可以激发人们阅读的兴趣,能够刺激大脑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并且强化对接受到的信息进行记忆。因此,微信的发展对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作用。此外,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当今人们的阅读习惯逐渐从纸质阅读变为电子阅读,电子阅读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人们的阅读更加方便。将微信阅读与互联网进行结合,受到更多人的喜欢,这也给新媒体环境下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带来了机遇。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物质文化是校园开展教学的基础,而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灵魂,在当今时代下,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以新媒体为载体,借助多媒体,顺应时代潮流,将图片、文字、视频、语音进行有效的整合,这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创新之路。由于大学生没有经济基础,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成本低廉的信息获取方式。新媒体的发展可以满足大学生对获取信息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微信,大学生可以及时发现校园的问题,为解决校园问题提供一定的对策,同时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多媒体与其

他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另外,大学生可以通过微信积极参与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例如高校可以通过微信宣传学校的文化活动并吸引学生积极参加,也可以定期举办各类文学讲座、思想政治教育和各类课外活动等,通过微信平台,这些活动信息可以得到快速传播。

(二) 新媒体环境下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的传递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人们可以通过新媒体手段即时了解信息,但有些负能量和错误的观念也会给学生的思想带来一定的冲击,进而影响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同时,以微信为主要代表的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文化和思想聚合度更高、覆盖更全面、传送效率更高,无疑对高校的教育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4]首先,在网络时代,人们的思想很活跃,人们可以在网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大学生思维的跳跃性很强,校园文化建设应该是健康向上的,但现今一些网络信息充斥着负能量,当大学生看到这些信息时,会对他们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会造成思想偏颇,对某些事情产生一些过激的想法。还有一些大学生受到负能量信息的影响后,会对这些信息进行转载,这些舆论信息就会在学生之间进行传播,为负能量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方便,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带来不良影响。其次,大学生是高校校园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如果大学生对不经证实的信息进行传播,会给其他学生带来负面情绪,甚至还会有学生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给学校的文化安全带来威胁。此外,大学生乐于接受新鲜的事物,但同时也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单纯的群体,大学生通过微信获得校内外的各种信息时,对信息的真实性很难识别,他们一般会被动接受信息或主动接受他人带来的信息,而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如果文化建设的信息中存在不良因素,如信息虚假、信息负能量等,会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在信息化时代,如何通过新媒体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正确引导和进行校园文化的建设活动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五、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策略

(一) 激发大学生文化传播的参与度

通过有关问卷调查可知,许多大学生对校园推广的知识并不是十分关注,因此可以让大学生积极投稿,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高校可以在微信平台举办有关校园文化建设的大赛,并制定一定

的奖励措施,吸引大学生进行投稿。对大学生所投稿件也要做出一定的要求,要求投稿的内容必须真实,必须是原创的作品,不得抄袭或模仿他人的稿件,同时作品要尊重他人,如在稿件中对他人的图片、文字进行应用,要注明出处。这样大学生为了获得知名度或获得奖品,会查找有关的文献资料,并进行一定的整理,与此同时,大学生会对校园文化有更多的理解,能够了解更多的有关校园建设的知识,提高文化素养。此外,高校还要积极进行征稿,要根据稿件的质量对大学生进行一定的奖励,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获奖作者的姓名,这样会激励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中,这也是使大学生关注学校微信公众号的一个重要策略。

(二) 优化大学生的微信文化体验

当下高校学生对校园文化建设认识不足,对文化概念和校园文化概念存在偏差,高校应优化学生对微信文化的体验。首先,高校可以借助微信平台的优势来开辟新的学生课外学习的途径,可以班级为单位,并建立一定数量的小组,在小组的微信群里上传一些有关文化安全的资料供大学生进行阅读,以此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高校还可以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公众号,大学生通过公众号可以交流自己的思想,同时在公众号中教师可以对学生的言论进行监督,学生也可以对公众号进行一定的管理,以加强大学生的优化体验。其次,高校可以借助微信的平台,进行课下交流和调查活动。高校的文化建设通过微信竞答等趣味的活动,将微信平台与课堂知识进行结合,同时高校班主任也可以与学生进行课下交流互动,让学生在竞争中获得快乐。在活动中,教师要对领先的学生进行适当的奖励,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高校可以利用微信平台,在学生和教师之间进行互相评价的活动。由于微信评价具有快捷、简单的优势,师生进行互评,可以提高学生的听课质量和教师的教学质量,同时也能对师生之间的文化互动起到监督的作用。

(三) 强化微信建设中的防范监督机制

一些充斥着负能量的微信信息可能对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高校应加强对这些信息的防范监督工作。首先,国家要加强对微信运营公司的监管。政府等有关部门可以成立微信文化的监督小组,制定有关微信安全的法律法规,同时微信运营公司也要加强对微信信息的管理工作,合理、合法地加强对微信信息的监督。其次,高校要建立微信安全的监督体制。高校可以借助社会的力量,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构建监督体系。同时还可让学生

作为监督的主体,学生发现不良的信息时要及时进行举报。高校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时,要从实际出发,对以学校名义开通的微信公众号,要采取措施进行监督。另外,高校还要创新校园文化建设的监督方法,采用先进的技术加强对微信信息的监管力度,建立有力的微信文化监督阵营,使微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全面加强宣传教育

高校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应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对学生进行宣传和教育,使更多的学生了解到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兴趣与责任感,并通过学生的传播使校园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口碑。首先,高校可以与学校的各类社团进行合作,在微信平台宣传各类有益的活动,这样可以让大学生对社团有一定的了解,学校可以通过社团来宣传校园文化活动。同时,在社团的活动中,也可以开展微信的互动活动,这样可以增加微信平台的粉丝数。其次,高校在微信平台推广有关文化建设的活动时,要考虑到学生的生活情况,并与学生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学校的教学楼、自习室、食堂等地点张贴有关微信平台的宣传内容或微信平台的二维码,使学生关注校园文化建设。最后,高校还应该根据大学生的需求,对微信公众号进行开发,并增加微信公众号的实

用性,让大学生对微信公众号产生依赖,促使其长期进行关注,以促进微信平台的发展,也能更好地建设校园文化。

六、结语

微信平台作为互联网的载体,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便捷了彼此的沟通与交流,但国家也要对微信环境下的各种信息进行关注与监管。高校在建设校园文化时,要意识到校园文化建设既有机遇,又有挑战,要结合当前文化安全的现状,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建设校园的文化安全活动。同时,高校也要意识到校园文化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脚踏实地去完成。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86.
- [2] 田静.新媒体环境下校园文化建设研究[D].南充:西华师范大学,2016.
- [3] 聂小燕.微信公众平台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研究[D].南充:西华师范大学,2016.
- [4] 熊德兰.微信传播形态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转型[J].许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3):133-135.

(责任编辑 姚虹)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WeCha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ampus Culture in Field of Vision of New Media

LYU Wen

(Students' Affairs Department, Zhengzhou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culture not only affect the lifeblood of the country and entire nation but also support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changing people's lif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no longer depends only on traditional media. The integration of old and new media is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rrently, students who have intense desire of exploration and seek for fashion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new media users, so the spread of social media of college campus culture should be studied.

Key words: WeChat; WeChat Public Platform; college campus, cultural construction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研究

陈双双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天津 300204)

摘要: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应用翻译的一个重要文本类型,肩负着向国外受众传递中国大政方针的使命,同时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分享中国经验的一个必要环节。研究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Holmes将描述翻译研究分为三个分支:产品导向的研究、过程导向的研究和功能导向的研究。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可以通过这三个方面得以更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特点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3

中图分类号:H319;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69-06

一、文献综述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应用翻译的一个重要文本类型,肩负着向国外受众传递中国大政方针的使命,同时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分享中国经验的一个必要环节。对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11年,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天津外国语大学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需求,联合创办“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它肩负着翻译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多重使命,主要特色是开展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及培养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的专业人才。该基地创办辑刊《中译外研究》,开辟“文献翻译”专栏,为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平台。由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与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承办的“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每年召开一次,迄今已举办四届。从学术共同体视角(研究队伍、研究机构、人才培养、期刊阵地、学术会议)来看,这些动态标志着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学术化。

在当今翻译研究中,文学翻译研究依然是主流,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之下,中国文学

的对外翻译研究和传播研究,发展态势迅猛。梁林歆、许明武指出“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文学翻译的研究成果呈上升趋势,一直是研究焦点所在。应该说,文学翻译依然是翻译学研究的一大传统趋势与特色。”^{[1]25}但是,许多专家和学者呼吁要关注当今的翻译活动、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翻译的范畴。“文学翻译的研究不能替代应用翻译的研究,特别在科技高度发达、人际交往频繁的当代,铺天盖地的语言产品中应用翻译占了绝大部分。”^{[2]80}韩子满也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翻译比文学和宗教领域的翻译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领域与当前人类生活的关联性更强,这些领域的话题也更能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3]77}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典型的政治文献翻译,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因而有必要展开针对性研究。关于中央文献翻译的特点,已经有学者展开零星论述,例如修刚指出的三个特点:“快(中文版一出现,相关译本就立刻跟了上来)、重视翻译理论的研究、加大了对译文受众的研究。”^{[4]123}李学军总结文献

收稿日期:2019-04-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央文献术语外译词典(中英、中俄、中日)编纂的理论与应用研究”(14AYY003);2016年度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影响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研究”(YXL2016ZL022)

作者简介:陈双双(1986—),男,山东菏泽人,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讲师,研究方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

翻译有四大特点:文献翻译的时效性、文献翻译的针对性、文献翻译的权威性、文献翻译的时代性^{[5]94}。本文以更加系统化的视角,从产品、过程和功能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

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相关概念界定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以中国立场客观地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以及来华外国人士传播中国的国家政策、发展方针政策等等,它是一种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跨语言、跨文化、跨国家的思想信息对外翻译和传播活动。那么我们如何界定“中央文献”这个概念呢?

本文借鉴中央编译局两位资深译者的定义:一、“中央文献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著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主要文件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重要政策文件。”^{[6]78}二、“中央文献主要有党和政府一些重要会议的报告和决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文集,文献资料,以及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演讲等。”^{[7]81}可见中央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与讲话;2. 党和政府的重要决议和会议文件。“中央”旨在说明是顶层设计,而地方政府以及各个部委等下属的机构的决议和报告等等,则不属于“中央文献”。

为何要强调是“对外翻译”呢?

首先是因为中央文献翻译存在“对内”和“对外”两种类型,“中央文献对内翻译”指的是民族语翻译,即将汉语的中央文献,翻译为中国的各种民族语,比如壮族语、蒙古族语、维吾尔语等等。这项工作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来承担,其面向的受众是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读者;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面向的是国外的受众。因此“对内”的类型不属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研究范畴。

其次,“对外翻译”意味着是由我方发起的一种翻译活动,是一种“中译外”,译者群体主要是我方人员,翻译活动的主动权也在我方。如果是由外国译者在海外独立完成的中央文献译本,整个翻译过程(从翻译活动的发起到译作最终发行和传播),没有我方的任何参与,那么这些译作不属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范畴。但这种由外方独立完成的译文,可以作为平行文本展开比较研究,只是性质上不属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但是很多学者使用的关键术语并不统一。有些学者使用“外宣翻译”“政治文献翻译”或“党政文献翻译”,但实际上他们所选的研究对象和具体例子,

都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范畴。就这几个术语的所含范围而言,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与其呈现隶属关系,能够用数学中的小于号“<”来表示: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 < 党政文献对外翻译 < 政治文献对外翻译 < 外宣翻译

如果以宽泛的概念来讨论一个事物,往往抓不住事物的本质,而应当是名与实相符,给事物一个准确而具体的命名,才能更好地探讨和捕捉其本质,因而本文作者建议在以后的讨论中,多使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术语,而尽量避免使用以上义词(概念宽泛的词),比如减少使用“政治文献翻译”,首先因为政治文献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地方政府的文件也属于此类,此外它也没有明确翻译的方向性问题,美国《国情咨文》翻译为汉语,也属于政治文献翻译,但这些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范畴显然是不同的。

三、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

在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James Holmes 将翻译研究分为两大分支:纯研究和应用研究。然后将纯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描写研究。描写翻译研究这个分支包括三个子项:产品导向的研究、过程导向的研究和功能导向的研究^{[8]176-177}。本文借鉴这三个方面,从产品、过程和功能来分析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Holmes 所言的产品导向的研究,一方面是描述单个译本,另一方面还可以进行译本对比描述研究,以及开展翻译语料调查(共时与历时),最终是构建普遍翻译史;本文所谓的产品研究,主要是指译作(内容与形式)所体现出的特点。Holmes 所言的过程导向研究,主要是针对译者的“黑匣子”(大脑),涉及的是译者心理层面的翻译研究;而本文所谓的“过程”,主要是指整个翻译活动从开始(委托人发起翻译活动)到最终结束(目标语读者接触到译文)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不再是心理层面的研究,而是对贯穿整个翻译活动“过程”的各种特点的研究,是指宏观意义上的翻译过程,比如:翻译的选材→译者的安排→译前准备→确定翻译策略→具体翻译→校对→出版→甚至读者反馈等过程。Holmes 所言的功能导向研究,主要是分析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方的翻译选材(哪些原作被选,为何被选,哪些没有被选,又是为何等),以及译作的影响;Holmes 关注的是译作在目标语文化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没有谈到对源语文化的影响,对于中译外的翻译活动而言,这是不全面的,而本文的“功能”则将两个方面都包含在内:即译作对目标语文化和源语

文化各有哪些影响。

(一) 产品

第一,中央文献译者的隐身性,即外文版没有译者署名。中央文献的外文版不标注每个译者的姓名,而是只标注负责的机构或译者群组(比如中共中央编译局译,或英文翻译组译等),有些甚至不标注任何译者信息。这也反映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重点在于凸现原作者或原作内容。

第二,出版社为国内指定的出版机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起初为了方便在国外传播,曾授权给英国的劳伦斯出版公司,但后来因为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删掉了两段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话,我方就不再授权外国机构出版,而改为由国内出版社出版(比如:外文出版社)。例如,中央编译局承担的《习近平系列论述摘编》的外文版,目前只由国内的出版社出版。现在还出现一个新趋势:外文版由我方负责翻译,但会积极寻找国外的出版机构展开联合出版活动。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某些外文版已尝试采用这种方式。

第三,中央文献外文版的封面设计与内容排版,与中文版保持一致。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的英文版,封面与中文版一致,扉页也印有习总书记的照片,英文版的内容排版也与原文保持一致,所有注释均放在尾注(第一卷的英文版,仅两个译者注是以脚注的形式出现,但第二卷英文版的译者注,则全部改为了尾注)。

第四,中央文献外文版的翻译副文本极少或甚至没有。由于中央文献翻译的权威性,译者必须忠实翻译,而不能夹杂自己的观点或看法,译者要避免出现任何主观的阐释,因为译者无法保证自己的阐释是否正确。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副文本极少,甚至完全没有。比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不存在译者注、插图等翻译副文本。《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也没有添加任何译者注。尽管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出现了一些译者注,但数量极少,另外其英文版中的插图等等,都是中文版已有,而非翻译过程中添加^{[9]110-113}。

第五,翻译的方向性——中译外。国际上的惯例是译者从外语译入自己的母语,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则与之相反,由中国译者从母语译入第二语。由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差异等原因,许多西方译者对中国存在偏见和误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为了由我方掌握解释权和主动权,我方译者积极承担起这项对外翻译的重任。在对原文意思的准确理解方面,我方译者具有绝对优势。目前已经有

学者出版专著,论述该翻译方向性的合理性和理据性。比如 Nike Pokorn 撰写的《挑战传统原则——译入非母语》(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 Translation into a Non - Mother Tongue) 和 Stuart Campbell 撰写的《译入第二语》(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

第六,翻译选材的指定性。许多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都是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翻译的题材,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选材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权。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其选材是由国家机构来指定的,而且翻译材料的优先顺序,也是指定的。“国家指定翻译题材,国家翻译机构在国家政策领导下组织翻译工作。也就是说,中央编译局的大部分翻译题材实际上是国家直接授权或指派的。”^{[10]112}

第七,中央文献重要术语翻译的传承性。许多重要术语,是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直沿用的,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些术语的译法已经被老一辈中央文献翻译家确立下来,因此,为了保证与历史文献在重要术语概念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应当沿袭使用已经确立的译法。

第八,统领性和规范性。中央文献是中国最高层次的政治文献,它规范、引导和塑造着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因此,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政治文件的翻译,起到指导性和规范性的作用。

(二) 过程

第一,以原作者为中心的翻译原则。原作者的权威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遇到需要调整的地方或难点,向上级汇报或请求原作者审批。原作者对翻译的看法,影响到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毛泽东同志认同鲁迅先生的翻译观,因而译者们以此为理据,尽量亦步亦趋紧贴原文,谨慎翻译,生怕有任何一句话违背了毛主席的原意。原作者对译文拥有最终裁决权,比如针对“纸老虎”(paper tiger)和“本本主义”(Book Worship)的译法,都是由毛主席来确定的。习总书记鼓励用受众易懂的话,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1]156}因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考虑目标语读者,这尤其体现在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章节标题的简化式翻译。某些书名的翻译,如今也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比如《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经过上级审批，英文简化为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作者标注为：Xi Jinping。“论述摘编”的字样则省略不译。如果全部逐字译出，则书名过长，不易于英文版在目标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

第二，翻译方法更多以直译法为主。直译法一方面可以保留源语文化，即把异质性元素引入到目标语文化，让读者接触到原汁原味的东西。另一方面，直译法可以避免译者的主观性阐释，从而实现与原作者最大程度的贴近和忠实。Vladimir Nabokov说：“从译者在翻译时所具有的心态来讲，面对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直译无疑是洗刷‘不忠’罪名的最保险选择”^{[12]526}。从其重要性上来看，中央文献也算是“经典文本”的范畴。

第三，国家指派的集体翻译模式。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工作，都是由群体译者完成，集体翻译可以极力避免个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和误读（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事关重大，其中出现的某个失误，甚至可能会造成国际性事件）。作为一种国家翻译实践，翻译的发起人（党中央或国务院等中央机构）不会委托或授权个人译者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译者个人的看法或因而产生不当阐释等等，这种风险性也是个人译者无法承担的。一方面，多位译者可以在翻译中进行商讨，推敲最适合的词语；另一方面，单个译者往往有自己的用词习惯和风格，而群体译者则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法和用语风格，从而丰富译文的词汇和风格。在这种集体翻译模式中，以我方的译者为主，他们都是由发起人挑选出的优秀译者，不仅语言水平高，而且政治素养过硬，立场坚定，值得信赖；外国专家起辅助作用，审阅语言的流畅性等，而最终定稿由我方确定。任东升指出“国家翻译实践作用之重要，操作流程之复杂，都要求强大的译者群体。……这单靠本土译家是无法实现的，即本土译家具有自身无法避免的劣势。与之相反，‘外来译家’天然的母语优势和综合文化模式可以很好地弥补本土译家的不足。”^{[13]1}

第四，翻译流程包含十多道工序，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程序性，以便发挥集体翻译的优势，确保翻译的质量。“我们在长期翻译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包含十多道工序的翻译流程，中外译者通力合作，确保了整个翻译工作的内在一致性、译文的准确性。”^{[14]58}

第五，原文处于不断修改的状态之中，因而译文也随之不断修改。“对于政治文献来说，原文一直处于不断修改过程之中，有自下而上的建议意见，也

有自上而下的要求指示；有写作班子的研究著述，也有集体领导的集体讨论决策。”^{[14]57}。《毛泽东选集》《政府工作报告》《十九大报告》等著作或文件的翻译工作中，其原文都出现过这种多次修改的现象。

第六，中央文献翻译是一项政治任务，其本质是政治性，因而翻译中要坚持政治第一。“政治文献翻译工作首先应当是一项政治使命，政治信息的传递始终是第一位的，而受众理解应当在其后。”^{[15]52}

第七，封闭的翻译环境或相对隔离的翻译环境。一些重要文件，必须在与外界隔离（封闭的）的情况下翻译，比如《十九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等等文件，因为它们涉及保密性。翻译过程和改稿过程，也因为保密而没有公布，所以改稿的材料，对外部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以获取，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的困难。再例如，建国之后，中央专门为从事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的译者们提供了专门的翻译场所——万寿路十八所。后来，随着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的成立（前身是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很多中央文献都是在这个机构内翻译完成。

第八，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时间紧迫，通常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很多重要会议的文件，要求必须在会议开幕之前完成翻译，因而译者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翻译任务，比如《十九大报告》的翻译。在早期的时候，译者拥有比较充沛的翻译时间，比如《毛泽东选集》对外翻译的过程是慢工出细活。但如今情形大为不同，中央文献的外文版与中文版往往要求同时发布，以便抢占舆论制高点和话语主导权。所以现在要求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不仅要质量高，而且还要速度快，更讲究时效性。

第九，机构性和制度性。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翻译机构来开展，例如中央编译局、外文局、外交部、新华社等，而且翻译工作已经形成制度化。

（三）功能

第一，为目标语文化服务。中央文献的外文版具有针对性，它有着明确的国外读者群体，他们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而不是普通大众），其中包括国外媒体、政界、学界、商界等人士。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把中国智慧和方案介绍给这些国外的读者，让他们了解中国，以及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从而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有利于这些国家与中国携手走向共同繁荣，也有利于当下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毛泽东著作的对外翻译活动，对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开展革命运动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为源语文化服务。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带来的效应是一种“双赢”,即不仅能够给目标语文化带来新的元素,促进其发展,也有助于源语文化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能够致力于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议。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占国际舆论界的形势下,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舆论权,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为国内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外部环境。

四、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启示

首先,传统的翻译研究是以文学翻译研究为主,而中央文献翻译属于政治文本翻译,与文学翻译存在较大差别。因而,以文学翻译理论来指导中央文献的翻译或展开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文学翻译的内容是具有虚构性,而中央文献翻译的内容则具有现实性,论述的是当前的问题。另外,文学翻译可以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而中央文献翻译则强调对于原作的忠实,而将译者主体性尽量降至最低。两者的受众、功能等也不一样。正如蒋明炜指出“中央文献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新闻翻译、科技翻译等等,在种类丰富的翻译领域中可谓自成一派,有其独特的语体风格、表述方式、逻辑架构、思想内涵。”^{[7]80}

其次,当代的许多西方翻译理论,都是从外语译入译者自己母语的翻译活动为基础,即主要关注译入的问题,因而不可直接照搬。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一种译者的“译出”行为,从译者自身的文化翻译到“他者”的文化。王东风指出“当代翻译学揭示,这是因为翻译为目标文化引进了异质的元素。这些元素之所以被引进,是因为作为社会知识精英的翻译工作者洞察了目标文化中所存在的种种漏洞,而这些被引进的异质元素往往就是修补这些漏洞的补丁”^{[16]7}。Gideon Toury 提出的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指的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面对的种种制约,这些制约主要来自译入语社会及文化,却直接影响译者的翻译决定。但中央文献翻译主要考虑源语文化的制约因素。André Lefevere 提出的改写理论,也仅仅适合外译中的情况,比如为了与我国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外译的过程中,我方译者要进行必要的改写。“勒弗菲尔坚守国际通行的母语原则,即遵照从非母语译入母语的原则,强调改写者要受到母语文化诗学规范和意识形态信仰的制约。”^{[2]109}但是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情形中,则有所不同,译者的宗旨在于传递我国

的意识形态和方针,切不可为了迎合读者,而改变我方的意识形态。译者只能是语言层面进行微调,对外翻译中关涉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不可修改的。

再次,尽管我们借鉴 Holmes 对描写翻译学的三个分支,但是描写翻译研究特别强调目标语导向。通过系统描写目标语文化中的译作,研究者们力图找出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包括言内和言外因素,比如语言、文学、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等诸多因素。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特别强调源语导向,因此描写翻译研究的一些概念,不可照搬使用,必须有所甄别和选择。

最后,要构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中央文献的对外翻译是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的外宣阵地,从其传播的‘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来看,也都独具特色。”^{[7]81}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那么学者们对其开展研究,则应当具有针对性,并应力图构建与之相应的翻译研究理论体系,而不是套用或照搬翻译学(尤其是西方学者的翻译学理论研究成果)中已有的理论体系。由于中央文献本身的严肃性和保密性等特点,之前翻译界的学者们很少有人针对这类文本的对外翻译展开研究;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提出),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这个翻译领域。目前来看,许多关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或套用现有理论进行分析的阶段,而关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理论,可谓少之又少,相对文学翻译研究而言,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是严重滞后的。杨明星提出“政治等效”^{[17]91}的外交翻译标准,虽然外交翻译与中央文献翻译的范畴有交集,但是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因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仍需继续努力,不断挖掘中央文献对外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新的翻译现象等等,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来解决问题、阐释现象等,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模型或理论体系,从而丰富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成果。

如何构建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政治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将其引入到中央文献对外翻译,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的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材料的根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了解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将有助于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的

构建。另一方面,从中国传统译学中汲取养分,构建理论体系,例如梳理中国从古至今已有的大规模的集体翻译活动(佛经翻译、西学东渐的翻译等等),以及中国古代的对外翻译活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寥寥无几)和相关的翻译话语。

五、结语

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是党的理论外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世界解读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阐释中国发展理念、讲述中国故事,中央文献的翻译发挥着规范和引领的作用。我方译者不能站在受众立场进行翻译,而是必须根植于原作者立场。通过分析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产品、过程和功能,总结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特点,一方面有助于译者了解其规律性,从而进一步提升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加深研究者对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的认识,从而推动中央文献对外翻译研究的深入。

参考文献:

- [1] 梁林歆,许明武. 基于关键词分析的国际翻译学研究热点及趋势评述[J]. 外语与翻译,2016(3).
- [2]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 [3] 韩子满. 跨学科翻译研究:优劣与得失[J]. 外语教学,2018(6).
- [4] 修刚,李钰婧. 推进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访天津外国语大学修刚教授[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1).
- [5] 李多. 首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在津举行[J]. 东方翻译,2015(5).

- [6] 贾毓玲. 对中央文献翻译的几点思考[J]. 中国翻译,2011(1).
- [7] 蒋明炜. 译之道,贵以专:浅谈中央文献翻译与对外传播[C]//王铭玉. 中译外研究(第5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 [8]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C]//In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 [9] 陈双双. 中央文献中的副文本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J]. 外国语言与文化,2018(4).
- [10] 滕梅,吴菲菲. 翻译政策作用下的国家翻译机构:以中央编译局为例[J]. 外语教学,2015(4).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2] 方梦之. 中国译学大辞典[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13] 任东升. 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的初步探索: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综述[J]. 上海翻译,2016(5).
- [14] 桂田田. 政治术语历来怎么翻译[J]. 新湘评论,2015(20).
- [15] 熊道宏. 答疑与翻译:对政治语言与工作机制的思考[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2).
- [16] 王东风. 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J]. 外国语,2014(4).
- [17] 杨明星. 论外交语言翻译的“政治等效”:以邓小平外交理念“韬光养晦”的译法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 of CPC Literature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CHEN Shuangshuang

(Translation Studies Center for CPC Literature,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CPC Literature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the pragmatic translation, having the mission of disseminating Chinese policies to foreign readers and becoming a vital link t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share Chinese experience to the world.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CPC Literature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Holmes divides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to three parts: product-oriented, process-oriented and function-oriented. These three aspects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ion of CPC Literature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Key words: CPC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foreign languages; characteristics

红莲相依浑如醉

——漫议普通话与方言

孟昭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随着到21世纪中叶普通话城乡全面普及,当前有不少人因方言的渐行渐远、方言词汇的大量流失而产生纠结和焦虑,有人甚至像保护野生动物一样大行保护之事。方言是一种地域文化,它既有历史的沿革,又有现实的需求,还需要精心传承。词汇是一种不断新陈代谢的开放系统,方言词同古词语、外来词、字母词、网络词一样,跟普通话共建一个“和而不同”的语用大家庭。

关键词:普通话;方言;相互依存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4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75-05

一、引言

沪教版《小学语文》有一篇课文《打碗碗花》,文中“外婆”一词,全被改成“姥姥”。这一改,引起了教育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一时沸沸扬扬。修改原因是“外婆”一词是方言词,不合规范。我们知道,无论“外婆”“姥姥”都是指称外祖母,都是流行区域广大而且历史悠久的称谓语言。“姥姥”一词,明代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外甥称母之父为姥爷,母之母为姥姥。”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京津地区,属于北方方言。而“外婆”一词,《史记》《汉书》中文字有证,主要分布在陕甘和广大江南一带。是要“规范”还是要“乡愁”?抑或二元齐芳?

二、共同语与方言的成因和历史沿革

语言是逐步约定俗成的语音、词汇、语法综合系统,这种系统就是这个民族的共同语。这种共同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时而分化,时而统一,方言就是在这种分化和统一的历程中衍生形成的。一般来说,历史长、使用人口多、通行范围广的方言,往往会出现较多的方言区。

形成汉语方言的因素很多,我国地域广袤,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传递不畅,人口的数次大的迁移,也由于语言本身的发展不平衡,因此,我国很早

就有共同语与方言之分。春秋时期,汉语共同语称为“雅言”,见《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西汉末年,扬雄历经27年写出《方言》一书(原书名《辘轳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东汉应劭将此书简刊为《方言》)。该书搜集了先秦时期的大量方言词与共同语进行对应。如:

“娥,好也。秦曰娥,关西人或为之姘,赵魏燕之间曰姝,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方言·卷一》)

晋人郭璞《尔雅注》,也记载了一些方言词。这部书也是用雅正之言来诠释一些方言词的。如:

“养,通语也,陈楚韩郑之间谓之鞠。”

例:《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尔雅·释言》)

清代小学盛行,研究方言的书籍较多。如杭世骏的《续方言》,这部书搜集唐宋以前的方言词语,补扬雄《方言》所未备。另外还有翟灏的《通俗篇》、钱大昕的《恒言录》、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和章炳麟的《新方言》等。

方言是由方音、方言词、方言语法结构三方面组成。“乡音”是考辨方言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之一是妇孺皆知的:

收稿日期:2019-04-21

作者简介:孟昭泉(1943—),男,河南温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学。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专门按当时吴音的音韵平仄，写过一首“吴体诗”，使唐诗开出了一朵“方音之花”。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上古时代是没有清唇音的。《切韵》音系只有“帮滂并明”，而“非敷奉微”是从其中分化出来的。东汉末年，孙炎、应劭创造了反切法为汉字注音（即用反切上字的声母与反切下字的韵母相拼，就是该汉字的读音）。孙炎是以北方方言来确定反切上下字的，这为北方方言成为汉语共同语的语音基础创造了条件。南北朝时梁代的沈约又发现了汉语音节中的“平、上、去、入”四声。至于入声，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中原为则而取四海同音。”作者以北方戏曲语言反映当时口语语音的官话为规范，总结出汉语声调的“平分阴阳，入派三声”。

有人曾以柳宗元的《冬雪》诗为例，说明原平声如何分出阴阳，入声是怎样消失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此诗是一首入声诗韵。诗中如“舟”，元曲中分化成“舟”（第一声和“轴”第二声）；诗中韵脚“绝”“灭”“雪”原均入声，元曲分别读“绝”（二声）“雪”（三声）“灭”（四声），这样入声字就消失了，从而奠定了北方方言成为现代汉语“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语音基础，并且可以考量各地声调的调值。如：

调值举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北京话	55	35	214	51
天津话	11	45	213	53

而金代官修的《平水韵》（平水，今山西新绛），只是供科举考试之用，还保留了入声十七韵，为元、明、清以来作“近体诗”的押韵依据，它同方言没有多大关系。

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主要不同还有方言词，古代的雅言和迥言的区别也在词汇。

我们知道，唐代末期敦煌变文的出现，开创了白话文的先河。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分化，使汉语涌现了一大批戏曲和小说。五代与宋代的“话本”，元代的“元曲”以及明清时的长篇小说，虽然有些作品夹杂着少许文言词语，但总体上用的是白话。例如方言词中“杌子”（小板凳），出现在不少白话文著作之中：

“唐明皇召安禄山，用矮金裹脚杌子赐座。”——〔北宋〕曾慥《须说》（34回）

“（武松）掇个杌子，自近火边坐地。”——《水浒传》（24回）

“东老正要问他来历，恰中下怀，命取一个小杌，赐他坐了。”——〔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七卷）

“他便掇杌子打横。”——《金瓶梅》（2回）

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陆淡安的《小说词语汇释》在“二刻”用例中特别注出是“吴语”。2012年7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陈效师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及《红楼梦》中同样把小板凳说成“杌子”，而且还说：“至今北京郊区还有这种叫法。”^[1]

现代汉语中的方言词，往往是共同语的“转基因”。例如“太阳”一词：

“老阳西落，砸得好心焦！不卖点命，谁也不饶。”——曹禺《日出》第二幕

“像死牛样的背煤，两头不见阳婆。”——魏巍《晋察冀诗抄·青石头青》

“咱们早准备下饭了，没啥好吃的，大渣（cha 玉米磨成的碎粒子）大酱管够。老爷儿快落了，请吧！”——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二部十一

曹禺先生是四川人，魏巍先生是河南人，周立波先生虽然是浙江人，但他在《暴风骤雨》中写的是哈尔滨附近小村庄元茂屯土改的故事。这些北方方言的方言词，只是为了彰显人物身份和地气才用的。“太阳”一词是早已有的民族共同语。宋代诗人谢枋《花影》诗：“刚被太阳收拾去，却叫明月送将来。”当代“东方红，太阳升”的歌曲唱遍神州大地，“老阳”“阳婆”“老爷儿”都指太阳，这是说方言词的人们都懂的。

有一些方言词，表现在称谓方面比较突出。湖南人把“妻子”称“堂客”，陕西北人叫“婆姨”，福州人叫“老妈”；湖南江华一带把女儿称“妹妹”；湖南华容县把父亲称“爷”，而把爷爷叫“爹”；广东陆河地区叫其父为“亚爸”；山西人把其父叫“大”；四川某地管叔父叫“爸爸”；湖北枝江一带把父亲的妹妹叫“爹”（父亲的大妹妹叫“二爹”，二妹妹叫“三爹”，最小的妹妹叫“么爹”）。这些方言称谓，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最小的使用范围局限在不到一个县里。至于温州话把妻子称“了鱼”，上海话叫“介子婆”，只在个别人口中出现。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有些方言词是因为风俗不同造成的。据钟敬文《民俗学概论》^[2]载：我国古代就有新婚第二天回娘家叫“回门”的风俗，但有些地方回门的风俗不一样，陕西韩城叫“回十天”（婚后十天），山东德州叫“住单九”（婚后九天），天津叫“回四”（婚后四天），武汉又分“单回门”或“双回门”（二天或三天）。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方言词。

因忌讳而形成了方言词。广州人忌讳说“肝”，粤语把肝叫“润”，猪肝叫“猪润”，豆腐干叫“豆润”。上海人忌讳说“鹅”，吴语“鹅”同“我”谐音，所以上海人说杀鹅叫“杀白乌龟”。长沙人把腐乳叫“猫乳”，把府正街叫“猫正街”。北京人忌讳说“蛋”，把炒鸡蛋叫“炒白果儿”。十二生肖的“蛇”年，北方人说“小龙年”，因为人们对蛇总是有不好的评价和忌讳。

有些方言词的形成，还同政治历史原因有关。如台湾方言：“出丑”等同“漏气”，“坟地”等同“夜总会”。香港人把“爱人”（内地夫妻互称）当作“情人”（小三、二奶），同日文中夹用汉字“爱人”的词义相同，这也是由于政治历史原因形成的。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各地的方言词不胜枚举。波多野太郎《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3]，其中多数方言词已成为“化石”，当用的方言词同北方方言相互通达、相互融合的情况已呈趋势。

另外，北方方言从少量少数民族语言里吸收了一些词，如“奞拉”（女真语）“胡同”（蒙古语）“萨其玛”（满语）等。北方方言还从各地方言中吸收了不少词汇来丰富自己，例如“名堂、把戏、二流子、忽悠、二杆子、垮、拆烂污、尴尬、陌生、鳖脚”等。特别是“垃圾”一词，原是吴方言，北京话原叫“脏土”。垃圾的词义覆盖面大，而且比较准确。脏土只能指生活垃圾的一部分，建筑垃圾、医疗垃圾等等无法概括。“搞”原是湘方言，吸收到北方话中已经失去其地方性。以上这些，就使北方话促成了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地位了。

我国古代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很少。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是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该书是模仿拉丁语的体系并结合古代汉语语料形成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没有涉及白话文的语法结构，对现代共同语的形成价值不大。及至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虽然该书受英语语法的影响，但对汉语白话文的词法、句法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而且阐述了合理的章法。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和王力

先生的《中国语法理论》相继出版，这两部书对汉语语法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的归纳，从而奠定了现代汉语语法结构的定位格式：

第一层面：主谓宾

第二层面：定状补

其排列顺序是：定语、主语、状语、谓语、补语、定语、宾语。

粤方言把句法中的谓语说在状语之前，如“我先走”说成“我走先”，把“你有没有吃饭？”说成“餐有未？”这都是不合语法要求的。

金元明清以来，北京长期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话作为“官话”已覆盖全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使书面语同口语结合，这样就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民族共同语。

三、普通话的全面普及会导致方言逐渐消失吗？

我国在1955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定义：“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9条规定：“凡以普通话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其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说普通话的能力”，第26条又规定：“规定的人员用语违反本法规定的，有关单位应当对直接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拒不改正的，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

20世纪50年代，中央对推广普通话有12字方针：“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后，20世纪80年代末又调整为：“大力推广，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到了9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决定：“逐步实行按水平测试的普通话等级制度”。这些政策、法令强调了普通话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随着普通话的逐步普及，随着中小学教师的普通话教学，随着广播、电视进入每家每户，随着交通的便利和城市的扩大，随着人们交流的频繁以及手机互联网的便捷，普通话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正牌的“日用品”了。

据“我国城市居民语言意识与外语观调查”：市民中80%的人会说普通话。而且普通话的普及率与年龄成反比：

60岁以上	46%
40~50岁	70%
20~30岁	85%

这些数据是前些年的调查,随着大量的农民工和商业人员入住城市,这个数据只能是一个时期的参考值。据2016年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现人们对老北京话的认同日渐式微。当下,北京话最具特色的儿化韵——京腔、京韵的“京片子”,往往被外地人的“蓝青官话”所代替。

20世纪时,上海的年轻人已经把“吸烟(yi)”说成“吸烟(yan)”了,也不再把“洗头”说成“打头”了。吴方言中苏州话原有8个声调,现在50岁以下的人已将其减至5个调值。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方言逐渐变成了“私房话”,而且禁区越来越多。2013年,四川渠县一公证处在进行保全证人证言的过程中,因为对一个方言词具体含义不了解,导致了笔录中所载的一处证言和证人实际证言不一致而没有公证成功。2015年,浙江金华的陈先生,因为上班时间与本乡的同事说方言被罚款100元。南昌一家通讯公司规定:一个月内如触犯5次或以上“方言禁令”将被辞退。江苏教育厅规定公务员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三级甲等,上班时间讲方言,将被扣“监测指标分”。

可见,政策的导向与现实生活的需要,决定了普通话同方言的走势。而且随着青少年的成长,到21世纪的中叶,可以实现普通话在城乡的全面普及。

普通话全面普及了,有不少方言词不用了,消失了。这引起了不少人的纠结和焦虑。那么方言会不会消失呢?答案是否定的。

方言中的乡音,一旦形成,一辈子都不会改变。前文引用的贺知章的“乡音未改”就是明证。贺是浙江萧山人,武则天时官至太子宾客、秘书监,在京城长安多年,“少小离家”,回乡时已年逾八十,但仍乡音不改。英人马凌诺斯基在其名著《文化论》^[4]中说:“说话分明的音节,是从小由不分明的口音中养成的。这不分明的口音,是婴孩对付他的环境时的天赋。”《红楼梦》20回中,史湘云把“二哥哥”说成“爱哥哥”,这也是由幼小时形成的。我国有七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又人口众多,各地口音南腔北调。历史上形成的“南蛮鸩舌”“吴依软语”以及现在“嗲腔嗲调”的台湾味就是这样。湖北人把“鞋”说成“孩”,湖南人把“没有”说成“冒”,上海人把“谢谢”说成“下下”,广东人把“吃饭”说成“食饭”,这都增添了语言的情趣。

数年前,上海、浙江等地,在部分小学、幼儿园开设了方言课程,2015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员刘震在

鹿鸣书店做了关于“印度学”的学术讲座,主讲人的特别之处是全用上海方言开讲;2016年4月,全国首档大型方言综艺秀开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一句顶一万句》(话剧版)是用河南话写成的著作;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用上海话写成。这些保护方言的举措可以理解,但给幼儿少年开设方言课大可不必。学术讲座用地方方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传播;方言之于文学,并非越原生态越好。老舍先生曾说:“假若油条比‘油炸鬼’更普遍一些,我就用‘油条’。”词汇是一种不断新陈代谢的开放系统,可见,一些方言词的消失是词汇发展中正常的事。打开《辞源》,不少的古语词我们不用了,但传承下来的古语词有无法代替的功用。《现代汉语词典》中不仅收录了许多古词语,同样也收录了不少方言词。因此,我们说,方言词是有“户口”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流浪儿”。

方言词还是普通话的“源”,只是“橘逾淮而北为枳”。谭汝为曾把方言词中一些词命名为“方源词”,这是语言学专家们的共识。

某些方言词还有逐步扩张的趋势。如河南话“中”,河南方言属于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其中“中”是标杆式的词语。“中”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第9个义项是“(方)成、行、好”的意思。《史记·秦始皇纪》:“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之尽去之。”这里的“不中”是不符合要求的意思。元曲《还牢末》一折(哪吒令):“他虽不中,你也不是个善的。”这里的“不中”是道德品质的劣行。《水浒传》17回:“我不中,也是你一个亲兄弟,你便奢遮杀,到底是我亲哥哥。”这里的不中是指势力能力不够。以上我国古代的用例都是打了一个擦边球,都是否定式,直到民国时期有一首打油诗才用了肯定式。这样,“中”的现代意义上的词义才初步形成:

你说不中我说中,
咱俩不是亲兄弟。
我披布衫你穿袄,
我过夏来你过冬。

当下“中”的“行、成、好”的词义,已被河南亿万人使用,而且还有扩大到周围省份的趋势。

豫东南、鲁西南的方言词“怼”(dui)早在《诗经》《左传》中已经出现。现代字典中释义为“怨恨”,而方言的意义与此无关。2017年“怼”入选《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语,其意非常丰富,如:“你怼他一顿”“咱俩怼一瓶”,其词义的泛化,普通话中无词代替。

方言词与普通话相比,某些词语比普通话更加

生动形象。如云南方言言其一个人高,不用“很、十分、非常”,而说“高摇摇”,给人一种高得像塔一样的印象,说“高闪闪”,又给人一种瘦高、细长的感觉。上海话里的“捱(ya)”^[5]也比普通话里的“等”含义丰富。

中华文化的观念是“和而不同”。现代是多元化的社会,语言品种的多元化,可以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品种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撞击可以产生色彩斑斓的火花。普通话、古词语、方言词、外来词、字母词、网络词以及肢体语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的综合存在可以共同构建一个滚动的五色大家庭。

从大处看,世界上较大的语言有85种,使用人口1000万以上的有17种,联合国用的有6种。比如英语就存在着英式英语、美式英语和澳洲英语三大派,这说明多数语种都存在着地方色彩。不少国家实行“双语制”,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印地语,但人们日常使用的却是古吉拉特语。欧洲中部的卢森堡更加特别:在幼儿园、小学,孩子们要学德语,进入中学要学英语。卢森堡这个国家,法律语言是法语,宗教礼仪用德语,报纸用德语出版,学术杂志用法语出版,而广播电视兼用这两种语言。饭店的菜单是法文,议会辩论除用法语外,还必须懂得卢森堡的土语方言。可见,一个人懂得多种的语言形式,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技巧。

另外,汉字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基因,汉字的超方言性,还可以使某些方言词语获得释解。

2008年,中国语言资料有声数据库录制项目已经启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还编有《汉语方言地图册》,这都给地方方言建立了安居的家园。因此,方言也像豫剧、黄梅戏、川剧、越剧、京剧等一样是需要传承的地方文化而长期存在。2019年2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保护与促进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岳麓宣言》在北京正式发布。留住乡音,铭记乡情,普通话姓“普”,方言姓“方”,二者是主与次的相互依赖。红花需要绿叶扶,“红莲相依浑如醉”,绿叶同样能陪衬出花的光彩。

参考文献:

- [1]陈效师.渐行渐远的北京话[N].文汇报,2012-07-15.
- [2]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 [3][日]波多野太郎.中国地方志所录方言汇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 [4][英]马凌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5]顾顺麟.上海话里的趣味动词[N].新民晚报,2018-03-0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Like Intoxicated Girls, Red Lotus Lean on Each Other

—Discussions on Mandarin and Chinese Dialects

MENG Zhaoquan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Institution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onfronted with the thorough popularization of mandarin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middle 21 century, many people are feeling nervous and upset currently due to the gradual neglect of dialects and the tremendous loss of dialectal vocabulary, and some people even want to start a vast protection for dialects as if they are protecting wild animals. Dialects are local culture. They hav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alistic demands and need careful inheritance. Vocabulary is a tolerant, changeable open system. Together with ancient vocabulary, alien vocabulary, letter vocabulary, and network vocabulary, dialectal vocabulary and mandarin form a “harmonious yet different” vocabulary family.

Key words: mandarin; dialect; interdependence

韩国手语研究概况

傅吉莲¹, 辛承姬^{2*}

(1. 拿撒勒大学 欧文斯教养学院 忠清南道, 天安 31172;

2. 梨花女子大学 外国语教育特殊学院, 首尔 03760)

摘要:从韩国最有公信力的国会图书馆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网站上,以“手语”“手话”为关键词搜出 639 篇韩国手语研究论文。将这些研究成果分析归纳出 10 个研究主题:手语语言学、手语习得与使用、教学法与学习效果研究、对学习者的研究、手语工程学、手语语言法(令)、手语翻译、教师教育、教材研究、田野调查,简述其内容,并提出今后韩国手语研究应走的方向与研究课题。

关键词:韩国;手语;手语语言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5

中图分类号:H026.3;R7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80-07

一、引言

韩国手语,自 1909 年因着聋教育的创建,作为聋人交际沟通的主要工具而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发展起来,到 1920 年代末韩国手语的基础基本奠定^①。此后,于 1963 年,以首尔聋哑学校(首尔宣禧学校)的教师为中心,发行了关于手语的第一本文献《手语》,为韩国手语的研究与认知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直到 1980 年代,韩国的聋教育才受到全面交往法(Total Communication)的影响,在聋校的教育课程里开始提到手语教育^②。与此同时,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开始设立手语社团,全国各地也开办起手语教室,人们对手语的关注度逐渐增强起来。韩国手语的研究也顺着这样的潮流在 1980 年代正式开展。本文的目的,便是通过对过去 38 年来韩国所进行的有关手语研究的状况与动态的追踪,分析韩国手语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韩国手语研究的走向与研究课题。

为此,本文以 2018 年 1 月为基准,从韩国最有公信力的两所图书馆,即国会图书馆^③与国立中央

图书馆^④的网站上,以“手语”“手话”为关键词搜索有关手语的研究信息,对其进行了统计,以图书、硕博学位论文(以下称为学位论文)、学术期刊三类作为分析归纳的对象。自 1979 年石东一、李典相最早于学术期刊发表相关文章时起,到 2018 年 1 月止,共搜出 639 篇有关手语的研究成果,以此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为了了解截至目前韩国(2018 年 1 月)进行的手语研究之总体概况,本文采用以下两个步骤进行分析。第一步是将研究对象即 639 篇图书、学位论文与学术期刊,按发行的年度分类,算出各年度发行的频率和百分率,分析出数量的分布,如表 1。第二步是将研究对象即 639 篇图书、学位论文与学术期刊,按各类别分析其研究内容,将各类别的研究内容按其主题再细分,算出各类别研究主题的频率与百分率,分析出其热点的分布,如表 2。最后将分析所得出的最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再按研究主题加以分析,以期整体把握韩国手语研究的课题及未来走向。

收稿日期:2018-10-18

作者简介:傅吉莲(1967—),女,韩国全北群山人,硕士,拿撒勒大学欧文斯(Owens)教养学院汉语口语专业助教授,主要从事韩汉语教学研究。

通信作者:辛承姬(1968—),女,韩国首尔人,博士,梨花女子大学外国语教育特殊大学院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助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与韩汉语教学研究。

二、按年度分析的研究状况

本文研究的对象按各类别所发行的年度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1。

表 1 手语研究成果发行年度分布状况

年度	图书数量	学位论文数量	学术期刊数量	年度小计	百分率(%)
2017	3	9	19	31	4.9
2016	10	7	26	43	6.73
2015	8	12	28	48	7.51
2014	9	5	12	26	4.07
2013	8	8	23	39	6.1
2012	8	5	18	31	4.85
2011	2	10	15	27	4.23
2010	13	8	22	43	6.72
2009	10	13	22	45	7.04
2008	6	12	16	34	5.32
2007	7	9	16	32	5
2006	2	7	12	21	3.28
2005	3	13	12	28	4.38
2004	9	12	11	32	5
2003	3	13	12	28	4.38
2002	2	8	19	29	4.53
2001	1	1	9	11	1.72
2000	0	6	7	13	2.03
1999	1	5	7	13	2.03
1998	1	4	3	8	1.25
1997	1	4	6	11	1.72
1996	0	4	6	10	1.57
1995	0	1	1	2	0.31
1994	0	3	4	7	1.09
1993	1	2	1	4	0.63
1992	1	1	1	3	0.47
1991	0	0	2	2	0.31
1990	1	2	0	3	0.47
1989	0	0	2	2	0.31
1988	0	1	1	2	0.31
1987	0	1	0	1	0.16
1986	0	0	1	1	0.16
1985	0	1	2	3	0.47
1984	0	0	1	1	0.16
1983	1	1	1	3	0.47
1982	0	0	1	1	0.16
1979	0	0	1	1	0.16
总计	111	188	340	639	100

从表 1 可以看出全部研究成果中,84.04%是在 2002 年以后发行的。以 2002 年为基准,图书、学位论文与学术期刊每年的研究成果皆大量增加,三者合计的数量每年都超过 20 篇以上,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而没有下降。2002 年以后有关手语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明显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所致。根据尹炳天(2005 年)的研究记载:韩国在 1980 年代后期,即手语研究的初期,手语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文献研究与实验研究为主,但自 2002 年以后,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所做的手语研究持续增

加。可见韩国在手语的研究上,研究者从 2002 年以后,采用了文献研究、实验研究、调查研究或将多种方法综合使用等更加多样的研究方法。这种尝试成为手语研究在数据上不断增多的主因。手语研究的成果在数量上于 2015 年达到了高峰,该年共有 48 篇研究成果,显示出最活跃的研究记录。

从研究成果类别来看,在整个研究成果中,图书类别占了 17.4%。有关手语的图书是从 1983 年开始出版的,2010 年是历年来图书出版最多的年份,共出版了 13 种图书。学位论文占了 29.4%,首篇博士论文是 1983 年完成的《韩国手语的心理语言学研究》(金承国),从首篇论文发表到 2000 年为止,论文的数量一直都非常稀少,但 2002 年以后,每年都维持着 5 篇以上的成果,也有达到 13 篇的记录,论文的研究有不断持续发展的趋势。学术期刊占了整个成果中的 53.2%。《使用手语的问题与改善方法》(石东一,李典相)这篇文章于 1979 年最早发表于学术期刊上,2001 年以来,每年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都没有超过 10 篇,直到 2002 年起,发表的数量明显地大幅增长了。

三、按研究主题的研究状况

(一)总体考察(按研究主题的研究状况)

本文将研究对象即 639 篇有关手语的研究成果,按其研究的主题进行分析与归纳,发现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手语语言学、手语习得与使用、教学法与学习效果研究、对学习者的研究、手语工程学、手语语言法(令)、手语翻译、教师教育、教材研究、田野调查等,无法归类的则列入其他项。由此可见研究者对韩国手语,进行了多课题,多角度的广泛积极的研究。被列为“其他”项目的研究成果^⑤,因为内容主要是将手语的形象应用在工艺、雕塑、设计等造型上,或有关聋哑人的职业康复等,无法归类于以上十个手语研究主题,故本文不做细致讨论。

2006 年 12 月 13 日,第 61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韩国则于 2008 年 12 月经过韩国国会批准后,于 2009 年 1 月 10 日该公约也在韩国正式生效。从此,手语在语言地位上,被确立为聋人的第一语言而备受关注。另外,此时不仅将手语语言(Signed Language)与有声语言视为同等,还将手语与其他非有声语言区分开来,以符合手语作为聋人群体独特的语言交际工具的时代潮流。韩国自 2007 年起,有关手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的研究类别雨后春笋般发表出来。在此以后所发

表的研究成果,占整个手语语言学研究成果中的 54.3%(共 70 篇),而关于手语语言学研究数量

又占了十个研究方面的 23%(共 147 篇),是在整个研究成果中所占比率最高的项目。

表 2 手语研究主题的数量与排名分布情况

研究主题	图书数量	百分率 (%)	学位论文数量	百分率 (%)	学术期刊数量	百分率 (%)	总数量	百分率 (%)	排名
1 手语语言学	28	25.2	39	20.7	80	23.5	147	23	1
2 手语习得与使用	0	0	12	6.4	16	4.7	28	4.4	8
3 教学法与学习效果研究	4	3.6	16	8.5	29	8.5	49	7.7	6
4 对学习者的研究	7	6.3	16	8.5	27	7.9	50	7.8	5
5 手语工程学	1	0.9	49	26.1	71	20.9	121	18.9	2
6 手语语法	4	3.6	1	0.5	12	3.5	17	2.7	9
7 手语翻译	6	5.4	29	15.5	39	11.5	74	11.6	3
8 教师教育	2	1.8	1	0.5	6	1.8	9	1.4	10
9 教材研究	52	46.9	4	2.1	5	1.5	61	9.5	4
10 田野调查	2	1.8	9	4.8	26	7.7	37	5.8	7
其他	5	4.5	12	6.4	29	8.5	46	7.2	
合计	111	100	188	100	340	100	639	100	

在手语语言学之后,排名第二的是手语工程学,占 18.9%(121 篇),研究成果所占的比例较高。相关的研究首次在 1994 年发表^⑥后,有关手语工程学的学会杂志与研究杂志增为六种^⑦,对手语工程学的重视不断地提高,其比重也越来越大。虽然有关手语工程学的图书,除了 2004 年由信息通信部出版的《韩字手语自动动画系统》一本外,到目前还没有第二本,但有关手语工程学的学位论文则从 1994 年以后,每年至少发表 2 篇以上,也曾出现过一年发表 13 篇的记录,可见这个课题备受重视。

将手语工程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再细分的话,又可分为以下五个小主题。

1. 手语影像系统的研究:截至目前所进行的研究有应用手语动画、上半身 3 维模型,3D 手势动画、3D 图像,三维动画卡通形象,3D 阿凡达(虚拟化身)等对手语影像系统的构筑方案,另外也有对应用三维形象模型的手语合成视频等的研究。

2. 建立手语实时识别系统的研究:为了手语实时识别系统的建立,研究者们应用各种方法进行了研究,如可变绘图模板、多重标志追踪技术、利用隐藏标记模型与矩不变量、彩色手跟踪器、动作捕捉(motion capture)、利用电脑摄像机里提取的形象、利用条件随机场(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Kinect 动作识别、深度相机与 SVM、植入条件随机场和 BoostMap 的手指与非手指信号、序贯 RAM 的累积神经网络(Sequential Ram-based Cumulative Neural Networks)、色彩信息与模糊聚类算法(Fuzzy Clustering Algorithm)或者 ART2 算法、卡尔曼滤波(Kal-

man filter),动态视频以及关键帧提取(key frame extraction),提取特征量的硬件设计,立体摄像机等,这些都是手语工程学研究常用的方法,也是备受关注的基础研究。除此之外,也有为识别手语而辨认手形与控制假象环境的研究,以及研发移动通信手语辨识系统等各种相关研究。

3. 为了手语教育系统的配备与系统化而进行的研究:有制作手语教育用的 CD-ROM title 可以应用在手语教育系统的视频和三维模型等。甚至手语教育系统化的研究,已进入以语音识别为基础的 3D 手语教育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程序设计与实现的阶段。

4. 有关手语翻译系统设计及实现的研究在进行中,同时进行研发的还有虚拟手语翻译师。

5. 构建多国语言间的手语通信系统的研究:用句子形式转换的方法来构建韩、中、日三国间的手语通信系统,或利用三维模式在网上建立韩、日两国间手语通信系统的研究等。

综上所述,韩国的手语工程学,研究活跃,主题多样。这些研究乃是在许多无法差派手语翻译师的偏远地区或特殊环境下,让聋人能够及时得到手语翻译的服务为主旨而进行的。手语工程学的研究不只是在数量上,在质量方面的研究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种水平可说是与韩国先进的 IT 技术接轨而获得的成果。

排在手语工程学研究之后的是手语翻译、与手语相关的教材的研究占比分别是 11.6%(74 篇)、9.5%(61 篇)。有关手语翻译的研究,多以学位论

文或学术期刊的方式发表,以图书出版的比较少。而与手语相关的教材研究却以图书出版的居多而以学位论文或学术期刊发表的较少。有关手语翻译的书籍,多是以手语翻译学概论或构建手语翻译网络的开发为主的研究,占整个手语翻译研究成果中的6.5%(共4本),所占的比例很低。与手语翻译相关的研究成果多以学位论文或学术期刊发表的形式呈现,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手语翻译师的角色,工作执行的能力,活动情况或培育手语翻译师的教育课程与工作模式的开发,以及激活手语翻译中心等。这些研究,主要是为了实践韩国的《残疾人福利法》,《禁止歧视残疾人与权利救济等的相关法律》,以及《韩国手语语言法(令)》(第16条)等的法律规条中,所要求提供聋人手语翻译的规定,而取得的成果。笔者认为此种原因促进了有关手语翻译的丰硕研究成果。

有关手语教材研究的图书占总研究数量(61部)的85.2%(52部)。纵观所有有关手语教材研究的成果,各种具有针对性的手语教材出版了不少,如驾驶手语,产业现场职务,home sign(家庭手语)等,也出版了有关“在线学习系统”为基础的教材^⑧。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信息通信术语的手语词典以及外语手语词典^⑨等。

除了以上排名前四的手语语言学、手语工程学、手语翻译与有关手语教材的研究外,其余的研究主题所占的比率很低,都不超过8%。其中有关手语语言法(令)的研究仅占2.7%,这是因为研究者集中精力于研究有关手语语言法的修订,直到2016年2月3日《韩国手语语言法》^⑩正式制定后,与其相关的研究便明显减少了。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可以影响教育成败的关键——“教师”的研究,却只占1.4%(九篇),成为整个手语研究主题中所占比率最低的项目。虽然已有对提升担任聋生的教师之教学手语水平的研究、韩国手语教员资格证的研究以及对聋文化的教师认知之研究等,但仍属相当不足的状况。为了给聋人建立一个系统的教育环境,不仅应多注重培育聋人教师与能使用韩国手语的听人教师,也应多关注为聋人提供全面教育的优秀师资的培育上,目前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与研究十分迫切。

从以上分析与归纳韩国手语研究主题的数据与排名得知,韩国的手语研究,在研究主题方面呈现比较多样化的现象,但遗憾的是相同主题的研究呈现过于集中的现象,即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少数几项主

题上。笔者期待今后在保持研究主题多样的同时,各个研究主题都能得到充分研究并在数量上保持基本均衡的状态。

(二)对重点研究主题的分析(手语语言学)

在十个主要的研究主题中,最受瞩目的研究主题是手语语言学,下文便以其为中心,深入研究,又可归纳出八个分支主题。以下便作简要陈述并总结各主题的特征。

韩国在2016年2月国会制定了《韩国手语语言法》,8月正式实施,宣布韩国手语与韩国语具有同等的地位,声明手语是聋人的语言,制定此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为奠定发展与保存韩国手语的基础,提高聋人与使用手语者的语言权与生活品质。即韩国政府已同欧美先进国家一样承认手语是一种语言。由此法案的通过不难看出韩国的手语研究者对手语语言学的重视,以及付出的辛劳。在本文所搜到的研究主题中占比例最高的是手语语言学,其文献内容大致又可分为八类:手语语音学、手语形态学、手语语法学、手语语用学、手语整体研究、国外手语研究、手语对比研究、标准手语规范,无法归类的则列入其他项。见表3。

表3 手语语言学研究成果的现状

研究主题	图书数量	百分比(%)	学位论文数量	百分比(%)	学术期刊数量	百分比(%)	总计	百分比(%)
手语语音学	1	3.6	1	2.6	11	13.8	13	8.8
手语形态学	3	10.7	8	20.5	14	17.5	25	17
手语语法学	1	3.6	16	41	26	32.5	43	29.3
手语语用学	0	0	0	0	1	1.3	1	0.7
手语整体研究	8	28.6	5	12.8	11	13.6	24	16.3
国外手语研究	0	0	0	0	6	7.5	6	4.1
手语对比研究	0	0	5	12.8	4	5	9	6.1
标准手语规范	13	46.4	1	2.6	5	6.3	19	12.9
其他	2	7.1	3	7.7	2	2.5	7	4.8
小计	28	100	39	100	80	100	147	100

1. 手语语音学研究:以学术期刊研究为主,对韩国手语的手向、手动、手形、手位的分析与手语音韵构造的研究。

2. 手语形态论研究:此项研究以非手动标志居多,韩国手语的语源分析与研究,韩国手语的记号学研究,几个地区间的手语词汇特性调查研究,手语词汇使用频率调查,手语惯用词汇的研究,韩国复合手语的造词特性,以及关于学校教材的手语形态论分析等。

3. 手语语法学研究:在手语语言学的研究中语法学占了29.3%,是所占比例最高的,最早的学位论文是1985年出版的《使用手语的聋童与使用口语的聋童所用的句子特征比较研究》,目前共有16

篇,有韩国手语否定句语法的研究,韩国手语人称代词的体系研究,韩国手语语法学特征分析,韩国手语语法的空间研究,韩国手语表示强调的特征研究,聋生手语的语法结构与发展等。学术期刊研究内容有对聋人的阅读理解能力之特征研究,对手语句子时态的分析,对韩国语语文中的多义词的手语表达方法之田野调查,聋生语言的语法结构特征,手语分类词谓语句型研究等。图书类只有《根据韩国手语的韩语语法教育(2010年)》一本,此书是由韩国国立语文院所编的书,主旨是为了让聋生有效地学习韩语的语法,是通过3年的聋生学习实验、专家与施教老师研讨后所编出的教材。教材例句如下:



手语: 아들+ 교사+ 되다+ 끝(儿子+老师+成了+结束)

语文: 아들이교사가되었다.(儿子当了老师。)

把手语里通常不使用的语法成分以及与手语语法不同的内容先加以说明后,将手语与韩语句子并列,让聋生用自己的语言(手语)学习韩国语。

在此也略略地介绍一下 Kim Manyeong(김만영)(2009年)^①所整理的韩国手语语法的六个特性:

(1) 韩国手语利用空间来表达主动句: 韩国语是在动词后面加词缀(이,히,리,기)来表示主动、使动或被动,如‘먹다(吃) — 먹이다(喂)’ ‘잡다(抓) — 잡히다(被抓)’,但在韩国手语里没有担任这种作用的词素,代之以用空间来显示施事与受事的对象,大部分句子以主语直接施事的主动句的形式为主。

(2) 非手动标志可显示韩国手语的句型类型: 韩国语是使用语尾词来造陈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等,而韩国手语则利用非手动标志来造出这些句子。如:[가다(去)],先打[去]的手势,同时将眉毛往上扬并将颈项往前伸,就成为疑问句“가니?(去吗?)”。

(3) 角色转换(role shift): 当出现好几个主语时,韩国手语利用‘角色的转换’来显示主语是谁。如)将身体稍微往左转,就成为主语1,稍微往右转,则成为主语2,以在哪个方向打的动词来决定该动词的主语是谁。

(4) 语序有限制: 韩国语是属于黏着语,因此要

通过助词来决定句子的成分,所以语序是比较自由的,而韩国手语在非屈折动词所组成的句子里,语序是非常重要的,即指在没有非手动标志与语法标志的非屈折动词的句子里,在动词前面的是主语,在后面的则是宾语。

(5) 韩国手语的句子是按时间的顺序来陈述的,若有好几个主语时,尽量让与主语相关的谓语紧挨着。如: “어머니가담배를피우고있는아들에게화를냈다.(妈妈对正在抽烟的儿子发脾气)”韩国手语如下:

[儿子][抽烟](将身子稍往右转后)

[妈妈][看][生气](从右向左)

(6) 韩国语通过叙述句的语尾词的变化来表示时态,但韩国手语却没有这种语法词素。韩国手语借由与时间相关的词汇来表达时态,或以手势者的身体作为时间轴来表示过去—现在—未来,在身体的前侧表示现在,渐渐往前方则表示未来,越过肩膀则表示过去。离身体中心越远表示越远的未来或过去。另外,可以借着打[结束]的手语词汇来表示完成,用[中]的手语词汇来表示进行。例如: “밥을먹고갈게(吃完饭再去。)”手语是[饭][吃][结束][去], “빵을먹고있다(正在吃面包。)”手语是[面包][吃][中]。

4. 手语语用学研究: 从表3中可看出,韩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极少,只有一篇发表于2002年学术期刊的《在手语中出现的语用学要素》。

5. 手语整体研究: 图书类别是以“手语学概论”研究等整体性研究成果为主,而学位论文与学术期刊里的内容则以研究手语语言学的特征为主。

6. 国外手语研究: 仅以学术期刊为主,关于美国手语的研究有4篇,另外2篇是葡萄牙手语与对德国手语的语言学性考察。

7. 手语对比研究: 学位论文以韩一中手语比较居多,而学术期刊则以韩—美手语为主。

8. 标准手语规范研究: 韩国标准手语规范制定促进委员会与韩国聋哑人协会自2000年起在韩国政府(文化观光部)的大力支持下,收集、调查、研究、分析并整理韩国手语词汇,于2004年8月举办韩国标准手语规范与词典编纂听证会后,从2005年陆续向聋人社会推广韩国标准手语,到目前完成的有《聋人国际手语/英国聋人协会[著](促进委员会编著)》《用手语打的国歌·向国旗的盟誓·韩字儿歌》《法律手语》《交通手语》《医学手语》《信息通信手语》《佛教手语》《基督教手语》《天主教手语》《政治术语手语》《经济术语手语》,语言领域有《语文教

材用语的手语标准化研究》《构筑韩国手语专业术语与文化信息》，共 13 本书。学术期刊则以韩国手语标准规范化的研究与规范化方案内容为主。

四、结论

以上是对自 1979 年至 2018 年 1 月以来，在韩国发表的与手语相关的 639 篇研究作为分析对象所进行的量与热点方面的研究。通过本文的研究所得的结论与对往后研究课题的建议如下：

(一)有关韩国手语的研究，不论是图书、硕博学位论文、学术期刊，都于 2002 年起有了显著的增长趋势。在研究方法方面，1980 年代后期即手语研究初期仅是以文献研究与实验研究为主，2002 年起增加了调查研究、综合研究等方法，使研究方法出现了多样化现象。期待今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可以采用更多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定性分析法、教材分析法、现场研究法等来增进更多有意义的手语研究。

(二)目前韩国手语研究的特征是：主要以手语语言学、手语习得与使用、教学法与学习效果研究、学习者研究、手语工程学、手语语言法、手语翻译、教师教育、教材研究、田野调查等十个主题为主。研究内容集中在手语语言学(23%)，手语工程学(18.9%)，手语翻译(11.6%)，教材研究(9.5%)四个主题上，而其他主题所占比例皆未达 8%，出现相当不均的现象。笔者认为今后除了前四项研究主题外，也应多致力于手语习得，手语教学法，对学习者的研究，教师教育，学习策略，学习效果等的研究，同时应关注在手语实际使用的场景中，如何更具亲和力 and 实用价值的研究。特别应着重于确保培育优秀聋人教师的人才库培训项目的开发与系统化的研究，以及为聋生家长们建立提升手语水平的教育支持体系，并为其制作所需的教材。也应研究构筑韩国手语学习所需的教材制作体系。

(三)在本文所分析的 639 篇有关手语的研究成果中，以手语语言学为主题的文献最多，其研究主题又可分为八类：手语语音学、手语形态学、手语语法学、手语语用学、手语整体研究、国外手语研究、手语对比研究、标准手语规范，见表 3。由于韩国手语学家、聋人协会与关心聋人的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及所累积的韩国手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促使韩国政府于 2016 年 8 月正式实施《韩国手语语言法》，提升了韩国手语的语言地位，并提高了聋人与使用手语者的语言权与生活品质。

(四)韩国的手语工程学研究，不论是在“质”或

“量”方面都获得了比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五个研究主题：(1)构筑手语影像系统的研究；(2)为建立实时识别手语系统的研究；(3)为手语教育体系的整顿配备与构建系统化的研究；(4)为手语传译翻译系统的设计与体现的研究；(5)构建多种语言间的手语通讯系统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主题都相当受重视。

(五)关于手语翻译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手语翻译师的角色、工作的执行能力、活动实况、培育手语翻译师的教育课程、工作模式的开发以及激活手语翻译中心等。根据韩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手语翻译师不仅需要扮演聋人的咨询师、社会工作服务员，还要成为聋人的代言人，同时也要成为他们的朋友^②等，为确保持续培育出有效率、能承担多重角色并具有专业能力及执行力，且有牺牲奉献精神的卓越手语翻译师，应为他们建立进修渠道的系统体制。为达成此目的，则又必须要有相关研究来促成和相关政策来保障。而且，不仅要有为聋人争取福利与支援的研究，同时也要有为手语翻译师争取福利与支援的研究。另外，为保障聋生的学习权利，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即是提供教育翻译的手语翻译师。为能全面提供有关聋人教育的学习支援，迫切需要有关教育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与激活教育翻译服务系统的研究。

注释：

- ①Choi Sangbae, AhnSeongu. 韩国手语的理论[M]. 首尔：瑞贤出版社，2003：47-49。
- ②Choi Sangbae, AhnSeongu. 韩国手语的理论[M]. 首尔：瑞贤出版社，2003：50。
- ③国会图书馆的网址是 <http://www.nanet.go.kr/main.do>，本研究资料是以 2018 年 1 月为基准而搜查的结果，因此实际上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到 2017 年 12 月为止所出版的书籍、论文与刊物。
- ④国立中央图书馆网址是 <http://www.nl.go.kr/nl/index.jsp>
- ⑤被列为其他项目的研究成果数量是：图书 5 本，学位论文 12 篇，学术论文 29 篇，共 46 篇。
- ⑥姜爱子. 利用多媒体的手语房 CAI 系统的设计与体现[J]. 教育论丛，1994(9)；ShinSuyeong. 构建利用多媒体的手语影像系统方案的研究[D]. 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育研究生院，1994。
- ⑦尹炳天. 国内手语研究的动向分析[J]. 特殊教育杂志：理论与实践，2005(1)。
- ⑧2011 年《使用智能手机(QR 码)学习手语：半导体职业手语视频》(Kim Hyeoksu, Oh Juseong 共著，由韩国残疾人雇

佣公团全罗南道职业水平开发院)出版。

- ⑨目前仅有韩语-美国手语词典,韩语-西班牙语手语词典,日本手语词典等成果局限于少数的外语词典。
- ⑩《韩国手语语言法》在2016年8月4日正式实施,具体的法令可参考韩国国家法令信息中心(<http://www.law.go.kr/lsEffInfo.do?lsiSeq=180821#>)的网站。
- ⑪Won Seongok. 手语[M]. 首尔:Communication Books,2013:109-112。
- ⑫李竣宇,南基贤.韩国手语学概论[M].坡州:你我出版社,2014:316。

参考文献:

- [1]石东一,李典相.关于使用手语的问题与改善方案[D].釜山:釜山市教育研究院,1979。
- [2]姜爱子.使用多媒体的手语房CAI系统设计与体现[J].教育论丛,1994。
- [3]Shin Suyeong.关于构筑使用多媒体的手语影像系统方案的研究[D].首尔:梨花女子大学教育研究生院,1994。
- [4]金承国.韩国手语的心理语言学的研究[D].首尔:成均馆大学研究生院,1983。
- [5]信息通信部.韩字手语自动动画系统[M].首尔:基督教大韩卫理公会首尔聋哑教会出版社,2004。
- [6]尹炳天.国内手语研究的动态分析[J].特殊教育期刊:理论与实践号,2005(1)。
- [7]ChoiSangbae,Kim Seonhong,HeoNojung,Kim Eunha.担任聋生教育的教师教育用手语水平认证制的实行[J].现场特殊教育,2016,23。
- [8]李竣宇,南基贤.韩国手语学概论[M].坡州:你我出版社,2014。

- [9]ChoiSangbae.担任聋生教育的教师教育用手语水平认证方案研究[J].国立特殊教育学院学报,2015。
- [10]ChoiSangbae,AhnSeongu.韩国手语理论[M].首尔:瑞贤出版社,2003。
- [11]文化体育观光部.关于韩国手语水平鉴定考试与韩国手语教师资格制度研究[R].世宗:文化体育观光部,2015。
- [12]Park Chanyeong.关于聋文化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特殊班级教师与普通班级教师的认知比较[D].大邱:大邱大学研究生院,2013。
- [13]Choi Seonggyu.对聋校教师的聋文化纵向态度比较[J].特殊教育期刊:理论与实践,2005(1)。
- [14]Yang Huideok.利用植入Conditional Random Field和BoostMap的手指与非手指信号来辨识手语[J].信息科学论文杂志:软件与应用,2014(1)。
- [15]Yoon Jiwon.关于聋校小学教师的语言教育方法之选择与效率的情节研究[J].(The)Korean society of education for hearing-language impairments,2015(1)。
- [16]Choi Sangbae.聋校高中部教师的手语水平的正确度、表达特性以及对问题解答的分析[J].(The)Journal of special children education,2011(1)。
- [17]Kim Hyeoksu,Oh Juseong.使用智能手机(QR码)学习手语:半导体职业手语视频[M].全罗南道:韩国残疾人雇佣公团全罗南道职业水平开发院,2011。
- [18]Won Seongok.手语[M].首尔:Communication Books,2013。

(责任编辑 许峻)

A General Situation of Korea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FU Jilian¹, XIN Chengji^{2*}

(1. Owens College, Nazarene University, Cheonan, Chungcheongnam-do 31172, Korea;

2. Foreign Language Special Education College, EwhaWomans University, Seoul 03760, Korea)

Abstract: This paper searches for 639 Korea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articles on the websites of two most credible libraries in South Korea,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sums up 10 research topics: Sign Language Linguistics, S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se,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Studying Learners, Sign Language Engineering, Sign Language Law (Order), 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Teacher Education, Textbook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A brief account of its content is given, and the direction and research topics for future Korea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are proposed.

Key words: South Korea; sign language; sign language linguistics

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实证研究

周春辉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探索建立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及测试方法,并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以期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及培养结果评价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学生综合能力;测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6

中图分类号:G64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87-05

一、概述

2019年2月,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范海林在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情况介绍时指出: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48.1%,中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规模的迅速扩大使高等教育同质化倾向严重、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存在脱节的现象,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而生产服务一线对应用型人才长期处于急需状态的两难境地。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培养方式的区别性。综观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其应用型高校的产生、发展及大众化进程,均与其社会需求的变化紧密相关。1900年,美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4.2%。^[1]进入20世纪,美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新的科学技术被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新的技术岗位只有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能力的人才能胜任。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美国的社区学院和州立学院迅速发展起来,20世纪40年代其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超过30%,到1973年达到50%。根据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高等教育顺利地由精英化迈入普及化。新增的社区学院和州立大学承担了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任务。^[2]二战后,德国经济从复兴时期的粗放阶段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增长阶段,与此同时,科技也迈进了大发展阶段,工艺进步、产品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带来了工业结构的改变。经济结构的转型,对劳动力的技术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一时期,德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呈现爆发式的扩张,迅速进入大众化阶段。据统计,1959年联邦德国高等学校在读人数是1950年的173.6%。^[3]为了适应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人才需求,德国在60年代末出现了应用技术大学,致力于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经过近40多年的发展,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成为工程师的摇篮和技术创新的源泉。^[4]

我国现代大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欧美现代高等教育相比,具有明显的后发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和辉煌。1978年,全国

收稿日期:2019-05-10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资助项目“应用型本科学校学生结合能力测试探索”(2017SJGLX134)

作者简介:周春辉(1962—),男,河南温县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与党建工作研究。

普通高等院校 598 所,全国高校招生数为 40 万,毛入学率仅 2.7%。1999 年 1 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提出的行动目标是:“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到 2010 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 15%。”2002 年普通高等院校毛入学率已达到 15%,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5]我国应用型高校的产生同欧美等国家一样,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高等教育大众化及产业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应用型本科的概念是 1998 年龚振伟在《应用型本科应重视创造性的培养》一文中首次提出的。^[6]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拓宽人才成长道路,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并明确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7]2013 年 6 月,在教育部推动下,国内 35 所地方高校成立了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标志着我国开始大力推动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和发展。^[8]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9]2014 年 4 月,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在驻马店市联合举办了“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围绕转型发展和应用型技术大学建设展开讨论,形成了“驻马店共识”,一批地方高校积极响应,表示向应用型技术型高校转型。^[9]2015 年 10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应用型本科高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高校具有平等的地位。^[10]《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发展目标。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方案明确提出引导高校从治理结构、专业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师资结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11]

二、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的特点

潘懋元先生提出:人才类型主要有两种:学术型(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学术型人才是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的,而应用型人才是运用客观规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是在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

下,将抽象的理论符号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品构型,将知识应用于实践。^[12]学术型人才的培养注重“厚基础、宽口径”,强调学生有厚实的理论基础、宽阔的专业适应面、较好的学术修养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有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知行合一,以行为主。

美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初,为了适应社会需求,明确市场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高校派人员到政府部门、企业去了解情况,根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安排。为了迎合市场,过度强调专业技能培养,专业设置过细,知识面过窄,忽视了知识的系统性和广度,甚至废弃了通识教育,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下降,学生仅局限于选学自己的专业知识,缺乏跨专业交流能力,创新能力不足。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反思过度专业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弊端,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还应具备全面的知识素质、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定位是与传统综合大学具有同等的价值但属于另一类型的高等教育,是为了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具有良好的理论知识和文化基础,同时具备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德国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复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一是专业与专业的复合。要求学生的知识面宽而全,更多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而不是关注纯理论的原理。^{[4]15}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全盘移植苏联模式,1952 年 5 月,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院校计划调整(草案)》,多学科综合大学被拆分为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专业学院,综合大学只剩下文理两个学科。^[13]苏联模式对我国迅速建立现代化的大学体系无疑是有益的,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人才培养上一味强调专才,而忽略了人的培养。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模仿美国模式,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先后实施的重点学科建设、“985”、“211”等建设工程,重视学术型人才的培养,追求大学学术水平的提高。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7,9-11]引导部分普通高校转型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很多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仍带有强烈的学术型人才的痕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高校要“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并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培养学生培养综合能力。

三、应用型本科人才综合能力培养的实践

《辞海》中“综合”的定义是总合起来,“能力”是本领和才干。“综合能力”是基于人的综合素质在现实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正确处理某种活动的实际本领和水平。我国有学者认为,人的能力包括认识能力、操作能力和社会能力三部分。认识能力即智力,包括观察、记忆、思维等能力;操作能力即完成各种活动的的能力,如学习、运动、劳动等;社会能力即适应能力、管理能力等。美国心理学家塞斯顿(L. L. Thurstone)认为能力由七种构成:言语表达能力、理解力、数字计算能力、记忆能力、空间知觉能力、知觉速度、逻辑推理能力。德国的迪特·梅腾斯提出,应用型人才应该具备关键能力和专业能力。关键能力是普遍的,是跨专业的能力,包括人格特质、交往能力、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德国把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作为重点。具有关键能力之才应该就是梅贻琦先生所说的通才。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写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

学生的关键能力和专业能力的总合或梅贻琦先生所说的“通专并重”就是本文所指的综合能力,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是在原中州大学的基础上,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2015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本科院校,2016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我校的办学定位是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为郑州市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升本后,学校以“一二三四”工程为抓手,围绕“建设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支撑作用、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这一战略目标;促进学校由“专科学校向本科院校、综合型院校向应用型院校”两个转型;实现“教学质量、管理水平、创新创业”三个跃升,确保“师资队伍素质、教学科研水平、学生综合能力、学校发展活力”四个显著增强。

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一二三四”工程的根本目标是学生综合能力的显著增强。学校成立

了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学生综合能力显著增强推进会,坚持通专结合的育人理念,推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等,确保学生综合能力稳步提升。我们对学校2016级、2017级、2018级三届的本科学生培养进行了三年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我校是在专科基础上升格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原来专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由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集中实践四个模块组成,除集中实践环节外,其他三个模块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但由于是学年制管理,选修基本没有实行,导致学生的培养千人一面。2016级本科虽然仍是学年制的管理模式,选修课也赋予了学生,但是课程体系有了本质的改变。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由通识教育、学科教育、专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及集中实践五个模块组成。自2017级起,学校全面推行学分制教学管理,并增加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通识选修课占总学分的比例由原来的3%增加到4%。总的课程体系虽没有大的变化,但是通识教育选修课完全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给出指导意见,要求工科类学生必须选修2学分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经管及人文社科类的学生必须选2学分自然科学课程。2018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级人才培养方案严格对标,又突出特色。主要变化是增加了综合教育与创新创业实践模块,共5学分,占总学分比例约3%;学科选修课的比例由原来的2%增加到4%。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规定,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通常需要140—180学分。如果每年按36周计算,在四年内完成180学分,如16学时计1学分,每周平均完成20学时,每天平均4学时。这就意味着学生有大量的课外时间,第二课堂也就应运而生。2016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印发《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14]2018年6月,团中央和教育部又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15]

“第二课堂”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3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九思所撰写的《高等学校管理》一书中,是“指在教学计划之外,引导和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健康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16]2019年,我校出台了《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把第二课堂分为六个模块,分别是思想成长与道德素养,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社团工作与任职履历,技能特长与培训认证。

“思想成长与道德素养”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入党、入团情况;参加党校、团校培训和思想道德主题讲座等经历;参加“三会一课”、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等思想引领类活动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扶弱助残、支农支教、社区服务、公益环保、赛会服务等各类志愿公益活动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及其他实践实习活动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参加国内外交流访学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科技学术与创新创业”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各级各类学术科技、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实践的经历及获得的相关荣誉;在公开刊物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取得专利等情况。“文体艺术与身心发展”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与各级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各类文艺、体育活动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社团工作与任职履历”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在校内党团学(含学生社团)组织的工作任职履历;在校外的社会工作履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荣誉。“技能特长与培训认证”模块,主要记载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培训的经历,以及获得的相关认证和荣誉。

第二课堂共计5学分。学生在完成第一课堂学分外,必须完成至少5学分的第二课堂活动,且在六个模块中至少有四个模块不为零学分,方可毕业。2016年以来,我校开展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各类学生竞赛、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实施了本科导师制、创新创业双百万工程等支撑项目,确保第二课堂活动落到实处。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真正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目标,为塑造学生的个性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学生综合能力不断提升。

四、学生综合能力测试

在中国知网输入“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有6篇文献,分别是:景亚萍“地方财经类院校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与培养体系研究”,董红星“工科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与教学方式模型构建”,刘幸“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胡丹枫“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模型”,张静“经济管理类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模型”,宋伟才“IMO-TOPSIS法的大学生综合能力评价”。景亚萍确定了包括基本素质与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创新与实践能力三个方面的大学生综合能力结构体系,共22项指标,并运用德尔菲方法,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采用问卷调查的方

法,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评价。其他五篇文献也是构建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进行测评。在中国知网输入“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有516条结果,多是对构建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评。

虽然,从1999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后,各级各类学校都通过各种方法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相关评价办法的探索也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校对人才培养结果的评价与企业对人才需求的评价匹配度仍然存在差异。^[17]

199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国家机关录用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公务员时,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择优录取。公务员考试制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公平性和科学性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18]公务员考试笔试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通过测试一系列心理潜能,预测考生在行政职业领域内多种职位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和资料分析五部分。这种考试测验的是一个人在多年生活、学习和实践中通过积累而形成的能力,其性质是一种基本潜在能力的考试。我们利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测试方法,结合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应用到学生综合能力测试中,我们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综合能力测试成绩与学业成绩的正相关度并不高,2018年测试成绩排名前五的同学在班级的学业成绩排名平均在班级的36.8%。其中,2018年获得十佳大学生第一位的某同学综合能力测试第二名,该同学曾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热心公益活动、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等,曾获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三好学生,但该生的学业成绩在班级排名只在26.6%。2018年进入综合能力测试前10名的同学有两位是全校十佳大学生。由此可见,综合能力测试与学生的综合能力呈现一定的相关性。由于测试数据只有两年的,并不能得到肯定的结论,仍需要大量的数据检验,学生综合能力测试将是一项长期工作。

五、结论

麦克斯公司对我校2016级、2017级在校学生进行了学生成长第三方评价,结果显示:该校德育、基本能力与职业素养整体培养效果较好。该校2017—2018学年大一、大二学生德育、基本能力、职业素养提升明显(“提升较多”或“有所提升”)的比例(分别为93%、88%、93%)均高于同类院校(分别为88%、8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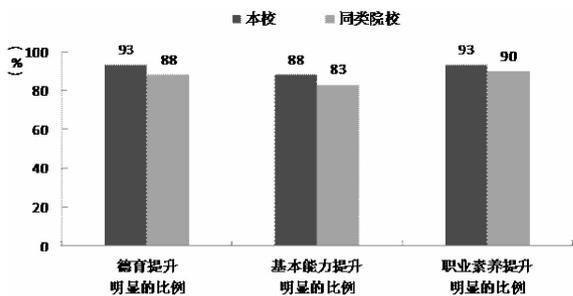


图2 本校学生德育、基本能力与职业素养增值情况

2016年以来,我们对应用型本科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进行了初步探索,基本思路是培养“通专结合”的“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并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综合能力的测试方法,以期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三方评价数据显示,在应用型人才的综合能力培养上,我们的培养方式是有一定成效的。

参考文献:

[1] 邓敏铭. 中美高等教育大众化比较研究[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2.

[2] 姚星星. 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预警功能研究: 兼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3] 赵子剑. 联邦德国高等学校类型结构变革研究(1945—1976)[D]. 保定: 河北大学, 2017.

[4] 冯理政.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办学特色的分析与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5] 赵俊芳.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六十年的历程与经验[J]. 中国高教研究, 2009(10): 3-10.

[6] 龚振伟. 应用型本科应重视创造性的培养[J]. 江南论坛, 1998(3): 41.

[7]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J]. 人民教育, 1999(7): 4-7.

[8] 王莹. 应用技术大学定位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EB/OL]. (2014-04-22) [2019-04-2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6/22/content_8901.htm.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EB/OL]. (2015-10-23) [2019-04-2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511/t20151113_218942.html.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19-02-13) [2019-04-2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12] 潘懋元, 石慧霞.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探源[J]. 江苏高教, 2009(1): 7-10.

[13] 李学丽. 中国大学模式移植研究: 历史的视角[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4.

[14] 中国共青团.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2018-11-14) [2019-04-26]. <http://www.gqt.org.cn/documents/zqlf/201611/P020161115391495551784.pdf>.

[15] 中国共青团.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在高校实施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EB/OL]. (2018-06-22) [2019-04-26]. <http://www.gqt.org.cn/documents/zqlf/201807/P020180704438215264881.pdf>.

[16] 曾剑雄. 第二课堂对培养大学生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8.

[17] 李华婷. 人才评价模式的校企差异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 2012.

[18] 刘玮. 我国公务员录用笔试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ZHOU Chunhui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pplication-bas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training and testing methods, and analyzes the test results, so as to build a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moral, physical, and artistic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evaluation of the training results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applied undergraduates; student comprehensive ability; test

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仲 岩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地方本科高校是我国本科教育的主要基地。加强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建设,是提高我国本科教育质量乃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梳理了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教学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并对教学基层组织的合理形式的选择与设置以及管理机制的完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组织形式;管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7

中图分类号:G6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92-06

地方本科高校是我国本科教育的主要基地,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教学基层组织是地方本科高校最基本的职能单位,承担着教学与科研重任,是地方本科高校实现基本职能的载体,因此,加强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建设,是提高我国本科教育质量乃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关键。不断深化教学基层组织改革与建设,提高其运行效率,始终是地方本科高校的职责使命。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尚不存在地方本科高校,大学教学基层组织的发展与变迁仅限于中央和部属高校层面,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发展与改革真正始于高校办学权力的下放。1956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对高校办学体制进行重新认识,认为中央高校办学集中统一过多,要求逐步将权力下放,以提高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到1958年,中央有关部门将其领导管理的本科高校下放地方政府领导管理,标志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的独立地位首次得以确立,^[2]由此拉开了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发展的序幕。我

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6至1960年,教学基层组织职能主要限于教学工作的时期。由于受苏联科研和教学相分离体制的影响,地方本科高校的教学基层组织是教研室,并且被定性为教学组织。这个时期教研室职能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进行教学,为国家与社会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第二个阶段是1961至1965年,教学基层组织科研职能得到重视与发展的时期。1961年中央颁布了《高教六十条》,鼓励高校从事科学研究。受其影响,地方本科高校的教研室逐步走上了理论与实践、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道路,^[3]科研职能在教研室得以发展。第三个阶段是1966至1976年,教学基层组织处于停滞不前的时期。十年“文革”,给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运行带来严重冲击,许多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职能无法正常开展,使得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建设遭到破坏,普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第四个阶段是1978至1998年,教学基层组织进行改革尝试的时期。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变中央政府对高校管得过多过死的情况,进而调动地方政府办学的积极性,中央公司于1985年和1986年先后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收稿日期:2019-03-10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形式及其管理的改革”(2018-JKGYB-0332)

作者简介:仲岩(1964—),男,辽宁大连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教学与研究工作。

决定》《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两个文件,加强了高校在招生、经费安排、办学等方面的自主权。随着高校管理权限的下放,一些地方本科高校对教学基层组织进行了改革探索,有些学校模仿美国组建学系,将学系作为教学基层组织。至此,基本上形成了“以学系和教研室为主”的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形式。第五个阶段是从1999年至今,教学基层组织创新探索的时期。自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行了扩招,地方本科高校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为了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我国一些地方本科高校着手对教学基层组织进行了改革与调整,纷纷打破以学系、教研室为主体的教学基层组织模式,不断对其他形式进行了探索与创新,建立了诸如教学部、学科组、课程组、教学团队、实验教学中心、实践教学中心、教授研究室等。^[4]

总之,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发展既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也受现实环境变化所迫。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现实力量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

二、当前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

(一) 组织设置脱离校情

从目前的教学基层组织建设情况来看,一些地方本科高校出现定位不够清晰,导致教学基层组织设置脱离了校情。突出表现在:一是盲目攀高。有的地方本科高校不顾学校实际情况,一味地向“高水平”看齐,教学型大学盲目地向教学研究型大学甚至研究型大学转型,教学研究型大学急于朝着研究型大学转型升级。^[5]在这一盲目攀高的指导思想下,学校的发展失去了自身的定位和使命,使得教学基层组织的建设也缺乏个性,丧失其应有的功能。二是机械模仿。有的地方本科高校在教学基层组织建设上没有尊重自身的组织特点和发展状态,而是机械模仿其他学校的建设情况,看见一些大学设立二级学院,就急于将几个具有相同或相似学科背景的系合并在一起,成立起一个二级学院,而教学基层组织仅仅是原有各系教学基层组织的简单拼凑,没有作相应的改革与调整;看见别的学校设立研究所,也跟着纷纷效仿,但建立的研究所往往仅有一块牌子,无对应实体,沦为所谓的空壳组织。^[6]总之,教学基层组织设置脱离校情,其结果是没有自身特色,不能反映学校的办学实际,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二) 主体功能弱化

教学基层组织自中世纪大学教师会发展而来,本质属性决定其应当是一个教学研究机构,^[7]其工

作的重心应在“教”与“研”上。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也不例外,其根本职责应在于不断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事实上,一些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却承担了大量的基层行政管理事务,如传达学校政策、迎接评估验收、考核评比业绩、计算工作量等零散、琐碎的工作,造成行政职能过于突出,这就分散了其集中开展教研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弱化了其教学研究、学科建设、实践与实训指导等基本职能。^[8]当前,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表现出这种行政化倾向明显、功能混乱的状况,严重偏离了其应有的“教研”核心和工作方向,淡化了“教学学术”功能,使其职能难以得到有效的发挥。

(三) 教学与科研相分离

高校要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人才,就必须要求教学基层组织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达到协调发展、相互促进,进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但是,当前一些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的教学与科研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发展,反而呈现出相互分离的态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现有评价制度存在偏差,导致重科研而轻教学。长期以来,在教师的职称评定与职位升迁中过分强调科研成果而忽视对教学情况进行考核,这种“科研至上”的政策导向往往诱导很多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名利双收”的科研工作上,而对教学探讨和改革的热情不高,使得教学基层组织的教学职能逐渐弱化。^[9]二是不能做到为教而研,导致科研与教学相脱节。当前,“为了名与利而科研”的思想在一些教师脑海中比较盛行,在这种功利性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许多教师产生短视行为,为了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科研多是东拼西凑,很少从教学的角度去感知和觉察问题而开展研究,其研究成果大多与专业教学无多大联系,从而导致科研游离于教学之外。

教学、科研相分离的结果是,教学是教学的东西,科研是科研的东西,二者难以真正融合,出现教学与科研“两张皮”现象,不利于教师的教学学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10]

(四)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

地方本科院校的主要职责是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教师掌握多种知识和专业技能,才能胜任教学工作。教学基层组织作为最基本的教师教学共同体,应该承担起对教师培养的职责,然而,现实中的教学基层组织却存在教师队伍建设滞后的现象。首先,缺乏交流合作,不利于教师的培养与提

高。^[11]传统的教学基层组织多是按照学科或者专业组建的,各基层教学组织之间往往壁垒森严,缺少交流,并且许多地方本科高校缺乏系统的教师培养机制,这些都使得教师很少与外界沟通,难以合作开展教学教研活动,^[12]从而阻碍了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其次,对青年教师的培养重视不够,限制了师资队伍的成长和发展。青年教师是师资队伍成长和发展的后续力量,应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大量引进人才,一些地方本科高校没有及时建立配套的青年教师培养计划和传、帮、带机制,致使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落实不到位,流于形式,不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建设。

(五)管理机制不健全

健全的管理机制是教学基层组织顺利开展工作的基本保障,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国一些地方本科高校却存在着管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一是存在责、权、利失衡的问题。许多地方本科高校在对教学基层组织的管理上只给“事权”,而不放人权、财权、物权,“管理重心下移”没有真正落实到位,导致对教学基层组织建设所需的人、财、物投入严重匮乏,^[9]使得保障教学基层组织正常运转所需的场地、办公条件和必要的软硬件设施不尽人意,严重阻碍了学科建设、教学研究、教师培养等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存在考核评价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当前,在我国地方本科高校教师评价中过于强化一些可量化指标,如在对教师工作的考核、职称晋升和岗位聘任上对科研工作都有明确的要求,而对教师的工作态度与教学水平则缺乏详细的考核标准。这种片面的考核评价制度诱导许多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上,而对教学工作不够重视,影响了教学基层组织教学职能的履行。三是存在约束和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一些教学基层组织只是对员工的工作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没有建立明确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与干坏一个样,成员的责任感、进取心及工作热情不高,使得教学基层组织长期处于一种比较松散、低效甚至无序的状态,功能和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三、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选择与设置的探讨

一般认为,地方本科院校多定位于教学型或者教学研究型大学^[13]。由于不同类型的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目标、办学层次、培养目标等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教学基层组织设置的形式必须与之匹配。本文从教学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的角

度,对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的设置加以探讨。

(一)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选择与设置的探讨

教学研究型大学是介入教学型和研究型大学之间的中间层次或过渡层次的大学,它具有以教学为主,兼顾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特点。本科教学是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工作重心,除此以外,还要为满足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承担一定的科学研究和服务工作。对于绝大多数教学研究型大学而言,结合广大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笔者建议建立“校——学院——系——课程群教学组”四级教学组织结构,以课程群教学组为教学基层组织。课程群的构建,要遵循有利于学科与专业发展的原则,对相关课程进行详细分析和选择,使课程与课程群形成紧密的联系。在课程群教学组人员配备上,要选拔教学水平高、学术造诣深的教授担任课程群负责人,团队成员要由职称结构合理、知识与能力互补、老中青搭配的教师组成,从而有利于教学与科研的开展。在教学人员流动上,要打破传统学科的束缚与限制,允许同一课程群内的教师可以参加相近课程群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以课程的逻辑联系为纽带来构建课程群教学组,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有利于整合教学资源,有利于教师形成团队与合作,有利于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高,对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然,对于学科与专业优势较为明显,教学、科研资源丰富,已具备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少数教学科研型大学,建议采取一般研究型大学的做法,在“校——学院”之下设立系与研究所,系为教学基层组织,主要承担教学任务。但系、所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交融的,系里的教师可以参加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也可以承担相应系里的教学工作。这种系、所相容共存的设置形式,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系覆盖专业领域广、利于不同学科知识融合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能够充分发挥研究所的科研优势,借助研究所的能力帮助解决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二)教学型大学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选择与设置的探讨

一般认为,教学型大学是规模相对较小,以教学为主,以培养本科生为主体的地方性大学。对于教学型大学教学基层组织合理形式的选择与建设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结论与建议。大部分学者认为教学型大学合适的教学基层组织形

式是教研室,这与教学型大学组织结构简单,功能相对单一,教研室完全能胜任其教学功能相适应的。因此,结合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以及笔者对教学型大学的认识,本文认为教学型大学的教学基层组织宜采用教研室形式。

教研室是我国大学里比较成熟的一种教学基层组织形式,虽然以教研室作为教学型大学的教学基层组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代表完全照搬传统的教研室体制,必须要对教研室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进行改革。首先,要明确教研室的功能与职责,要坚持教研室教学为本的原则,避免教研室行政化倾向严重现象,要让教研室重新回归到以教学与教研为主的职责范围上来。其次,要建立具体而细化的教研室规章制度,避免教研室制度的缺失,要提高教研室制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使规章制度成为规范和约束教研室工作人员的行为准则,以健全的制度促进教研室健康发展。再次,要将一批德才兼备的中青年教师充实到教研室的重要岗位上去,要量化教研室的工作考核指标体系,明确教研室主任和教研室成员的工作职责,将教研室成员的“权、责、利”有机统一起来。最后,要灵活设置教研室内部的组织模式,可根据需要设置零时性的、非正式的教学与科研组织,如建立教学组、教学团队、研究室、研究小组、研究中心等,在完成工作任务或达到预定目标后可以自行解散,然后再根据新的工作任务自愿组成新的组织。^[13]

另外,教研室不应故步自封,要保持开放性。可以采用进修学习、访问交流、挂职锻炼等方式吸引校外专家学者到教研室短期工作。通过加强教研室的开放性,促进教研室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以激发教研室的生机与活力。^[14]

四、完善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管理机制的探讨

制度是组织正常运转的保证。教学基层组织职能是否高效地履行关系着地方本科高校功能能否有效地发挥,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健全且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以确保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正常的运行。

(一)下移管理重心,赋予教学基层组织应有的权责利

大学是一种底部沉重的组织,基层是决定大学权力、资源、关系的端点,^[15]这种特点决定了大学管理重心应在基层。然而,当前地方本科高校普遍存在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学校上层,而基层权力虚构的“头重脚轻”的管理现状。因此,必须将与教学与科

研事务有关的权力都下放给教学基层组织。具体而言,在“权”上,就是给予教学基层组织充分的自主权力,拥有切实履行职责的权力保障。如组织和落实教学任务的权力,开展教研讨的权力,实施课程建设的权力,进行教学质量检查和监控的权力,对外交流的权力等。^[16]在“责”上,就是要求教学基层组织承担与地方本科高校相适应的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基本职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与教学基层组织职责相匹配的工作任务。^[17]在“利”上,就是在利益分配的政策制定上要向基层教学组织适当倾斜,切实改善教学基层组织的软硬件条件,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18]总之,通过下移管理重心给教学基层组织,为其配置合理的权责利,实现三者平衡,从而调动教学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和活力,使其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二)坚持教授治学,实现决策民主

教学基层组织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专业性,使其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机构,它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很难由其他层面的人员来替代,^[19]因而教学与科研事务应尽可能地交由教学基层组织成员去管理。实践证明,教授治学是实现高效的教学与科研管理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具体表现在:一是,利用教授在教学与科研上的带头作用,可以领导教学基层组织人员,形成团队,不断促进教学与科研水平的提高;^[16]二是,坚持教授治学,可以合理平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尽可能地避免行政力量对学术事务的过多干预,防止教学基层组织行政权力泛化现象的发生。^[20]总之,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与科研上的权威与引导作用,使教授成为教学与科研的主导力量,对于促进教学基层组织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教学基层组织应实行民主的决策管理,要让教学基层组织的成员充分参与教学与科研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之中,从而提高教学基层组织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具体来说,教学基层组织日常教学工作的分解、落实与实施都应由教学基层组织负责人组织教师讨论解决;拟定教学计划、安排教学内容、分配教学工作需要教学基层组织负责人组织教师商议确定;教学质量的评估标准与考核办法的制定与实施,应当广泛征求教学基层组织成员的意见;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等也需要征得广大教学基层组织成员的同意。在教学基层组织的教学与科研管理中,通过增加一线教师的话语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管理中去,实行广泛的民主决策,不仅可以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而且可以增强成员之间的团结协作,更加有利于管理。^[19]

(三)完善工作制度,强化约束机制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规章制度是实施管理的依据,是保障工作正常开展的基础,因此,建立完善的工作制度是教学基层组织的必然选择。首先,要制定与工作有关的规章制度,包括教学基层组织集体活动制度,教学研究制度,新课试讲制度,听课评课制度,导师制度等。^[21]其次,要明确工作制度规范的对象,应将所有的教学基层组织成员纳入规范管理之中,使合规人人有责。通过建立完善的工作制度,不仅能够明确教学基层组织成员的岗位职责,使分工明细、职责清晰,避免人浮于事的现象发生,而且能够起到督促教师积极参与教学基层组织的各项活动,形成工作习惯,使教学基层组织工作规范化。^[17]另外,还需要建立配套的工作检查与考核标准,强化约束机制,树立责任意识。在教学上,要严格教学纪律,禁止教师上课迟到、早退;要明确教学任务,不得随意调课、缺课;要建立学生评教体系,将评教结果与教师的切身利益挂钩,以评促教,不断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要建立教学事故问责制,视其严重程度,对出现教学事故的人员做出相应处罚,以规范教学行为。在科研上,要制定教师科研工作量的最低标准,建立细致的奖惩制度,量化科研工作的绩效考核,做到奖惩分明,有效调动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同时,对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检查与考核要实现手段多样化,要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对教学与科研尽量实行量化考核,对不能量化考核的,可以采取问卷调查、访谈等定性考核方式进行。^[22]在考核过程中,要结合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保考核结果公平公正。

(四)加强教师培养制度建设,提升师资队伍素质

教师是教学基层组织的核心,是承担学校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教学基层组织的建设,而且将最终决定学校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水平。为此,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教师培养制度建设,从而为不断提升教师队伍水平提供保障。一是建立“传帮带”制度,以加强对新进青年教师的培养。教学基层组织应建立对新进青年教师的导师制度,为每位新进青年教师配备一名经验丰富的业务指导教师,对新进青年教师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帮助他们尽快通过思想观、教学关和科研关,^[23]不断提高新进教师的业务水平。二是建立完善培训制度,提高

教师业务能力。学校二级学院应建立各项教师培训制度,如业务进修制度、校本教研培训制度、企业挂职锻炼制度、出国访问学习制度等。学院教学基层组织必须认真组织实施教师培训计划,通过对教师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培训,使教师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更新和补充,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师德师风管理制度,提升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发展和成长,所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素质修养,是学校的应有之责。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务必建章立制,以确保师德师风建设有章可循。首先,学校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师忌语》《教师禁令》等规章制度,要求教师认真遵守这些制度,严格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其次,学校还需要制定师德师风监管制度,加强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断提升制度的执行力,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各项工作落实到位,取得成效。

(五)改革分配制度,完善激励机制

当前,在一些地方本科高校教学基层组织中,仍然存在着部分人员工作作风涣散、责任心不强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究其根本原因,这与教学基层组织的分配制度不科学、“大锅饭”现象严重紧密相关。因此,改革分配制度,充分调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彻底改变“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与干坏一个样”的状况,已成为教学基层组织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建立按照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进行薪资分配的制度,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坚持优质优酬的原则,除了对教师完成的工作数量进行考核之外,还要加强对教师完成的工作质量进行考核,对于在工作上表现优秀的教师应提高其薪资水平,而对于没有达到基本要求的教师则相应减扣其薪资作为处罚。依靠建立收入有差别的薪酬分配制度,形成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调整教师的工作心态,切实调动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其次,要建立科学的奖励制度,充分发挥奖励的激励导向作用。教学基层组织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研比赛活动,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对于在精品课程建设上、课件制作比赛上、授课比赛上、学术研究上等有突出表现者,则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职务升迁上予以重点支持,除给予足够的精神奖励以外,还要给予足够的物质奖励,充分发挥奖励的杠杆作用,努力营造“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良好氛围,从而激发教师谋求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0]总之,通过加强分配制度的改革,让想干事、干成事的教师

劳有所得、功有所奖,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不断提高教学基层组织教师的工作热情。

参考文献:

[1]徐红梅.提升地方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EB/OL].(2019-03-10)http://www.doc88.com/p-748682437305.html,2018-09-20.

[2]叶芄.地方高校定位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

[3]肖化柱,尹红,易自力.新时期教学研究型大学“双室型”教学基层组织的研究[J].中国农业教育,2008(06).

[4]张晓玲,王大勇,王晶,高阿娜.基于校院两级管理体制视角下的地方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重组和资源配置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9(7).

[5]周巍蔚.重构教研室:教学型大学基层组织研究[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11.

[6]杨文兵.学院制建构下地方高校基层教学科研组织建设问题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10).

[7]徐毅鹏.质量观下大学教学基层组织的反思与重构:《大学运行模式》的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4(5).

[8]陆国栋,孙健,孟琛,等.高校最基本的教师教学共同体:基层教学组织[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1).

[9]熊岚.高校教研室功能的回归与重建[J].现代教育管理,2010(6).

[10]杨菊先,周琦,胡义伟.高等学校基层教学组织创新策略[J].教育与现代化,2010(3).

[11]黄兴帅.地方院校教学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J].池州学院学报,2008(6).

[12]季爱华.论高校基层教学组织教研室的建设[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13]李晚景.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教学基层组织设置的若干设想[J].咸宁学院学报,2010(2).

[14]王晓敏.高等学校教学基层组织问题探析[D].天津:天津工业大学,2003.

[15]阿蒙.基层组织形式改革:让“沉重底部”动起来[N].浙江海洋学院校报,2015-05-30(1).

[16]甘晖,杜生一.重点高校教学科研基层组织改革研究:以兰州大学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4(2).

[17]白彦满都拉,张立军,任洪宝,等.当前高校教研室发展现状调查研究[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4(3).

[18]王怀勇.高校教学基层组织建设的改革与实践[J].高教探索,2015(2).

[19]王粉,周琦.高校教研室存在的问题及管理对策[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8).

[20]易自力,卢向阳.谈教学与科研协调发展的基层学术组织建设[J].中国高等教育,2008(23).

[21]洪志忠.高校基层教研室的演化与重建[J].大学教育科学,2016(3).

[22]吴梦婷,张继河.地方本科高校教研室建设策略探析[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5(2).

[23]白夜昕,胡晓萍.高校教研室制度化建设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08(3).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Grass – roots Organizations in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ZHONG Y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bases fo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eve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grass – roots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organization. On this basis, the selection and setting of the rational form of grass – roots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al form; management

应用技术型院校发展的实践逻辑

周书焕

(河南工程学院 实验室管理中心,河南 郑州 451191)

摘要:应用技术型院校发展有其自身实践逻辑。教育理念对教育发展具有引导作用,在西方教育初始阶段,教育注重知识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欧美等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并逐步由初始阶段注重知识传播向注重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并重转向。正是在这种转向过程中,应用技术型院校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快速发展。应用技术型院校引领着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也具有现实紧迫性。

关键词:西方教育理念;高校办学定位;应用技术型院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098-04

从国外教育发展史来看,国外教育在初始阶段比较重视知识的传播,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教育指导思想开始由注重知识传播向注重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并重转向。

一、西方教育理念的演化

思想支配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康德曾说过:“真知灼见固然需要教育,教育亦要靠真知灼见。”^[1]纵观西方教育发展史,教育事业的发展无不是在教育理念引导下进行的。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2]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国家开办教育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能够明确高校的职能和教育的本质。从教育发展史上看,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人们对教育目的的回答也不相同,正是基于这些回答形成了教育思想的演化发展史。

在古希腊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视教育的教育家

和思想家。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公众教育事业。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教人怎样做人。在这里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和科学知识,而是人们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美德。他认为,既然人的美德来源于对理性的准确把握,那么通过对人进行道德教育,就能够培养出有美德即有知识的人。他把教育的目的看成是培养治国者。他的学生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不仅被人们称为一本政治学著作,更有人把它称为教育学著作。他认为,教育和培养是执政者应该注意的一件大事,离开了对人的教育,理想国就不可能建成。因此,他主张教育应当由国家来管理和控制,并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在这里,古希腊柏拉图虽然强调了教育的政治属性和功能,但他同样只是重视对统治阶层尤其是执政者的培养,把培养良好的执政者看成是教育的主要目的。基于此,此时的教育是针对统治者和统治阶层的教育,具有知识垄断的特征,广大下层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收稿日期:2019-04-20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2017SJGLX121)

作者简介:周书焕(1973—),女,河南泌阳人,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实验室管理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教育理论。

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成了基督教的天下,中世纪成了神性的时代。在这个时期,王权从属于教权,国王从属于教会。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基督教教育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而且统治了当时的文化和教育。基督教强调,教育是实现传播教义和争取信徒的重要途径,对人的教育过程就是使人摆脱世俗的过程,因此,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使人成为具有纯粹信仰的人。这样,神权教育成了这一阶段教育的主导,具体体现为在教育中主要进行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知识观、目的论教育,正是这种神学教育的存在维持了欧洲社会长达上千年的基督教神学黑暗统治。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不同于教会学校、以传授专业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世纪大学,这成了西方近代大学的直接起源。

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倡导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其核心是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君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束缚。作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积极倡导近代自然科学和科学教育。为了实现他的目的,他还起草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科大纲,几乎包括了科学知识以及技术各个方面,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对后来学校课程的科学化影响很大。

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欧洲主要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相继确立了自己国家的近代教育制度。在17至18世纪,英国对教育放了任政策,此时的英国教育以古老的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它们注重古典文化,表现出强烈的贵族色彩。19世纪以来,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知识教育的重要性,为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确保国民接受教育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开始干预教育。此时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新大学运动和大学推广运动上。1828年伦敦大学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新大学运动的开始。之所以称为新大学运动,是因为该学院不再实施宗教教育,转而重视自然科学教育。大学推广运动是最早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主要指全日制大学以校内或校外讲座的形式将教育推广到非全日制学生。以这两个运动为标志,高等教育开始向中产阶级子弟开放,高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19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快速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主要以私立为主,公、私并重;二是办学类型的多样化,这一时期不仅出现

了研究型大学,还出现了以服务工农业生产为方向的应用型学校。以美国新兴农工学院的发展为代表,高等教育开始了向应用型的转向。

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教育的实用性,试图通过教育的改革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发展。杜威是美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他立足于现代社会,提出了“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的观点。他认为,教育就是“人的经验的不断的继续改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要培养理想的人。在杜威看来,只要能培养出理想的人就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目的。理想的人必须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素质:一是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具有民主理想和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二是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三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有合作意识,能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四是具有一定的职业素养,通过从事某种职业发展个人才能并能为社会尽力。^{[3]376}杜威主义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的教育理论对20世纪的东西方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高了更多更高的现实要求。在此情况下,现代欧美国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思想流派,他们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理论或现实问题作出各自的阐述,从而形成了空前活跃的教育思潮。^{[3]501-530}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更加强调高校的社会责任,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答,突出学生知识转化能力的提高。正是在这些思潮的推动下,欧美国家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开始出现。

二、国外高校办学定位的发展

列宁曾指出:“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可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4]与教育思想的演化相适应,高校办学定位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中世纪大学是近代西方大学的直接渊源”^{[3]391}。在此之前的教育机构并不具有现代意义大学的诸要素。从管理方式上来看,中世纪的大学并非由政府控制,而是一种自治的团体,类似于商业领域的行会。由于当时正值教会主导社会,教会史学家把大学的兴起看成是教会的功劳。“从本质上

来说,中世纪大学是西欧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生,教会自身不具备创造大学的能力,甚至在最初,教会也并不存在发展这种教育的动机。”^{[3]86}

意大利是欧洲中世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最早的中世纪大学也首先在这里孕育形成。据考证,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全世界最早的大学,其始建于1088年,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故有“千年大学”^[5]之美誉。博洛尼亚大学是学生和老师自由联合而成,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教学。在随后近千年的历史中,博洛尼亚大学一直保持着独立进行教学和研究,不受任何政治和经济势力影响的传统,并逐渐被其他大学所接受,成为办学的宗旨。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大城市也兴起了办学之风。一些世界著名大学先后建立起来,如英国在1168年建立牛津大学,1209年建立了剑桥大学。德国1358年建立海德堡大学,1388年建成科隆大学。^{[3]87}

那时的大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大学的起源,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具有了现代大学的雏形,这里有老师、学生,既进行学术研究,又进行知识的传授;其二,具有现代大学标志性的学位制度,当时学生学院大学课程之后,经考试合格,就可授予“硕士”“博士”学位。在当时,这两种学位并不代表学术程度上的差距;其三,体现出了现实关怀,具有世俗性。当时的大学教育主要是职业训练,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带有职业培训色彩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方式为这个时期的世俗社会教育作出贡献。”^{[3]91}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大学定位主要集中在知识的传授上,职业训练与现代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定位也相去甚远。

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大学教育在不断强化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同时,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注重教育的实用性。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指出,近代以来社会生活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大学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他指出,大学是实施教育的机构,也是进行研究的机构。但“大学从来就没有局限于纯粹的理论学习”,如果单单从这一层次理解大学是不全面的,甚至是肤浅的,在他看来,教育绝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这么简单,“单就传授知识这个作用来说,自从15世纪印刷术普及以来,可以说大学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大学之所以存在,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是因为它能够将知识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使学生不仅能学到知识,更能学会如何运用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把教育定义为“教人们掌握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他认为,大学就是要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识,

这是一种很难传授的艺术。^{[6]112}

作为世界教育思想史上的巨人,杜威对社会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切。他主张教育不能脱离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主张烹调、缝纫、手工等科目在课程设置中要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主张。他积极支持职业教育,把职业技术看成是教育上的一种创新,认为职业教育知识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生活的需要。他主张把职业训练与文化修养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学会生存的技能。应该说,杜威主张发展职业教育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既适应了美国社会工业化对教育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为欧洲和美国战后应用技术院校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20世纪前期,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要,高校办学进一步分化,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19世纪后期,随着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显现。然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工商业发展急需大量新型应用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在此情况下,如何通过教育改革加速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更多更好地应用型人才就成了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不过,在这一时期,各国对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在中等教育中,许多国家都在中等教育阶段设立了专门的技术学校,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专门应用人才,而在高等教育阶段还没有进行过多的改革,高等院校还主要是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对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主要放在了职业技术教育中。

三、近代应用技术型院校的兴起

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后,国外教育由初始阶段注重知识传播向注重知识传播与能力培养并重转向,而且日渐明显。不过,这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主要不是在高校中进行的,更多的是在高中阶段或中等专业阶段,通过职业高中或职业中专的形式进行,较少将这种教育上升到大学教育,换言之,大学教育主要还是以知识的传播和研究为主,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性质。

美国教育非常注意教育的应用特性。为了适应美国经济发展需要,早在19世纪,美国就发展了高等工业教育。如1824年创立的伦塞综合技术学院,1865年建立的麻省理工学院。不过,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学校的定位还不能定位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应用技术型学校。因为,根据美国的教育指导思

想,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仍然把实用人才的培养重点放在中等教育学校中进行,强调“重点主要是中等教育的发展”。日本也非常重视实用人才的培养,但日本把大学定位在传播国家所需要的思想和知识的高水平人才,而把实用技术人员的培养放在职业教育和专科学校中。^{[3]406-414}二战中,世界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受到法西斯国家的沉重打击,经济和社会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还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西欧国家尤其如此。这样,如何通过教育发展培养出国家和社会快速发展所需要的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非常关心和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应用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瑞士、奥地利、荷兰和芬兰等欧洲国家陆续将职业性院校合并升格为应用型大学,形成与普通大学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二元格局。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欧洲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这几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均已经达到50%以上,其中英国已经达到了77.1%,德国达到了72.3%),这些国家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业结构的改变对人才培养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这些院校的职能定位来看,欧洲国家的应用技术大学不同于普通大学的知识生产与产品研发功能定位,是具有不同社会分工的社会组织,它是一种与普通大学并行、以专业教育为主导和面向工作生活的类型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肩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开展应用研发创新、服务就业和区域发展及促进终身学习等多重使命,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这些研究都是植根于专业实践领域的,立足于现实,受实践驱动,同时又高瞻远瞩,面向长期战略性的问题。”该类大学主要是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包含工程和技术等31个子分类,基本来源于实践,完全符合应用技术大学以实践为导向的办学定位。今天,尽管欧洲各国应用技术大学在高等教育中所占比例有所不同,但应用技术大学引领着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

四、中国发展应用型院校的必然性

习近平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不仅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1999年开始,随着我

国高校的扩招,我国地方高校开始了升格热潮。在升格过程中,一些学校脱离区域经济发展和自身实际,盲目向学术型研究型大学靠拢。这不仅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院校的合理布局,也严重制约着高校自身的发展。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指出,“教育是教人们掌握如何运用知识的艺术”。在他看来,单就传授知识这个作用来说,自从15世纪印刷术普及以来,可以说大学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如果说大学必须传授知识的话,那么它“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传授知识。^{[6]6,11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是一种被实践证明具有价值、且能够被人们所复制的经验。理论创新正是在这些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需要来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代是创新之母,实践是创新之源。离开了时代需要,离开了现实关怀,再精美的理论也是没有价值的。

在高校升格潮中,很多地方高校盲目向学术型研究型大学靠拢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定位不准确。“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是指一所高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及自身条件和所处的环境,从学校的办学传统与自身条件出发,在明确自身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方向。办学定位解决‘办怎样的高校’和‘怎样办好学校’的问题,对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统领和引导作用。”^[7]如果定位不准,就找不到发展的方向和提升的空间,最终会因为违背国家教育发展的整体战略而影响自身的长远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4年初,教育部开始“研究制订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启动实施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2015年10月21日,教育部等三部委又颁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具体目标,即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

从我国当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也具有现实紧迫性。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快速升级转型阶段,“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28.6%,我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全球占有率第一的产品数量最多,超过1760个”。这些数据说明,我国产业结构正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种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亟需大量高层次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技能人才。(下转第111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钱昌照¹, 张晓丹²

(1. 北方工业大学 组织部, 北京 100144; 2.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凤凰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00)

摘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创新性思想,为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工作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四个服务”问题;要深入研究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三个培养”问题。

关键词:习近平;思想政治工作;立德树人;“四个服务”;“三个培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19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102-04

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对当前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坚决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一)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人生如屋,理想信念如柱。理想信念指引人生方向,是人的“精神之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15}我们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有效引导学生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结合,将个人前途和民族、国家命运炽热相融。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通过主题教育活动与课程渗透以及校园文化陶冶等路径,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科学社会主义信念,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强化社会责任感,立志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争做有理想有信念的好学生。

(二)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

爱国主义情怀,是炎黄子孙心系祖国的纽带与基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也是新时代新征程的强劲动力。我们必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手段,着眼于“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2],尤其要注重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引领作用,引导学生从热爱国家的一草一木和壮丽河山做起,教育学生了解祖国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增进学生对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的认识 and 了解,让爱国主义情怀融入学生的血液之中,引导学生厚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家国情怀,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立志扎根于人民、奉献于国家,建功立业于新时代,从“小我”走向“大我”,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三)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

子曰:“有才无德,小人也;有德无才,君子也;

收稿日期:2019-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话语体系生成、转换与传播设计研究”(16JDSZ2017);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学业辅导工作创新研究与实践”(BJSZ2018ZD09)

作者简介:钱昌照(1977—),男,湖北黄梅人,博士,北方工业大学组织部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然德才兼具者，圣人也。”（《资治通鉴》卷第一）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人的品德修养是在社会生活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要引导学生加强自我修炼，内外兼修，激励学生向上向善、孝老爱亲，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一点一滴、踏踏实实涵养品德，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又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其“接地气”（与不同受教育者的年龄与心理特点相适应），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在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弘扬主旋律，发挥正能量，并养成良好的文明道德行为习惯，争做有大德有善心的好学生。

（四）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

知识就是力量，见识就是未来。正如中国近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美术教育家李苦禅所说：“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欲上进先求知。”在知识爆炸、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在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伟大时代，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见识，才能不会被社会与时代所淘汰。打铁必须自身硬，自身硬还须要打铁。知识见识是才与德的前提与基础，才与德是知识见识的升华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我们必须深化课程改革，坚持教学创新，真正把“水课”变成有难度、有深度、有挑战度的“金课”。我们要引导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珍惜学习时光，勤奋学习，质疑问难，刻苦钻研，增长见识，丰富学识。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更要加强研究学习课外知识，广泛涉猎交叉学科知识，“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不断求索创新，在实践创新中倾听和探寻学问之美。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在实践中成长，在创新中升华，争做有见识有本领的好学生。

（五）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3]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青少年学生成长的必然要求。有意义的人生因拼搏而出彩、因奋斗而生辉。人生的价值是在奋斗中实现的，只有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奋斗的青春，才无愧无悔。我们要教育引导学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之中，把高远志向熔铸在脚踏实地的前进征程之中，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践行“实

干兴邦”的精神，勇于开拓，攻坚克难，刚健有为，顽强拼搏，自强不息，争做有担当有作为的好学生。

（六）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

教育是一种心灵的唤醒，是一种人格的塑造，最终的价值取向就是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我们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还必须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健全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协同育人的联动机制，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格局，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充分激发教育事业生机与活力，以更丰富、更高质量的综合教育，着重培养可爱、可信、可贵、可为的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的高素质人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全面增强发展本领，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尤其要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其保持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自觉投身新时代改革创新的潮流，以昂扬的“赶考”气势，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争做有活力有魅力的好学生。

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深入分析新形势和新任务，牢记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和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转变立德树人的工作方法，切实做好新时代教育“转时态”“转心态”“转语态”和“转状态”的工作，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善于作为，找准立德树人的切入点与突破口，种好“责任田”。教育者要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努力工作来自觉传播知识、思想和真理，努力塑造灵魂、生命和新人，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教师。

二、坚持以“四为”为主要目标

（一）坚持“为人民服务”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把执政为民作为出发点，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4]。

思想政治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以人民利

益为重,以体现和维护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只有坚持这样的出发点,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民满意不满意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是我国教育的根本宗旨。大学生是高校教育的主体,高校的一切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学生培养为核心,能否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衡量一所高校教育教学效益的根本指标,这就要求高校除了要对学生进行专业的教育外,还必须加强对学生的信仰信念教育。

(二)坚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过程。高等教育在坚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必须坚持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必须为党治国理政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人才支撑。坚持不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奠定学生一生的思想基础,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强化于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三)坚持“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我们的大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正确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认识 and 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增强制度自信,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用青春激扬梦想,用奋斗书写人生,自觉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国梦,珍惜韶华,付诸实践,增长本领,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坚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们办社会主义大学,就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教育要坚持正确方向就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始终坚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大局和趋势。要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为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苦练本领,增长才干,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才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体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人梦想,以个人梦想的实现助力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三、坚持以“三个培养”为根本目的

(一)培养什么人

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是党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根本要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培养什么人论述的核心内容。不管是又红又专还是德才兼备抑或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终目的都是强调学校在教书育人、培养人才过程中必须注重政治过硬与业务精湛的统一,强调摆正红与专、德与才、政治与技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学校既要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远大理想信念,又要掌握过硬的技术或专业技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如何培养人

结合高校和大学生特点,着眼“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学生在高校生活,正处在人生成长的“拔节孕穗期”,就好比小麦的“拔节”“孕穗”和“灌浆”期。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具有化人育人的本事,满足学生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和期待,根据各自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促进学生“灌浆”饱满。高校教育工作者需率先垂范、将心比心,为学生的理想信仰塑造、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培养、心理疏导、情感成长等提供专业服务。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及时关注和推动解决青年学生在学习生活、成才发展、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普遍性利益诉求。在工作中要善于运用“七育人”的方式载体,善于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新手段,探索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避免教条式、填鸭式、宏大叙事或的说教模式。将线上线下的思想工作有机结合,既会“键对键”,又能“面对面”,努力实现学生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做到哪里,做到需求出发,服务入手。努力在青年学生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将思想政治工作如“盐”一般溶解于学生大学生活之中,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吸收,做到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5]

(三) 为谁培养人

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高校办学治校的首要问题,也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关键所在。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战略决策;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我们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是听党的话,是不是跟党走,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不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为奋斗目标,是不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说是不是心中有党、心中有国、心中有民,这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事关党的执政之基,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意义极为重大。如果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出现了偏差,那么,人才的才华和专业性越高,起的反作用就越大。长期以来,忽略、淡化、回避、轻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恰恰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动力不足、推力不够、找不到发力点的根本原因。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就是教育的初心,不忘这个初心,才能前进;没有方向的“前进”,可能恰恰

是倒退,至少是迷失。不忘根本点,中国高校才不会成为新时代的“留美预备学校”,把辛辛苦苦培养了十几年的顶尖人才拱手送给西方国家及其利益集团;不忘根本点,高校学子才不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2]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 (2019-03-1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0/c_1123408400.htm.
- [3] 习近平.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4-05-05.
- [4] 习近平.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 人民日报, 2013-08-21.
- [5]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充分发挥高校共青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生力军作用: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N]. 人民日报, 2017-01-26.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Discussion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QIAN Changzhao¹, ZHANG Xiaodan²

(1.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44, China;

2. Phoenix College, Zhejiang Tsinghua Yangtze River Delta Research Institute,
Hangzhou, Zhejiang, 3111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Xi Jinping's serial speeche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t forward many innovative ideas and pointed out the direct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having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ity education; We must correctly understand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rves peopl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consolidation of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e must deeply study the three issues - train what kind of people, how to train people, and train people for whom.

Key words: Xi Jinp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enhance morality and foster talents; "Four services"; "three trainings"

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调查分析

张菁菁

(商丘师范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通过调查发现,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较高,思想主流健康向上。他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立场坚定,道德认知良好。调查结果也反映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即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认知有待加深,践行度有待提高。这与艺术类大学生的自身特点、高校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社会有着密切联系。要遵循艺术类大学生发展规律,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融合新媒体新技术,增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时代感、针对性,从而提升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2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106-06

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次的力量来自这个国家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1]艺术类大学生肩负着未来文艺繁荣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责任,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有特殊意义。为准确反映当下转型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状况,本文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一些高校的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状况进行了调查。依据数据分析,呈现出转型背景下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状况,同时据此实况提出艺术类大学生培

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教育改进建议。

一、调查概况

为了准确把握现状,笔者带领团队,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2018年暑期对河南省内外10所高校艺术类大学生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52份,有效回收率为95.2%,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表1。问卷设计了4个方面的指标:艺术类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高校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性别		年级			政治面貌			宗教信仰	
	男	女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	群众	有	无
比例(%)	49.3	50.7	34.6	33.2	32.2	2.3	53.6	44.1	8.4	91.6

二、数据分析

通过调查表明,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总体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高,思想主流健康向上,绝大多数被调查者积极认同并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立场坚定,道德认知良好。这表明高校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成效明显,艺术类大学生思想

状况呈现向上向好发展的良好趋势。与此同时,调查结果也反映出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其他普通大学生思想状况有一定差异。如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倾向有一定比例,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认知有待加深,践行度有待提高。这反映出高校针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

收稿日期:2018-12-31

基金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教育厅教改项目“‘高职生的缺失’与高职教育综合改革研究”(2017SJGLX578)

作者简介:张菁菁(1988—),女,河南商丘人,商丘师范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香港中文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动画影视与视觉设计研究。

教育也有待创新和改进。

(一) 认知与认同度差别大

艺术类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有着绝对的认知度,从表2可以看出,只有0.4%的被调查者表明没有听说过核心价值观,但是对核心价值观“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艺术类大学生比例高达29.3%;认为践行核心价值观“没有意义”和“说不清楚”的比例为7.4%。在回答“核心价值观与自己的学习、生活等方面联系”的问题时,有28.2%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没有联系”或者“说不清楚”,有45.4%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核心价值观教育“没有必要”或者“有无皆可”。这表明虽然几乎所有艺术类大学生知道核心价值观,但是对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认知却有待加深,认知度与认同度之间存在差异。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价值观迷茫、对核心价值观认知模糊等问题。也反映出高校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不够深入,对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灌输不到位。这种认知与认同之间存在较大差别的背后是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的效果还没有达到。

表2 艺术类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认同

问题	选项	结果比例(%)
你是否听说过核心价值观?	听说过	99.6
	没有听说过	0.4
你是否了解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非常了解	10.1
	基本了解	60.6
	不太了解	28.2
	完全不了解	1.1
你认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是什么?	促进个人发展	33.2
	促进社会发展	59.4
	没有意义	1.7
	说不清楚	5.7
你认为核心价值观与自己的学习、生活联系如何?	联系密切	21.3
	有一定联系	50.5
	没有联系	11.5
	说不清楚	16.7
你如何看待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非常有必要	54.6
	没有必要	22.5
	有无皆可	22.9

(二) 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发生偏差

调查发现,由于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与认知度不同步,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价值取向存在功利主义倾向,价值标准存在偏差。在当前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新时期,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少数艺术类大学生价值取向发生偏离。如表3所示。在“判断人生价值大小的最主要依据是什么”的问题中,有42.9%的艺术类大学生选择了“拥

有财富的多少”或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只有28.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有45.2%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实现个人理想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或者“个人运气”,认为是“个人的努力”的不到50%。需要重视的是,有23.3%的艺术类大学生“没有入党意愿”,另外有30.4%的艺术类大学生的入党动机是“有利于就业”,有26.7%的被调查者的入党动机则是“满足政治荣誉感”。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艺术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缺乏,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明显,社会不良风气对他们的负面影响较大,自身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参与意愿有待提升。

表3 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

问题	选项	结果比例(%)
判断人生价值大小的最主要依据是什么	拥有财富的多少	16.8
	社会地位的高低	26.1
	对社会贡献大小	28.6
	个人家庭的幸福	11.2
	知识技能的高低	17.3
实现个人理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	运气	10.4
	个人的社会关系	34.8
	个人的努力	49.5
	其他因素	4.3
你是否有人党意愿,你的入党动机是什么	为人民服务	19.6
	有利于就业	30.4
	满足政治荣誉感	26.7
	没有入党意愿	23.3

(三) 核心价值观践行度缺失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核心价值观只有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才能体现其内在功能,真正发挥作用。在艺术类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情况调查中显示,尽管绝大部分艺术类大学生(有92.6%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核心价值观“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认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但只有18.7%的艺术类大学生能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始终努力坚持以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南,这与只有20.8%的艺术类大学生“关注并主动参与”和核心价值观有关的实践活动调查结果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这表明了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知行不一”的状况。在“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你的反应是什么”的问题中,有20.5%的艺术类大学生选择了“直接走开”;对于是否会在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坚守诚信的问题中,有30.8%的艺术类大学生选择“会”在就业应聘中造假;对于“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有21.5%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

“可以接受”,有 24.1% 的艺术类大学生“说不清楚”自己的态度,还有 1.2% 的被调查者“自己也曾有过作弊”。这些数据反映了社会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等不良社会现象对艺术类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较大,造成部分艺术类大学生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淡薄,核心价值观外化于行的表现欠佳。

表 4 艺术类大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情况

问题	选项	结果比例(%)
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你是否坚持以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南	始终努力坚持	18.7
	有时能做到	50.9
	完全做不到	4.1
	说不清楚	26.3
对于学校和班级开展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你的做法是什么	关注并主动参与	20.8
	只是关注,但是不主动参与	49.1
	不关注	30.1
	主动提供帮助	21.6
当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打电话给警察等部门	21.7
	直接走开	20.5
	视具体情况而定	36.2
在参加一家竞争激烈的单位招聘,你会在简历中造假吗	会	30.8
	不会	25.7
对于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不一定	44.5
	反对并抵制这种做法	53.2
	可以接受	21.5
	说不清楚	24.1
	自己也曾有过作弊	1.2

(四)核心价值观教育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存在的问题暴露出当前高校培育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有待增强,需要从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资源挖掘、教育教学途径和方式创新等方面努力。在回答“你所在学校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效果如何”的问题中,有 32.4% 的艺术类大学生认为是“一般”;20.3% 的被调查者直接认为“没有效果”;认为效果“非常好”的只有 22.6%。显示艺术类大学生对当前高校培育核心价值观成效的认可度比较低。在选择“影响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因素”时,选择“网络舆论”选项所占的比例最高,说明了新时期现代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度愈发增强,给教育者提出了新问题。对于“你最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学习核心价值观”和“你认为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最为有效的途径是什么”的两个问题,选择“社会实践活动”的艺术类大学生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是 40.4% 和 40.6%,而选择“理论学习”或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比例分别是 17.3% 和 14.9%,是 4 个选项中所占比例最低的。选择“网络教育”或者“网络等媒体宣传”的比例为 22.5% 和 28.3%,位列第二,这也再次凸现代媒体对于艺术类大学

生的影响。

表 5 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情况

问题	选项	结果比例(%)
你所在学校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效果如何	非常好	22.6
	一般	32.4
	不清楚	24.7
你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学习核心价值观	没有效果	20.3
	理论学习	17.3
	社会实践活动	40.4
你认为影响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文体活动	19.8
	网络教育	22.5
	个人的思想观念	16.2
你认为培育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	家庭教育	18.1
	学校教育	22.5
	社会现象	15.1
	网络舆论	26.1
	榜样示范	16.2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14.9
	网络等媒体宣传	28.3
	社会实践活动	40.6

三、原因解读

(一)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特点所致

艺术类大学生与其它大学生群体相比,在文化基础、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差异。在进入大学之前,艺术类大学生的大量时间用于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训练,文化基础相对薄弱,导致他们进入大学后对文化课和公共课程的学习兴趣不高,文化基础知识深入性和全面性不够。艺术类大学生长期受到艺术熏陶,情感丰富,更加容易受到舆论和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他们擅长形象思维,感性大于理性,思考问题相对简单直接,容易走向极端。作为大学生中最为敏感和最具有创新意识的群体,艺术类大学生思想开放,热衷于标新立异,突出个性,所以集体观念和团队意识淡薄,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艺术类大学生的家庭从小就对他们个人的专业技能期望很高,使得艺术类大学生更为关注自己的表现,行为表现形式世俗化,重自我轻他人,重个人轻社会。由于专业特点,艺术类大学生经常参加各种商业活动,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更大,价值取向更加功利化。艺术类大学生心理素质与其他类别大学生比较而言趋于成人化。这主要因为艺术类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经常要离开家庭独自到外地学习专业课,或者经常奔波参加各种活动和专业考试,他们的心理更加趋于成熟。这些不同于其他大学生群体的个性特点,造成艺术类大学生在核心价值观上的表现也与众不同,缺乏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意愿,外化践行的行动力不强。

(二) 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的直接原因是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针对性不强

无论是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存在的问题还是他们对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认可度,都说明了当前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出现了偏差,实效性不足。究其根本原因是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不强,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

高校面向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针对性不强。不仅是艺术类大学生自身存在“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高校在制定教学计划和实施的具体过程中,也普遍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文化课及思政课教学重视不够,将绝大的部分的人力、物力放在大学生的专业技能的提升,忽视针对他们综合素质的培养和锻炼。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没有发挥。作为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针对所有大学生群体,没有考虑到艺术类大学生文化基础的特殊性,同时缺乏有针对性的辅助课本,教师的授课方法不灵活,造成本来就对文化课程不感兴趣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更多的抵触情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应知应懂的知识了解不够,个人学习生活中应该坚持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形成。

专业课教师应有的育人职责没有履行。艺术类大学生的授课方式大多采取小班制或者是单独授课,他们与专业课教师的交往相对较多,关系较为融洽,“亲其师信其道”,这些专业课教师的思想观念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影响较大,但是这些专业课教师的正向影响力没有有效发挥。其一,有些专业课教师本身的核心价值观就有待提升,甚至有时给学生传播一些不正确的或者消极的思想观念;其二,有些专业课教师只重视传授专业技能,漠视立德树人这一育人之本,在与学生的交往中忽视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

(三) 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现状的外部原因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离不开所处社会的影响,思想活跃、感性思维较强的艺术类大学生,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更加容易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劳动和利益分配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思想,使一些人形成了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单纯以个人

拥有的金钱和物质财富为唯一标准。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念虽然不是主流,但无时无刻的在侵蚀着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艺术类大学生的人生追求目标发生了偏差,将判断人生价值的主要依据归结为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而不是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和个人技能水平的高低。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缺失,个人利害得失成为一些艺术类大学生做出判断的主要考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加剧,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纷纷入场,在拓宽人们认识社会、发展自我视野的同时,一些消极的甚至是极端错误的思想观念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他们的头脑。在这种泥沙俱下、美丑共存的多元文化冲击下,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诸多的困惑和迷茫,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产生了动摇。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更是利用各种途径和机会,有目的有计划地渗透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增大了培育艺术类大学生正确思想政治素养的困难。

四、新时期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建议

(一) 遵循艺术类大学生发展规律,增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

艺术类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对于如何把握好自我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精神与功利等之间的关系,更需要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因此,高校要依据艺术类大学生的专业和个性特点,遵循他们独有的成人成才规律,尊重艺术类大学生群体实际状况,制定符合艺术专业特点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目标;关注他们的个性差异,改进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增强教育内容与艺术类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契合度,调整教学方案,合理安排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活动是艺术类大学生认为最有效并且最希望采用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增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必须重视实践活动的开展,在实践中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专业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而且能够提高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能力,充分调动他们的主体性意识,实现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高校可以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通过参观艺术大师工作室或者开展艺术讲座等途径,给艺术类大学生提供更多与社会上艺术大师学习接触的机会,使他们在与艺术大师接触中汲取艺术养分,提升综合素质。实践活动不仅给艺术类大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才艺的平台,而且是他们艺术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要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鼓励支持艺术类大学生主动参与各

种艺术大赛和文艺活动。

(二)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升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切实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导作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应自觉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务。”^[3]艺术类大学生本身对文化课兴趣不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同样如此,甚至有抵触情绪,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掌握的不够理想。艺术类大学生本身就有着理想化的倾向,再加上新时期社会转型产生的各种突出矛盾使他们看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越来越大,因而一些艺术类大学生对政治产生不同程度反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存有偏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保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和任务的普遍性与艺术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特殊性一致的前提下,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编写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助教材,在统筹解决好“自由与导向”“个性与标准”“薄弱与深厚”和“形象与理论”等几对矛盾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先进的艺术作品和德艺双馨的艺术名家事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三位拓展的方式,实现核心价值观有效地内化为艺术类大学生的正确艺术精神追求,外化为引领时代的艺术创作”^[4]。

充分发挥专业课教师的正向影响力,推动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教师的品德操行、价值取向、言行举止,对于学生有着深厚而持久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5]专业课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素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艺术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力求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思想问题。通过宣讲艺术大师高尚的爱国情怀、优秀的人格品质和高超的艺术技能,引发艺术类大学生的情感共鸣和思想转变。

(三)融合新媒体新技术,增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在当下信息化的新时期,大众传媒的作用与影响是无法替代的,而且会愈发突出。高校必须因势利导,充分融合新媒体新技术,遵循新媒体新技术互动传播规律,主动占领网络阵地,通过“搭建网络交互机制,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打造网络生活平台,重视大学生情感关怀;优化网络教育载体,拓展大学生交往渠道;强化网络监控管理,致力大学生实践养成”^[6]等途径,增强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核心价值观

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加强艺术类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对于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不能因噎废食,禁止艺术类大学生接触大众传媒,而是应该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充分发挥艺术类大学生的主体性,增强他们对大众传媒信息的甄别和选择能力,主动抵制不良信息的侵袭。通过开设选修课、举办讲座、开展辩论赛等活动,旗帜鲜明地宣讲网络虚拟世界应该遵循的法律法规,提升艺术类大学生认识、分析和使用新媒体的能力。要充分利用“朋辈效应”和“群体模仿效应”,通过转发、点赞和评论等方式,有意识地在大学生中树立网络舆论领袖典型,发挥他们的正向引导作用。

以人为本,推进网络教育载体优化和平台建设。信息化时代高校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要了解大学生对网络生活的需要,重视对他们的情感关怀,通过情感交流,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对核心价值观的内心认同,实现艺术类大学生主动去接受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价值观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不能接受,二是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的问题始终是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否有效的关键和难点。”^[7]要创设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网络语境,使艺术类大学生在情感上关心关注核心价值观,进而将核心价值观外化为自己的实践。要将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融合,综合运用网站、微信、微博和慕课等手段,及时、准确地对艺术类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话题做出回应,实现与大学生的实时对接,及时有效地进行沟通与引导。要打造核心价值观专题教育网站等主流教育平台,推动先进网络社团建设。在强化网络监控管理的同时,建立核心价值观专题教育网站等主流教育平台,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旋律,以核心价值观引导网络舆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通过先进网络社团建设,整合网络教育力量,发挥艺术类大学生中先进分子的模范带头作用,形成网上网下相互促进的网络教育工作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10-15(2).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 [3] 秦宣. 思政课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N]. 光明日报,2014-04-18(7).
- [4] 袁汪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艺术院校思政课的特殊性及方法[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6):49-50.
- [5] 冯刚. 以正确荣辱观为指导深化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J]. 中国高等教育,2006(7):17-20.
- [6] 何华宇.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ore Values of Art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ZHANG Jingjing

(Academy of Arts and Design,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Henan 476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art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have a high awarenes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that their minds are positive and accord with the mainstream. They agree with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stick to the right political position, and have good moral cogni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survey results also reflect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re values of art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ir 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core values need to be deepened.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education of core valu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o the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art college students, to innov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 to integrate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y into each other, to enhance the affinity, attraction, sense of era, and pertinence of core values education. By doing so,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of core values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new era; art college students; core values

(上接第 101 页) 地方高等院校只有适应这种发展需要,紧盯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迅速转变职能定位,探索建立新型教学模式,健全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才能找准发展着力点,提升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承担起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1]康德. 康德论教育[M]. 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版,

1976:243.

[3]吴式颖. 外国教育史教程:缩编本[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4]列宁全集:第3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1.

[5]王利明. 追寻现代大学特征[N]. 中国教育报,2012-12-17(5).

[6][英]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教育的目的[M]. 徐汝舟,译. 北京:三联书店,2014.

[7]赵予新. 高等工程教育质量保障研究:以河南省为例[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3.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Practical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e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ZHOU Shuhuan

(Laboratory Management Center,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pplie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has its own practical logic.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wester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focuses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fter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major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and their education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initial stage which focuses only on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to the stage that focuses both on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nd on ability training. It is in this process of turning that the applie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began to emerge and developed rapidly. Applie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lead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view of Chinese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also urgent to develop the applie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Key words: the western educational concept; th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 the applied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s

门式启闭机主梁疲劳寿命预估研究

王继东, 孙建延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对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进行研究分析, 确定出了裂纹部位, 对危险部位疲劳裂纹进行分类, 并研究了线弹性裂纹与弹塑性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结合 Forman 疲劳裂纹扩展公式和 miner 连续损伤理论, 推导出了门式启闭机主梁在恒定载荷与交变载荷作用下的疲劳寿命公式。该研究工况与门式启闭机实际工况更加接近, 且考虑了不同材质对疲劳裂纹的影响, 较准确地预估出门式启闭机的疲劳寿命,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门式启闭机; 主梁; 裂纹; 寿命预估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2.021

中图分类号:TG2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2-0112-04

门式启闭机作为水利水电工程和大中型给排水工程的必备设备, 通过升降各类闸门, 达到开启与关闭闸门的目的^[1], 如图1所示。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及焊缝处经常要承受交变载荷的反复作用, 在主梁结构缺陷及焊缝应力集中位置会产生细小裂纹, 这些微小的裂纹在反复交变载荷作用下, 日积月累逐渐汇集扩展, 最后扩展为较大、较长的疲劳裂纹或裂缝^[2], 这些裂纹与裂缝严重影响整个门式启闭机主梁的疲劳寿命。本文对主梁结构进行分析研究, 并借助先进的探伤检测仪器, 对门式启闭机主梁进行探伤检测, 找出裂纹部位, 对检出的裂纹类型进行分析、分类, 研究门式启闭机主梁在不同的材质下, 线弹性裂纹与弹塑性裂纹的强度因子, 以及疲劳裂纹的扩展规律。利用 Forman 裂纹公式^[3], 推导门式启闭机在恒幅载荷作用下的疲劳寿命, 借助 miner 连续损伤理论^[4], 推导门式启闭机在多级变幅载荷下的主梁疲劳寿命。研究工况与门式启闭机实际工况更加接近, 且考虑了不同材质对疲劳裂纹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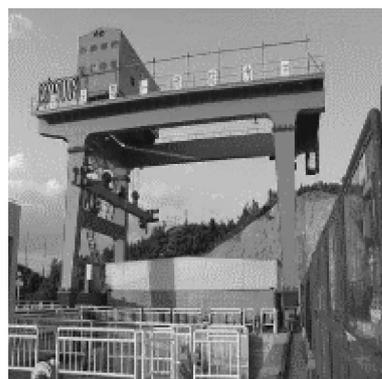


图1 门式启闭机工作图

1 门式启闭机裂纹产生的机理

1.1 裂纹产生的位置

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疲劳裂纹多发生在应力最大和疲劳特性最薄弱的部位, 通常集中在两处: 其一, 发生在主梁内筋与腹板焊接的下部。如图2所示。门式启闭机主梁内筋板常常通过断续焊^[5]与主梁焊接在一起, 这些断点在交变载荷的日积月累下, 形成较大的应力集中点, 产生微小的裂纹。门式启闭机主梁筋板下部承受拉力, 在拉力作用下, 这些

收稿日期: 2019-03-11

基金项目: 河南省2018年度科技发展计划(182102210598);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创新团队项目(CXTD2017K4)

作者简介: 王继东(1965—), 男, 河南太康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水利、电力、建筑施工机械及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与教学工作。

微小裂纹不断聚集扩大,最后形成击穿门式启闭机主梁下腹板的疲劳裂纹。其二,集中在门式启闭机下翼缘板和腹板连接焊缝处。该处通常采用单边坡口焊,施工人员无法对主梁内侧的焊缝进行夹渣、气孔等初始缺陷处理^[6],且在主梁承受载荷时,此处所受拉力最大。在各级最大拉力下,这些初始缺陷不断扩张汇合,进一步形成较大的疲劳裂纹。通过对一台在役水电站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进行表面渗透检查和无损检测,我们验证了分析的正确性。

1.2 疲劳裂纹的类型

由断裂损伤理论可知,疲劳裂纹可以分为三种类型^[7]:撕开型、滑开型与张开型。撕开型裂纹扩展方向与剪应力方向垂直,划开型裂纹扩展方向与剪应力方向平行,张开型裂纹正应力(拉应力)垂直于裂纹面,如图3所示。通过上文分析可知,门式启闭机的主梁裂纹基本都是在拉应力的情况下产生的,压应力情况基本不会产生疲劳裂纹。而在役水电站门式启闭机主梁的危险部位,在受拉的情况下,细小裂纹会拉开一定的位移,日积月累会形成较大的裂纹。由于形成机理为拉应力垂直作用于裂纹面,因此门式启闭机主梁裂纹以张开型裂纹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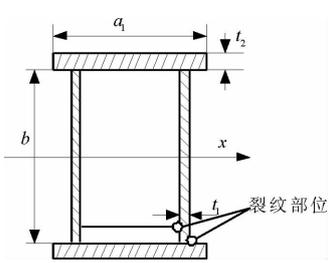


图2 裂纹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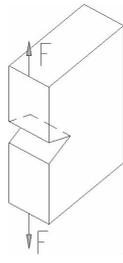


图3 张开型裂纹

2 疲劳裂纹研究

2.1 裂纹强度因子

门式启闭机主梁的裂纹处存在应力集中,而裂纹是否会扩张直至完全断裂,与裂纹尖端部位应力场和应变场有关。如图4、图5(ANSYS模拟下的裂纹尖端应力场^[8])所示,应力场与应变场较强时,裂纹扩展比较快,反之裂纹扩展就比较慢。通常采用应力强度因子来表示裂纹与应力场和应变场之间的关系,应力强度因子公式为

$$\Delta K = K_{\max} - K_{\min} = Y_s \Delta \sigma \sqrt{\pi a}, \quad (1)$$

其中: ΔK —应力强度因子; Y_s —与裂纹类型和材质有关的修正系数; $\Delta \sigma$ —裂纹处的应力变化值。

2.1.1 线弹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当门式启闭机的主梁材质为强度较高的钢材

时,由于钢材本身材质强度较高,受力变形主要为线性变形,基本不产生塑性变形,所形成的疲劳裂纹也都是线弹性裂纹,其裂纹尖端多为半椭圆形,取系数 $Y_s = 1.12$,代入式(1),得出线弹性情况下所对应的强度因子为

$$\Delta K = 1.12 \Delta \sigma \sqrt{\pi a}, \quad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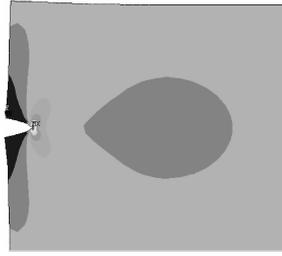


图4 ANSYS模拟下的裂纹尖端应力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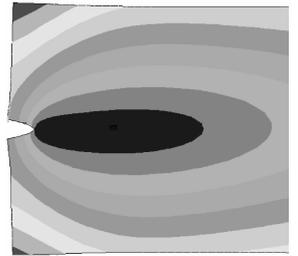


图5 ANSYS模拟下的裂纹尖端应变场

2.1.2 弹塑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门式启闭机一般跨度都比较大,对主梁刚度要求较高,强度要求较低,一般中等强度以下的钢材都能满足应力要求。在裂纹尖端部位应力场比较强,应力集中也较大,在尖端部位就会形成一个不大的塑性变形区,这个塑性变形区尺寸与疲劳裂纹尺寸及构件长度相对比小一个数量级,属于弹塑性情况,这就需要对这个弹塑性区域加以修正,才能够适合线弹性裂纹理论。对线弹性情况下的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公式(2)进行修正^[9],修正与裂纹有关的系数 Y_s ,由

$$Y_s = \frac{1.12}{\sqrt{J(k)^2 - 0.212 \left(\frac{\sigma}{\sigma_s} \right)^2}}$$

可得

$$\Delta K = Y_s \Delta \sigma \sqrt{\pi a} = \frac{1.12 \Delta \sigma \sqrt{\pi a}}{\sqrt{J(k)^2 - 0.212 \left(\frac{\sigma}{\sigma_s} \right)^2}}, \quad (3)$$

其中: $k = \frac{c}{a}$; c —疲劳裂纹宽度的二分之一; $J(k)$ —裂纹的椭圆积分; σ_s —所用钢材的屈服点。

2.2 裂纹扩展速率

在断裂力学中,裂纹扩展速率用来表示裂纹在交变载荷的作用下,每完成一次循环疲劳裂纹所增加的长度,用 da/dN 来表示^[10],其中 a 代表裂纹长度, N 代表载荷循环次数。用双对数曲线 $\lg da/dN - \Delta K$ 来表示裂纹扩展速率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之间的关系, $\lg da/dN - \Delta K$ 的对数曲线按速率可分为低(I)、中(II)、高(III)区域,如图6所示。

I区(低速裂纹扩展区):随着裂纹尖端应力强

度因子 ΔK_I 的下降, 裂纹的扩展速率也急剧下降, 当下降到 $\Delta K_I \leq \Delta K_{th}$ (ΔK_{th} 为裂纹扩展的门槛值) 时, 疲劳裂纹将停止扩展, 也即安全裂纹。

II 区(中速裂纹扩展区): $\Delta K_I > \Delta K_{th}$, 该阶段为疲劳寿命的主要阶段, $\lg da/dN - \lg \Delta K_I$ 有良好的对数关系, 通常在该区域进行疲劳寿命的预估。

III 区(高速裂纹扩展区): 随着 da/dN 的不断增大, 裂纹由 II 区经过转折点 B_2 进入到 III 区; 在该区, 裂纹的扩展速率快, 构件会快速失稳断裂, 一般可以不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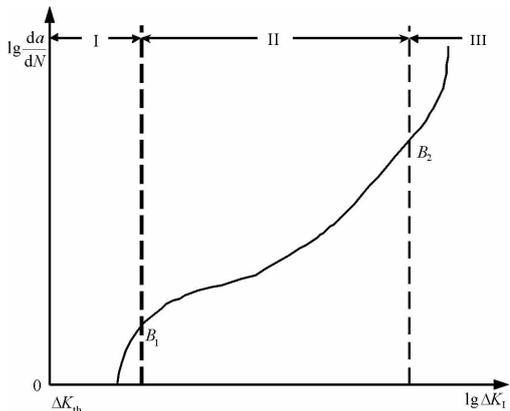


图6 裂纹扩展 $\lg da/dN - \lg \Delta K_I$ 关系曲线

3 门式启闭机寿命预估

3.1 疲劳裂纹扩展公式

以往关于起重机疲劳裂纹扩展公式, 主要是 pairs 裂纹公式, 该公式能够推导出构件的疲劳寿命, 但未考虑应力比的影响, 因此计算出的疲劳寿命与构件实际寿命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笔者采用考虑应力比修正后的 pairs 裂纹公式, 也即 Forman 公式, 得出疲劳裂纹的扩展寿命公式为

$$\frac{da}{dN} = \frac{C(\Delta K)^m}{(1-R)K_{Ic} - \Delta K} \quad (4)$$

式中: a —裂纹尺寸; R —应力比; c, m —与疲劳裂纹类型、材质等相关的参数; K_{Ic} —断裂韧度。

3.2 恒幅载荷下门式启闭机的寿命预估公式

当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承受恒幅不变载荷时, 只需对 Forman 裂纹公式(4)积分, 就得出门式启闭机在恒定不变载荷作用下的疲劳寿命。假定裂纹的初始长度为 a_0 , 裂纹的临界长度为 a_c , 门式启闭机的疲劳寿命则是由裂纹的初始长度直至扩展到临界裂纹所经历的载荷循环次数, 疲劳寿命为

$$N_f = \int_{a_0}^{a_n} \frac{[(1-R)K_{Ic} - \Delta K]}{C(\Delta K)^m} da =$$

$$\frac{(1-R)K_{Ic}}{C(Y\Delta\sigma\sqrt{\pi})^i(0.5m-1)} \left(\frac{1}{a_0^{0.5m-1}} - \frac{1}{a_c^{0.5m-1}} \right) -$$

$$\frac{1}{C(Y\Delta\sigma\sqrt{\pi})^{m-1}(0.5m-1.5)} \left(\frac{1}{a_0^{0.5m-1.5}} - \frac{1}{a_c^{0.5m-1.5}} \right) \quad (5)$$

3.3 变幅载荷下门式启闭机的寿命预估公式

恒幅载荷是一种理想状态, 在实际的工作中, 门式启闭机经常要吊装不同重量的载荷, 也即变幅载荷。对于变幅载荷作用下门式启闭机的疲劳寿命的预估, 可将无级变幅载荷谱进行转换, 使其转换为幅值不相同的恒幅载荷。笔者将门式启闭机的载荷谱分为八级, 则与每级应力幅 σ_i 相对的载荷循环次数是 n_i , 得到新的转换后载荷谱; 然后把这些转换后的载荷谱分别代入恒幅载荷下门式启闭机的寿命估算公式(5)中, 可以求得在每级应力幅 σ_i 的载荷循环下, 门式启闭机的疲劳寿命 N_i 。再由 Miner 连续累计损伤理论, 求得与之相对的损伤度 D , 其表达式为

$$D = \sum_{i=1}^k n_i/N_i, \quad (6)$$

则可求得门式启闭机的总的载荷循环次数

$$N_z = \sum_{i=1}^k n_i/D, \quad (7)$$

再把恒幅载荷下的寿命预估公式(5)代入(7)式, 求得门式启闭机在变幅载荷下的寿命预估公式

$$N_z = \frac{\sum_{i=1}^k n_i}{D} = \frac{\sum_{i=1}^k n_i}{\sum_{i=1}^k \frac{n_i}{N_{fi}}}, \quad (8)$$

其中 N_{fi} 为每级应力幅 n_i 所对应的每级应力幅下的恒幅载荷寿命, 由恒幅载荷公式(5)求得。

4 工程实例

已知某中型水电站的一台在役的门式启闭机, 该门式启闭机为双主梁箱型结构, 额定起重量 160t, 工作级别为 A5, 该门式启闭机的跨度为 21m, 主梁材质为 Q235 钢。在一次例行检验时, 发现在一侧主梁跨中下翼缘板处有一条裂纹, 经仔细测量, 测得该裂纹初始长度 $a = 0.5\text{mm}$, 深度 $c = 1\text{mm}$, 临界裂纹的长度为 100mm, 该门式启闭机一侧主梁所受的最大应力幅 174.6MPa; 已测得其一段时间内的应力幅, 如表 1 所示, 试确定该门式启闭机有裂纹侧主梁的总寿命。

由裂纹长度 a 、裂纹深度 c , 计算得 $k = \left[1 - \left(\frac{a}{c} \right)^2 \right]^{\frac{1}{2}} \approx 0.866$, 根据参考文献, 可求出 $J(k) = 1.2111$, 再由弹塑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 可得 $Y_s = \frac{1.12}{\sqrt{J(k)^2 - 0.212 \left(\frac{\sigma}{\sigma_s} \right)^2}} = 0.9692$ 。

由以往钢材实验可知, Q235 钢材 $m = 3, C = 2.61 \times 10^{-13}$ 。

将求得的参数以及各级应力幅和对应的循环次数代入恒幅载荷作用下的寿命预估公式(5), 求得

表 1 门式启闭机主梁应力幅

载荷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应力幅 $\sigma_i / (\text{MPa})$	174.6	169.2	148.5	125.7	101.2	76.5	62.3	45.3
循环次数/ n	1450	2500	6500	11035	15203	11895	5696	2950

5 结论

(1) 对门式启闭机裂纹成因进行分析, 确定了门式启闭机主梁结构裂纹的位置, 对典型裂纹进行分析分类, 同时研究门式启闭机在不同的材质下线弹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和弹塑性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给出两种裂纹下裂纹的应力场和应变场, 并对门式启闭机典型裂纹的扩展规律进行研究分析。

(2) 借助 Forman 裂纹公式, 推导出门式启闭机在恒幅载荷作用下的疲劳寿命, 并通过 miner 连续损伤理论, 推导出门式启闭机在多级变幅载荷下的主梁疲劳寿命。该公式不仅能够较准确地计算出门式启闭机的疲劳寿命, 而且也适用于其他类似机械设备的疲劳寿命预估。

参考文献:

[1] 管世珍, 谢广东, 顾生锋, 等. 浅谈液压门式启闭机典型故障及处理措施[J]. 机电工程技术, 2017(11): 114 - 117.
 [2] 曾攀. 材料的概率疲劳损伤特性及现代结构分析原理[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3.

各级恒幅应力对应的循环次数, 最后通过各级载荷所占的比例以及变幅载荷下的寿命预估公式(8), 求得该在役门式启闭机主梁的寿命为 $N_e = 1.752 \times 10^6$ 转。

[3] KOPNOV V A.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the metalwork of a travelling gantry crane [J]. Engineering Failure Analysis, 1999(6): 131 - 141.
 [4] 杨恒乐, 郭建斌. 基于故障树贝叶斯网络的液压门式启闭机故障诊断方法[J]. 液压与气动, 2015, 12(1): 44 - 48.
 [5] 殷玉枫, 曾光, 徐格宁, 等. 起重机箱形梁疲劳裂纹与寿命预估[J]. 中国工程机械学报, 2010, 8(3): 274 - 278.
 [6] 王爱红, 徐格宁, 高有山. 桥式起重机随机应力谱的获取及疲劳剩余寿命的估算[J]. 机械工程学报, 2012, 48(18): 192 - 198.
 [7] 王富耻, 张朝晖. ANSYS10.0 有限元分析理论与工程应用[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
 [8] 李庆芬, 胡胜海, 朱世范. 断裂力学及其工程应用[M].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8.
 [9] 徐格宁. 机械装备金属结构设计[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10] 赵少汴. 常用累积损伤理论疲劳寿命估算精度的试验研究[J]. 机械强度, 2000, 22(3): 206 - 209.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the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the Main Beam of Gantry Crane

WANG Jidong, SUN Jiany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beam structure of gantry crane is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crack position is determined, the fatigue crack of the dangerous part is classified, and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f the linear elastic crack and the elastoplastic crack is studi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Forman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formula and the miner continuous damage theory, the formula of fatigue life under constant load and alternating load is obtained. The study condition is close to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 of gantry crane, 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on the fatigue crack are considered, so the fatigue life of gantry crane can be estimated accurately. This can reduce the safety accidents caused by the fatigue failure of the gantry crane.

Key words: gantry crane; main beam; crack; life prediction

Ce 和 Nd 对多道次固相合成 AZ31 - RE 镁合金 腐蚀性能的影响

康 永

(榆林市瀚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 榆林 718100)

摘 要:采用固相合成技术制备 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及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并用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作为参考。质量分数为 3.5% 的 NaCl 溶液作为腐蚀介质,比较试样腐蚀后的宏观形貌和微观组织。结果表明:试样表面发生很明显的点腐蚀,Cl⁻加速了 AZ31 镁合金的腐蚀。在相同时间下,试样发现腐蚀严重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腐蚀 4 h 时所有试样的腐蚀速率均达到最大,其中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 0.641 mg · cm⁻² · h⁻¹;腐蚀 64 h 时所有试样的腐蚀速率均最小,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 0.291 mg · cm⁻² · h⁻¹。

关键词:固相合成;微观组织;腐蚀速率;组织分析;失重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22

中图分类号:TG14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116-05

镁合金的耐蚀性能较低,已成为镁合金发展的障碍,镁合金在人体和海洋中应用较广,然而其极低的耐蚀性迫切需要得到解决^[1]。模拟海洋和人体中质量分数为 3.5% 的 NaCl 溶液作为腐蚀介质,通过固相合成技术制得试样,将其放在腐蚀介质中进行试验,进一步探索 AZ31 镁合金中加入稀土元素 Ce 和 Nd 对 AZ31 - RE 镁合金腐蚀性能的影响^[2]。

目前,稀土元素对含 AZ31 镁合金耐腐蚀性能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混合稀土或单一稀土含量对合金组织和耐蚀性的影响。AZ31 镁合金是变形镁合金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合金,但有关多种稀土元素对含 AZ31 镁合金组织及腐蚀性能的影响对比研究较少。添加稀土元素,从根本上改变 AZ31 相组成、微观组织和结构,这对于研究 AZ31 镁合金具有重要意义^[3]。本文旨在对固相合成 AZ31 - Ce 及 AZ31 - Nd 镁合金腐蚀性能进行研究。

1 实验部分

1.1 主要仪器

XA5032 立式升降台铣床、WE-60 液压万能试

验机、自制分体式电阻炉、金相抛光机、OLYMPUS - GX71 光学显微镜。

1.2 试样制备

将 AZ31 镁合金铸锭与 Mg - 30% Nd (质量分数) 中间合金铸锭,用 XA5032 立式升降台铣床车削成 (3 ~ 5) mm × 2 mm × 0.2 mm 大小的碎屑,AZ31 镁合金成分如表 1。

表 1 试验用 AZ31 镁合金的化学成分

元素	Al	Zn	Mn	Si	Cu	Fe	Mg
质量分数/%	2.80	1.00	0.25	0.01	0.01	0.01	其余

计算 Mg - 30% Ce 中间合金与 AZ31 镁合金屑混合成分,混合后使 AZ31 - Ce 镁合金中含 2.5% Ce。先将 AZ31 镁合金屑放入机械混料机中,再放入 Mg - 30% Ce 屑,操作时机械混料机转速为 80 r/min,时间为 240 min,使配料混合均匀,然后进行冷压,将混合屑放在挤压机中缓慢挤压挤出型材。接下来进行热挤,挤压工艺为:挤压温度 360 °C,挤压比 25 : 1,挤压饼大小为 Φ40 mm × 40 mm,保温时间

收稿日期:2019-03-16

作者简介:康永(1981—),男,陕西富平人,博士,榆林市瀚霆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从事高分子复合材料以及金属材料研究工作。

10 min。挤出试棒直径为 7 mm,将其切割成 15 mm 长的试棒。热挤出的小棒重复进行 5 次,挤压过程采用的参数保持不变。

制取 AZ31 - Nd 的方法同上,采用固相合成技术,将 Mg - 30% Nd 中间合金和 AZ31 铸锭削成屑,按照含 Nd3.0% 的分配比将 Mg - 30% Nd 中间合金屑和 AZ31 镁合金屑一起放入机械混料机中混合均匀,冷压缓慢挤出坯锭,然后将坯锭放在热挤压所需的套筒里,加热至所需温度后保温一段时间,然后缓慢挤出型材。

通过固相合成制得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及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用挤压机将合金挤压成 $\Phi 7$ mm 圆柱棒,机械切割试棒长 $\Phi 7$ mm \times 15 mm 圆柱试样。

1.3 试样比较

以 AZ31 镁合金为研究对象,采用固相合成制得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及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将其放入质量分数为 3.5% 的 NaCl 溶液中进行腐蚀,比较试样腐蚀后耐蚀性的差异。

(1) 用数码相机记录试样腐蚀后的宏观形貌,在相同腐蚀时间下,比较 4 种试样表面腐蚀的深浅程度。

(2) 用金相显微镜观察试样腐蚀后的微观组织,确定试样的腐蚀类型,分析腐蚀原因。

(3) 采用失重法,计算试样的腐蚀速率,绘制腐蚀速率随时间变化图,得出随着时间的延长,腐蚀速率变化的趋势。观察试样在相同时间下的腐蚀速率,比较试样腐蚀的快慢。

2 结果与分析

2.1 腐蚀宏观形貌分析

通过数码相机记录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及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分别腐蚀 8 h, 16 h, 32 h 和 64 h 后的表面宏观形貌,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延长,试样表面腐蚀程度明显变大,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表面完整性保持最好,AZ31 屑一次挤压表面保持完整性次之,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表面腐蚀比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严重,表面腐蚀最严重的是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综上,腐蚀后表面腐蚀保持完整性由好到次依次为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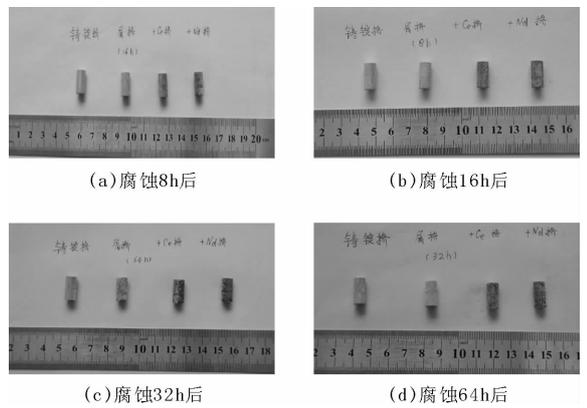


图 1 数码相机记录试样腐蚀后的宏观形貌

2.2 腐蚀微观形貌分析

图 2 为试样腐蚀 8 h 后的金相显微照片。通过图 2 可以明显看到试样表面发生很明显的点蚀反应。AZ31 表面可以产生钝化膜,但由于 Cl^- 的迁移和扩散,加速了 AZ31 镁合金表面钝化膜的破坏,降低了 AZ31 镁合金的抗腐蚀性^[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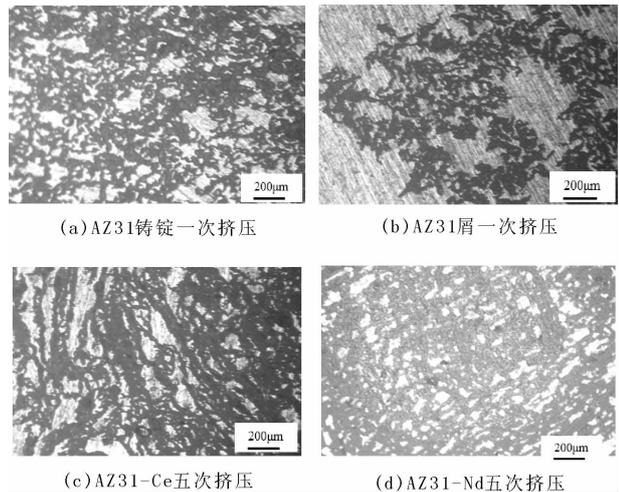


图 2 试样腐蚀 8 h 后的金相显微照片

观察图 2(a),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点蚀作用最少,表面保持较完整;观察图 2(b), 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腐蚀表面点蚀均匀分布,说明固相合成技术使其组织均匀,提高了 AZ31 屑的耐腐蚀能力;观察图 2(c)和(d),加入 2.5% Ce 和 3.0% Nd 的固相合成 AZ31 - RE 镁合金,未能使 AZ31 镁合金耐蚀性能提高,反而使其腐蚀性能下降;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点蚀反应较均匀,腐蚀程度较深。图 2 中,腐蚀最严重的是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其余依次为: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

2.3 腐蚀速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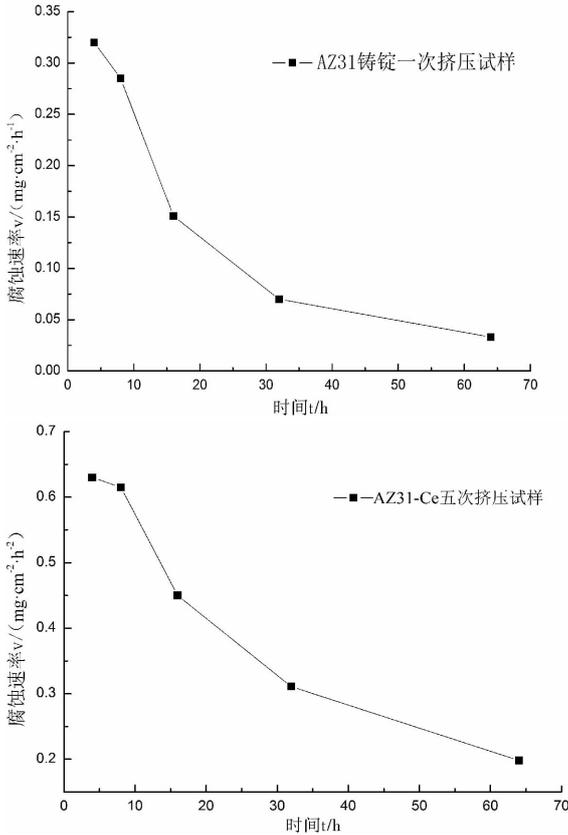
2.3.1 质量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

这种表示法的依据是金属被腐蚀前与被腐蚀后的质量将发生变化。承受腐蚀的金属表面积大小、

腐蚀时间长短等都与腐蚀质量变化有关^[6-7]。测量腐蚀前后试样的质量(腐蚀后的试样要进行去除腐蚀产物、清洗、吹干),采用质量变化表示法计算腐蚀速率,计算公式^[8-9]为

$$v = \frac{m_1 - m_2}{s \cdot t} \quad (1)$$

式中: v —腐蚀速率, $\text{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 m_1 —腐蚀前的



质量, g ; m_2 —腐蚀后的质量, g ; S —试样表面积, cm^2 ; t —腐蚀时间, h 。

图3分别为AZ31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Ce五次挤压试样和AZ31-Nd五次挤压试样按质量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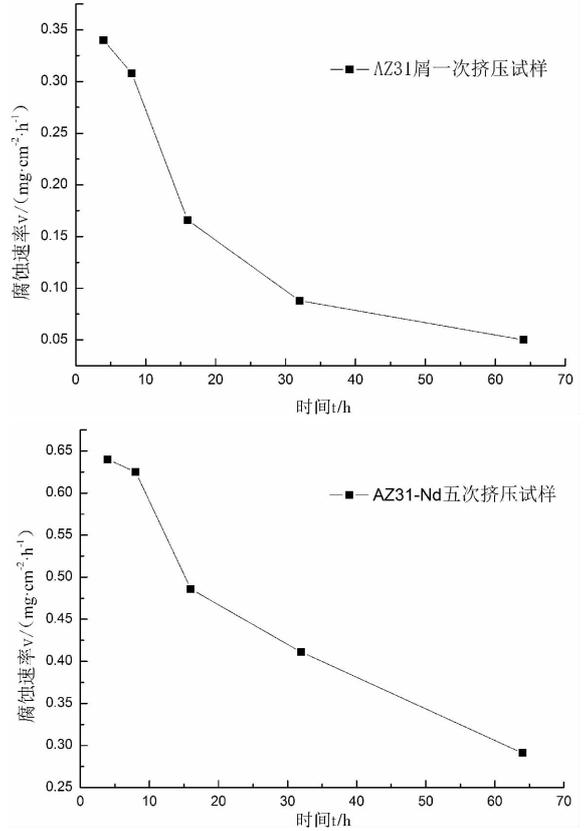


图3 试样腐蚀速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经测试发现,AZ31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Ce五次挤压试样和AZ31-Nd五次挤压试样的腐蚀速率随时间的延长而降低,最后逐渐趋于平稳;腐蚀8~16h时,腐蚀速率变化最快;腐蚀64h后试样趋于稳定,腐蚀速率最低。4种试样在腐蚀4h时按质量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分别为0.321,0.342,0.635,0.641 $\text{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在腐蚀64h时按质量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分别为0.033,0.052,0.198,0.291 $\text{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 。其中AZ31-Ce五次挤压试样和AZ31-Nd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变化更明显。腐蚀时间相同时,试样腐蚀速率由高到低排序为:AZ31-Nd五次挤压试样、AZ31-Ce五次挤压试样、AZ31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铸锭一次挤压试样。说明AZ31镁合金中含质量分数为2.5%的Ce或3.0%的Nd时,不能提高AZ31镁合金的耐蚀性,反而降低了其耐蚀性。

2.3.2 腐蚀深度表示的腐蚀速率

从材料腐蚀破坏对工程性能(强度、断裂等)的影响来看,确切掌握腐蚀破坏的深度有重要意义^[10-11]。当均匀腐蚀时,腐蚀深度($D_{\text{深}}$)可以通过腐蚀前后的质量变化,经过换算得到,换算公式^[12-14]为

$$D_{\text{深}} = 8.76 \times \frac{m_1 - m_2}{S \times t \times \rho}, \quad (2)$$

式中: $D_{\text{深}}$ —腐蚀深度, $\text{mm} \cdot \text{a}^{-1}$; m_1 —腐蚀前的质量, g ; m_2 —腐蚀后的质量, g ; S —试样表面积, cm^2 ; t —腐蚀时间, h ; ρ —金属的密度, $\text{g} \cdot \text{cm}^{-3}$ 。

图4分别为AZ31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Ce五次挤压试样和AZ31-Nd五次挤压试样按腐蚀深度变化表示的腐蚀速率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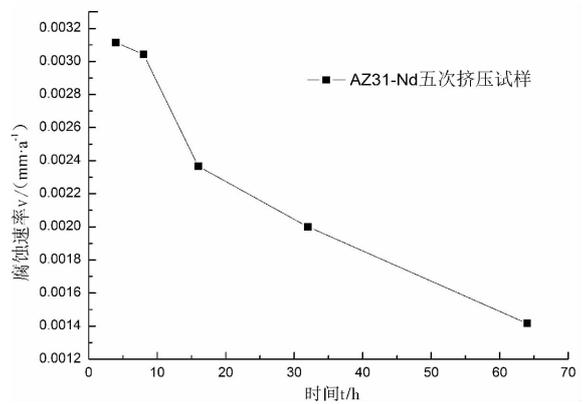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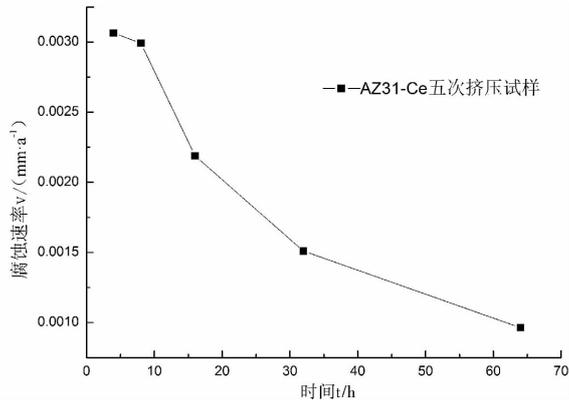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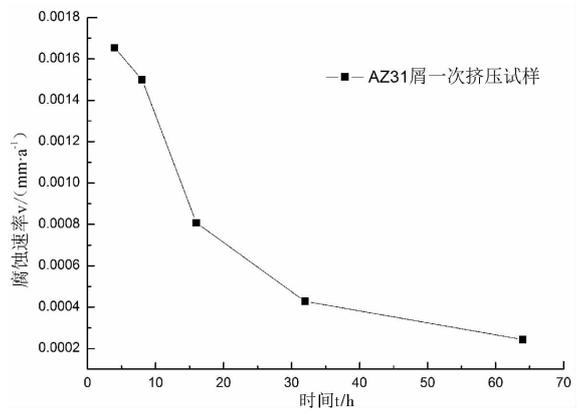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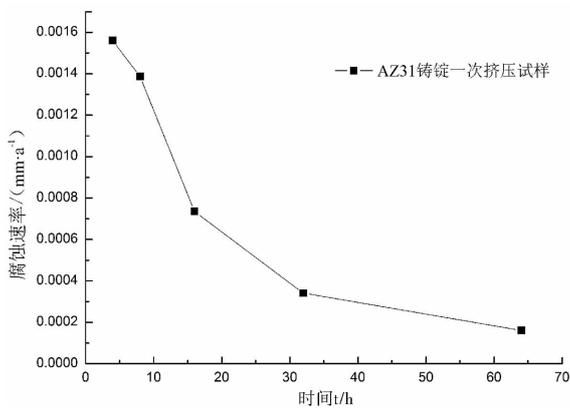


图4 试样腐蚀深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对比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及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在相同腐蚀时间下的腐蚀速率(腐蚀深度),可以看到试样腐蚀速率随着时间的延长均趋于下降,当达到一定值后,又趋于稳定。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在 8 ~ 16h 腐蚀速率变化最快,试样放入 4h 时腐蚀速率最大,腐蚀速率为 $1.56 \times 10^{-3} \text{ mm} \cdot \text{a}^{-1}$;试样放入 64h 时腐蚀速率最小,腐蚀速率为 $0.161 \times 10^{-3} \text{ mm} \cdot \text{a}^{-1}$ 。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在腐蚀开始时,腐蚀深度变化较快,32h 后腐蚀深度开始缓慢变化,直至达到一个稳定趋势;试样放入 4h 时腐蚀速率最大,腐蚀速率为 $1.654 \times 10^{-3} \text{ mm} \cdot \text{a}^{-1}$;试样放入 64h 时腐蚀速率最小,腐蚀速率为 $0.243 \times 10^{-3} \text{ mm} \cdot \text{a}^{-1}$ 。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在 8 ~ 16h 腐蚀速率降低较快,在 4 ~ 8h 和 32 ~ 64h 腐蚀速率变化平稳;试样放入 4h 时腐蚀速率最大,腐蚀速率为 $3.066 \times 10^{-3} \text{ mm} \cdot \text{a}^{-1}$;试样放入 64h 时腐蚀速率最小,腐蚀速率为 $0.964 \times 10^{-3} \text{ mm} \cdot \text{a}^{-1}$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放入 4h 时腐蚀速率最大,腐蚀速率为 $3.115 \times 10^{-3} \text{ mm} \cdot \text{a}^{-1}$;试样放入 64h 时腐蚀速率最小,腐蚀速率为 $1.416 \times 10^{-3} \text{ mm} \cdot \text{a}^{-1}$ 。在相同腐蚀时间下,腐蚀速率由大到小的顺序是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

样。

3 结论

固相合成 AZ31 镁合金,使合金的晶粒变得细小,多次挤压使晶粒更加细小。失重法计算腐蚀速率,发现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最大,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次之,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的腐蚀速率最小;经金相观察试样表面,发现试样表面发现明显的点蚀,这是由于 Cl^- 的扩散与迁移,使镁合金表面的钝化膜破坏,加速了试样的腐蚀。

通过数码相机观察试样表面宏观形貌变化,发现试样随着腐蚀时间的延长,腐蚀程度加大,腐蚀程度由小到大依次为: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

通过金相显微镜观察试样腐蚀后的微观组织变化,发现试样发生很明显的点腐蚀,并且挤压次数越多,点腐蚀反应越均匀。试样发生点腐蚀反应面积由低到高依次为: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

通过失重试验,发现随着腐蚀时间的延长,试样腐蚀速率变小。在相同腐蚀时间下,腐蚀速率由大到小依次为: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AZ31 屑一次

挤压试样、AZ31 - Ce 五次挤压试样、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

AZ31 镁合金中加入质量分数为 2.5% 的 Ce 及 3.0% 的 Nd, 无法改善 AZ31 镁合金的耐蚀性, 反而降低了 AZ31 的耐腐蚀性。

腐蚀时间在 4h 时所有试样的腐蚀速率都达到最大, 其中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 $0.641 \text{ 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 $0.321 \text{ 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 在 64h 所有试样的腐蚀速率最小, 其中, AZ31 - Nd 五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 $0.291 \text{ 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 AZ31 铸锭一次挤压试样腐蚀速率为 $0.033 \text{ 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 。

参考文献:

- [1] 梁成浩, 郑润芬, 黄乃宝. AZ31 镁合金及工业纯镁大气腐蚀行为研究[J]. 稀有金属, 2013(2): 207-214.
- [2] 郭初蕾, 郑弃非, 赵月红. AZ31 镁合金在海洋大气环境中的腐蚀行为[J]. 稀有金属, 2013(1): 21-26.
- [3] 刘文峰, 孙钢, 陈永哲. Cl⁻浓度和 pH 值对 AZ31 镁合金腐蚀行为的影响[J]. 太原科技大学学报, 2009(3): 221-224.
- [4] 苗晋琦, 孙为云, 霍方方. Ce 含量对 AZ31 镁合金显微组织及耐蚀性能的影响[J]. 热加工工艺, 2016(18): 73-76.
- [5] 雷黎. 镁合金铈转化膜与铈/硅烷复合转化膜的成膜机

- 理及腐蚀行为[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15.
- [6] 赖晓明. 镁合金微弧氧化与有机镀膜的复合表面改性及复合膜功能特性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 [7] 刘敏娟. 稀土元素对 AZ31 变形镁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D]. 太原: 太原科技大学, 2010.
- [8] 马国发. RE、Sb 对 AZ 系变形镁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D]. 郑州: 郑州大学, 2009.
- [9] 邓希光. AZ31 镁合金在模拟人体环境中的腐蚀行为研究[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09.
- [10] WANG L, SHI T D, ZHANG B P. Corrosion behavior of Mg, AZ31 and AZ91 alloys in dilute NaCl solutions[J]. Journal of Solid State Electrochemistry, 2014(54): 22-33.
- [11] WAN F, LI J B, LIU J, et al. Influences of Ca and Y addition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vacuum Die - Cast AZ91 alloy[J]. Acta Metallurgica Sinica, 2014(43): 14-22.
- [12] 陈晓瑜. 固相合成 AZ91D 镁合金制备工艺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07.
- [13] 吉泽升, 陈晓瑜, 胡茂良, 等. 固相合成 AZ91D 镁合金的组织 and 性能[J].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2006(12): 2010-2015.
- [14] 徐萍. Ce、Nd、Sr 对 AZ91 镁合金显微组织和腐蚀性能的影响[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05.

(责任编辑 姚虹)

Effect of Ce and Nd on Corrosion Behavior of AZ31 - RE Magnesium Alloy Prepared by Multi - pass Solid Phase Synthesis

KANG Yong

(Yulin Hanting Chemical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Co., Ltd., YuLin, Shaanxi 7181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solid - phase synthesis technology was used to prepare AZ31 chip once squeezed sample, AZ31 - Ce five - time extrusion sample and AZ31 - Nd five - time extrusion sample, and the sample was extruded with AZ31 ingot as a reference, simulate the ocean and the medium in the body. The macroscopic morphology and the microscopic microstructure of the sample were compared, with 3.5 wt% NaCl solution as corrosion medium.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as obvious pitting corrosion on the surface of the specimen and that Cl⁻ accelerated the corrosion of magnesium alloys. In the same time period, the order for the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 seriousness of corrosion from low to high was AZ31 ingot once extrusion sample, AZ31 chip once squeezed sample, AZ31 - Ce five times extrusion sample, and AZ31 - Nd five times extrusion sample. The corrosion rate of all samples was at maximum at 4 h, and the corrosion rate of AZ31 - Nd was $0.641 \text{ 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 At 64h, the corrosion rate of all samples was at minimum, and the corrosion rate of the AZ31 - Nd sample was $0.291 \text{ mg} \cdot \text{cm}^{-2} \cdot \text{h}^{-1}$.

Key words: solid state synthesis; microstructure; corrosion rate; microanalysis; weightlessness

提高 VC 6.0 中函数执行时间测试可信度的研究

张合花,张全法,马 冰

(郑州大学物理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VC 6.0 集成了一个测试函数执行时间的工具,为开发对运行速度有较高要求的程序带来了方便,但是该工具在某些情况下给出的结果很不可靠。通过例程证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提出了测试具有更高可信度之函数执行时间的方法,并通过实验证明了其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函数执行时间;集成测试工具;可信度;VC6.0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23

中图分类号:TP31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19)03-0121-04

C/C++ 程序可以获得很高的运行速度,而许多情况下对程序的运行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特别是需要实时处理大量信息的时候。但是 C/C++ 程序写出后往往还需要进行优化来提高速度。常用的优化技巧包括:尽量采用自增、自减运算和赋值缩写,利用指针法访问数组,合理使用内联函数和寄存器变量,采用位运算代替一些乘法或除法运算,尽可能将浮点数运算转化为整数运算,正确运用内存拷贝函数,等等^[1-4]。

对程序优化后通常需要测试运行速度,以便确认取得了优化效果并了解优化程度。文献[5]通过编程测试程序运行时间,这非常麻烦,并且仅适用于它小于一个时间片。实际上,VC 6.0 作为许多高校教学平台程序员惯用的开发工具,其内部集成了一个使用非常方便的测试工具,可以用来测试程序中各个函数的执行时间,已经在不少方面获得了应用^[3-4]。然而实验证明,在某些情况下该工具所给的测试数据非常不可靠。为此,提出了获得具有更高可信度之函数执行时间的方法。

1 实验用程序及集成测试工具使用方法

1.1 实验用程序

利用 VC 6.0 新建 Win32 Console Application 类型的空白项目,然后添加头文件 MyClass.h,内容如下(为节省篇幅,对代码做了尽可能的简化,并利用

先注释掉部分代码再逐步修改的方法,将本研究所用的多个程序揉和在了一起,下同):

```
externint x;  
classA {public:  
    //A() {a = x ++ ;} //标记①  
    //~A() {a = 0;} //标记②  
    //A(); //标记③  
    //~A(); //标记④  
    int a;};
```

```
class B {int b;};
```

接着添加源文件 MyClass.cpp,内容如下:

```
#include "MyClass.h"  
//A::A() {a = x ++ ;} //标记⑤  
//A::~~A() {a = 0;} //标记⑥
```

最后添加源文件 main.cpp,内容如下:

```
#include <iostream >  
#include "MyClass.h"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x = 1;  
voidfunc() {A *p = new A[100];delete[] p;}  
void consume() {B *p = new B[100];delete[] p;}  
void main() {  
    for(int i = 0; i < 10000; i++) { //标记⑦  
        //consume(); //标记⑧
```

收稿日期:2019-04-26

作者简介:张合花(1970—),女,河南汤阴人,郑州大学物理工程学院高级技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信息处理。

```
func();} //标记⑨
```

程序中,func()函数先利用矢量形式的新运算符动态创建变量数组,再利用矢量形式的delete运算符动态释放内存,为主要测试对象。consume()函数的功能与它相同,不过创建对象时所用类型不同,其作用后面说明。

1.2 集成测试工具使用方法

利用VC 6.0提供的工具测试函数执行时间的完整步骤是:①单击Build弹出菜单上的Set Active Configuration菜单项,设置程序的当前编译、运行版本为Debug或Release版。②同时按下Alt和F7键,在弹出的对话框的Link选项卡上,选中Enable Profiling复选框。③单击Build弹出菜单上的Re-build All菜单项,编译、链接程序。④单击Build弹出菜单上的Profile菜单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上确保单选按钮Function timing处于选中状态,再点击OK按钮启动测试。程序退出后在Output面板上的输出窗口即可看到各函数的执行时间,此后步骤可以简化,不必每次都完整进行。

输出结果中,Func Time称为函数的部分总执行时间,它是多次调用所需时间的总和,但是不包括在其内部调用其他函数所需时间。Func + Child Time称为总执行时间,它是多次调用所需时间的总和,且包括在其内部调用其他函数所需时间,将其除以调用次数即为前面所说的函数执行时间。Hit Count为函数调用次数,Function为对应的函数。

2 问题的发现

2.1 发现问题所用程序

上述程序称为设计1。在其基础上:将标记①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2;将标记②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3;将这两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同时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4。

按照C++编程思想,new运算符内部首先调用malloc()函数动态分配内存,再调用自定义类型的构造函数初始化对象;delete运算符内部首先调用自定义类型的析构函数清除对象,再调用free()函数动态释放内存^[6]。因此,可用来比较没有自定义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仅有前者、仅有后者、二者皆有等情况下func()函数执行时间的差异。

2.2 实验条件与测试结果

实验所用计算机型号为Lenovo G50-70m,操作系统为Win10,其CPU为Intel Core i3-4030U,主频为1.90 GHz,下同。分别在Debug和Release版下对func()函数的总执行时间测试10次。对于

Release版,优化策略为最大速度,下同。

由于操作系统的多任务特性,每次运行程序同一函数的执行时间存在明显差异。为此采取的措施有:利用for循环增加函数总执行时间的有效位数并减小波动幅度,若某次测试结果偏离平均值太多则舍弃重测,对总执行时间测试多次求平均值,等等。得到测试数据后计算平均总执行时间及标准偏差,结果如表1所示。VC 6.0给的时间以ms为单位,小数点后面有3位数字。考虑到数据的波动性,仅给出了2~3位数字,下同。

表1 设计1~4中func()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ms

版本	设计1	设计2	设计3	设计4
Debug	7.7 ± 0.3	198 ± 5	197 ± 6	388 ± 8
Release	4.0 ± 0.3	8.0 ± 0.8	168 ± 5	337 ± 7

2.3 测试结果分析

设计2~4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均比设计1的对应值大许多。这是因为没有自定义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时,new运算符会调用默认构造函数,delete运算符会调用默认析构函数,而默认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皆为空函数,执行速度一定比自定义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快许多。Release版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小于Debug版的对应值。这是因为Debug版需要嵌入调试信息而Release版不需要。

Debug版下设计2和3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相等。这是因为自定义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差别很小,二者的执行时间差别应该不大,而默认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的执行时间差别也应该不大。Debug版下设计4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为设计2与3平均总执行时间之和再减去设计1的平均总执行时间。根据上述分析,正应该如此。问题是,Release版下设计3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为设计2的20倍,设计4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为设计3的2倍,这不符合预期。而Release版下函数的执行时间通常是最应该关心的。

3 假设与验证

3.1 引起问题之原因的假设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Release版下对于设计2进行测试时,在VC 6.0给的结果中找不到执行自定义构造函数的总执行时间,对于设计3有自定义析构函数的总执行时间,对于设计4二者皆有。然而很容易证明,对于设计2程序运行时确实调用了自定义构造函数。于是可以假设:对于使用了矢量形式之new和delete运算符的函数,测试其Release版执行时间时,测试工具在仅有自定义构造函数情况下未统计自定义构造函数的执行时间。

3.2 假设的具体化

为了使假设更具体,在设计 1 的基础上,将标记③和⑤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同时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 5;将标记④和⑥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同时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 6;将这四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同时删除后的程序称为设计 7。设计 5~7 与设计 2~4 的区别在于,自定义构造函数和(或)析构函数皆由内联成员函数变成了非内联成员函数。按照同样的方法对设计 1 和设计 5~7 中 func()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进行测试和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设计 1 和 5~7 中 func()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ms

版本	设计 1	设计 5	设计 6	设计 7
Debug	7.8 ± 0.3	200 ± 5	197 ± 6	391 ± 4
Release	4.1 ± 0.4	169 ± 5	166 ± 6	330 ± 5

此时 Release 版下设计 5 和 6 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大约相等,设计 7 的平均总执行时间也大约为设计 5 与 6 平均总执行时间之和再减去设计 1 的平均总执行时间。因此,将前述假设具体化为:对于使用了矢量形式之 new 和 delete 运算符的函数,测试其 Release 版执行时间时,测试工具在仅有内联自定义

表 3 设计 I~VII 中 main()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s

测试手段	版本	设计 I	设计 II	设计 III	设计 IV	设计 V	设计 VI	设计 VII
VC 6.0	Debug	8.2	191	189	406	203	201	399
	Release	4.6	7.7	176	334	171	162	352
人工测试	Debug	5.34 ± 0.04	30.1 ± 0.3	27.5 ± 0.1	50.5 ± 0.1	29.3 ± 0.1	28.1 ± 0.1	50.7 ± 0.1
	Release	0.97 ± 0.06	4.45 ± 0.04	5.49 ± 0.04	10.0 ± 0.1	4.68 ± 0.06	5.55 ± 0.05	10.1 ± 0.1

再利用一款苹果手机上的秒表功能进行人工测试,对于每个设计测试 10 次,然后计算平均值及标准偏差,结果在表 3 中同时给出。为方便操作,利用工具栏的快捷按钮启动程序的同时让秒表开始计时,出现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后停止计时。另外发现,每当程序修改后启动运行时,前几次往往明显偏慢,需要跳过。

由于 main() 函数的部分执行时间很短(参见后面实验结果),即使将其总执行时间视为 func()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误差也不是很大。根据表 3 中的数据可知:采用测试工具时调用次数变为以前的 1000 倍,相应的总执行时间也大约为以前的 1000 倍,这符合预期,不算很大的偏差主要是数据波动性的影响,main() 函数部分执行时间的影响并不大;人工测试时,对于 Release 版,无论是内联的还是非内联的,自定义构造函数对执行时间的贡献与自定义析构函数相差不多。这是对所作假设的支持。

3.4 测试工具的可信度问题

对实验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所作假设成立,测试工具所给数据的可信度也值得怀疑。根据测试工具所给数据:设计 I~VII 中 main() 函数总

构造函数情况下,未统计自定义构造函数的执行时间。若果真如此,将设计 2 中 func() 函数在 Release 版下的总执行时间近似取为 168 ms,将比由测试工具所给数据得到的 8.0 ms 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3.3 实验对假设的支持

假设的正确性必须通过人工测试来验证。人工测试时必须设法让函数的总执行时间足够长,从而使得人工测试误差小到可以容许的程度。为此,将设计 1 中标记⑦所在行的 10 000 改为 10 000 000,此时的程序称为设计 I。在设计 I 的基础上进行上述修改,由设计 2 得到设计 II,以此类推,直到得到设计 VII。另外注意,人工只能直接测试整个程序即 main()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为了进行比较,先利用测试工具按照上述方法测试 main()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不同的是仅测试 1 次且不再计算平均值及标准偏差。这是因为此时完成一次测试所需的时间很长,例如对于设计 VII 测试一次耗时长达十几分钟,主要影响因素是测试工具本身需要时间。测试结果如表 3 所示。

执行时间之比与设计 1~7 中 func() 函数总执行时间之比基本一样,在 Debug 和 Release 版下分别约为 1:25:25:50:25:25:50,1:2:40:80:40:40:80;如果认为所作假设成立,Release 版下的比值大约为 1:40:40:80:40:40:80;对于相同设计,Debug 版的总执行时间不超过 Release 版的 2 倍。

然而根据人工测试数据:设计 I~VII 中 main() 函数总执行时间之比在 Debug 和 Release 版下却大约皆为 1:5:5:10:5:5:10;对于相同设计,Debug 版的总执行时间大约为 Release 版的 5 倍。将数据的波动性、main() 函数的部分执行时间、测试工具运行所需的时间以及人工测试时的反应速度等因素之影响加在一起,都不足以造成与测试工具所给数据之间如此大的差别。虽然这不否定所作假设,但它确实可能是 VC 6.0 提供的测试工具内部的又一个 Bug,使得它在特定条件下给的结果不可信,必须进行人工测试才能够得到可信的结果。

4 获取高可信度的测试数据

4.1 获取任意函数执行时间的方法

人工获取任意函数执行时间的方法只能是间接的:程序整体完成后,测试 main() 函数的总执行时

间 T_1 (亦即它的执行时间,因没有通过循环多次调用它);然后将对被测试函数的调用注释掉,再次测试 $\text{main}()$ 函数(其中可能包含对其他函数的必要调用)的总执行时间 T_2 ;于是,被测试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T = T_1 - T_2$,执行时间等于 T 除以调用次数。若 T_1 比较小,减小其测试误差的方法如前所述。若 T_2 比较小则可以通过调用“耗时函数”来减小其测试误差。这种耗时函数本身没有意义,但是总执行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测试 T_1 和 T_2 时不变。

表4 设计 i ~ viii 中 $\text{main}()$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版本	设计 i	设计 ii	设计 iii	设计 iv	设计 v	设计 vi	设计 vii	设计 viii
Debug	10.1 ± 0.1	34.2 ± 0.1	32.1 ± 0.1	55.0 ± 0.1	34.2 ± 0.1	32.1 ± 0.1	55.1 ± 0.1	5.3 ± 0.1
Release	1.9 ± 0.1	5.5 ± 0.1	6.2 ± 0.1	10.8 ± 0.1	5.4 ± 0.1	6.2 ± 0.1	10.8 ± 0.1	1.0 ± 0.1

将表4中设计 i ~ vii 的 T_1 减去设计 viii 的 T_2 ,得到设计 i ~ viii 中 $\text{func}()$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T_i \sim T_{viii}$,如表5所示。

表5 设计 i ~ viii 中 $\text{func}()$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

版本	T_i	T_{ii}	T_{iii}	T_{iv}	T_v	T_{vi}	T_{vii}
Debug	4.8	28.9	26.8	49.7	28.9	26.8	49.8
Release	0.9	4.5	5.2	9.8	4.4	5.2	9.8

将表5中的结果与表3中的人工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可知, $\text{main}()$ 函数的部分执行时间很短,如果不添加对耗时函数的调用,人工直接测试将非常困难。但它的影响还是有的,将其影响剔除后可以提高测试结果的可信度。

4.3 关于操作系统多任务特性的影响

若按照本文提出的方法测试函数的执行时间,其中将包含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其他任务中断所消耗的时间。文献[7]认为不应该包含它,但是本文认为恰好应该包含它,因为在这样的操作系统中被中断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包含它才能反映实际情况。

5 结语

本文通过实验证明了 VC 6.0 提供的函数执行时间测试工具对于使用了矢量形式之 new 和 delete 运算符的函数存在问题:在 Release 版下当仅有内联自定义构造函数时,没有统计自定义构造函数的

4.2 实验结果

在设计 I 的基础上,将标记⑧所在行前面的注释符号删除以添加对耗时函数 $\text{consume}()$ 的调用,此时的程序称为设计 i。在设计 i 的基础上进行上述修改,由设计 2 得到设计 ii,以此类推,直到得到设计 vii,再将标记⑨所在行对 $\text{func}()$ 函数的调用(注意不包括后面的两个右花括号)注释掉,此时的程序称为设计 viii。然后按照上述方法人工测试并计算平均值及标准偏差,结果如表4所示。

执行时间;无论 Debug 版还是 Release 版,其所给数据的可信度都太低。此时,通过人工测试调用和不调用被测试函数时 $\text{main}()$ 函数的总执行时间,再取二者之差,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如多次循环调用、添加调用耗时函数等减小测试误差,可以得到较高可信度的测试数据。或许还有更多的类似情况尚未发现,相信皆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解决。

参考文献:

- [1]唐娟.合理提高 C/C++ 程序效率的方法[J].孝感学院学报,2006,26(3):68-70.
- [2]张志军,孙志辉.基于 VC 平台的彩色图像的灰度化技术[J].自动化技术与应用,2005,24(1):61-63.
- [3]张全法,陈倩,王东亚.帧差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图像亮度的校正[J].应用光学,2013,34(5):778-783.
- [4]张合花,张全法,李素晓.利用内存拷贝函数提高 C/C++ 程序运行速度的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17,34(6):125-128.
- [5]赵家森.在 VC++ 6.0 中精确测量程序的运行时间[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3(4):158-160.
- [6]ECKEL B. C++ 编程思想:第1卷 标准 C++ 导引[M].2版.刘宗田,袁兆山,潘秋菱,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305-309.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Improvement of the Test Credibility of Run Time Testing of Functions in VC 6.0

ZHANG Hehua, ZHANG Quanfa, MA Bing

(School of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VC 6.0 provides an integrated tool for testing the run time of functions, and it is very convenient to develop programs that require a high running speed. But under some conditions, the given data of the tool are very incredible, which is proved by testing some designed program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for acquiring more credible data and proves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through experiments.

Key words: run time of function; integrated testing tool; credibility; Visual C++ 6.0

大数据流式计算框架的任务调度优化方法研究

梁秋红¹, 郝雅萍²

(1. 运城广播电视大学 成教部, 山西 运城 044000; 2.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务处, 山西 朔州 036000)

摘要: Storm 是当前流式大数据计算处理的主要平台, 它配置了一个自动任务调度框架, 但其并未考虑到网络节点负载不均衡, 调度方式单一。提出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 将子拓扑中组件线程都分配给固定的工作节点上; 基于负载均衡任务调度策略, 应用贪心策略选取资源数量最大的工作节点进行分配,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任务调度策略具备较好的实时性。

关键词: 任务分配; 负载均衡; 固定节点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9.03.024

中图分类号: TP31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19)03-0125-04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物联网、社交网络等在各个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每天都会产生海量数据, 人们已经逐步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如何高效处理海量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工业界以及学术界重点研究的方向。大数据的计算模式包含批量计算、流式计算、交互计算、图计算等, 以批量计算、流式计算为主^[1-2]。批量计算一般处理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海量数据, 适合应用在实时性较低的环境下, 常见的有 Hadoop 生态系统; 流式计算以数据流的方式计算进入到内存中的工作节点, 只要数据源保持活动状态, 就会持续不断地生成数据且无需进行存储, 适用于实时性要求较高且处理窗口局部数据的应用领域中。流式大数据平台可以显著提升在线数据密集型应用的用户体验, 广泛应用在各类实时性非常严格的行业领域中, 例金融银行、股市分析等^[3]。

1 Storm 模型框架

一个完整的 Storm 分布式系统由 4 类节点组成, 分别为:

(1) 主控节点。用户会将拓扑作业提交给主控节点, 直接将任务分配给工作节点, 提供状态获取接口。

(2) 工作节点。它是 Supervisors 运行的后台节点, 完成 Nimbus 分配任务的监听动作, 属于分布式部署。

(3) 控制节点。它是一个 Web 服务器, 将计算结

果反馈给用户, 并提供给制定端口网页服务。

(4) 协调节点。负责所有节点的协调配置管理, 也是维持 Storm 系统稳定、实用性的关键因素。

2 任务调度优化

2.1 Storm 基本模型

2.1.1 Storm 拓扑逻辑模型

拓扑结构一般都是应用二元组 (C, S) 来描述, 其中 $C = \{c_1, c_2, \dots, c_{|C|}\}$ 表示拓扑顶点集合, 每个顶点表示 1 个组件, 符号定义为 Spout 或 Bolt; $S = \{s_{1,2}, s_{1,3}, \dots, s_{|C|-i, |C|}\}$ 表示拓扑中有向边集合, 每个组件表示相邻组件间的数据流传递。当 $s_{ij} \in S \rightarrow c_i, c_j \in C, i \neq j$, 即表示 c_i 组件发送了数据, 并由 c_j 接收。因此就可以定义拓扑逻辑模型为具备上述特征的有向无环图^[4-6]。

图 1 为一个拓扑逻辑模型, 图中组件集为 $\{c_a, c_b, \dots, c_g\}$, 数据流集为 $\{s_{a,c}, s_{a,d}, \dots, s_{e,g}\}$ 。数据初始顶点 Spout 为 c_a, c_b , 主要功能为数据的输入以及发送到流式计算群待处理; 其余的节点表示为 Bolt, 主要功能为接收上一组件数据并将计算结果发送给下一组件; 数据流的终端节点 c_f, c_g 直接将结果展示给用户或保存到数据库中。

假设任意组件 c_i, c_j, c_k, c_l 是 c_i, c_k 的中间组件, 组件 c_i 发送的数据可以经过 c_j 组件到达 c_k 组件, 则表示组件 c_j 的关联组件为 c_i, c_k 。例如图 1 中 c_d 组件的关

收稿日期: 2019-02-28

作者简介: 梁秋红(1968—), 女, 山西运城人, 运城广播电视大学成教部讲师, 主要从事会计专业教学和企业会计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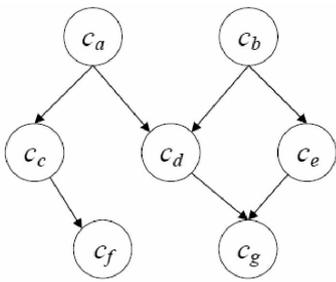


图1 Storm 拓扑逻辑模型

联组件为 c_a, c_b, c_g ; c_e 组件的关联组件为 c_a, c_f 。

2.1.2 流任务

在拓扑逻辑模型中,每个组件都可以并行处理多个任务,且每个任务由一个工作线程处理。而对于其中任意的组件 $c_i \in C$,存在任务 $E_i = \{e_{i1}, e_{i2}, \dots, e_{iT_i}\}$, 当中 e_{ij} 表示 c_i 运行的第 j 个任务,尤其是任务数量为 1 的组件 c_i ,则可以定义 $E_i = \{e_{i1}\} = e_i$ 。其中任务关联则表示存在上一任务流和下一任务流之间存在较大的数据流关联。图 2 为图 1 中的任务拓扑实例模型,其中组件 c_a 有 3 个任务: e_{a1}, e_{a2}, e_{a3} , 任务关联以 e_{a1} 为例,它的关联任务分别为 e_a, e_b, e_{c1}, e_{c2} 。子拓扑中各个组件必须存在数据流,即子拓扑中任务是可以数据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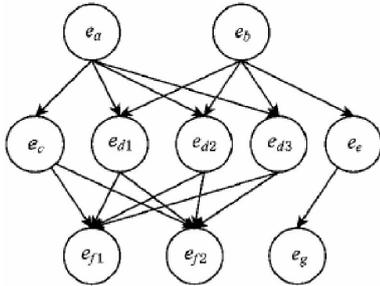


图2 拓扑流结构

2.2 任务调度策略

在 Storm 集群中,资源都是由工作节点 Supervisor 构成的,slot 表示任务工作节点内存资源,每个 slot 表示一个内存资源,且每个 slot 都只能被一个线程 (Work) 占用。在每个 slot 中每个 Work 则会包含多个 Executor 执行器,当中每个 Executor 执行器有很多个 Task 任务。Storm 默认的调度器为 EventScheduler,它是通过轮询策略来搜索集群中所有拓扑结构的工作节点,并将资源较为均匀地分配给任务进程^[7]。

上述任务调度策略较为简单,任务分配较为均匀,已经应用到较多的场景中,但该上述资源分配调度只是平均分配集群资源,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具体任务对于磁盘、内存、CPU 等需求都不一样,甚至子拓扑结构的关联任务需求资源都不一样,这就会给流式数据任务调度性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当某些业务对于

CPU 的需求较高时,若采用上述任务调度策略就会致使子拓扑中任务都运行在同一个工作节点中,很容易发生集群工作节点负载不均衡的现象。

2.3 任务调度策略优化

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任务分配不均匀以及负载不均衡的问题,提出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分配调度策略,该任务分配调度策略将子拓扑中的计算组件强制运行在一个固定机器上,且分配计算任务较为简单的子拓扑,这就可以促进组件的维护管理;基于负载均衡策略,将子拓扑中多个线程都均衡分配给集群的各个工作节点,确保组件可以获得相似的线程数量,降低同性资源竞争,将一些对 CPU 需求较大的相似组件分配到不同任务处理,以此来获得更加均衡的资源调度^[8]。

2.3.1 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

基于固定节点的直接分配调度策略,将子拓扑的组件线程都分配到一个固定的物理节点上,避免元组在不同节点间进行传输,提高任务调度的运维管理能力。子拓扑中组件固定分配给某一个物理节点,当数据临近该物理节点,就可以直接就近分配给该节点,以此来降低带宽开销;计算得到的数据结果 Bolt 直接分配给该节点,提升数据存储速度。具体任务调度优化步骤如下:

(1)目标定位。判断需求子拓扑是否已经上传到集群资源上,并从 Storm 拓扑模型中找到需求子拓扑进行下一步任务分配。

(2)确定目标是否需要分配。根据定位到的目标子拓扑,判断其是否已经被任务调用分配过:已经被调用过,则进入下一步;否则分配调度资源。

(3)定位目标线程。要对需求子拓扑中线程进行分配调度,已经被分配过线程不能被调度。

(4)目标组件分配确认。根据得到的需求子拓扑所有组件的线程,并确认目标组件是否要被分配资源。

(5)工作节点定位。在确认目标组件需要分配资源后,找到分配的相关执行器,接下来定位子拓扑进程节点。

(6)得到目标资源。根据上述定位到的目标进程得到相关资源 slot,并判断 slot 资源是否可以满足子拓扑需求,当无法满足时要将已经被占用的 slot 释放,供需求子拓扑调用。

(7)分配调度。循环上述过程,并将所有非目标子拓扑的任务调度都分配给 Storm 的调度管理器 EventSchedule 实现。

2.3.2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应用贪心算法思想,在

每次对任务进行调度时尽可能分配 slot 数量最多的节点。定义符号 $L_i (i=1,2,\dots,t)$ 表示第 i 个子拓扑需求

进程数量, $K_i (i=1,2,\dots,t)$ 表示第 i 个子拓扑需求线程数量。任务调度策略步骤如表 1。

表 1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序号	步骤
1	Storm 拓扑逻辑模型需要资源的子拓扑进行提交,已经分配的子拓扑不处理。
2	循环获取得到子拓扑中进程数量 $C_i (i=1,2,\dots,t)$,且计算每个子拓扑中组件的并行度之和 $S_i (i=1,2,\dots,t)$ 。
3	根据任务需求判定包含组件是否为特殊组件,例 CPU 需求较高的任务,如果属于特殊组件,调到步骤 4,否则调到步骤 5。
4	将特殊组件线程分配给不同线程,线程组件会均衡分配到线程中,调到步骤 6。
5	根据每个线程可分配执行器数量,实现平均分配,并判断剩余线程数量。
6	计算每个工作节点中可以使用到的内存资源 Slot 数量,并降序排列。
7	判断当前节点是否已经被分配过,若第一次分配组件线程,则将其分配给资源数量最大的 Slot,否则选择下一个工作节点。
8	当子拓扑中进程还在线程未被分配调用,跳转循环步骤 4 到步骤 7,否则跳转到步骤 9。
9	当所有的子拓扑都被调度分配,或当前没有 Slot 数量可以被调用,结束上述过程,否则循环步骤 3 到步骤 8。

3 实验和评价

3.1 实验环境

实验所用的 Storm 环境搭建在 Linux 虚拟机中, Linux 虚拟机数量为 6; Storm 集群由 1 个 Nimbus 节点、5 个 Supervisor 节点构成;内存为 8G; CPU 为 4 核;每台服务器硬盘大小为 80G。

3.2 数据时间性能测试

将本文任务调度算法应用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交通领域中,并从中获取到上百亿海量的车牌识别数据,并将其输入到集群系统中。将集群计算组件 Bolt 并行度设置为 5,以此来测试集群计算时间,即一条实时数据从传输到计算识别完成所需的时间。从图 3 可以看出,数据处理时间基本为 0.6 ms,波动范围很小,表明本系统可以实时计算处理高并发数据流,具备非常好的时间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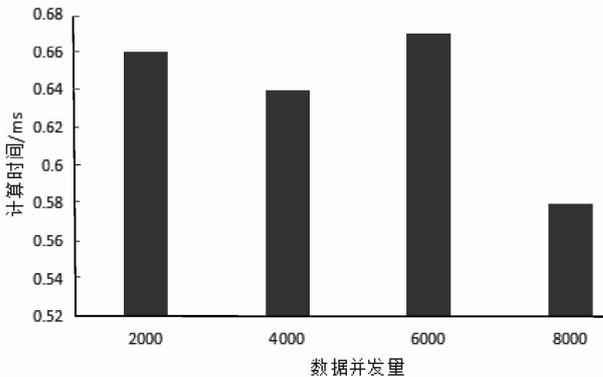


图 3 不同数据并发量下的计算时间

3.3 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评价

将某一个子拓扑作业“List”中的所有进程分配到工作节点“storm - node”上,且该作业任务提交给 Nimbus 节点上,将并行度设置为 5。表 2 表示各个工作节点的使用情况;在 storm - node 工作节点上只有一个进程,即 list;其他工作都没有工作,即集群中其他的 slot 都是闲置的。

表 2 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调度结果

工作节点	可用 slot	已用 slot
storm - node	8	5
storm - node	8	0
storm - node	8	0
storm - node	8	0
storm - node	8	0
storm - node	8	0

通过将子拓扑 list 的并发度定义为 2,4,6,8,并将该 list 提交到集群中,并分别将引用 storm 默认的调度器以及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进行识别时延对比,实验结果如图 4 所示。根据图 4 可知,直接分配固定节点的任务分配调度策略因降低了各个数据在网络关联度,明显降低了数据处理时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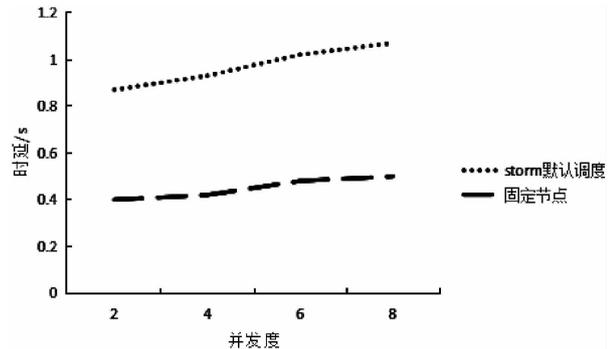


图 4 不同并发度下的两种调度器的处理时延

3.4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评价

为了更好地测试集群负载均衡任务调度策略的正确性,在当前集群环境中配置以下任务负载,并实时记录各个集群的使用情况。

(1) 创建一个子拓扑 T_1 , 包含了一个 spout (1 个任务), 两个 bolt (均为 8 个 task), 定义并发度为 4;

(2) 创建一个子拓扑 T_2 , 包含了 spout (1 个任务), 3 个 bolt (前两个 bolt 为 8 个 task, 第三个 bolt 为 1 个 task), 定义并发度为 3;

(3) 创建一个子拓扑 T_3 , 包含了 spout (1 个任务), 2 个 bolt (均为 8 个 task), 定义并发度为 3。

在提交每个子拓扑作业后,集群中节点 slot 数量

的使用情况如表3。分析表3可知,在完成 T_3 子拓扑提交后,集群中每个节点都应用了2个slot。由此可得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可以将子拓扑中作业进程平均分配给各个工作节点,且在任务调度时,选择可用资源数量最大的节点进行分配。

表3 基于负载均衡的任务调度策略

	T_1		T_2		T_3	
	可用 slot	已用 slot	可用 slot	已用 slot	可用 slot	已用 slot
S-node	8	1	7	2	5	2
S-node1	8	1	7	2	5	2
S-node2	8	1	7	1	5	2
S-node3	8	1	7	1	6	2
S-node4	8	0	8	1	6	2

4 结论

Storm是当前处理流式大数据的主要框架,已经被广泛应用在实时性要求较高的领域行业中。Storm自带任务分配调度器没有考虑现实环境中任务需求以及负载均衡,会对任务调度性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提出两种优化调度策略来解决上述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具备较好的实时处理效率。

参考文献:

- [1]鲁亮,于炯,卞琛,等. Storm环境下基于权重的任务调度算法[J]. 计算机应用,2018,38(3):699-706.
- [2]鲁亮,于炯,卞琛,等. 大数据流式计算框架 Storm 的任务迁移策略[J].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8,55(1):71-92.
- [3]孙怀英,虞慧群,范贵生,等. 大数据流计算环境下的低延时高可靠性的资源调度方法[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3(6):855-862.
- [4]蒲勇霖,于炯,王跃飞,等. 大数据流式计算环境下的阈值调控节能策略[J]. 计算机应用,2017,37(6):1580-1586.
- [5]梁毅,侯颖,陈诚,等. 面向大数据流式计算的任务管理技术综述[J].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17,39(2):215-226.
- [6]杨秋吉,于俊清,莫斌生,等. 面向 Storm 的数据流编程模型与编译优化方法研究[J].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2016,38(12):2409-2418.
- [7]宋杰,孙宗哲,毛克明,等. MapReduce 大数据处理平台与算法研究进展[J]. 软件学报,2017,28(3):514-543.
- [8]孙大为,张广艳,郑纬民. 大数据流式计算:关键技术及系统实例[J]. 软件学报,2014,25(4):839-862.

(责任编辑 姚虹)

Research on Method of Task Scheduling Optimization of Large Data Flow Computing Framework

LIANG QiuHong¹, HAO Yaping²

(1. Department of Adult Education, Yunche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2.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Shuozhou Normal College, Shuozhou, Shanxi 036000, China)

Abstract: Storm is the main platform for current stream-based large data computing. It configures an automatic task scheduling framework but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unbalanced load of network nodes, and the way of scheduling is single. In this paper, a task allocation and scheduling strategy for direct allocation of fixed nodes is proposed, in which component threads in sub-topologies are allocated to fixed working nodes. Based on load balancing task scheduling strategy, the greedy strategy is applied to select the largest number of working nodes to allocate resourc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ask scheduling strategy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effective and has good real-time performance.

Key words: task allocation; load balancing; fixed nodes